

韩国史新论

〔韩〕李基白 著
厉帆 译
厉以平 译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韩国史新论

〔韩〕 李基白 著
厉 帆 译
厉以平 译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史新论/(韩国)李基白著;厉帆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9

ISBN 7-80105-150-5

I. 韩… I. ①李… ②厉… II. 历史—韩国 N. K3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8906 号

韩国史新论

[韩]李基白 著

厉 帆 译

厉以平 译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发行

京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2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80105-150-5/K·12 定价: 14.50 元

著者序言

能结识未知的新读者对著者来说是件幸事，能与中国的新读者见面尤感高兴。这是因为韩国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着频繁文化接触的邻邦。

在韩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以通过书籍进行的学问交流最为突出。学问是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这一属性为普通性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现在正在进行不少学问交流，如果本人的著书能对此种交流有所助益，著者将实感荣幸。

正如有经验人所深知的，翻译是一桩烦难的工作。借此机会著者想向承担这一烦难工作的厉帆，及为译文进行校阅的厉以平先生致以真诚谢意。

1992年4月

于汉城 道谷书室

著者 识

译者序

李基白教授（1924· ）是韩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韩国史学会会长。他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学系，后又回国攻读社会学，自1947年以来一直从事历史学的讲授与研究，现任翰林大学史学科教授。他在兵制史领域造诣颇深，其代表作《高丽兵制史研究》（1968年）是这方面研究者的必读文献。在朝鲜通史，尤其在古代及中世纪史方面，李基白教授用功极勤，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除《韩国史新论》外，主要有《新罗政治社会史研究》（1974），《新罗时代的国家佛教与儒教》（1978），《韩国古代史论》（1975）；涉及韩国社会传统的编著有《民族与历史》（1977），《韩国史学的方向》（1978），《檀君神话论集》（1988），《读书随录》等。

《韩国史新论》（以下简称《新论》）自1967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备受本国史学界的推崇，并被译成日、英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史学界也享有盛名。该书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广泛、持久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在史学编纂体系和史料运用上都透着“新”意。

韩国史的编纂主要分三个阶段：李朝时期，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族解放之后。李朝时期史籍编纂一般立足于儒学立场，秉承中国儒学鉴戒史观，沿袭中国纪传体形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史学界御用主义史观盛行，殖民主义色彩浓厚。1945年民族解放后，史学团体即着手编纂韩国通史，民族主义史学观勃然兴起，殖民主义御用史观遭到摒弃。然而在记叙形式上不是承继中

国史学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就是沿袭欧洲史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体系。因此，迄止本世纪6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部成功的通史。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新论》不仅以其民族主义史观和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史学编纂体系——以支配势力的变迁作为时代划分的原则，引起当时史学界的瞩目。

如果说《新论》在问世后是以其观点新颖、体系独特而引起当时史学界的重视，那么在初版后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其新意则表现为不断吸收史学界最新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于1967年初版后，于1976和1990年分别出版了修订版和新增版，两次增修，不仅增添了现代史部分（至1961年四月革命），而且还应用史学界新材料对原著进行局部修订和充实。

《新论》在体系构造上颇具新意，为便于说明，现将该书16章目录抄录于下：

- 第一章：原始共同体社会
- 第二章：城邑国家与联盟王国
- 第三章：君主统治下的贵族社会
- 第四章：专制王权的形成
- 第五章：豪族时代
- 第六章：高丽的贵族世袭制度
- 第七章：武臣统治
- 第八章：士大夫的出现
- 第九章：两班社会的建立
- 第十章：士林势力的成长
- 第十一章：广作农民和都贾商人的出现
- 第十二章：两班身份制的动摇与农民起义
- 第十三章：开化势力的成长

第十四章：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十五章：民族运动的发展

第十六章：民主主义的开端

该书“以支配势力的变迁作为时代划分的原则”，将整部韩国史分为以上十六个阶段。作者也意识到，从民族立场看，这种“以支配势力为中心”的划分法诚然不无缺陷，他仍坚持认为历史记叙的核心始终是政治，而政治是围绕着支配势力展开的。

《新论》也摒弃了以王朝为中心的时代划分法，有意规避在各章开头交代王朝交替的程式化表述。这是因为一则作者认为王朝交替时政治势力并非必然更替，王朝交替也不是仅仅由于政治势力变动所致，而是有社会、经济等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刻的原因；二则作者认为新罗王朝、高丽王朝、李氏王朝这种以王朝为中心的时代划分体系失于笼统与粗糙，无法把握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症候与脉搏，不能真切地再现历史全貌。而运用比较精密的“以支配势力变迁为原则”的时代划分法则不然，例如它将文化细分为古代文化、豪族文化、贵族文化、武人文化、士大夫文化、两班官僚文化（政治、经济亦按同一原则处理），用精雕细刻的方法记叙韩民族历史进程，比历来惯用的粗线条勾勒更丰富、具体。

该书也未采用欧洲史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作者认为“以西洋社会为基准的时代划分法必定使韩国史打上畸形变态的烙印，这是欧洲殖民主义史观，不可盲从”，因此他宁愿从韩民族特有的历史背景与史料出发，另辟蹊径，创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时代划分体系——将支配阶层的推移、变迁作为贯穿整部韩民族历史的中轴线。

虽然这一时代划分法不过是作者的一家之见，并且史学界至今对此仍不无争论（如认为它无视被支配阶级的存在，模糊了与

世界史发展阶段论的关系等)，但仍不失为具有“创意”的探索。

《新论》博采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众多研究成果，参考文献不仅有韩国的，也有日本、中国和欧美等国的史籍和论著。作者在节末和卷尾附录的参考文献涉及时代史、政治史、法制史、兵制史、经济史、地理史、社会史、美术史、金石学、古文学、考古学、巫俗、传记、杂学等各个领域。这份详尽的文献附录不仅方便了读者查阅和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充分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史家风范。

该书对文化史的处理也有引人注目之处。除了将文化史细分为“古代文化、豪族文化、贵族文化”等细致记叙外，作者还将文化史介绍富于匠心地编织于政治、社会、经济史的记叙之中。这样，文化发展便不独为韩民族创造精神的孤立表现，而被视作韩民族全部历史经验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新论》问世后被韩国史学界誉为“有个性的通史”、“史学界的共同财富”，成为迄今为止拥有最广泛读者的一部韩国通史，并且在日、美史学界也引起高度重视和享有赞誉。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更使该书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

《新论》的翻译和中文本的出版得到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

在翻译出版过程中，韩国一潮阁韩万年社长和作者李基白教授始终给予关心和支持。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孙以年总编辑为中译本的尽早问世提供了许多帮助。

在此谨向以上各位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此书出版的友人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共同体社会	(1)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1)
第二节 新石器时期的朝鲜人.....	(3)
第三节 新石器时期的社会和文化.....	(6)
第二章 城邑国家与联盟王国	(10)
第一节 青铜的使用与城邑国家的形成	(10)
第二节 古朝鲜的形成和发展	(15)
第三节 诸联盟王国的形成	(23)
第四节 联盟王国的社会和政治	(29)
第五节 联盟王国时期的文化	(34)
第三章 君主统治下的贵族社会	(40)
第一节 三国的的发展	(40)
第二节 三国的对外关系	(49)
第三节 三国的政治和社会	(53)
第四节 三国的贵族文化	(62)
第四章 专制王权的形成	(70)
第一节 新罗的统一与渤海王国的建立	(70)
第二节 统一后新罗的政治和社会	(78)
第三节 新罗文化的繁荣	(85)
第四节 渤海的社会和文化	(94)
第五章 豪族时代	(98)

第一节	骨品身份制的矛盾	(98)
第二节	地方豪族的兴起	(101)
第三节	后三国	(104)
第四节	高丽的统一	(108)
第五节	豪族的文化	(112)
第六章	高丽的贵族世袭制度	(117)
第一节	高丽贵族制度的形成	(117)
第二节	贵族的统治机构	(121)
第三节	贵族的社 会和经济结构	(127)
第四节	对外政策	(131)
第五节	贵族文化	(136)
第六节	贵族秩序的紊乱	(144)
第七章	武臣统治	(147)
第一节	武臣的掌权	(147)
第二节	农民和奴婢的起义	(151)
第三节	崔氏武人政权	(153)
第四节	对蒙古的抗争	(156)
第五节	武臣时期的文化	(160)
第八章	士大夫的出现	(163)
第一节	亲元政策与权门势族	(163)
第二节	士大夫权势的上升	(169)
第三节	朝鲜王朝的建立	(171)
第四节	新兴士大夫的文化	(175)
第九章	两班社会的建立	(182)
第一节	朝鲜两班社会的建立	(182)
第二节	两班官僚国家的统治机构	(185)

第三节	两班官僚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	(191)
第四节	朝鲜初期的对外政策·····	(198)
第五节	两班贵族的文化·····	(202)
第十章	士林势力的成长·····	(210)
第一节	勋旧势力支配下的社会变迁·····	(210)
第二节	士林势力的登场·····	(213)
第三节	同日本人和女真人的斗争·····	(218)
第四节	士林的文化·····	(225)
第十一章	广作农民和都贾商人的出现·····	(230)
第一节	闾閻政治·····	(230)
第二节	税收制度的变革·····	(233)
第三节	经济的增长·····	(235)
第四节	实学和其它新知识·····	(241)
第五节	艺术表现的新方法·····	(253)
第十二章	两班身份制的动摇与农民起义·····	(257)
第一节	势道政治·····	(257)
第二节	两班身份制的动摇·····	(260)
第三节	农民的反抗·····	(262)
第四节	平民文化的发展·····	(265)
第五节	大院君的改革和孤立政策·····	(272)
第十三章	开化势力的成长·····	(277)
第一节	开化政策以及对开化政策的反应·····	(277)
第二节	开化党的改革运动·····	(285)
第三节	东学农民军的革命运动·····	(292)
第四节	1894年的改革(甲午更张)·····	(301)
第五节	开化时期的商工业和社会思潮·····	(307)

第十四章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侵略	(312)
第一节 独立协会的活动.....	(312)
第二节 日本的政治侵略与“义兵”的斗争.....	(318)
第三节 日本的经济侵略与韩国的民族资本.....	(331)
第四节 爱国启蒙运动.....	(342)
第五节 “三·一”运动.....	(354)
第十五章 民族运动的发展	(361)
第一节 日本殖民政策的转变.....	(361)
第二节 民族资本及韩国农民和工人的状况.....	(370)
第三节 韩国民族运动的新阶段.....	(377)
第四节 维护韩国文化.....	(385)
第十六章 民主主义的开端	(391)
第一节 韩国解放.....	(391)
第二节 大韩民国的建立.....	(394)
第三节 朝鲜战争.....	(397)
第四节 1960年4月革命.....	(400)
附录 历代王室世系	(405)

第一章 原始共同体社会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朝鲜的旧石器时期

人类何时开始生活在我们称之为朝鲜这一历史舞台的，其精确时期现在尚难断定。直到几年前，北咸镜道钟城附近的潼关镇才有关于旧石器时代遗迹的报导。在该遗址上，与猛犸和其它哺乳动物的化石一道还发现了许多被认为是当时人制作的石器和骨制品。不过，这些人工制品可能属于分散在其附近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因此，有些学者不大愿意将这些人工制品与出自同一地点的残遗化石明确地联在一起，也不大愿意把它们归入旧石器时期。但是近年来，在许多发掘物中经常发现有旧石器的遗迹，因此，我们至少可能就朝鲜旧石器时期勾划出一个轮廓。

现在，朝鲜半岛上最著名的旧石器遗址在屈浦里（北咸镜道雄基县境内），祥原（在南平安道的中和县境内），石壮里（南忠清道的公州），浦田里（北忠清道的堤川县）。此外，还有几个旧石器遗址也在调查中。根据这许多遗址的报告，可以推断旧石器时期在朝鲜半岛各地实际上都有人居住。

旧石器时期如何划分还不大清楚，但是根据旧石器末期石壮里两个文化层的时间分别为大约 30000 年和 20000 年前这一事实，一般推测在距今约 40000 年到 50000 年前旧石器时期的人类

便已开始在朝鲜半岛上定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缓慢地演进。但是我们还不清楚，现今的朝鲜人是否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的旧石器时期先民的族裔。

旧石器时期人的生活与文化

旧石器时期的朝鲜人既在洞穴中居住，也在地面建造住所，前者可以举祥原的遗址和浦田里的遗址为例，后者举石壮里的居住遗址为例。石壮里的居住遗址始于旧石器末期，其标志是在一块由墙垣部分围起来的空地上建有炉灶和其它遗迹。炉灶的存在表明火不仅被用来取暖，而且被用来烧煮食物。

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靠采集水果、浆果和可食用树根为生，也靠狩猎和捕鱼为生。狩猎和配制食物所需的工具是用碎石制成的。起先先人把一块大石头砸成许多碎片，留下有刃的、有锋的作工具，而后再把一块块砸碎的石头敲打出新的锋刃并加以利用。这样制成的石头工具各式各样，更适合他们的心意；有手斧、砍刀、打猎和宰割用的尖状器、配制食物用的刮削器以及加工石头和木头用的刻刀。

由于打猎需要集体齐心协力，所以旧石器时期人们很可能过着某种固定形式的公社生活，但采取何种确切形式则无从知道。此外，据推测，旧石器末期的人们还依赖巫术的力量，禳灾祛祸，乞求狩猎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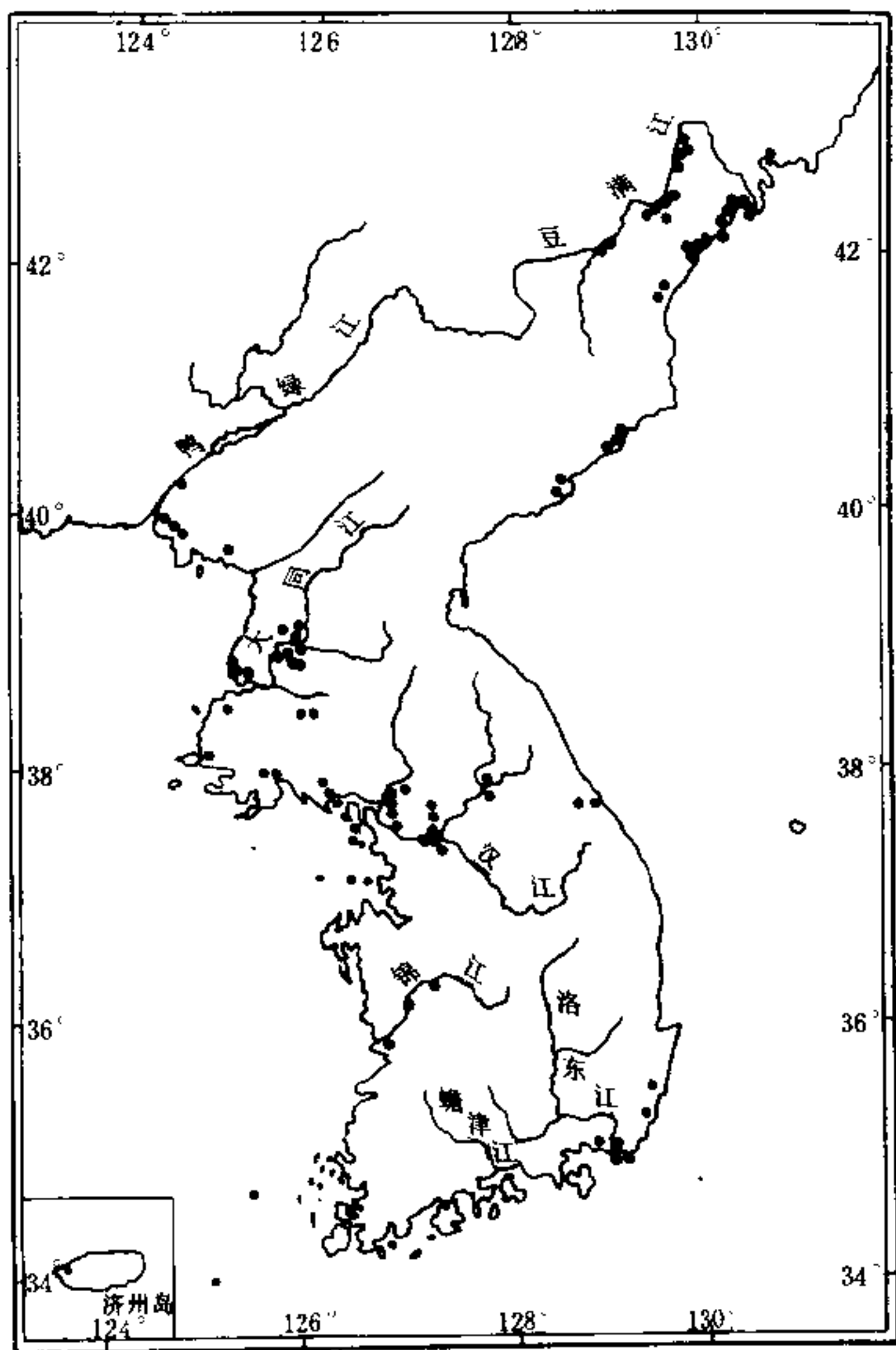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新石器时期的朝鲜人

新石器时期人的出现

一般认为，在朝鲜新石器时期人大约出现在公元前 4000 年，其特征是制作磨制石器和使用陶器。朝鲜最早的新石器时期的居民与当时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那些人可能是同一个族系，一般人认为后者已经使用了圆底无花纹陶器。但是由于这些新石器时期人的居住遗址我们所知甚少，除北咸镜道的雄基和釜山外的影岛上的东之洞外，我们所知不多，因此现在我们对朝鲜的新石器早期的情况还只有一些肤浅的知识。

从大约公元前 3000 年起，新石器人已明显活跃在整个朝鲜半岛上。这时出现了使用新石器时期陶器的人，这种陶器上有特殊的几何图案，常被称作“篦纹陶器”。这种有几何图案陶器呈灰白色，有 V 形尖底，其外表图案有类似梳状条纹的平行线为标记。这种陶器被广泛发现于各地，如南平安道大同县的清湖里，汉城江东区的岩寺洞。这一事实表明了其制作者活动的地理区域。具有类似几何图案的陶器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满洲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蒙古等地也有发现，从而使我们对制作者生活的地理范围和他们的向东、向南迁移的路线有所了解。

大约在公元前 1800 年，绘有素色图案的第三代陶器文化已从满洲延伸到朝鲜半岛，并随着其影响的逐渐渗透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绘有几何图案的陶器在形式和图案上现在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出现了绘有电闪图案这类新形式的陶器。在农圃洞（在北咸镜道的清津境内）、智塔里（黄海道凤山）和校洞（江原道春川）（见图，第 4 页）等地都发现了这种新文化的遗迹。



栉文土器遗迹分布图

随着三次迁移浪潮连续涌入半岛，朝鲜的新石器文化也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与朝鲜旧石器时期的人种不同，新石器时期的人种族系被认为连续不断地构成后来朝鲜族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新石器时期的种族彼此融合，到了青铜时期又与新的种族融合，最后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朝鲜人。

新石器时期朝鲜人的生活

新石器时期朝鲜人的住所遗址多半被发现在沿海和河流沿岸。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新石器时期的人也大胆地深入到内陆地区。

新石器时期人的食物主要来源于他们住处附近的水中生物。在这些新石器遗址处频繁发现的石坠说明已用网捕鱼，当然他们也用钩子和线捕鱼，并收集多种贝壳类动物。狩猎也是获取食物的途径，发现有鹿、獐、野猪等动物的骨头，在新石器遗址处发现的石制品中还有箭簇和枪尖。橡树果的出现，为这些新石器时期人的采集活动提供了证据。这样起初靠打猎、捕鱼、采集为生的人，不久便开始进行农业活动。这一点我们是从后来在遗迹中发现了用于翻土的石锄、用于收割的石镰以及被认为是稷的谷粒而得知的，粮食和橡树果用磨石碾碎做成食物。

新石器时期的朝鲜人大都居住在坑穴中。坑穴被挖成圆形或大致呈四方形，竖有立柱支撑覆盖在上面遮蔽风雨的茅草，坑穴的大小以直径约为6米、坑深为60厘米为典型。在住所地面的中央一般都发现有炉灶，这必定是用来做饭的。炉灶边或入口附近设有贮藏坑，这表明各种工具和粮食都放在手边。各种发现物的方位显示，住所空间被分成居住区及做饭和完成其它家务活动的

区域。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当时的坑穴住所是以什么方式组合成小公社的。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新石器时期人们有时住在天然洞穴或人造洞穴里。

起初，衣服是用兽皮制成的，用石刀把肉刮去，再用骨针缝缀在一起。后来，在原始织布机上用兽毛或植物纤维织出布，再用用这种办法做成的衣服上饰以贝壳和其它装饰性石块。

第三节 新石器时期的社会和文化

氏族共同体社会

几乎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新石器时期，即制作绘有几何图案陶器的人引人注目地定居于朝鲜的时期，社会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根据他们的许多住所聚集一处来推测，他们已经过着某种定居的公社生活。但由于还没有对作为一个完整单位的村落进行过调查，因此现在还不能用住所聚集这一证据来证明社会组织采取的形式。不过，神话、传说和后世记录所描述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如果按照现代社会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对这些资料加以评价，那么是有可能弄清这一早期社会性质的概况的。

当时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朴赫居世传说中的“六村”便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各自按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集团被认为是有图腾的，彼此借助各自所认同的自然界物体相区别。例如，朴赫居世氏族以马为图腾、阇智和阇英的金氏族以鸡为图腾。

这些氏族实体组成了各自的公社，重要事务在氏族大会上决定。普遍认为后来新罗的“和白”制度便代表这种古代传统的延续。可以肯定，氏族由族长来领导，但族长是由氏族成员推选的，

如果他被认为有过失，通常会被免职，这可以从“扶馀”人的王在其历史早期所具有的性质推测出来。正如根据在后来韩国农村发现的公社劳动安排的实际形式可以推测出新石器时期打猎、捕鱼、务农等主要生产活动可能也是共同进行的。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后世习俗如迎鼓（一种祈求上帝或神灵保佑的礼仪）、东盟（这种古老的崇拜仪式也许发源于为尊崇高句丽的开国国王而举行的祭礼）、舞天（为上天舞蹈，一种敬天形式）等等表明，宗教仪式活动也是以公社为基础进行的。此外从沃川人把整个一家埋在一口大棺材的习俗也可以推测，死者是被葬入氏族公共墓穴的。

氏族公社是经济独立、自给自足的实体。无论是采集还是打猎或捕鱼，经济活动不允许在其它氏族所有的领土上进行。如果发生违禁，便要给予“赔偿”，这可以从被称作“责祸”这一东濊（朝鲜东北沿海平原）人的习俗而推测得知。不过，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间也进行一些经济交换，比如从很远的地方带来一种特殊的石头用于制作某种工具。

以上叙述表明这些有血缘联系的氏族公社是具有明显封闭特点的群体。但实行的是族外婚，即不得在公社内部而要从其它氏族去找配偶。这可以从东濊禁止在“同姓”中通婚或氏族集团内通婚的习俗推测得知。可以断言，在新石器时期的某个阶段，血缘是按母系来确定的。高句丽“婿屋”制被认为是这种早期习俗的残余，这种制度规定新郎在婚后要搬入新娘家，在征得女方双亲正式同意后，同新娘在“婿屋”里生活，直到其子女长到一定年龄后才能将妻子带回自己的氏族。但是，近来有人对新石器时期母系血缘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这里根据现在所能推测的对氏族公社的一般结构特点进行了描述，但氏族并不是新石器时期社会组织采取的唯一形式。

较大的社会组织即部落已经出现。有的部落是将几个过去因人口增加而分开的氏族合并而成，有的部落则是将有姻亲关系的氏族合并而成。这些部落往往不仅靠血缘纽带而且靠领土联系来实现他们的团结。但指导部落社会的原则实质上与指导氏族的原则一样。那就是与整个部落有关的事务要在氏族族长大会上决定，部落首领由这些氏族代表推选产生。朴赫居世便是由新罗“六村”的氏族首领大会推举为国王的，与此相似的加耶“九族长”大会推举肯露王也被认为是这种选举部落首领习俗的加工和美化。

新石器时期朝鲜人信仰万物有灵，即相信世上万物都有灵魂。当然人也有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是永生的。因此，在埋葬死者的尸体时，从各方而显得特别注意。石头安放在尸体周围以保护它不受邪恶神灵侵犯，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同他一起下葬，尸体头朝东，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自然物如高山、河流、树木的灵魂被认为与人的灵魂一样，其中一些具有神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太阳，可以从人类卵生的神话中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对太阳的崇拜。例如，据说夏族在太阳光照射到她身体之后开始怀孕，后来生下一枚蛋，高句丽的创建者朱蒙便是从这枚蛋里出生的。再就是朴赫居世的诞生，也被描述成出自子蛋，据说给他起“朴”这个姓（意为“光明”，用来称呼他的这个土语的音是用汉字表达的）就是因为他身上发光的缘故。这两个传说表明高贵的人都被认为是太阳之子。

人们相信象太阳这样善良的神灵给人类带来好运，而那些隐匿在黑暗中的邪恶的神灵则给人类带来不幸。因此，要有精通巫术之人，能驱走恶神，祈求天神保佑带来福祉。据推测，在部落里是这些巫师主持仪式，通过唱歌、跳舞等手段来祛灾避邪，因为上述习俗传统在三韩时期“天君”的日常活动中也发现了。同

样类型的原始宗教习俗在全世界都有发现，在东北亚地区通常称之为萨满教。

原始的艺术形式

“篦纹”陶器可以说是新石器时期艺术形式的代表。这种陶器呈某种圆V形，其外表饰以数行平行斜线，几组线的方向变化不一，构成了象常见的鱼骨图案那样一些几何图形。这些图案，与其认为是简单的装饰，毋宁说是一种宗教象征。一般认为在大部分原始艺术中，平行斜线象征水，所以不妨认为绘有几何图案的陶器上的装饰线也含有象征水的意思。朝鲜新石器早期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于水，但是随着农业的出现，直线图案让位于曲线图案，开始出现了令人联想到电闪的参差不齐呈弯曲状的虚线。一般认为这种图案象征着天神之力使万物苏生的电闪雷鸣。

已发现的唯一雕刻品是岩寺洞遗址出土的某种动物的泥制小雕像的头。还不清楚，它代表什么动物，但其做工栩栩如生，令人惊叹。在东三洞发现了一个用贝壳做的面具，上面有洞作眼睛和嘴，还发现了也许是当装饰品用的石块。所有物品，经推测都用来为宗教目的服务，如在宗教仪式上用来祈求食物供应充足，或祛除恶神等。

根据对以上提到的象迎鼓、东盟、舞天一类晚期仪式的观察，可以推断音乐和舞蹈是朝鲜新石器时期人生活的重要附属品。这些表演肯定也具有宗教意义。

总之，新石器时期的艺术形式与宗教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石器时期朝鲜人制作的艺术品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更具有抽象性，因为他们的用意在于表达某种象征意义。

第二章 城邑国家与联盟王国

第一节 青铜的使用与城邑国家的形成

青铜工具的使用

无论是新石器时期各民族一批批的涌入还是进入朝鲜半岛的文化所引起的冲击，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朝鲜新石器时期人的生活相对而言变化是微小的。但是青铜的使用打破了这种稳定。

在朝鲜青铜工具的初次使用一般定在公元前九或八世纪前后。不过有些学者将时间移前一些，有些学者将时间挪后一些。一般认为朝鲜的青铜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当然这段持续时间在半岛的不同地区不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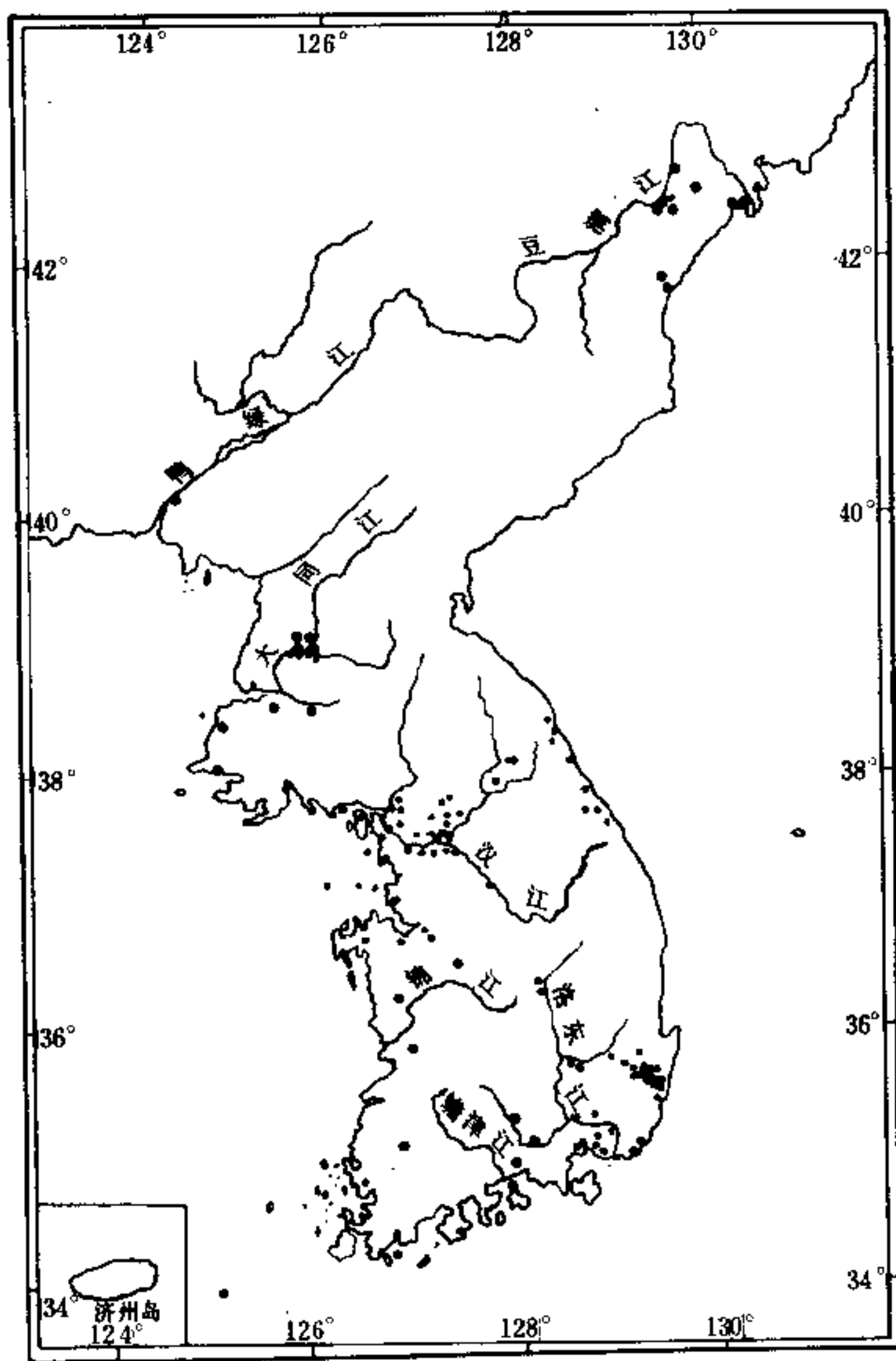
这几个世纪的青铜文化具有单一性，而且是独立发展的。其范围从满洲的松花江和辽河流域延伸到朝鲜半岛。这个时期使用的两种典型的青铜工具为琵琶形的短剑和多节粗线条的镜子，总的说来，在这一区域以外没有出土过。这一时期使用的窄底、双柄、色泽褐红的无装饰陶器也仅发现于该地区。偶尔在这一地区也发现有一种黑陶或另一种象当时中国式样的陶器的碎片，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是无装饰陶器。此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已发现的史前墓遗址大都集中于这同一地区。因此，可以断言，满洲南部和朝鲜半岛这一地区是青铜时代的朝鲜人扮演其历史角色的舞台。

现在还不清楚青铜时代的人与朝鲜新石器时期的居民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管有几何图案的陶器与无图案的陶器在某些方面多么近似，两种类型的陶器仍可以明显地区分开来。这表明生产这两种陶器的人可能生活方式也不同，也许还会有种族上的差异。同时，两类陶器有时在一处被发现表明两种文化接触时有个过渡期。与此相似，在有几何图案的陶器上发现的花纹重复出现在琵琶形短剑和多节粗线条铜镜上，这表明两种人之间的文化有连续性。但是一旦进入青铜时代，便不再发现有几何图案的陶器了，由此可以说明青铜时代的人已经变成了当时正在朝鲜发展的新社会的主宰者。

青铜时代人的生活

朝鲜青铜时代人的代表性制品是琵琶形短剑和无花纹陶器，其遗址都座落在可以俯瞰河边平地的台地上。这一事实显示，与使用饰有几何图案的陶器的新石器时期人不同，青铜时代的人是山坡居民。

已发现的这些物品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显示朝鲜青铜时期人的食物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虽然用青铜制成的农具尚未发现，但是用青铜制成的如刀斧一类木工工具的存在表明一定已产生了各种木制农具。从月牙形的石刀和形似斧头带有沟槽的石锄的使用可以推断，从这时起开始了水稻的种植。石刀是一种手持工具，收获时节用来砍断稻米梗，石锄是一种为耕种作准备的翻土工具。这两种工具在中国都是用来种植稻米的。因此可以认为，稻米农业很早便已从中国传入。这些青铜时代人当然也捕鱼、打猎，但他们种植稻米，这一事实意味他们的农业已经相当复杂。



无文土器遗迹分布图

有一些武器也是用青铜制造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枪尖和箭头。这些青铜武器的存在证明通过战争进行征服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标志。可以想象，青铜时代人凭借这种武器很容易赢得对只有石头武器的新石器时期人的优势。

青铜时代人也主要过着穴居生活。随着矩形建筑越来越多，圆形建筑逐渐消失了。一般坑深为50厘米，但也出现了坑深30厘米的，这预示在地面修建住所已为期不远。炉灶逐渐被安置在一侧，如果住所稍大，有时会找到两个炉灶。一般而言，陶器都存放在屋子的进深处，妇女在那里做活，而户外用的工具则放在人口附近，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占据了生活空间。当然村落是一座座住所组成的，但究竟是怎样安排的还不清楚。不过，在一个地点便发现有一连串住所遗迹这确实可以证明村落已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住所遗址不断显示出火造成的损害，这可能既反映随着用火的增多而发生的燃烧也愈加频繁，也反映在战争或征服中焚烧造成的故意破坏。

青铜时代残存的主要墓葬形式是石坟。这些坟墓连同砾石巨柱（即巨大的竖立石柱）的存在产生了这个时期被称作“巨石”的文化。朝鲜的史前墓在全国各地已多处发现，其建筑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桌式和板式。桌式（也称北方风格）的建造是在一块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放置几块竖立的石头，再用一块平整的顶石盖在其上，这种式样的分布在汉江以北占优势。而板式（也称南方风格）则用一块大砾石作顶石，放置在几块稍小的岩石顶上，这种式样在汉江以南颇为流行。也有很多坟墓没有支撑的石柱，顶石就直接放在葬室的顶上，这样的坟墓在半岛的南部和北部可以看到。墓葬品有一些青铜制品，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频繁出现的光滑的石剑。在一些石墓中有一口用几块平石制成的合形棺材，放

在浅坑里，这种埋葬形式有时与坟墓一道出现。此外，还发现了一种在一口石棺上建造的石冢。但能确定时期的只有一处遗址。

城邑国家的形成

石制和木制工具在青铜时代也使用，事实上，青铜工具是贵重器具，很难得到。至于象琵琶形青铜剑和多节粗线条的青铜镜这一类物品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拥有，因此他们的所有权便象征着权力。

对于墓葬地也应当这样看待。坟墓是专为埋葬单个尸体而建造的个人坟墓，顶石长达9米，重达70吨。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厚重的石板得从数里以外的地方运来。显而易见，埋在这种坟墓中的个人有权力命令众人出劳役。此外，这种人的权力好象不止是他在世时享有，而且要传给后代。这一推测是基于以下考虑，已发现的坟墓至少三、四个一串，还确有三、四十个一组的，少数情况竟达一百个以上，整齐地建成一条直线，这一切都显示坟墓是在不同时间建造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坟墓中埋葬的这一个人不仅是公社社会的领导成员，而且是分层社会中享有权力的人。

那末，拥有权力象征的青铜的是什么人呢？谁有足够的权势被安葬于史前坟墓中呢？最有可能是新石器时期部落首领的继承人，这些人承袭了传统的领导。不过青铜时期社会群体的首领们肯定靠农业获得了比较丰裕的产品，又在战争中扩大了土地，这样他们就能够支配更多的经济财富。

青铜时期首领们统治的领土不会太大。大概他们只控制一些农业人口，这些农户在他们建于高地上的土堡瞭望所及的狭窄平

原上从事耕种。这些小国家以往常被称作部落国家，而改称为城邑国家更为合适。这是因为，虽然它们保留了部落的特征，但想必已具有环绕一个领土单位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包含许多人口而不止是一个部落。这些城邑国家是存在于朝鲜的最早的国家结构形式，因此，应从那里探寻朝鲜国家形成的起源。

第二节 古朝鲜的形成和发展

古朝鲜社会的演进

城邑国家是随着青铜工具的使用而形成的，现在在这些国家的周围具有政治结构的社会开始在各处发展起来。在北方夫馀兴起于松花江流域，濊貊兴起于鸭绿江中游地区，古朝鲜兴起于辽河和大同江流域，临屯兴起于东北沿海的咸兴平原，真番兴起于黄海道，而汉江以南则出现了辰国。到公元前四世纪前后，这些国家已发展到连中国也知道它们存在的地步。这些国家之中以古朝鲜为最先进，该国建于辽河和大同江流域，那个地区青铜制品发现最多。

作为城邑国家的古朝鲜好像开始时只占据平壤周围的大同江流域，这时想必不过是一个统治着平壤四周的平原地带的小政治实体。其早期首领似乎有“檀君王俭”的称号，一般认为他很可能集政治、宗教职能于一身。据说檀君王俭是象征太阳之子桓因的后裔，这似乎含有象征性地提高他作为政治领袖这一角色的威严与权力的用意。

古朝鲜这个城邑国家继续兼并散布在大同江和辽河之间整个地区的其它城邑国家，组成了一个单一的大联盟，其首领开始被称为王。这一阶段的古朝鲜也许称作联盟王国比较适宜，因为它

虽然还与以前同名，但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演变。难以肯定的只是古朝鲜社会结构的这一演变究竟是何时发生的，但显然必定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有一条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北方的燕国开始用“王”来称呼大约在这一时期衰落的周王国，古朝鲜也用“王”来称呼它的统治者。“王”这个汉字用来称呼联盟王国的统治者要比称呼小城邑国家的首领更合适。还有记载说古朝鲜这时计划进攻燕国，而这只有当一个联盟王国已经达到比较先进的发展阶段时才有可能。接着燕和古朝鲜隔着辽河边界相遇，燕国宣称古朝鲜傲慢无礼，残忍无道，据此可以推测古朝鲜自恃有令人生畏的势力，已经成为东北区一个独立的强国。

铁器的使用

由于中国人和匈奴人的强行进入，公元前四世纪两种不同渊源的新的金属文化传入朝鲜。一种是中国的铁器文化，另一种是源自西徐亚—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两种新文化在满洲混合，经由鸭绿江中游和清川江上游而进入大同江流域。这样，大同江地区于是变成了新金属文化的汇聚区，很快再从那里向四方扩散。而且，这些文化浪潮继续越过海洋，直至渗入日本，在那里产生了弥生文化。

铁工具的使用促使当时盛行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种种变迁。首先，农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铁制锄具的存在以及犁铧和镰刀一类复杂的铁制农具的发现都说明了这一点。犁铧表明当时已经有可能使用耕畜犁地。但是，由于使用木制犁铧和铁锄一类工具，看来大部分土地可能仍准备用人力来耕种。而且很有可能连铁犁铧也不是用牲畜而是用人来拖曳的。还有，铁镰的使用意味收割稻

子一次砍倒的不是一株而是一束稻梗。这样，食物产量较之青铜时代有了明显的增长。可是，增加的产量并非由全社会平均分享而是不容怀疑地往往被统治阶级独占了。因此贫富之间的差距必然进一步扩大。

经常发现的另一些铁器时代的制品还包括诸如短剑、枪尖一类铁制武器以及青铜短剑、枪尖和枪等。有一种短小而做工精良的青铜短剑（细形铜剑）和青铜枪以其独特的图案而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图案在邻近民族的制品中尚未见过。出土的物品还有铁嚼和铜铃这一类马饰、轴帽以及马拉车辆的其它部件。看来很明显，这些金属制造的物品想必只归少数上层人士拥有。这个统治集团装备着金属制成的锐利武器，安坐在马背上或乘驭着马拉的车辆，不难想象，他们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至于象图饰精致的多节铜镜一类物品也显然成了其权力的象征。

新金属时代的人继续过着穴居生活，但是有证据表明已经开始使用“温突”（地下放置燃料的一种装置）取暖，而且这时也起用了在地面建造的木屋。动物形状的铜带扣是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服饰范例。盛行的埋葬形式是3米长和1米宽的土墓，尸体好象是被直接放入墓中，而瓮形棺葬是用两个瓮口相对的大瓮（尸体下部长有时要加一个瓮）来装躯体。还有一种新式陶器现在出现了，这种中国式的粗陶器色泽灰白、高温烧制、硬度大。总之，在地面建造的木屋、动物形的带扣和土墓都是统治集团生活方式的必要标志。

这种新金属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多处朝鲜遗址发现了象“明刀钱”这样的中国钱币，首先便证明了这一点。但如果从这一证据来推断中国铁文化传入大同江流域是伴随着它对朝鲜半岛上那个地区的政治统治的延伸，并象某些人所做的那样试图

以此说法来解释箕子朝鲜的传说，那就悖谬了。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上述这种理论，尤其是以下事实，即代表这一时期文化主流的乃是许多独特的制品，如短小精巧的铜剑、铜枪、图饰精致的多节铜镜，以及源自北亚平原文化的多种成份的存在，如西徐亚—西伯利亚风格的动物形带扣等。此外，在古朝鲜发现了大量铸铜和铸铁的模子，这一事实也表明新金属文化不是移植的而是本土固有的。

卫满朝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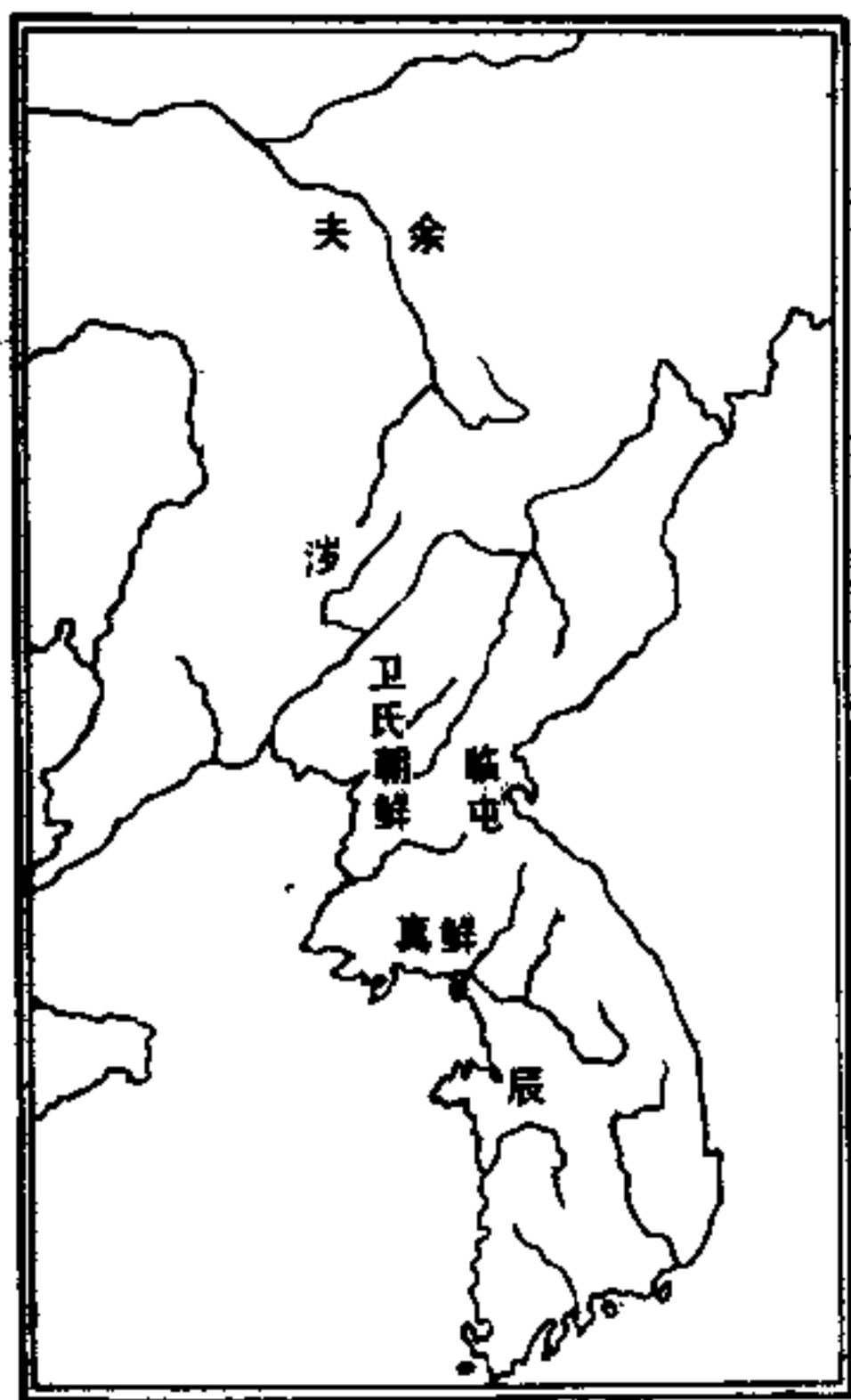
公元前四世纪末，中国强大的燕王国侵入辽东半岛，在它的压力下，古朝鲜进入了渐趋衰落的时期。燕军在秦开的指挥下迅速推进，直到攻占了这一战略地区并使之归附燕国管辖。后来辽东辖区落入秦帝国的控制下。但在受到干涉的这段岁月，中国的官、商、军人来来往往，为数甚多。秦统一中国不久，中国又于大约公元前 206 年落入刘邦（汉王朝的创始者）之手，汉朝在前燕国领土上册封卢绾为燕王，但不久卢绾反叛汉王朝向北方匈奴寻求庇护。在政治纷争充斥不断的这一时期，前往东方避难的人数越来越多。卫满就在这些难民当中，据说有上千人跟随着他。起初卫满受古朝鲜准王的委托守护西北边界，从而巩固了他在难民中的权力基础，但不久，他便将准王赶下王位，自己称起王来（在公元前 194—180 年间）。据说这时准王逃往南方辰国，他在那里自称为“汉王”。

从大约公元前 300 年燕入侵起，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便不断渗入古朝鲜王国的领域。最终，这一地区权力结构的转变导致了卫满建立新王国，这个王国当然带有强大中国的文化特

征。但以前流行的认为卫满朝鲜代表由中国移民统治的殖民王朝的见解，已经受到许多当代学者的挑战。首先要指出，按种族性来说，卫满可能不是燕人而是古朝鲜人。这一看法的依据是，据说他率领随从进入古朝鲜时，他的头发蓄着不同的顶髻，身着朝鲜式服装，还有就是他继续用“朝鲜”来称呼他的王国。其次，据论证，许多古朝鲜人在卫满统治下都身居高位，最著名的是参出任尼谿相。这些理由强有力地证明，不管卫满朝鲜多么依赖于拥有更复杂的铁文化知识的中国移民，它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殖民王朝。相反，卫满朝鲜肯定是在以前古朝鲜的权力结构的基础上采取联盟王国形式的。这样，古朝鲜社会便呈现出新的面貌，并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

凭借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卫满朝鲜得以兼并北方、南方和东方的邻国。位于慈悲岭和汉江之间的真番、南咸镜道地区的临屯被迫臣服，从而使得卫满朝鲜控制的版图扩张了几百里（见图，第20页）。在实力增强和版图扩大以后，卫满朝鲜禁止辰国（位于汉江以南）和其毗邻的一些小国与汉朝直接接触，力图充当本地区与中国贸易的媒介而获利。但汉王朝并不欢迎这一做法，汉王朝关心的是卫满朝鲜与匈奴之间的联系可能带来的威胁，这时匈奴已从蒙古腹地扩张到满洲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汉利用濊的统治者南间的反叛，试图通过在濊的领土上（鸭绿江中游和佟佳江流域区）建立沧海郡以便对卫满朝鲜施加压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几年以后汉王朝便取消了它在该地区的侵略计划，其原因多半可能是濊国人民的反抗。

由于政治谈判无法弥合卫满朝鲜与汉王朝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所以当中国使臣涉何（此人稍早时杀死过一名朝鲜指挥使，后来逃回中国受到了奖赏）被朝鲜士兵报复性地杀死后，一场重大



卫氏朝鲜时代图

危机便爆发了。早已在其帝国周边进行军事征伐的汉武帝便以此为借口最后发动了对卫满朝鲜的武装进攻（公元前 109 年）。卫满朝鲜奋力反击入侵者达一年之久，但因媾和派叛变通敌，谋杀了右渠王（卫满的孙子）使得抵抗削弱。在高级官员成己的领导下，斗争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无法再维持下去，随着公元前 108 年首都王俭城（现在的平壤）的陷落，卫满朝鲜便灭亡了。

卫满朝鲜之所以能够如此顽强的抵

抗，原因在于其金属文化已达到了与中国汉王朝入侵者相抗衡的水平。然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却葬送了这一雄心勃勃的王国。

汉的郡县

公元前 108 年，汉中国在于同年征服的前卫满朝鲜的领域内设置了乐浪郡、真番郡和临屯郡三个辖区，并于次年在以前濊的领域内设置了玄菟郡，从而完成了所谓四个中国辖区的创建。这些中国行政单位的所在位置不十分清楚，但普遍认为可以这样来确定它们的位置：乐浪郡位于古朝鲜的大同江流域；真番郡位于慈悲岭以南到汉江的前真番地区；临屯郡位于南咸镜道古临屯地区；玄菟郡位于鸭绿江中游两岸和佟佳流域的濊领土上。根据这一理论，四个中国人辖区的版图以汉江以北地区为限，于是便得出有趣的结论，即试图让它们管理的是四个截然不同而又联成一体的社会政治实体。

无论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在当地居民的反对下，汉中国被迫对这四个行政单位的边界分别进行了重大调整。它们设置后只有 25 年，汉中国便取消了真番郡和临屯郡，而将它们的辖区分别划归乐浪郡和玄菟郡（公元前 82 年）；同时，有些比较偏远的管区大概也只得取消。后来不到 10 年时间，公元前 75 年汉王朝将玄菟郡的辖区西迁，从以前濊的领土上迁到满洲东部中央以现代兴京为中心的地区。这有可能是由于同日益强大的高句丽国的冲突引起的。结果，最初受临屯郡辖治的地区的管辖权现在从玄菟郡转移到乐浪郡。

乐浪郡本身对其领土的行政管理也未能维持多久。后汉王朝初年，在乐浪郡权贵王调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叛乱。虽然，这场反叛在公元 30 年被新到任的乐浪郡守王遵镇压下去，但它却具有重大的影响。大约同时，在汉江以南的辰国地区，朝鲜人的汉社团开始显示出新的活力，从这时起，许多在乐浪郡统治下的朝鲜人试图到那里寻找庇护。这些社团的势力不断壮大终于引起辽东地

区统治者公孙氏的戒心（后汉末期这个家族在那里实行独立统治），他们在乐浪郡以南以前由真番郡辖治的地区设置了一个新的辖区即带方郡（公元 204 年）。但在公元 313 年，乐浪郡屈服于高句丽的压力，约于同期，当百济向北扩张其边界时，带方郡便消失了。

乐浪郡是中国在朝鲜推行拓殖政策的核心地区。中国人在该郡营建了一座地道的中国城市作为郡的行政中心。郡守及其下属官员、商人和其它许多中国的拓殖者都住在城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据土城里出土的遗物的调查大体可以推测出来，土城里横跨大同江直至平壤的西南部，一般认为这里是乐浪郡的行政中心所在地。住在乐浪郡都城的中国官员、商人和其它享有殖民封建主地位的人过着富裕的生活，从安葬这些中国人的砖墓和木墓中发现的各种随葬品可以得到证实。虽然，随葬品中有一些是乐浪本地制造的，但大部分是从中国带来的。因此，乐浪文化是中国文化，而且从生产和使用这些物品的人的角度看，这种文化与当时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古朝鲜人民没有任何联系。

尽管乐浪郡的殖民行政中心十分奢华，但中国的殖民政策看来并没有政治高压的特点。中国人与当地古朝鲜民众分开而居，由此可以推测中国人乐于在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时也给予受其统治的人民一些基本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治理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看来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有记载称从乐浪郡曾动员了 1500 人去砍伐南部的汉国地区的树木，还有记载称中国商人夜间犯有偷盗行为，这些记载虽然提供的证据确实算不上完整，但毕竟透露出事情的真相。而且，既然盐和铁是中国政府独占的，乐浪的官员们必然会对染指这些当地资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众所周知，弃韩国的铁既供给乐浪郡也供给带方郡。为了从不受中国

控制的地区得到这一类主要产品，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授予当地首领们以空头官衔、印玺、礼服，以便建立与他们的纳贡关系。

中国人辖区的影响在中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尤为明显，在那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制度逐渐地而且是不可抗拒地渗入古朝鲜社会结构中，也许以下事实可以用来说明这一影响。古朝鲜最初的法律只有 8 项禁止性条款，现在由于中国人的出现而扩展到 60 多项。我们知道在乐浪郡中国商人夜间偷盗事件接连不断，这是古朝鲜人不习惯于把自己的东西放到安全地方收藏起来而促成的；我们也知道这种经验削弱了当地居民对其传统价值观念的信心，从而有必要在法典中增加一些规定。由此可以推断，与私有财产意识高度发达的中国人的密切接触，加速了古朝鲜社会的瓦解进程。例如，据说一部分本地居民开始使用中国式的饮食器皿，这表明一个拥有财富和权势并适应中国方式的新的上流阶层已经出现。不过，在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内不能指望古朝鲜人民在政治上有独立的发展。

中国人辖区的影响在一些邻近的国家也可以感觉到。在这些地区，文化影响最为重要，因为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之果十分令人艳羡。例如半岛南部汉国的首领大多数愿意接受象征对乐浪当局臣服的官职、印玺和礼服。应当指出，正是这种一边吸收中国文化一边能保持政治独立的能力使得这些本地社会经受住了经常面临的危机，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

第三节 诸联盟王国的形成

夫余

夫余出现于满洲的松花江流域（见图，第 28 页）。一般认为

其心脏地区在农安一带，这个地区有着无比辽阔的平原。

第一次明确提到夫馥与公元前四世纪前后发生的几起事件有关，从公元一世纪起，这个名字便频繁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此时，夫馥已经发展成为强大势力，与匈奴和高句丽一道被认为已构成对短命的王莽新朝（公元8—23年）的潜在威胁。因此，可以推测最迟到此时，夫馥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联盟王国。在这方面进一步的证据有，此后不久，公元49年，夫馥的统治者开始用起“王”这一中国的称号。

实际上，中国显然有充足的理由欢迎夫馥在北方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因为夫馥位于中国北方边界鲜卑和中国东北方的高句丽之间，中国同夫馥鼎力合作才能制止这两个强大民族的扩张。同时，夫馥与其南方的高句丽以及其北方的游牧民族，长久以来彼此敌视，因此，夫馥的统治者也急于同中国建立友好联系。中国人于是深信夫馥人怀有和平诚意，而且两国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很快便在一系列事件中具体表现出来。

据记载，夫馥于公元89年首次派使臣前往中国，从这一年起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几批使臣。诚然，夫馥与中国在满洲辖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但总的说来，关系是密切的，而且中国以最大的热诚接待夫馥的使臣。在后汉末期，当公孙氏控制乐浪郡并统治中国最东部地区时，曾与夫馥联姻。公元244年当中国魏的将军毋丘俭举兵入侵高句丽时，夫馥向魏军供应给养以表明其有支持中国利益的义务。40年后，公元285年，鲜卑统治者慕容廆人侵夫馥，其国王依虑王自杀身亡。由于国王的子弟都已逃到朝鲜东北的沃沮，夫馥的存续处于危难之中。但中国晋王朝的统治者仍给予夫馥皇室成员依罗王以帮助，扶持他登上虚悬的王位，从而使夫馥王国的复辟成为可能。然而，夫馥国接着又遭到南方高

句丽的侵犯。

夫餘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曾与连续几个中国王朝达成和解，借以保护自己不受高句丽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在中国人的支持下，夫餘首先谋求扩展，而后力图维护它的绝对权力。但是当公元 316 年中国西晋王朝被北方游牧部落驱赶到南方时，夫餘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境地。公元 346 年在鲜卑君主慕容皝的入侵中，夫餘国君主玄王连同其人民 5 万多入沦为俘虏。一代人以后，公元 370 年，鲜卑的前燕复灭，夫餘转到高句丽的保护下。不久，满洲东北部的勿吉人兴起，夫餘的王室被逐出其自古以来的领土，降服于高句丽。于是夫餘连最后一点痕迹也归于湮灭了。

高句丽的崛起

传说公元前 37 年，来自夫餘的朱蒙及其一伙随从，在被认为是以鸭绿江中游和佟佳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建立了高句丽。可是，早在大约公元前四世纪时，高句丽的先辈已在这一地区巩固了自己势力。这便是被称做“濊貊”的民族，显然这一政治实体是由濊的领主南闾控制的，在关于公元前二世纪几起事件的记叙中，据说此人统治了 280000 人。这样看来，高句丽的领导阶层并不是他统治的这个地区的本地人，而在当地已经发展进化的政府想必代表着这种新势力与本地社会的联合。

濊的首领在抵制卫满朝鲜的统治中曾寻求汉朝援助，汉的反应是在中国的鸭绿江中游地区设置沧海郡（公元前 128 年），然而这不过是在地图绘制上做的一点小动作。不久，于公元前 107 年，在该地区设立了玄菟郡，但是 30 多年后，却不得不撤回到中国纵

深地区（公元前 75 年）。玄菟郡的西迁想必是由于该地区强大的本地势力的反抗所致，据推测，高句丽这时已经采取了联盟王国形式。

高句丽便是这样出现并在与中国人的冲突中不断发展的。因此，高句丽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在早期的军事斗争过程中，高句丽统治阶层的尚武传统也不断得到增强。显然，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个尚武的贵族集团除了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训练外是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对于高句丽的武士来说，实际上战争是他们可以从事的最大的生产性活动，他们对土地、人口、家畜这类战利品的消费兴趣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只有通过战争，他们才能补偿疆域内资源的不足。无疑，与夫余不同，高句丽给中国人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好战成性，热衷于进攻它的近邻。

从公元一世纪起，高句丽国已发展到用“王”这一中国人的称号称呼其统治者的地步了，并且试图从各个方向上打破它的领土界限。高句丽向外扩张的地区西南指向辽河，南方指向大同江，西北指向松花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东北沿海的平原。由于这些地区当时或直接受中国辖治或在其影响范围内，所以高句丽与中国开战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是与王莽新朝。王莽征募高句丽军队征伐匈奴，但在交战前，高句丽派遣军已经变心，结果中国与高句丽队伍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公元 12 年），而王莽只得将其国名由“高”句丽贬抑为“低”句丽而聊以自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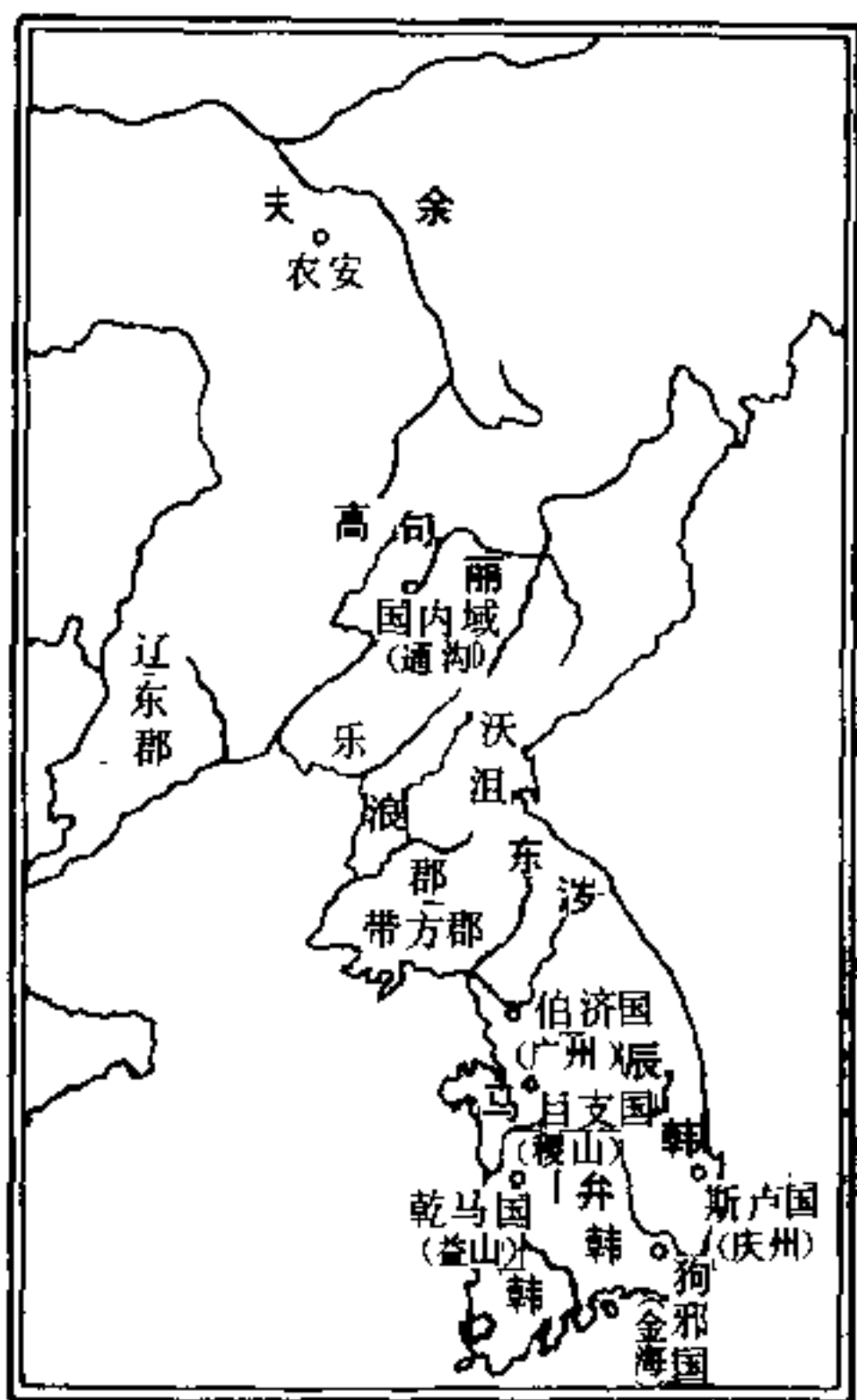
高句丽与中国的冲突在热衷于领土扩张的太祖统治时期（53--146 年）变得愈加激烈。太祖对其东南方的沃沮进行了征服，从而保障了其后方的根据地，可以有力地支持高句丽反对中国的战争。朝鲜的东北沿海当时是沃沮与其邻近的东濊人的国家，在设置临屯郡而变成中国殖民地以前，早已被临屯人占据。但现在

整个这一地区都处于高句丽的统治之下。不过，高句丽允许当地公社的首领们保留他们的权力，并通过他们来征收贡物。例如，我们知道，沃沮人将“濊貂布”、鱼、盐和其它土产品运到二三百里外的高句丽作为回报。太祖在推行其西进计划时，也多次进犯中国的辽东郡和玄菟郡。在太祖继任者统治下，高句丽继续象以前那样进犯辽东地区。特别在二世纪末公孙氏力图从辽东郡他的基地向外扩张其势力时，高句丽非常顽强地抗拒了中国的这一强行推进。

辰国和三韩

与墓葬现象同时发生，一种文化同质的政治实体似乎也在韩国汉江以南地区形成。这一假设基于以下考虑，以磨光的石剑为典型随葬品的棋盘式坟墓广泛分布于汉江以南地区。这些制品可能是辰国出现的最早迹象。

记载中首次提到辰国与公元前二世纪的一起事件有关，当时卫满朝鲜已经占据了大同江流域。这时，辰国致函中国汉王朝谋求开展两国的直接接触。这表明辰国强烈希望分享中国金属文化的种种利益。但由于卫满朝鲜当时控制着该地区的国内贸易，对此横加阻挠，辰国的愿望未能实现。然而，正是这个时期，拥有较先进的金属制造知识的难民从古朝鲜涌入辰国领土，并在当地社会自谋出路。在这一难民潮中，古朝鲜的最后一个国王准王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向南逃离了卫满，而移居辰国时刚好卫满朝鲜的一名高官下台，于是便被委任为历谿卿统领二千多户人家。由于将这些难民吸收到本国人口中，辰国因此能够利用一种比较发达的铁器文化，结果辰国社会发生了迅速的变革。



联盟王国时代图

铁器文化的广泛传布在汉江以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还应注意与铁器文化一道，稻米也大约在此期间开始更加广泛地种植，在金海的贝壳堆中发现有烧焦的稻粒可以为证。由于移民潮连绵不断，移民人数越来越多，新来者的统治手腕和金属文化知识与辰国当地社会合而为一，使其实力得到了稳步增长。这一过程最后导致辰国的重建，在其版图

上形成了三个新政治实体，统称为“三韩”，分别为马韩、辰韩、弁韩。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马韩位于现代京畿道、忠清道和全罗道等地区，辰韩位于庆尚道的洛东江以东，弁韩位于庆尚道的洛东江以西。不过现代有一种观点认为辰韩位于汉江流域（见图，第28页）。

第四节 联盟王国的社会和政治

农村公社和农业人口

从青铜时代起，农业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在旱地已知种植各种谷物外，稻米也在水田里栽种起来。稻米在三韩尤为盛行，一般认为当时已建造了水库用来灌溉稻田。农业是这一时期食物的主要来源，以下事实清楚证明了这一点，夫余国王对歉收负有责任，其后果不是被赶下王位就是被杀。最重要的仪式有两个，一个是播种后第五个月为祈祷丰收举行的仪式，另一个是第十个月收获以后举行的感恩节。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农业的重要。

当然，除农业外，还有其它许多经济活动。例如，在夫余已大规模地饲养牲畜，已发现当地官方的路标竟是用牛、马、猪、狗这些家畜的名字来标明的。在南方，在三韩地区，也饲养起家畜，在金海的贝壳堆中发现有牛马的骨头。在三韩地区据说也发现了各种长尾鸡。同时，打猎也是一项重要活动，特别在高句丽这样地处山区的国家更是如此。从金海贝壳堆中发现有野猪和野鹿的骨头，在北庆尚道蔚州郡的盘龟台，有一块石块上还发现了刻有这类野生动物的画面，可见狩猎具有重要意义。盘龟台的岩画还绘有鲸和其它海洋生物，这证明沿海地区人也从事捕鱼。象住在东部沿海狭窄平原上的沃沮人和东濊人，他们大概已将捕鱼看作是特别重要的食物来源。

然而，这时期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业。进行农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农村公社。在这些农村公社中大部分农业人口是自由人，即平民，其社会地位相当于中国人所称作的“下户”。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这些自由农民之上是豪民，在自由民以下是一些奴隶。个体

农民的私有土地可能已发展，但一般认为，自由民作为农村公社的主要劳动力仍然耕种公社土地。农村具有这种公有性是推测的，但有些遗址其上矗立着高大的建筑物，它们可以作为公社集会场所，而成文记载还涉及到一些被认为代表三韩地区青年集会和公社劳动习俗等制度。当然，有一部分农业人口不能参与农村公社安排的活动，这些人大概已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但这些都是推测，大部分农民仍作为自由人在公社的农业共同体中从事劳动。朝鲜的自由农负担着沉重的实物税，还负有向国家提供劳役的义务，因而被中国人认为是受农业奴隶方式的剥削。而且，自由农不得拥有武器，战时参战也仅限于运输给养。总之，城邑国家和联盟王国时期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社会，栖居的便是这样一种农村农业人口。

城邑国家的结构形式

在农村公社生活的农业人口受城邑国家的统治阶层支配。这个统治阶层的成员最初想必是同一氏族的成员，作为农民享有同样的地位。但现在他们已演变为统治者，住在与农村公社分开的城邑之中。可以肯定，王权已在城邑国家社会的顶层出现，只是这时权力事实上是由这个统治阶层来行使。

卫满朝鲜习惯于将一个地名附在“相”或“卿”这类官职前面，如以上提到过尼谿相和历谿卿这两个具体例子，据此可以推断，在城邑国家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统治阶层。当卫满逃到古朝鲜时，据记载，辰王曾授予他领土100里，并责成他防卫西部边界。这块领土可能大体相当于稍早合并为古朝鲜联盟王国的那些城邑国家中的一个疆域，卫满及其随从的地位可能类似于以前的

统治阶层。在夫餘由“加”治理的“四出道”可能代表地方政府结构朝中央控制下发展，但这大概只是早期城邑国家形式的一种派生物。

在早期高句丽，小国家不是被征服就是被并入联盟，这相当清晰地显示出城邑国家的形式。向高句丽投降的沸流国和曷思国、象贯那部、藻那部、桓那部、朱那部、椽那部等各种“那”国一样都是城邑国家的例子。中国人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那”国，称它们为消奴部（或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这些最初小而独立的实体，由于降服于高句丽联盟王国而转变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其统治阶层被称作“相加”。

三韩地区许多小国按中国记载共有 78 个，肯定也是城邑国家。在朝鲜资料中，它们以沙伐国、召文国、押督国、伊西国、骨火国的名字出现，较大实体的统治者叫做臣智，较小实体的统治者叫做邑借。在这些城邑国家中，百济位于汉江以南现在广州（京畿道）一带，斯庐国在现在庆州。后百济王国的发展超过了由北方移民建立的前百济王国；其创始者据说是温祚王。从城邑国家斯庐国脱胎而来的新罗王国是由朴赫居世创建的，历史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斯庐国结构和发展的某些记载。

座落在庆州平原上的斯庐国似乎由六个氏族集团组成，即及梁部、沙梁部、本彼部、牟梁部、汉祗部和习比部。传说，朴赫居世被推举为斯庐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由于他是及梁部氏族的成员，所以斯庐的首领似乎首先是按世系来遴选。赫居世的王后阙英来自沙梁部氏族，因而它可能是斯庐的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世系。不久，斯庐领导权被脱鲜王攫取，此人来自斯庐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娴熟的金属技艺，又是一个萨满。显然，这时斯庐还突破庆州平原界限，而与该地区的其它城邑王国发展了一种联盟关系。这

一时期，在采用“尼师今”以前，先是用“居西干”，而后又用“次次雄”来称呼斯庐的统治者，这些称号的含义分别为“首领”、“萨满”、“王子”，至于将要以新罗出现的中央集权的斯庐国王就不能用上述称号了。

我们无从知道斯庐模式被其它许多城邑王国仿效到何种程度，但可能在本质上有相似性。关于大邱地区史前墓遗迹和其它古老坟墓的研究使我们了解该地区也有过一个其权力由几个世系分享的城邑王国。因此，我们确信对于其它城邑国家的形成过程和结构也可以作出同样一些综合性的假定。

王权的发展

朝鲜联盟王国都代表若干城邑王国的联合，但形成过程有早有晚，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因为有一些发展得稍早或比较快。正如中国史书《三国志》中的“东夷传”所载，三韩的情况也许可以算是正常发展的一种模式。由于百济国的辰王是有名无实的首领（据说他是经马韩民众共同认可而登上其位的），三韩的许多城邑王国在公元三世纪已结成一种联盟关系。虽然，可以肯定，弁韩地区的几个王国曾一度自行退出过这一联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的辖区单独建立与各城邑王国的外交联系，制订旨在破坏它们结盟的分裂政策，因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妨碍。像沃沮和东濊这样一些处于高句丽直接统治下的城邑王国是发展较为迟缓的例子。这些王国确实从未达到结成联盟关系的阶段。

相反，无论夫馀还是高句丽，政治上重建的速度就快得多了。在这两个国家，国王最初显然是经过某种选举程序遴选的。以下

事实证明了一点。夫馀国王对歉收负有责任，并因此不是被取代就是被杀。在后高句丽，大对卢这一首席大臣的职位也是选举出来的。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国王也许是从两个或更多的王族中遴选的。这方面有一个具体证明，即关于高句丽国王从消奴部（即涓奴部）世系传给桂娄部世系的记载。这同一现象后来在新罗的历史上又出现了，当时它还没有超出联盟王国阶段。此外，这一时期王位继承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奉行兄终弟及的原则，这也表明国王制度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是不久，王权开始属于一个王族所有，继承也变成了父死子继的世袭制。上述发展是与这些新兴王国发动的激烈的征服战争一道发生的。这样新虏获的土地被当作臣服领土来统治，而土地上的人口则要交纳贡物，结果导致王权进一步增强。夫馀国王依虑王（？—285年）六岁继承其父登基，高句丽从山上王（196—227年）起确立了王位父死子继制，这些实例表明了这一变化过程发生的大致年代。大约同时，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制度似乎也付诸实施了。这方面的实例有夫馀的四出道制和高句丽的五部制，后者系由故国川王统治时（179—196年）所创，用北、东、南、西、中五个方位命名。

不过，这些新制度仍含有以前联盟形式的一些特点。事实表明，高句丽的大加像国王本人一样，也有众多家臣如使者、皂衣、先人。而夫馀的大加等官员（如马加、牛加、猪加、狗加长官）也好像由家臣服侍。因此更确切地说，归国王支配的实际政治权力要少于那些大加手中所拥有的，一般认为他们要么是王族的高级成员，要么出自王后那一支世系。大加不仅享有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经济财富。看来，大加阶层有权通过他们的村头向农民征税。

他们身着丝绸、皮毛，连中国人也艳羡不止。他们的像王冠一样的头饰和圆帽上点缀着金银饰品，极其奢华。不仅如此，他们还用最精美的中式餐具（叫做俎豆）进餐。此外，这些人物权势大得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下令处死上百名仆人为他们殉葬。他们显然也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这样，他们所在的社会便自然形成了一套对他们肃然起敬的礼仪规范。叩见者要鞠躬行礼，两臂伸开，双手平放在地面，讲话要低声细语。

因此可以说，在夫馀末期和高句丽初期，大加构成了他们社会的权势阶层，但与三韩臣智和邑借不同，不能把他们看作是城邑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相反他们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贵族政治势力可能也在发展过程当中。因此，在夫馀和高句丽，联盟王国的结构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王权得到了加强。夫馀大加官员（大多数最初是王室的管家）在政治上越来越重要便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这两个北方联盟王国可能正在转变为具有至高无上王权的中央集权的贵族专制国家。

第五节 联盟王国时期的文化

法律

这一时期法律的主要特点是简单、残忍。当时社会满足于维持社会秩序规范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法规。凡是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禁令都被认为是好的，违反了禁令则被认为有罪，应受到惩罚；没有人去关心要什么罪罚相当。既然人们相信上天已注定会扬善惩恶，法律也就具有了一种宗教意义，罪行的判定和罪罚的执行都与宗教仪式一道进行。

在古朝鲜人们遵奉的一部法典有八项条款，不过只有三条规

定可以确信，即：

1. 杀人者应立即处死。
2. 伤人身体者应以粮食赔偿。
3. 偷窃他人财物者应给受害者为奴，不过，交付 500000 “铜币”可免于这种处罚。

我们还知道在朝鲜，为人之妻要忠贞娴淑，不得荡检踰闲。似有理由推测，在古朝鲜法典的八款中还有一款是禁止妇女通奸。

现存记录中载有据说是夫馀人遵奉的四条法规：

1. 杀人者应处死，其家庭成员则沦为奴隶。
2. 抢劫他人者必须十二倍地赔偿受害者。
3. 通奸妇女应处死。
4. 妻子猜忌尤为可憎，亦应处死，其尸应弃于京城南山；不过，如果其家人想要索回尸体，则需适当交付牛或马。

这样看来，尽管古朝鲜与夫馀的法律条款像我们所了解的有细微的差异，但总的说来它们显示出共同的特点。我们对高丽、三韩和沃沮、东濊的法律显然知之甚少，但看来它们可能包含着许多同样的条款。总之，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杀人、伤害、偷盗、妇女通奸、妻子妒忌五罪被共同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罪行。

这些法律条款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价值观念提供了重要依据。首先，对杀人与伤人者施以处罚表明对个体生命以及工作能力的高度重视。我们知道，特别在古朝鲜对偷盗罪行尤为关切，以至虽然犯罪人交付了赔偿赎回来自由，但在社会看来这种行为之可耻仍将使他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配偶。其次，对于妇女通奸和妒忌的处罚被认为维护了家长制的家庭制度。夫馀对于家庭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尤为重视，对妒忌罪的残酷处置可能反映在夫馀上层社会已广泛实行一夫多妻制。没有理由认为对妒忌的处罚仅限

于夫馀，因为对贯那夫人的处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位有名的高句丽的长发美女便是因妒忌罪而被处死的。

宗教

一般认为，在韩国历史进程的早期阶段，政教是合一的，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权力的发展，两者才变得泾渭分明。这是因为政治统治阶层这时光有世俗权力就感到满足了，而把宗教仪式委托给专司祭祀的人。在三韩这些专司祭祀者被称作“天君”，据说他们可以对分散的各个村落亦称“苏涂”行使权力。据记载，在每个苏涂中都竖立着一根高大的木杆，木杆上悬挂着一面鼓和许多只铃铛，在宗教仪式上要使用这些东西，这马上让人想起现代朝鲜的女萨满跳神作法时的场面。如果某人犯罪后进入了苏涂界内，便不能在那儿拘捕他。总之，虽然关于苏涂有各种推测，但看来它最可能是一处祭神场所。这样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即原始萨满教便发生了一种变化。宗教领袖的职责不再仅仅是专事巫术以自己的祈祷力量感化上天，而且要主持祭礼祈求神灵赐福。这些职责不再需要由政治上的掌权者本人来履行，于是到这个地步宗教领导与政治领导的职能便被认为已经分离。丰收感恩节是最盛大的宗教节日。夫馀的迎鼓，高句丽的东盟，东濊的舞天以及三韩在阳历10月举行的庆典都代表这种收获节日。它们都在阳历十月即收获收尾时举行，除夫馀的迎鼓在十二月举行外，迎鼓习俗大概是夫馀进化而来的那个原始狩猎社会的传统延续。春天为祈求一年丰裕也要举行仪式，其重要性并不次于丰收节。我们知道在三韩这种仪式是在五月播种后举行的。据记述，每逢这些重大的宗教节日，所有百姓都聚集在一起，一连数日纵情吃喝，又

唱又跳。

不论尊卑贵贱，不分阶级差别，在一起庆贺这些宗教节日，这表明在宗教领域，早期平等的以血缘为中心的公社传统仍有一定的影响。但甚至在这方面，个人和社会阶级的分化也是明显的。例如，高句丽的一位国王为其王朝开创者设立了一座神殿，国王本人才可以在里面行礼参拜。同时，早期消奴部（或涓奴部）王室的一支古老的世系也获准设立这种祭奠先王的神殿，而这一关于分享王室重要特权的记载也表明，在高句丽王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一些限制。

信仰灵魂不朽以及必然出现的葬礼过分铺张是这一时期宗教生活的共同特点。我们知道在夫馀将葬礼拖延五个月是一种习俗，因为尽可能拖延被认为是荣誉的标志。在夏季，要用冰块来防止尸体腐烂。确实，由首席祭司主持葬礼被认为是最尊崇的礼仪，只是到后来才不得不由别人来主持。坟墓中放置了许多随葬品，有些葬礼上还实行殉葬，多到上百名随从同主人一起下葬。在高句丽葬礼也大肆铺张，许多葬品随同死者一起下葬，坟墓由一块块厚石块垒积成金字塔形，在有些情况下随葬品也包括牛马，这表明在三韩对死者身后的生活也同样关注。为了使灵魂便于从尸体中逸出，还将大鸟的翅膀同死者一道安葬。这有趣地证实了这个地区的民众相信灵魂不朽。当然，很明显采取这种铺张的葬礼在于表示对祖先的尊敬，而这样做又是基于相信，祖先活生生的灵魂会继续影响着子孙后代的幸福。于是作为由家族把持和王位世袭发展而成的形式，为祖先举行葬礼也开始变成世袭继承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最后，众所周知在这个时期还实行占星术。在夫馀，开战时在仪式上要杀死一头公牛供奉上天，如果发现牛蹄上裂口扩大了，

便认为灾难要降临；如果没有裂纹就是好预兆。这种占卜形式好像与中国殷商时期的龟卜（卜骨）相似。占卜起初也是国王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据推测，随着其它政治权力的扩大，占卜便逐渐沦为萨满的专职。

艺术

随着青铜工具付诸应用和农业的发展加快，美术领域的活动也增多了。不过，总的看来新石器时代的传统仍有很强的影响力，联盟王国时期的艺术继续显示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许多青铜制品的图案和装饰上可以看出为表现美而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已发现的这类青铜制品中有几种确实令人难忘：用鸟或马的雕刻作装饰，两边配有一对小铃的短剑柄；作成马或老虎形状的皮带扣；悬有2个、5个有时是8个小铃的祭礼面具；用一对鸟儿装饰的萨满祭杆；刻有鹿和其它动物图案的肩甲；刻有动物或农耕场面的盾形祭品和短剑柄；饰以精美的几何图案的青铜镜，如做工精致的多节铜镜。总之，这种装饰品有两个特点，一是动物雕刻体现的写实主义，二是其几何图案镌刻成直线图案。在青铜制品中，有许多礼仪器具是专为宗教目的制作的，“天君”和其它萨满在主持各种祭礼上看来可能就要用上这些器具。而且既然连政治首领们世俗用的那些制品上的装饰都可能含有巫术意义，这些礼仪器具上的图案也自然被认为具有宗教性了。

除了有一个妇女塑像外，尚未发现这个时期的其它泥塑。不过还发现了几个与雕刻有关的骨制小人像。虽然，它们形体不大，在制作手法上也无艺术可言，但作为宗教雕像仍值得注意。

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中近来最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是刻在岩石上

的图画。高灵县良田洞发现的一幅岩画上有若干个几何形图案的同心圆，还有一些十字形和人物面具。蔚州县川前里的那幅呈现出各种几何图案，有圆圈、三角形和菱形，一些动物素描作映衬。在蔚州县盘龟台发现的一幅石刻画上，绘有陆上狩猎和乘船出海狩猎的场景，图中有鲸、乌龟和其它海洋生物，鹿、虎、熊、野猪、兔子等野生动物，还有人类。画中的同心圆大概象征太阳，含有祈求物产丰饶的意愿，正像崇敬太阳的其它农业社会也有过这种情形那样。其它几何图形也可以解释为是同一种宗教意义的表现。动物一般都画着成双成对，这显然象征生育过程，同时也表达人们祈求自然界恩赐的意愿。绘制的狩猎和捕鱼的情景有可能是祈求这些基本活动成功。这些雕刻在岩石表面的图画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

为庆贺春季祈求丰产的节日和秋季感谢丰收的节日，歌舞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在三韩二十多个人合着节拍，手舞足蹈，在场地上一齐踏着大小交替的步子。无疑从这时起，所有重大庆典上表演的就是这种歌舞：夫馀的迎鼓、高句丽的东盟、东濊的舞天以及其它，这些表演不仅是娱乐，而且还是宗教仪式，这种传统无疑是从长期以氏族为中心的社会传下来的。

第三章 君主统治下的贵族社会

第一节 三国的发展

高句丽的壮大与百济的兴起

在太祖（53—146年?）时期，高句丽的王权一直由桂娄部的高氏把持，而从故国川王（179—196年）统治起，加强王权和使国家政治结构中央特权化的过程仍在加快进行。首先，代表早期传统社会余绪的五个部落的领土被重建成五部，其名称分别表示北、南、东、西、中五个方位。标志着中央集权的政府结构的强化。其次，王位继承一般不再是兄终弟及而变成父死子继，这也表明王权的进一步加强。第三，王后从掾那部（绝奴部）世系的明临氏挑选已成惯例。在王室与一个贵族世系之间建立特殊联系可以被看作是为限制其它抗拒君权壮大的潜在权力中心而作的一种努力。这些变化构成高句丽向西至辽河流域、向南至大同江流域奋力推进的背景。最后于313年，在美川王统治时，高句丽成功地夺取了乐浪郡的领土，占据了大同江一带。但同时，高句丽与百济发生了尖锐冲突，后者已经向西推进并控制了现在黄海道的带方郡以前的辖区。

前面已提到百济最初是由辰王统治下的盘踞在马韩地区的许多城邑王国中的一个（也叫百济）发展而来的。不能肯定的只是早先的百济是何时再联合汉江流域的各个城邑王国而成为联盟王

国的。但到 246 年，当乐浪和带方郡（在中国三国之一的魏国统治下）对汉江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时，一股新势力正在这一地区发展壮大，因为魏军进攻的目的就是要阻挠和防止这股新势力巩固加强。在随后而来的战争中，带方郡长官弓遵在战斗中被杀。由此可见这一新兴势力已有相当的实力。这一令人惊讶的强大实体肯定不是马韩而是由古尔王（传说统治期为 234—286 年）领导的新联盟王国百济，据说古尔王这一时期在其它领域也是十分活跃的。

古尔王被认为是像仇台那样的历史人物，后者被尊为百济的创始王，每年要为他举行四次纪念仪式。古尔王统治的第 27 年即公元 260 年，我们知道任命了六名大臣（六佐平）各有专司地掌管国家事务，创立了十六等级（品位）官制，规定官服颜色要与官职等级相符。据进一步记载，古尔王下令，那些接受贿赂或犯有敲诈罪的官员必须交付三倍的赔偿金，此外还要终身褫夺官职。国王身着华服接见臣民以显示其君权，凡此种种描绘出了一幅有权势的政治领袖的生动画面。

百济演变为中央集权的贵族王国似乎完成于近肖古王统治时期（346—375 年）。这位国王好战成性，令人生畏。他于 369 年摧毁了马韩，此时马韩京城已向南移到现在的益山地区，随后占据了它的全部领土。接着于 371 年，百济向北一直扩张到平壤的高句丽领域，在进军中杀死了高句丽国王故国原王。这样百济开始统治了朝鲜半岛相当大的一部分，包括现在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的全部以及黄海道和江原道的部分地区。而且，近肖古王主动向位于扬子江流域的东晋以及日本的倭人作出表示，以巩固其国际地位。

不足为奇，从这个好战的国王起，百济的王权便越来越独裁

专断。一般认为，王位父子相传始于近肖古王，也是从他在位时起，开始了所谓的真氏家族王妃时代，因为近肖古王的直接继承人继续从一个贵族家族挑选配偶。近肖古王命令学者高兴编写《书记》（一部百济历史），反映出他对王权扩大和国家井然有序而欣喜的心情。近肖古王的继承人是近仇首王（375--384年），近仇首王死后，枕流王立即继位，他采纳了佛教（384年），并将那种信仰的新的价值体系移植过来。

全盛时的高句丽

故国原王时，前燕（由鲜卑的慕容部落建立）和百济的入侵，给了高句丽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克服困难，高句丽需要重新改造其制度，这一任务是由小兽林王（371—384年）承担的。他采纳了佛教，于372年建立了一所太学，次年颁布了一部行政法规。如果说佛教有助于全国在精神上的团结，那么太学对于创建新的官僚结构则必不可少，行政法规则使国家结构本身系统化。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时颁布的法典的内容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它意味着高句丽初步完成了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结构。

这些内部安排为随后进行的向外扩张奠定了基础。正是广开土王（391—413年）雄心勃勃地担负起通过征服为高句丽开疆扩土的任务。这位国王的名字按字面意思就是“广开疆土的人”，他发动的重大军事战役都详细记录在当时高句丽都城即国内城（现鸭绿江中游满洲一边的通沟）其坟上的高大石碑上。根据碑文，广开土王在位仅仅十多年，这期间他总共征服了64处要塞，1400座村庄。他率领骑兵从高句丽四处出击，赢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胜利：在西边，他占据了长期以来成为高句丽同中国和非中国的

国家激烈争夺的焦点地辽东；他征服了高句丽东北的肃慎族人，从而使自己成为满洲的主人；向南进攻百济，将高句丽的疆域扩展到临津江和汉江之间地区；东南部到达洛东江流域，他击溃了一支倭人进攻新罗的军队。广开土王自定其年号为永乐，为高句丽僭取了与中国同等的地位。他死后被谥以一长串歌功颂德的称号，以充足的理由赞誉他那令人生畏的成就。

广开土王之后由长寿王继位（意为“长命”，413—491年），他在位79年。这期间，他继续其父业，使高句丽臻于鼎盛。他运用与北朝南朝都保持联系的外交策略来牵制中国，因而得以操纵这两支危及高句丽利益的敌对力量。他于427年将高句丽的都城迁到平壤，为国家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心。从狭窄的山谷地区转移到广阔的河岸平原，这表明都城不再主要是军事营地，而是已发展成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都市。确实这时高句丽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已日趋完善。

高句丽的都城从遥远的南方迁到平壤当然给百济和新罗造成了严重威胁。百济与新罗二者结合为联盟（433年），以及百济于472年派使臣前往中国北魏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高句丽南侵，都是百济在面临危急情势下采取的措施。但是，百济的努力落空了，高句丽于475年还是攻占了它的都城汉城（现汉城南的广州），俘获了盖鹵王，并杀死了他。百济将都城往南迁到熊津（现在公州），勉强地维持生存。高句丽的领土于是开始向南扩展到竹岭（联结现在北庆尚道和北忠清道）至南阳湾一线（见图，第44页）。现在高句丽已经成为一个制度机构运行良好、幅员广大、领土囊括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大帝国，终于同中国在战场上争雄长。



高句丽全盛时代图

新罗的兴起和加耶

如上所述，新罗是从斯庐国发展而来的，后者是位于朝鲜东南部的辰韩地区的十二个城邑王国中的一个。斯庐在联合该地区其它城邑王国建立联盟结构中处于领导地位。一般认为，昔氏的第一位统治者脱解王（传说时期为57—80年）的出现标志这一渐进过程的开始。后来，到奈勿麻立干王（356—402年）时，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联盟王国，控制着现北庆尚道的洛东江以东地区。通

过征服和结盟，斯庐已达到了可以迅速转变成新罗王国的阶段。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的中心人物，奈勿麻立干采用了一个与他作为一国之主的新地位相宜的称号。奈勿麻立干未取其前任用过的称号“尼师今”（意为王位继承人），而采用了“麻立干”，这一称号意为“分水岭”或“高地”。从这时起，国王不再从三个王室中挑选，而是在世袭的基础上由奈勿麻立干的金氏所垄断。奈勿麻立干在

位期间曾向高句丽寻求援助以挫败百济利用加耶和日本倭军骚扰羽翼未丰的新罗王国的计划。这一努力虽然获得了成功，却导致新罗的发展速度放慢。

加耶兴起于洛东江下游，这一带最初是弁韩十二“国”的领土。它们不受“辰王”的统治，而是通过联盟而形成了一个独立实体。在最初的十二国中，位于现在金海的狗耶国拥戴首露王为其第一任国王，并发展成为本加耶王国；而在高灵地区，弥鸟邪马国接受伊珍阿鼓为其第一任统治者，并发展成“大加耶”。而后本加耶和大加耶联合洛东江下游地区的其它城邑王国成立加耶联盟。

由于地处洛东江，加耶（特别是位于江口的本加耶）的海上活动生气勃勃，远至半岛西海岸与中国辽东和带方郡、向北沿东海岸与濊族、向南与日本倭人都保持着联系。不过加耶局促于新罗和百济之间，这两个王国之间的斗争使它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而且，当百济引来倭军取道加耶进攻新罗时，新罗与加耶之间的矛盾便激化了，最后导致高句丽的广开土王派军队援助新罗（400年）。此后，加耶不断遭到新罗的袭扰，直到本加耶于532年，继而是大加耶于562年先后屈服于力量日益强大的新罗，洛东江下游地区的其它小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样便造成加耶联盟的覆灭。

新罗的昌盛和百济的复苏

新罗在奈勿麻立十王时采取了将王权固定于金氏的措施，不久以后，随着訥祗麻立下（417-458年）继位，确立了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形式。稍后，为实现政府权力集中于中央采取进一步

措施。六个氏族公社被重组成几个行政“区”（部）。只是还不清楚，这种重建是何时着手进行的，好象是在慈悲麻立下（458—479年）或炤知麻立下（479—500年）统治时期，即五世纪后半期的某一时期。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在京城开放市场以成交各地产品，无疑便是新罗政府在其国土上推行中央控制的结果。同时，为了抵御高句丽对其边疆造成的压力，新罗与百济于433年结成联盟。在对外事务方面，新罗能够完全摆脱高句丽的干涉，很可能是在慈悲麻立下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罗与百济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百济于475年将都城迁到熊津后，新罗便与百济东城王结成了姻亲，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记述了这一事实，在以后几年里，两国联合进行了多次军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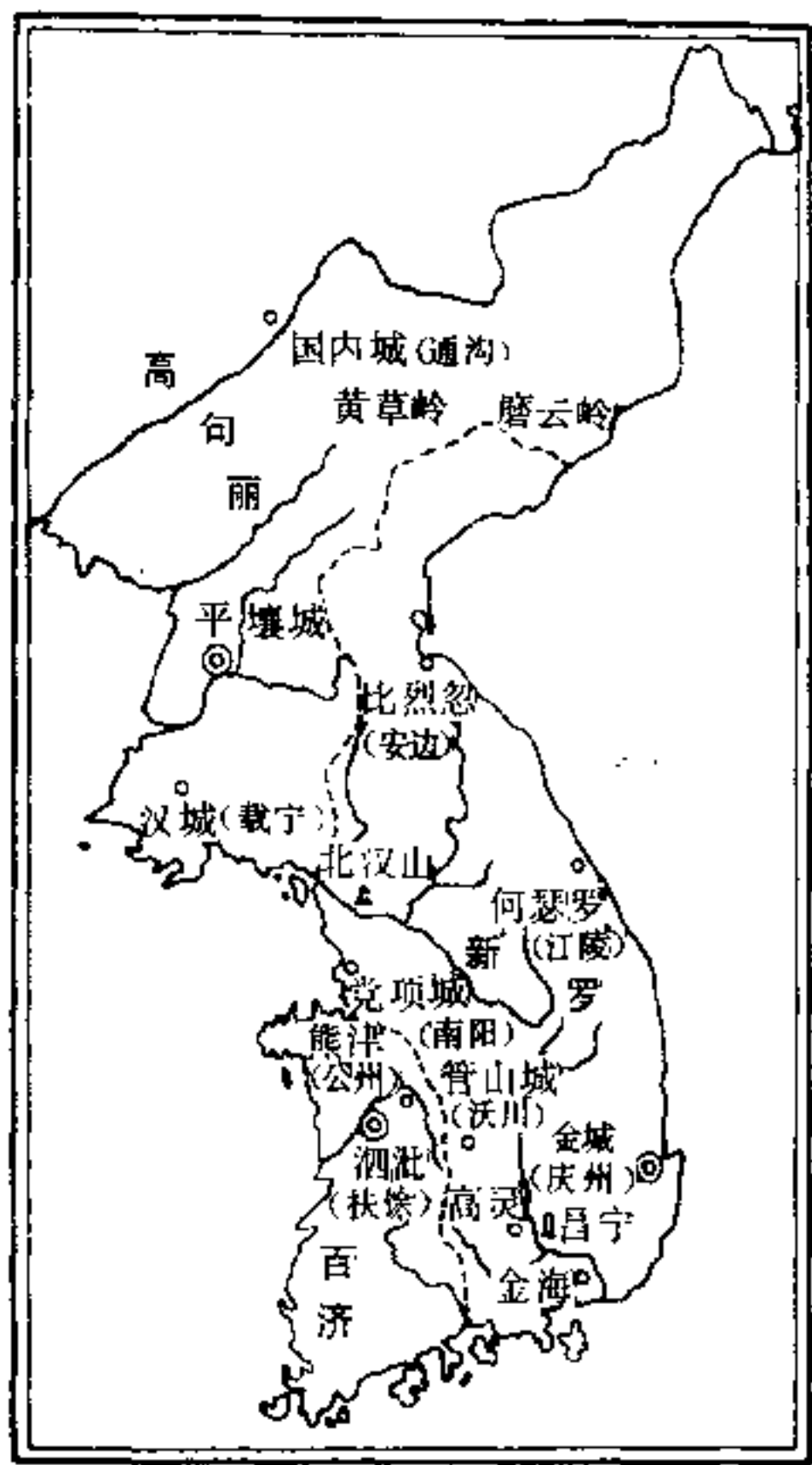
新罗在经历了内部和外部的的发展之后，终于在法兴王统治时期（514—546年）完成了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的构建。在其前任智证王（500—514年）统治时，随着牛犁的引进以及从这时起灌溉工程的广泛采用，新罗在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农业产量的增加，想必是加速新罗社会变革的一个原因。在政治领域，宣布国名为“新罗”，采用中国“王”称号来代替本国麻立干的称号。这些中国化事物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技术变革，而且也反映出新罗准备接受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这期间政治上还有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朴氏族作为新罗王后的来源出现了。

在基础奠定好以后，新罗在法兴王统治时期，创建了一个完全是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所特有的行政结构。这一发展的最明显标志是520年颁布了一部行政法典。虽然其条款还不能肯定，但一般认为，其基本条款中应含有17个等级的官制、关于服饰与官职要相符的规定、以及“骨品”制等。536年采用了一个独立的年号建元，也值得注意，因为它表明，在新罗境内王权已牢固地确

立，以及新罗自信已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享有与中国同等地位的国家。在 527—535 年间，官方确定佛教为国教，这是法兴王统治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为刚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新罗的国民团结和国家巩固提供了思想基础。

这时新罗在与其邻国关系上可能继续采取攻势。可以肯定，这种扩张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在进行着。智证王于 512 年吞并了于山国（东海的郁陵岛），法兴王于 532 年征服了布加耶（现金海地区），从而为向西北方洛东江流域推进铺设了跳板。不过对新罗领土扩张最为卖力的还要数真兴王（540—576 年）。551 年，新罗联合百济圣王（为百济中兴事业开创者）进攻汉江流域高句丽的领土。汉江上游的十个县于是被新罗攻陷，稍后，新罗又将百济逐出汉江下游，从而将整个汉江流域控制在自己手中。圣王极为愤怒，于 554 年对新罗发动了一场正面攻击，但他本人在管山城（现沃川）战役中被杀。维持了 120 年的新罗——百济联盟终于破裂。新罗占领汉江流域不仅为它增加了人口和物资，而且为它提供了一个重要门户，新罗通过这个出口可以与黄海彼岸的中国交往。562 年，真兴王又摧毁了大加耶（现高灵地区），从而完成了新罗对洛东江流域沃土地带的征服。在东北，真兴王也将新罗疆域推进到咸兴平原。为纪念君主亲自巡视新边疆而在昌宁、北汉山、黄草岭和磨云岭（见图，第 48 页）上竖立的四块石碑，有力地证明了真兴王作为征服国王所取得的武功。

应当记得，百济已于 475 年被迫将都城南迁到熊津（现公州），其存在一度曾面临着威胁。经过东城王（479—501 年）和武宁王（501—523 年）两代的努力，百济才稍有复兴。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百济在京城以外地区设立了 22 个区（檐鲁），王子或王室其它成员每人分封一区，以期加强国内团结。但是如果要为



真兴王拓境图

国家重新发展打下基础，百济就必须冲破群山环绕的熊津的限界，找一处地势更佳的新都城来治理它的国土。圣王抱着这个目的迁都泗泚，即现在扶余的大平原上，同时他将其王国改名为“南夫余”。一般认为，22个不同的中央政府官署制度以及五个京畿区（部）和五个（方）构成的地方行政结构很可能是同迁都夫余一道发生的。此外，圣王把传播佛教的任务委托给谦益和其它僧侣，这样便巩固了国家的精神基础。同时，他进

一步加强了百济与中国南朝的联系。

在重建王国和增强实力之后，圣王转而致力于恢复百济以前在汉江领域的领土。为此目的，他与新罗的真兴王缔结了盟约，乘高句丽内讧向北推进。由于占领了汉江下游，他曾一度达到了目的。但是新罗出乎意料地攫取了圣王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这一成

果，终于使他的梦想归于破灭。百济王在愤怒之下试图回击新罗，但正如我们已了解的，他本人却在战斗中被杀身亡。此后，百济便将新罗视为永世的仇敌，而与以前的宿敌高句丽联合一道一次又一次地对它发动进攻。

第二节 三国的对外关系

发展与外国的关系

在三国与东北亚各邻国的关系方面，与中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三国对中国政策的总特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由于热衷于推行扩张性的征服政策，所以它们有时敢于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自然，它们反过来也遭到中国的进攻。与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尤其如此。确实，这种冲突是三国时期与中国关系的主流。其次，在制订统一半岛的各自策略过程中，三国都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此时中国南北朝之间的对峙，在外交方面还试图利用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倭人。第三，三国都毫不犹豫地吸取了中国文化中对其自身发展可能有用的成份。三国时期，朝鲜的几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就一直是在这些基本特点的框架中发展的。

我们已经说过，高句丽在其立国的早期阶段，曾一再对中国人在辽河和大同江流域的领土发动进攻，在东川王统治时（227—248年），高句丽向鸭绿江口的西安平进犯，试图截断中国本土与其乐浪殖民地的陆路联系。中国的魏国在毋丘俭率领下于244年即报复了高句丽的来犯，结果攻占了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城（也称国内城，现鸭绿江中游中国一侧的通沟）。魏国在次年（245年）又派出一支由王颀统领的军队入侵高句丽，东川王只得逃亡到偏远的东北海岸地区寻求庇护以保全自己。魏国于265年灭亡后，接

着是晋朝（266—316年）的短暂统一，但这是极为脆弱的统一，中国仍不断为其北疆游牧民族的侵袭所困扰。高句丽抓住这一机会重新进逼辽东并同时将中国人逐出乐浪殖民地（313年），这样便获得对大同江流域古朝鲜以前领土的控制权。

但在中国，一方面晋王国被驱赶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另一方面在中国北部地区，十六个短促的王国此兴彼衰，除三个外其余的王国都是由五个不同的非汉族人建立的。鲜卑人的前燕（由慕容部落建立的）是其中的一个，当它推进到满洲时，高句丽不得不再次进行一场血腥的战争以求控制辽河地区。结果是高句丽遭到惨败，342年，前燕国王慕容皝统帅入侵大军涌进高句丽都城，将王宫夷为平地，还掘出先王美川王的尸体，虏获了皇太后和50000名高句丽人。三十年后，371年百济近肖古王的军队途经平壤向北推进，在攻城战役中杀死高句丽君主故国原王，给了高句丽同样狠狠的一击。为了克服国家日益加深的危机，前面已经说过，在小兽林王在位时（371—384年）实施了许多制度。这为广开土王在位时高句丽的辉煌扩张奠定了基础。该王终于成功地占据了整个辽东地区，并征服高句丽东北边境的肃慎族人，最终创建了一个幅员囊括大半个朝鲜半岛和满洲许多地区的大王国。

随着疆域大幅度扩展，高句丽当时对中国采取了与较远的王国友好往来，而与相距较近的王国兵戎相见的政策。这样高句丽一边与邻近的北朝继续激战，一边又越海谋求与中国南朝发展外交接触，高句丽还与中国北疆的游牧民族建立联系以便进一步牵制中国。至于百济，为了遏止高句丽，不仅与北朝也与南朝建立了联系。不仅如此，百济还向百济移民在日本九州建立的许多小倭国求援以发动对新罗的进攻。这迫使新罗转而求助于高句丽，于是广开土王派遣一支高句丽军队将倭军驱逐出新罗境外。

但是，随之而来的高句丽的压力却使新罗宁可与百济结盟以求得庇护（434年，新罗纳祗麻立干王在位期间）。

三国与中国的冲突无论多么激烈，都没有使朝鲜国家对引进中国文化的热情稍减。对此最值得注意的解释是认为采用了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佛教和儒教思想以及中国文字的缘故。不过，尽管有了和平的外交关系和密切的文化接触，但朝鲜三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仍是它们关系的主流。高句丽与隋王朝和唐王朝之间的战争标志着这一激烈冲突达到了高潮。

高句丽与隋和唐的斗争

六世纪后半期，三国的力量均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罗由于占据了汉江流域便推进到半岛的中心地区，但这一征服招致了高句丽与百济的敌视，面对两者的联合力量，新罗陷于孤立。高句丽——百济新联盟立即进攻新罗，特别是与中国交通线上的党项城（现水原以西的南阳），高句丽著名的指挥官温达就是在征伐新罗的一次战役中被杀身亡的。

六世纪后半期不仅在朝鲜半岛而且在大陆上也开始出现了新的紧张气氛。在中国，隋朝在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再次成功地统一了帝国（589年），与此同时，在中北亚荒原崛起的突厥人却对获胜的隋朝造成了直接威胁。由于隋朝不断向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和满洲扩展，高句丽于是谋求与突厥联络抗击隋，而同时它的盟国百济也正在与隔海的日本人接触。这样，为了对抗由突厥、高句丽、百济、日本代表的南北同盟，隋与新罗联手组成东西轴心。这两大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预示一场风暴即将席卷东北亚，而高句丽与隋之间的摊牌则是最具有决定性的较量。

598年，高句丽越过辽河悍然袭击辽西，第一个公开了它的敌意。隋文帝对高句丽发动了一场报复性的攻击，但遭到惨败，中途只得撤回。隋朝的下一位皇帝于612年接着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进犯，集结的兵力据说达100万人之多。而且就是在他的军队没有攻下高句丽第一道防线上的重镇辽东城（现辽阳）的时候，他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即大约30多万人，投入那里的战役，直接攻打高句丽的都城平壤。但是隋军陷入了高句丽著名指挥官乙支文德设下的陷阱，在萨水遭到灾难性的接败。据说30万隋军中只有2,700人越过鸭绿江侥幸夺路逃回，隋炀帝于是只得解除对辽东城的围攻，将军队撤回中国本土。以后，炀帝继续对高句丽派兵都徒劳无功，不久因战争而削弱的隋帝国便崩溃了。

唐灭隋以后，高句丽预计中国将会进一步发动进攻，于是便在西北边境上修筑了一道长达千里的围墙增强它的防御。大约同时，高句丽贵族发生了内讧。渊盖苏文在大肆杀戮荣留王和其它异己分子后，作为拥有绝对政治权力的军事强人出现（642年）。而后，渊盖苏文在外交关系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使高句丽处于同时与唐和新罗对抗的境地。他拒绝了新罗使臣金春秋吁请援助以击退百济进攻的要求，反而命令新罗让出汉江流域。他对唐朝敦促高句丽停止对新罗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也表示蔑视。以后不久，645年高句丽的这种挑衅态度终于招致唐对它发动的一场大举进犯。

唐太宗越过辽河，攻陷了辽东城（现在的辽阳）和其它一些地方，但在安市城（现在的英城子）遭到阻击，于是只得撤退。虽然，高句丽的防御堡垒彼此缺少呼应，但安市城仍经受了60多天的围攻，其间唐军投入全部兵力，一天内进攻竟达六、七次之多。在杨万春指挥下顽强的守军击退了每一次新的进攻，城塞始终没

有被突破。不久，太宗皇帝又几次三番企图进犯高句丽，但都被击退了。

高句丽对隋唐侵略军的胜利在朝鲜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征服高句丽是隋唐为达到称霸整个东亚的大帝国计划的一个步骤。因此，如果高句丽战败，百济和新罗也很可能落入中国人统治之下。但是，高句丽顽强地支撑下来，便起到防波堤的作用，抗御了中国人的一次次入侵，从而使朝鲜半岛上的民众得以免遭外国征服的无妄之灾。因此，高句丽的胜利在朝鲜历史篇章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第三节 三国的政治和社会

中央贵族统治的出现

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颇为艰辛的努力之后，三个王国都演变成了中央集权的贵族统治王国。每个王国的权力都集中于居住在都城里的某些人的手中。而在那些人中，从等级森严的社会身份制度中获取特权的贵族家族（特别是国王和王后的世系）似乎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也在文化方面占据了优先地位。三国时期便是这一人数极其有限的世系巩固他们在各自社会的统治地位的时期。

关于高句丽社会身份制度的确切性质虽然所知不多，但看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贵族阶层，首相大对卢便是从这个阶层遴选的，而且它本身有权选定任何最高官职的人选。无疑，这一上层贵族集中于王室和高句丽君主挑选王后的那些世系。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测，除了桂娄部的高氏，最荣耀的敬称“古雏加”只有消奴部的前王室和贡献后妃的掾奴部的明临氏才配享用。在这一最高贵

族阶层之下是其它几个社会阶层，地位不同的几个社会群体之间似乎不能自由通婚。

我们知道，百济有八个望族——沙氏、燕氏、荔氏、解氏、真氏、因氏、木氏和苦氏。政府要职都被夫余王室和百济王后的真氏和解氏家族所把持，而京城以外重要地区（如 22 个檐鲁区）的主要行政职位则全部委派给王室成员。因此，可以推测除国王和王后的家族在百济社会居于显赫的地位外，一般认为只有少数与众不同的贵族家族集团可以参与像政事堂会议一类决策机构，该机构的职能被认为是推选一位首相来统治百官。百济的官服着色制度与新罗的相似，将官职分成二等十六级，这可能与社会阶级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新罗的骨品制为三国时期贵族统治社会的实际结构提供了最清晰的说明。这一制度按照个人骨品即世袭血统决定的受尊敬程度，授予或收回上自政治职位下至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特权。“骨品”本身有两等，即“圣骨”和“真骨”，此外还有“六头品”，从六头品至一头品共六个等级的“头品”。有资格为上的金氏王室成员才具有“圣骨”的身份，但后来在新罗统一前这一高级骨品便不复存在了。在“真骨”这一等级中有些人也属于金氏王室成员，但最初并不具备为上的资格，然而在圣骨这一等级消失后，具有真骨身份的那些人便占据了王位。真骨还包括早先为新罗王室后来为王后来源的朴氏，由布加耶国王室一脉相传的“新金氏”。在同一个新罗的金氏王室中，有圣骨与真骨之分，其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显然是依据母系血统来区分的。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由一般贵族构成，六头品（也称“得难”可以解释为“得来困难”）地位仅次于真骨。至于三头品、二头品和一头品，如果它们曾经正式存在过，想必指的是平人或百姓，即没有特权的普通人。

正如已经指出的，不同等级的骨品授予其拥有者以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官阶和官职的分配，对此下图将予以说明（见图，第56页）。例如有真骨品级的人可以享有最高的官职（即伊伐滄或角干），而有六头品身份的人则受到限制，官阶最高不过为阿滄（第六等官阶），有五头品的人最高不过为大奈麻（第十等官阶），有四头品的人最高不过为大舍（第十二等官阶）。这种限制自然反映在官职的任命上。例如，令这一职位是一个部门之首，只能由大阿滄（第五等官阶）或更高官阶的人担任。因此，这些部门长官的职位只能由真骨这一等级的人担任。与此相似，卿或部门副长官的职位由有限滄（第六等官阶）至奈麻（第十一等官阶）官阶的人充任，因此可以由六头品或五头品的人据有，不过这是这两个等级的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职。部门中的较低官职如大舍、舍知和史既可以由四头品的人也可以由一头品和骨品稍高的人担任。在军事方面，新罗军队中行使最高指挥权的是将军，其官阶由伊伐滄（第一等）至级伐滄（第九等），但规定只有那些真骨等级的人才能接受这一类要职。

因此，个人的仕途不能不受到个人在骨品制中所具有的等级身份的制约。不仅如此，骨品还决定了一个新罗居民可以居住的住所的大小。例如，一个真骨的房屋长宽不得超过24步。六头品的房屋为21步，五头品为18步，四头品或平民为15步。此外，以骨品为依据的禁奢法令对官服、车马装饰和各种器具的着色实行管制。毋庸置疑，象新罗这样一个等级社会，统治权力是由享有最高社会等级地位的人即真骨等级的人所把持的。而且由于真骨中的核心分子是王室和王后家族的成员，可以断言，统治新罗社会的就是这两大世系集团。新罗的“葛文王”（相当于高句丽的“古维加”）这一尊称只授予王室和姻亲家族的成员，这一事实也

可以看作是新罗社会这一基本特点的反映。

政治结构

三国都同样地从早期多元的政治制度演变为以王权为中心的单一的官僚结构。例如高句丽的贵族官职被分成十二等级，最高等级是大对卢，也就是首相。在高句丽的结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个兄品位：太大兄、皂衣头大兄、大兄、小兄和诸兄。兄在上下文中含有长者的意思，一般认为，在高句丽转变为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的过程中，那些以前曾经是部落或氏族首领的人被授予“兄”这一适合他们早期地位的品位，这样他们便被融入新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还应注意到，高句丽许多官阶附有使者之称：太大使者、大使者、收位使者和小使者。与有着部落或氏族首领背景的兄不同，有使者品位的人似乎来自于为王室和权贵之家服务的那些管家中间。高句丽往昔的多元政治结构就这样转变为单一的官阶制度。

百济实行三级官阶制，其上品是佐平和几种率，其中品是几种德，下品由武督以下构成。三个品级进一步由每一品级官服的着色加以区别。上品着紫、中品着赤、下品着蓝。与新罗情况相似，百济的制度可能反映官阶与社会地位之间有一种关系。看来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像百济这样的单一官阶结构必然是随着中央集权的贵族专制国家的创建而形成的。再看一下新罗的官阶制马上就可以明白，像滄和知这类名称是表示早期部落首领的。而且像高句丽和百济那样，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将新罗往昔的敌对分子融为一体的单一结构已经创立。

关于三国时期的政府结构，实际上没有高句丽方面的记录。但

是百济方面，我们知道，当它的都城还在汉城时（百济都城于475年从汉城即现在的广州迁到熊津即现在的公州），有过六佐平或大臣，分掌内廷奏折、财政、宗教礼仪、王宫和京城守卫、刑狱和地方军队。在百济最后的125年，当时都城还在泗泚（现夫余），便设计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府结构，由22个部门组成，其中12个隶属王宫，10个分管政府事务。在新罗，一段时间也创建了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并按职能各有专司（如军事、监察、内廷机要以及财政等）。

三国的官阶

高句丽 12 官阶					
(1)大对卢	(2)太大兄	(3)郁折	(4)太大使者	(5)皂衣头大兄	
(6)大使者	(7)大兄	(8)收位使者	(9)小使者	(10)小兄	
(11)诸兄	(12)仙人				
百 济 16 官阶					
(1)佐平				} — 紫服
(2)达率	(3)恩率	(4)德率	(5)扞率	(6)奈率	
(7)将德	(8)施德	(9)固德	(10)季德	(11)对德	—— 绯服
(12)文督	(13)武督	(14)佐军	(15)振武	(16)剋虞	—— 青服
新 罗 17 官阶					
(1)伊伐滄	(2)伊尺滄	(3)迎滄	(4)波珍滄	(5)大阿滄	—— 紫服
(6)阿滄	(7)占滄	(8)沙滄	(9)级伐滄		- 绯服
(10)大奈	(11)奈麻				- 青服
(12)大舍(知)	(13)舍知	(14)吉士	} --- 黄服		
(15)大鸟(知)	(16)小鸟(知)	(17)造位			

三国在各目的政治进程中最重要特点是政务会在政治决策

中发挥作用。高句丽的首相经高级贵族会议选举产生，有五等官阶（皂衣头大兄）和五等官阶以上的人集会商讨和决定重要的政府事务，这一事实表明由高级贵族官员参与的会议确实存在。与此相似，一般认为通过投票程序选举首相的百济政事堂会议也具有以政务会议管理该国事务的性质。不过，为这种现象提供最清楚解释的还是和白制度，即新罗的一种贵族会议。和白是由“上大等”这种贵族领导而由“大等”这种等级的人组成的议会。一般认为，这两种人都出自真骨世系。和白的职能是就国家最重要的事务作出决定，如王位继承、宣战等；早先关于正式采纳佛教的决定也是由和白会议作出的。全体一致的原则支配着和白的决定。我们知道，审议特别重要的事务都是在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场所进行的，有庆州京城东端的青松山南边的专知山、西边的皮田和北边的金刚山。象高级贵族集会一样，这些政务会议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给三国的政治进程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三国中每个王国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都延伸到农村，农村已逐渐被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在先前部落公社声称有领土所有权的地区建立了堡寨，这些堡寨于是便成为地方行政的中心。不久，地方行政单位被称作郡，在高句丽一郡之长称作处间近支（或道使），在百济称作郡将，在新罗称作郡太守，但实际上，“城主”这个叫法更常用，适用于所有这些地区的长官。最后将几个郡合并成更大一级的行政单位省，高句丽有五部（北、东、南、西、中），百济有五方（中、北、东、南、西），新罗有若干州（上、下、新）。这些省的长官在高句丽称做褥萨，在百济称作方领，在新罗称作军主。在三国的京城里，贵族统治者居住在此，于是作了特别的行政划分，高句丽和百济都为“五部”，新罗为六部。像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每个王国京城的居民都享有比外省居民优越的地位。

军事组织

随着三国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军事单位已开始按国家标准组建,而且象政治制度发生的演变那样,军事单位也被置于王权之下。于是,就这种结构意义而言,国王已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而实际上,三国的君主经常亲自率领士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虽然关于新军事结构的组织单位所得信息尚不具体,但已经了解在新罗建立了称为“停”的六部,每州有一个。六停由有真骨身份的将军统领,由住在都城的人组成,因而具有成员出身上层的精锐之师的特点。那些士兵将服役视为一种荣誉和特权,而不是一种繁重的义务。在新罗除了停这支核心军队以外,还有叫做“誓幢”的军队,一般认为其兵员由家臣那一类人充任,要为其统帅服役和效忠。

显然,为了补充作为三国军队核心的精锐之师,还将一伙年轻人组织起来,如新罗有花郎徒。花郎的特征是由新罗创立时期以来的传统公社制度演变而成的。如同早期以氏族为中心的社会青年人的那些共同大会那样,花郎磨炼出一种为国家需要效劳的精神气质。事实证明或有证据显示,尚武的花郎青年推崇早在600年前由著名佛教僧侣圆光制订的“世俗五戒”(其内容为1.效忠君王2.孝奉双亲3.忠诚友谊4.战不退却5.戒妄杀戮)。花郎的活动也有宗教特点,比如他们在新罗的神山圣河处营建圣殿,表演宗教歌舞以祈求国泰民安。但花郎的最重要的作用毕竟在军事方面,花郎在和平时整军习武,战时奔赴前线投入战事。许多关于骁勇善战的传说都讲述了象斯多含、金庾信和官昌这些花郎的英雄业绩,这是全部朝鲜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片断。

三个王国各自还组织了地区或地方一级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作为地方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在作为地区

行政中心的每个要塞，都由兵员固定的军队戍守，一般认为高句丽的扃堂制度是作为加强这些地方单位的一种手段而被制订出来的。像花郎一样，扃堂的年轻成员专心于砥砺道德、操练武艺。城主当然是一郡的军事首脑，而一省之长既然对几个郡的军事中心享有管辖权也必然兼任军事首脑。因此，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三国时每个王国自己都有一个一元化的军事组织。

村长及农民

随着以君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贵族专制国家的出现，演化出一些新概念，如“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土地私有制的消失或国民都处于国王直接统治之下。作战获胜的指挥官或贵族出身的政府官员会得到与他们的出色服务和高贵地位相称的大片土地和众多战俘。结果，拥有的私人土地和奴隶便越来越多。国王本人也毫不例外，从以下事实即可看出。百济政府机构中设有内官，该部门掌管王室内务，主要忙于与谷物及手工制品有关的事务。有时，新罗将战俘或犯人安置在叫做乡或部曲的村子中，他们在那里组成了地位最低的劳动者村社。实际上，三国时期贵族国家的一个特点便是社会强制性地使大部分居民沦为丧失自由身份的人。

不过，身份是自由人又耕种自己土地的各地的独立农民仍是这些社会的占主流的阶级。当然，他们的生命及生活是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国家向他们征收粮食和贡税（以地方产品形式），还强迫他们服劳役。自由农民以一人或一户为基础交纳布匹和粮食税，在规定的时间内被调去守卫地方，或当劳工去修建要塞、灌溉设施或其它工程。确实，有人几乎想证明国家控制农民的兴趣与其说是榨取他们

所垦种的土地上的产品，毋宁说是役使他们的劳动力。

由于三国时期居住在农村中的农民仍旧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某些农业活动，例如种植大麻，所以很明显，早期公社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不过，总的说来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农民，独立耕耘着他们的土地，结果，在他们中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社会差别。例如有些农民失去土地，因此而沦为新的佃农阶层，这一现象可以在关于乙弗（即后来高句丽的美川王）的传说中看到。传说记载他在水室村一户富庶地主阴牟家当佃农的经历。佃农是靠耕种他人土地勉强为生的贫苦农民，高句丽所谓的游人看来可能属于这一个农业劳动者阶层，由于游人处于无地的困境，因此对他们征收的租税比自己有土地的农民要轻。高句丽的赈贷法使农民在春季饥谨时能向国家仓库借粮，秋收后予以偿还。作为对该国农业社会中已出现这种无地阶层的一种回应，这项法令想必至少部分实施过。

农民生活的村庄是地方行政结构的基础单位。中央政府对农村的控制显然是通过村长来实行的，就新罗而言，虽然不完全，但至少可以设想这一制度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新罗的村长都是本地的土著，其社会地位由其等级身份所决定，而他们的等级身份却不同于都城居民的等级身份。他们或具有“真村主”或具有“次村主”的官阶，而他们享有的社会地位特权则与五头品和四头品相当。

村长们接受地方政府的官阶并不是都城居民享有的那一套官阶，他们可以被提升到的官阶等级早已由其“真村主”或“次村主”的身份地位所决定。这种情况当然意味他们被摒于其它政府官职之外，就是日常生活方面也要受制于与他们作为村长的社会地位有关的一些限制性法令。

第四节 三国的贵族文化

史学和儒教

早期与大陆铁器文化一道传入朝鲜的汉字系统在三国时期已应用得更加广泛。但是，原封不动地使用这种外国文字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朝鲜人自然想出一些办法以使汉字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特别发明了一种或用汉字字声或用汉字字意表示朝鲜字的方法，这种翻译方式有一套固定规则，后来影响了被叫作万叶假名的日本文字系统的创立。起初，韩语翻译仅限于记录本国名词，但后来发展成臻于成熟的文字系统。正如在612年壬申誓石记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汉字首次只按朝鲜词序来安排。但后来，某些汉字开始部分按朝鲜语法来表达句子以便阐明其意。这种文字系统叫做“吏读”。稍后发明了一种更复杂的系统叫“乡札”。总之，像在写乡歌中所用的，乡札用有同样意思的汉字来表达朝鲜名词，而随意用语音合适的汉字来写动词词干和音变及其它语法成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阅读中国原文用的系统，用汉字按固定形式写成，将朝鲜语法成分适当地插入，这叫“口诀”，据记载薛聪用新罗语阅读九部汉文典籍，这意味着在原文解释方面使用了口诀系统。

随着书写方式的发展，国家支持的各种编纂活动开始进行，其中主要是国史编纂。我们知道在高句丽初期产生了一部名叫《留记》的一百卷的著作，600年又由李文真重新加工辑成五卷的《新集》。在百济，近肖古王在位时（346—375年）由高兴编纂了一部名为《书记》的史书。在新罗居柒夫于545年完成了《国史》。虽然这些历史著作无一幸存，但一般认为它们的大部分内容已由金富轼收入到他在十二世纪编写的《三国史记》一书中。三国各自在其颁

布法典、设计制度并向外扩张的同时着手编纂历史,这可能反映它们极欲在国内外显示君主尊严的共同愿望。因此,这些国史的编纂可以被看作是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个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创立的纪念碑。

三国都大力强调灌输儒家精神作为维持贵族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早在372年高句丽就设立了讲授儒教的太学。不久,各地的扁堂也将高句丽的未婚青年召集起来讲授中国典籍和操练武艺。据记载,高句丽人很早就接触了儒家五经、司马迁的《史记》、《汉书》、汉字字典《玉篇》以及《文选》一类典籍。在百济,既然讲授中国典籍的学者被称为“博学之士”,想必也有过儒家的教育制度。另外据记载,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的一些选本也有人阅读。虽然儒教传入新罗比其邻国要晚,但是儒家道德观念在当地民众中间传播得却相当广泛。花郎徒成员拳拳服膺的忠贞观,在将新罗社会凝聚为一体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反复灌输忠诚信念,将这股凝聚力向上导向加强王权。这样,儒教对于造就一种促使新罗民众举国团结一致的社会风尚便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圆光僧的“世俗五戒”和512年《壬申誓石记》(此文刻于一块石碑上,在文中两名新罗青年发誓恪守忠贞并把中国典籍读完)中表达的价值观便可以理解了。没有理由认为,儒教教义在巩固它们的社会所作的贡献方面高句丽或百济与新罗有什么不同。

接受佛教

普遍认为,372年是最早接受佛教的日期,当时顺道和尚从控制中国东北的前秦进入高句丽,并将佛祖偶像和佛教箴言传入该国。12年后,摩罗难陀和尚从位于长江流域的东晋将佛教传入百

济。在这两个例子中，主张吸收中国文化的态度似乎已有发展，新教似乎是经官方批准的传教人士从中国那些与三国关系友好的国家传来的。因此，佛教受到了高句丽和百济王室的欢迎而没有引起任何重大冲突。在新罗佛教开始传播也为时不太晚，可以确信在五世纪中期阿道和尚（也称黑胡子）由高句丽进入新罗后佛教便开始传播了。这一传教活动只是个人的努力，仅限于新罗的边远地区，由于遭到当地的敌视，最后以失败告终。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南方梁朝（502—557年）和尚兼使臣元表的到来，佛教才进入新罗王室。稍后，法兴王（514—540年）尽一切努力保证佛教的传播，却因新罗贵族反对而长期受到阻挠，以至高级贵族异次顿于527年英勇殉难。然而这一事件起到了催化作用最终导致官方在法兴王统治末期，很可能在535年承认了佛教。

在这三个王国，王室为接受佛教起了重要的开创作用。这在新罗显得尤其明显，只是当佛教传入新罗王室后，过了一个世纪，佛教才开始在民众中传播，最终导致官方承认这一异教。而且正是国王及其臣僚，不顾贵族的反对，强有力地贯彻官方的佛教法令。佛教受到王室如此强大的支持和推动可能是因为它看来非常适合作为支持以王权为中心的新统治结构的精神支柱。信仰者万众一心地皈依佛法以及万民如一地侍奉君王的观念，肯定作为一支力量对于这些早期朝鲜国家的团结和凝聚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同时不应忘记，如果没有强大的贵族集团的认可，佛教要得到官方接受也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差别如此严格的这种社会中，佛教在因果报应的基础上关于再生和转世的教义可能被当作对贵族特权地位加以承认的一种学说而备受欢迎。因此，可以断言，佛教已经作为一种特别适合以君王为首的中央集权的贵族王国的需要的思想体系而被接受了。

三国时期佛教信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佛教已成为保护国家的一种学说。佛教自然也是个人谋求幸福的一种工具，比如通过祈求来禳除灾难和生育后代，不过实际上佛教作为一种保障国家福利的信仰显然仍是最重要的。因此，毫不奇怪像仁王经这样的箴言特别受人尊重。在履行箴言的教义方面，举行过“百座讲会”（也叫仁王会）这样的宗教盛典为国家祈福。此外，还有一种叫“八关会”的仪式也是为国家祈福的重要方式。在三国众多的佛庙中，规模最为宏大的都是用来传播保护国家教义的，如新罗的皇龙寺、百济的王兴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罗人笃信皇龙寺的九层宝塔象征新罗注定要征服其它九个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并接受他们的朝贡，还确信弥勒佛，未来的佛祖在新罗土地上已多次转世为花郎勇士。上述事实也反映世人相信佛教是国家的保护者。僧侣们劝勉说作战勇猛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及其统治者，而且是为了捍卫佛法，这些训诫对于那些应召而来为国一战的士兵们无疑是一种激励。

再看一下三国时期衍生的佛教教派，这对于说明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会不无裨益。最重要的教派是戒律宗，百济的谦益和新罗的慈藏是该教派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慈藏是国家首席住持，因而负有对新罗全境佛教机构的监督权。戒律宗教义侧重于阐述僧尼必须遵奉的“戒律”和“准则”，这在政治上也很重要，信仰和戒律的统一也可以为国家服务。为此目的，新罗建立了一套由郡、道及国家一级的住持构成的等级组织，用戒律宗的统治法则来控制全国的寺院和僧侣。这一时期还兴起了一种与后来道教教义相似的佛教，人们普遍相信佛力能够产生神奇的疗效，驱逐来犯者，甚至能杀死恶龙，这充分说明佛教对当时民众的吸引力有多大。不过在高句丽和百济后期，随着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佛教徒的信

仰也发生了变化,其证据是涅槃宗越来越不流行。涅槃宗教义认为佛性不朽,永存于万物之间,最为高句丽高僧普德所推崇,并以此来抵制道教的灵魂不死的信仰。

由于佛教受到国家如此有力的支持,因而毫不奇怪,僧侣有时也起政治顾问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很有名,一个是新罗的高僧圆光,国王向他请教如何治国安邦;另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慈藏,他作为国家的首席住持提议在皇龙寺建造九层宝塔。另外,佛教僧侣在将新的中国文化成分带到朝鲜的过程中起了开拓作用,因为他们在三国时期前往中国学习的人当中占了大多数(这一现象当时称“西学”)。僧侣们也给人们提供道德上的指引。圆光僧的“世俗五戒”以及与花郎徒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僧侣对他们所作的道德训诫都可以说明这方面的作用。

诗歌和音乐

不能肯定高句丽和百济的诗歌采取了何种形式,但在新罗有一种乡歌,贯穿在这些简单诗歌中的轻柔的韵律被认为是朝鲜人的文学情感的绝妙表达方式。不过,要完全欣赏乡歌便需要认识它的宗教特点。因为乡歌大都是花郎或佛教僧侣写的,常被用来恳请神明过问尘世俗务。这样,乡歌代表一种从萨满咒语到佛家祷辞的转变。融天师的“慧星之歌”据说曾经使得慧星消失、日本来犯者也逃之夭夭,堪称是三国时期一种不同凡响的乡歌,这清楚地表明了朝鲜早期诗的宗教性。

当时的音乐由于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充满了宗教意境。这里不乏表明音乐的宗教特点的证据:如花郎徒常常纵情歌舞的事实;史书关于新罗真兴王派遣居柴夫进攻汉江地区,自己前往

娘城(现忠州)召见于勒及其门徒尼文演奏音乐的记载;相信模拟声音具有神奇力量的百结先生,用槌槌捣击奏乐的轶事。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三国时期音乐在各国已十分兴盛。

这一时期已知使用了大约三、四十种乐器,包括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其中最著名的是玄鹤琴,它是高句丽的王山岳根据中国晋朝的七弦琴改制而成的。据说王山岳为他的乐器谱了一百多首乐曲,后来流传到新罗,产生了像玉宝高这样技艺精湛的演奏家。有关百济音乐的详细记载所存甚少,但就百济的乐器、乐器工匠以及演奏师们到达了日本这些情况来看,百济的音乐不比高句丽和新罗发展得差。加耶地区有一种独特的加耶琴也很著名。加耶琴由于勒带到了新罗,当时他向阶古和其它许多新罗弟子传授了演奏这种乐器的技艺。我们知道,光是供加耶琴演奏的乐曲就有 185 首。

艺术

三国时期的艺术具有简洁、率直之美。诚然,具有儿童般的怪诞意识作为早期朝鲜艺术的一种标志,虽然有时比如在小泥人身上仍能看到,但总的说来,这时已经消失。这个时期艺术与其说是一种成熟技艺的产物,毋宁说是具有一种粗犷之美的现实主义艺术。三国时期,在贵族阶层的努力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这个阶层尚未腐化堕落,因而这个时期的艺术在美的表达上也很自然具有率直粗犷的特征。当时佛教也逐渐兴盛起来,这不仅丰富了三国时期艺术的知识内容,而且明显提高了艺术的技巧,结果艺术品开始显示出一种臻于精炼的美感。

高句丽没有遗留下地上建筑物,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现存的

的高句丽都城通沟和平壤附近遗留下来的众多古坟间接推测其模样。高句丽的古坟有石塚和土塚两种。石塚由石料堆砌而成呈金字塔形,将军塚是这种形式坟墓的代表,其特征在于表明坟墓主人所拥有的强大的权势。土塚则是在石制的玄室之上盖土筑成的封坟,其代表作为双楹塚。从该塚玄室人口处的八角双柱、绘有图画的四角主柱、斗拱、栋梁等处可以略见高句丽建筑风格之一斑。高句丽没有遗留下与佛教有关的建筑物,这是因为堂塔皆属木制。百济虽亦以豪华的宫室和楼阁为主,并据记载曾建造过像王兴寺这样的大寺刹,但现存的代表性建筑物只有石塔。著名的石塔有扶餘的定林寺址塔和益山的弥勒寺塔。弥勒寺塔是一座具有木造塔形式的巨塔,而定林寺址塔则形式简洁,蕴含美感。新罗虽也留有許多巨刹的记载,但现在只有遗址尚存。不仅如此,连百济人阿非知所建的著名的皇龙寺的九层木塔据说也被入侵的蒙古人付之一炬。不过从宏伟的芬皇寺的模博塔及曲线优美的瞻星台仍可以领略到古新罗建筑的风范。最后应该注意的是,三国时代的寺院最初是一塔三金堂式,后来演变为一塔一金堂式。

在雕刻艺术方面,佛像几乎占了全部。高句丽的佛像以“延嘉七年铭金铜如来立像”和“金铜弥勒半跏像”为代表,这些优秀作品都而含神秘的微笑。百济的佛像如瑞山的磨崖石佛、头戴低矮筒朴小花冠的金铜弥勒半跏像,都带有优雅的面容和宽厚的微笑,表现出百济作品的特色。头戴雕刻成塔形高大宝冠的金铜弥勒半跏像是新罗佛像的杰作。这尊半跏像与百济的相比,线条更流畅,其神韵更为人称道。应当指出,三国都制作了许多释迦像或弥勒跏像,这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些雕刻品的作者已无人知晓,新罗的雕刻家僧人良志则是一个例外,他制作了许多佛像、神将、瓦博。瓦博这种雕刻艺术以造型优美而风行于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最有名的绘画当数高句丽古坟的壁画。绘于古塚玄室四壁及抹角藻井的天障等处的古坟壁画涉及各种题材，为研究高句丽人的思想和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高句丽的这些壁画通常依其绘画题材而命名，如神塚、角抵塚、舞蹈塚、狩猎塚等。壁画中尤为著名的是遇贤里大墓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图。线条遒劲、色彩鲜明、刚毅果敢的高句丽武士策驭座骑宛如置身眼前。在百济发现了受高句丽影响的古坟壁画，其中公州宋山里博筑坟和扶餘陵山里石室坟最为著名。然而，百济的古坟壁画比高句丽的更精炼优雅，两国的画家如高句丽的昙徽、百济的阿佐太子曾前往日本，他们技艺精湛的传世之作有法隆寺的壁画以及圣德太子像等。新罗也产生了著名画家，从有关画家的记载中推断率居便是一位名画家，但其作品没有一件保留下来。新罗的古坟没有壁画，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其古坟建筑中没有玄室部分。但最近在天马塚中发现的绘于马具障泥板上的天马图，向我们显示了新罗绘画艺术的雄健与精湛。

由于高句丽和百济的横穴式古坟易于盗掘，所以古坟的随葬品几乎无一幸存。不过最近在公州宋山里发现了完好无损的武宁王陵，从中可以看到金冠饰等优秀的百济工艺品。然而，留下最多工艺品的仍是新罗。这是因为新罗的竖穴式积石塚几乎难以盗掘。随葬品有金冠、金履、金带、金耳环、金戒指、金腕环等纯金制品，佩玉、玻璃等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之物。特别是金冠在金冠塚、瑞凤塚、金铃塚、天马塚等多处出土，因具有新罗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尤为人们钟爱。然而这些工艺品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其卓越的艺术品质，而在于它是新罗王权的一种象征。

第四章 专制王权的形成

第一节 新罗的统一与渤海王国的建立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在高句丽卷入与隋唐的血腥战争时，百济加紧了对新罗的侵犯。当时以忠勇著称的义慈王（641—660年）发动的攻势最有效。他在即位初期，于642年便派兵攻陷了大耶城（现陕川）以及新罗和百济素有争持的边界上的设防地带的四十多个重要据点。在这样紧急的情势下，新罗被迫把防线撤回到洛东江。在这一危急时刻，金春秋亦即稍后新罗的武烈王承担了向新罗的另一个敌人高句丽请求军事援助的危险的外交使命。但当时高句丽的掌权者渊盖苏文要求以归还汉江地区作为援助的代价，金春秋的努力因而落空了。新罗又派金出使中国，试图与唐朝结盟。唐朝同意新罗的请求，并制定了先攻克百济，再以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进攻高句丽的战略。

这样，于660年，中国的皇帝唐高宗派遣了由苏定方率领的一支船队入侵百济，同时，由金庾信带领新罗军队步行协同进攻百济。唐军在白江（现锦江）入海口的南岸登陆，而此时新罗军队已通过了大田东面的炭岬隘口。百济王由于忽视了一位名叫成忠的高级官员早先提出过而现在又由另一位名叫兴首的王室官员再次提出的忠告，很晚才派阶伯去阻止新罗的前进。但这支特遣



统一战争图

队寡不敌众，在黄山（现连山）战败，新罗和唐朝的军队于是猛攻百济的都城泗水。不久，泗水陷落，随着义慈王投降，被流放到熊津（现公州），百济王国灭亡了。

尽管国王降服了，但一名叫福臣的王室成员和僧人道琛在周留城招募了一支军队抵抗其国土上的入侵者。他们的努力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收复了大约二百个要塞。这时百济王子本从日本归来，复辟势力推举他为国王，并围攻泗水、熊津和其它被占领的要塞。

他们不仅袭扰唐朝的守军，而且多次使派来对付他们的唐军和新罗军遭到重创。人们会有趣地发现，百济统治者如果早一点得到他的臣民的这种帮助，百济何至于如此轻易地复灭。然而，复辟运动也发生了领导权问题，福臣杀害了僧人道琛，自己又被本所杀。新罗和唐的联军抓住这一内讧带给他们的机会发动了进攻，

并夺取了复辟势力在韩山的要塞。这时残余的复辟势力接连投降，任存城（现大兴）的最后一个据点失陷后，三年之久的复辟百济王国的斗争便终结了。

在最终摧毁百济后，唐和新罗的联军又转而进攻高句丽，这当然是最初的意图。早在661年，中国指挥官苏定方就率船队前往大同江对平壤发起过正面进攻。诚然，中国军队被渊盖苏文击败后被迫撤退，但高句丽的力量这时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消耗以及渊盖苏文专制统治激起的不满对于高句丽的削弱也起了作用。渊盖苏文死后，其子弟之间爆发了一场权力斗争。这场内部分争竟把高句丽推向毁灭。当时其长子（男生）被其次子（男建）排斥，逃往旧都国内城，投降了唐。而其弟渊净土则投奔了新罗。唐军不愿坐失良机，于667年在李勣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新的入侵，新罗也配合发起了进攻。这次，唐军得到了变节的男生给予的一切可能的帮助。虽然高句丽又固守了一年，但最终还是在668年灭亡了。高句丽的一个名叫剑牟岑的前中级官员向高句丽的末代国王的非法之子安胜宣誓效忠，发起了一场长达两年的抵抗运动，直到在他效力的人的唆使下被杀为止。安胜后来逃到新罗寻求保护，并被授予高句丽王的称号（后改为报德王）。

新罗驱逐唐

中国派兵征服百济和高句丽，用意在于将整个朝鲜半岛置于唐帝国的控制之下。出于这种考虑，唐在以前百济五个方的地区建立了五个辖区，开始直接统治该地区。不久唐创建了鸡林大都督府作为统治新罗的机构，并任命新罗的文武王为督军。为了显

出对朝鲜本国人无害，唐对这一强加的外来统治多方掩饰，出于上述目的，唐任命了义慈王之子扶馀隆为先前百济地区的熊津辖区的督军。唐接着又向扶馀隆和不甘俯首的文武王施加压力，在就利山（现公州附近锦江北岸的鹞尾山）会面，订立一项友好条约。这些行动不仅意在赢得百济人心，也是为了挫败新罗对前百济领土的图谋。不久，在高句丽覆灭后，唐又另设立了九个辖区来统治王国先前版图，同时又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授权它管辖高句丽地区、新罗地区以及前百济的领土。其结果与新罗的预想正好相反，新罗原以为唐会给予它不同于被征服的高句丽和百济的待遇。

但新罗不甘心接受这一结果。因此，几乎就在高句丽覆灭之时，新罗便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这次是力图赢得对前高句丽领土的控制。新罗向剑牟岑的复辟势力提供帮助，后者致力于驱逐中国人，正式拥立安胜为高句丽的国王。此外，新罗还派军队到百济地区并在几次战役中击败扶馀隆的百济军和唐的守军。最后，于671年新罗攻占了泗批要塞并建立了所夫里州，这样便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唐则宣布金仁问（文武王的弟弟，长期住在中国）为新罗国王加以反击，虽然未经他本人的同意；接着便向它以前的朝鲜盟友发起了进攻。新罗军队在汉江地区的一系列战役中与唐遭遇，并于676年成功地将唐军击退。最后，唐将其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辽东城（现中国沈阳正南的辽阳），实际上就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所拥有的霸权。这样，新罗开始占有了大致从大同江以至元山湾沿线以南的全部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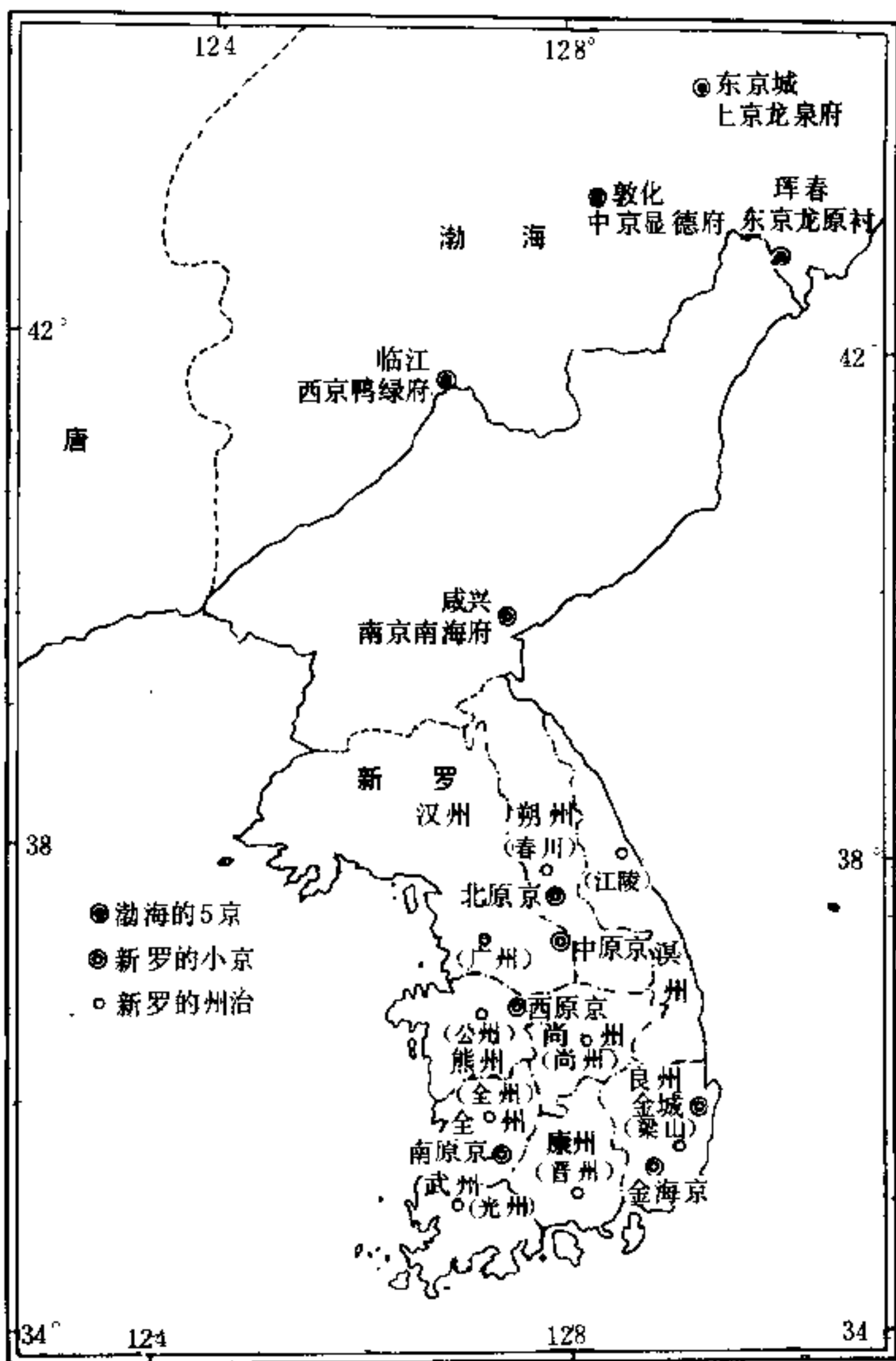
新罗以武力击退了来犯的唐军并维护了朝鲜半岛的独立，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唐朝试图摧毁百济和高句丽，同时征服新罗，从而将整个满洲和朝鲜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

一奢望给朝鲜人民带来的危机的严重性并不亚于 700 年前汉四郡的设立。显然，在唐的政治统治下朝鲜的社会文化将不能顺畅无阻的发展。幸运的是新罗完全抗御了唐的侵略，从而维护了民族的独立。这为统一的新罗社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朝鲜人民独立的历史发展铺平了道路。

诚然，新罗没有完成对三国所占据的全部领土的统一。高句丽曾据有满洲广大地区，仍处于新罗控制之外，从高句丽来的难民此刻在那里建立了渤海王国。所以严格说来，新罗的统一不包括整个朝鲜半岛，因为更北的地区是在渤海国的控制下。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削弱新罗统一的重要性，其意义首先在于为朝鲜人民在形成过程中采取独立的道路创造了一种环境。诚然，统一的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但毕竟是统一的新罗的领土和人民，在那里形成的社会文化构成了后来朝鲜历史的主流。就这个意义而言，新罗统一的历史作用几乎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

渤海国的建立

以上已经叙及高句丽覆灭后，其以前的一部分领土处于新罗的统治下，但其余的广大领土并不受一个统一的国家控制。辽东地区受唐的控制并处于安东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出于安抚该地区先前高句丽臣民的考虑，唐册封最后一位高句丽国王宝藏王为朝鲜王，并任命他为辽东督军。但他阴谋造反，不久即被废黜流放。不久，其子德武也被任命为辽东督军，他的直系后裔继承了他的职位，逐渐争取到其统治地区的完全自治，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小高丽国”。



新罗与渤海

同时，在中国东北部被松花江一分为二的大平原上，在古扶馀曾经兴盛过而后又处于高句丽统治下的地方，一个新的渤海国建立起来。渤海的创建人是前高句丽将军 大祚荣（后称高王）。高句丽覆灭后，他被当作俘虏，安置在营州（现长春西南的朝阳），但他抓住契丹人造反的时机，带领一伙人跑到东部的东牟山（现吉林省敦化附近），在那里自立为震国的国王（其时为 698 年，从 713 年开始称渤海国）。他不仅统治着高句丽的少数民族，也管辖着当时在满洲东部生活的人数众多的靺鞨人。靺鞨人是半游牧的肃慎族人，许多部落分散在满洲、南西伯利亚以及东北朝鲜的广阔区域。以往一直臣服于高句丽在满洲的统治，如今很自然要受渤海的管辖。尽管靺鞨部落人在渤海王国的人口中居多数，但统治阶层却由高句丽人构成，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国家代表着高句丽的复兴。这在一位渤海国使节向日本呈递的公文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该文书中，渤海国自称为“高句丽王国”。

新的渤海王国发现自己的国际地位极为微妙。渤海国从立国之日起就屈从于中国的强大压力，所以几十年来对唐人一直怀有敌意。732 年，武王（719—737 年）甚至出兵从海路进攻山东半岛登州港。同时，渤海还发现自己与新罗对峙，结果新罗于 721 年竟沿其北疆建起了一道防御墙。实际上渤海施加的压力显然是新罗不得不以大同江至元山湾一线为北方疆界的重要原因。因此，很自然，新罗和唐于 733 年要从两边夹击渤海。为了克服这双重危险，渤海与中国北方的突厥人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又往南隔海与日本进行了类似的接触。在这种危险的国际背景下，武王竟成功地将其版图扩展到包括满洲的整个东北部，从而清楚地表明了渤海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王国的地位。此外，在文王继位期间（737—794 年）渤海利用唐朝安禄山叛乱，还将版图延伸到小高句

丽地区，这样便将辽东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后来，渤海与中国达成了协议，开始吸收唐的制度和文化的。宣王时期（818—830年）渤海在领土扩张和文化成就方面达到了顶峰，当时占据了东临俄国滨海地区、西至满洲（中南部）的开原、南达朝鲜半岛的南咸镜道一带、北到黑龙江的广大地区。

朝鲜对外政策的转变

三国时期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与唐的关系中冲突是主要的一个方面，诚然与中国的接触也采取了别的形式，如外交联盟、文化引进，但从更广的视角看，占主流的是武装冲突的历史。不过，新罗统一后不久，新罗和渤海都与唐建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这代表在朝鲜与中国关系的特点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

新罗和渤海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被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交流，在唐朝纳贡制下进行的朝鲜出口贸易，起初多是由原材料构成，而后手工制品逐渐明显增长。不过自始至终，对进口物品的需求一直是朝鲜对中国贸易的强大动力，因为多种奢华的丝织品和手工制品一直是贵族们急切追求的消费品。以至新罗兴德王于834年不得不三令五申地禁止这样炫耀财富。

文化引进是与中国唐朝关系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新罗和渤海都传入了大量的书籍与艺术作品。此外，朝鲜僧侣和学生——起初主要是僧侣——到唐旅行，学习佛教或儒教学问，他们回来后，对本国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总的说来，唐文化的传入是新罗和渤海本国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日本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进行，特别是渤海，由于同新罗对峙更是频繁地隔海与其南面的那个岛国联络。至于新罗则连阿拉

伯商人都有过接触，这样远方文化的涓涓细流便渗入到了朝鲜。

第二节 统一后新罗的政治和社会

专制王权和贵族统治

新罗在统一半岛从而赢得愈益增多的土地和人口的同时，在内部也出现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新罗人民自己认为这些发展标志着他们历史的早期终结和中期开始。现在，有必要就新罗政治社会的这些变革的性质作一些探讨。

王权的不断加强是伴随新罗统一而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在新罗早期的历史阶段，即三国时期，王权是由“圣骨”世系的统治者所把持，但这一最高等级世系由于七世纪两位王后即善德女王（632—647年）和真德女王（647—654年）而终止。其后的国君太宗武烈王出自真骨世系。他在镇压和白的首脑、上大等毗昙的叛乱以及在王权之争中战胜另一名上大等阙川之后登上了王位。总之，他是在战胜以和白首脑上大等为代表的贵族统治势力之后取得王位的。武烈王的母宗出自王室金氏，是一个王的女儿，另外他的王后是金庾信的妹妹，其加耶王室世系被称为“新金氏”。于是新罗王后要在金氏王室的小圈子里遴选便约定俗成，从而打破了要求国王的母亲和王后都出自以前“朴氏”王室的传统。这一变化说明王权是在牺牲其权力竞争者即贵族家族的情况下壮大的。武烈王之后其王位由其直系后代继承，历史记载不再提到“葛文王”这一往日经常赐与国王的弟弟们以示对他们特权地位承认的敬称。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王权的加强。

到了神文王（681—692年）时才牢固地确立了王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对处于贵族权力中心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次果断

的清洗。他在即位的同一年即 681 年利用其第一个王后的父亲金钦突所发动的流产的政变，搜捕所有与之有牵连的人，并将他们杀死。接着又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处死了上大等军官。神文王的清洗是一次极其大胆的举动，它明显地将加强王权的进程推进到决定性的阶段，国王从此加快了行使王权所依赖的那些政治军事制度的建置。这样在其次子圣德王（702—737 年）在位期间，新罗最终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王权，而由于这一项目标的实现，也使王国最后得以享有异乎寻常的内部安宁。

所谓王权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骨品制这一新罗社会政治秩序的枢纽已经动摇。统治阶层继续由具有真骨世系的那些人所构成，主要的差别是在于掌权的金氏家族现在行使着几乎绝对的政治权力。另一个差别是关于王室本身的，王室现在已不是阻挠王权实施的势力，而是起着王权主要支柱的重要作用。

由于真骨贵族的权力总的说来遭到削弱，新罗等级秩序中六头品贵族的作用便相应提高了。这也可以看作是当时发生的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由于以前对六头品的擢升有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出任上大等或中侍一类最高的职位（见下文），甚至也不能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令，于是这些缺乏特权的贵族成员便与固守自己身份特权的真骨贵族们发生了对立，而将自己的利益与君王的利益拧在一起。因此，尽管社会身份制度造成了一些障碍，君王与六头品还是联合起来，结果六头品的人也从此在新罗社会崭露头角。特别是由于他们学问渊博见识通达，君主不时征询他们对政府事务的意见，而他们便以这种方式在新罗统一后的年代里发挥了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

政府机构

在王权大大加强的同时，中央政府的机构职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统一的新罗可能相当广泛地利用了详细制订的行政法规来指导政府事务。文武王的遗嘱责令适当修改新罗法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目标。然而新罗的行政结构至少在形式上大体沿袭三国时期的行政结构。例如分掌军事、度支、礼仪、税收、监察、司法的各部仍像以前一样存在。而且，实际上作为和白首脑而代表贵族统治的上大等职位，像法兴王于 531 年首次设立以来那样继续存在。但是有一个重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执事部变得比较重要，该机构作为新罗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创建于 651 年。执事部并不代表贵族利益，而是执行国王指令的政务会。执事部的首席长官实际上是首相，处于与上大等相对立的地位。执事部的首脑称中侍，在政治上比上大等更重要，这一事实表明统一的新罗的政治结构变得更加独裁。

统一的新罗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为了治理扩大的疆域，需要扩充省和地方的政府系统。在统一的新罗时期，地方行政的基本单位是州、郡、县。统一后不久，于 685 年建立了九个州。其中三个州在以前新罗——加耶的领土（尚州、良州、康州），三个州在百济王国的领土（熊州、清州、武州），另外三个州在高句丽以前统辖的区域（汉州、朔州、溟州），这种九重划分好像有意模仿古中国夏朝的九州模式。起初州是由摠管来辖治，这一名称与以前用的名称军主相比，军事含义要轻一些，9 世纪末，这一名称又改成都督。官职名称的变化可能反映这一官职的权责特点的逐渐演变，即从较多的军事性变到较多的纯行政性。省划分为郡，由太守主管，郡下辖若干个县，令为一县之长，县下进一步分为村以及专为无自由身份的人设置的乡、所和部曲。

统一后的新罗实施了一项强制性地将被征服国的贵族安置在小京（即次都）的政策。685年，即颁行九州制的同一年，设立了五个这样的小京（次都），即——中原京（现忠州），北原京（现原州），金官京（现金海），西原京（现清州）和南原京（现南原）。新罗统一后不久便考虑将都城从庆州西迁到大邱，但最后未能做到。这表明新罗贵族是多么顽强地固守着他们在庆州的权力根基，尽管其位置偏于半岛一隅。次都制度既是对新罗所征服的人民的一种安抚姿态，也是对他们实行控制的一种手段，同时对于京城地理位置的不满也起到了平衡缓冲作用。以上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京城的一些贵族也定居于次都，其结果这些次都在统一后的新罗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新罗在创建这种省级和地方行政制度的过程中同时造就了一种统治新占领地的机制。一方面战俘变成了奴隶，叛乱地区的居民沦为无自由身份，并被放逐到乡、所和部曲等特别居留地。另一方面，被征服地区的某些人按他们以前在自己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被宽宏地授予“骨品”身份和官阶。但总的说来，新臣服的民众是例行公事地被编入省、郡、县、乡各级行政区的。刺史、太守、县令固然总是由京城贵族出任，但村长和省、郡、乡政府的吏佐都来自有影响力的地方家族。因此，中央政府必需设想出一种防止这些地方望族势力坐大的办法。为了这一目的，一般认为新罗发明了现代历史家们称作上守吏的制度，这种入质制度要求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家族的代表轮流担任低级军职或在京城任职。

贵族经济生活的变迁

甚至在统一前，新罗的贵族便接受了各种赏赐，有“食邑”、

永世拥有的别的农田、马场和粮谷，就这样积敛起大量的财富。例如，金庾信得到的赏赐是对一个有 500 户人家、500 结农田和 6 个马场的村庄拥有世袭权利。669 年，新罗 174 个马场中，22 个分给了王宫，10 个分给了各级官署，其余的都分给了金庾信、金仁同和其它贵族。这些赏赐是为了报答他们为国家所作的功勋卓著的贡献。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服务则得到“禄邑”作为报偿。接受这种薪酬的人不仅可以将赏给他们的土地上的粮食税供自己享用，一般认为，也可以征用耕种这些土地的农夫服劳役。

不过，统一后不久，“禄邑”这种薪酬方式便于 689 年被废止了，取代的办法是分给官员“职田”（于 689 年），官员只能从职田收取“粮食税”。这一变化反映了尽可能限制贵族对农业人口直接控制的一种企图。而且这一发展变化是与王权壮大相伴发生的。但是不久“禄邑”制又恢复了，而“职田”和“岁租”这种官方薪饷的支付办法却没有继续下去。这代表着贵族一方为摆脱王权强加的限制重新进行的努力，也表明贵族势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在《新唐书》中关于统一后的新罗统治集团的财富出现以下这样的描述是不足为怪的：

“宰相家不绝禄，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马猪称之。”（《新唐书·东夷》）

贵族生活集中在京城庆州（也称“金城”）。在今天的庆州仍能发现一些遗迹，如临海殿（是一座在人工湖雁鸭池上建造的宴会厅）和鲍石亭（有一条细长的回廊，用雕刻精细的石料做成，欢宴者一边赛诗一边绕着回廊传递酒杯）是新罗贵族豪华生活与享乐的无声见证。有一则 9 世纪末期的纪录告诉人们，庆州在鼎盛时期，有居民 178,936 户，分为 55 个区，1,360 个住宅点，有 35 个最富有的宅邸和许多分别供四季用的住所。在庆州的围墙内，据

说不单有茅草屋，而且有完整的一排排带有已圈围的庭院的砖瓦房。这也证明贵族统治阶级的生活是奢侈富有的。

重建军事制度

新罗统一后王权的统治地位也明显地表现在其军事组织的性质上。在统一前，新罗的重要军事单位是六停。一般认为这是按早期部落传统的方式加以组织的，而随着新罗的统一，便不复存在了。而与新罗社会其它地区的变化相适应，设置了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为九誓幢和十停。最后建于神文王统治时期（681—692年）的九誓幢已成为一支驻守在京城的国家军队。作为一支自愿军存在的誓幢逐渐得到了扩充，直到新罗统一后组成了九部。每部的上衣上缀有颜色各异的衣领：绿、紫、白、绯、黄、黑、碧、赤和青，誓幢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仅从本地的新罗人中招募，也从以前高句丽和白济的居民以及靺鞨部落人中招募。誓幢各部似乎直接听命于国王，每部都对国王效忠。这样，九誓幢的出现便成为新罗军队的核心取代了贵族指挥的六停。这可以说是为了加强王权而作的另一个深谋远虑的努力的结果。

驻守在京城外的十停是庆州九誓幢的补充。其中最重要的两停戍守在现在的利川和骊川，守卫着汉州，汉州是最大的郡，也是王国的重要战略边防区。其余的八停驻守在现在的尚州、青阳、南原、达城、咸安、罗州、洪川、青松，每郡有一停。这些军队被一律分配到新罗全国，因此不难想象它们不仅承担保卫国家的任务也负有维持内部安全的责任。这又一次昭示了新罗政府的中央集权性质。

还有其它许多军队组织虽然都不大重要，但它们毕竟是精心

设计的军事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九郡和五小京的行政系统一道构成了统一后的新罗进行统治的重要的制度环节。

人民的生活

在新罗统一的战后年代，普通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社会阶级差别也日渐扩大。奴隶制盛行，特别在贵族牢牢盘踞的京城更是如此。许多有奴隶身份的手艺人和劳动者依附各个宫廷和官府机构，这些机构既供给王室需要的物品，也生产武器船只。正如《新唐书》所记载的，最高官员的府里蓄有奴隶达三千人之多，由此可以推测，整个贵族拥有的奴隶人数占了新罗总人口的一个重要部分。

普通农民居住在村庄这一地方行政结构的最小单位。一个村通常由同一家族大约十户人家构成，于是自然发展成一个小的农家居住群落。这些村庄都归政府控制，几个村为一组由村长管理，每个村都备有人口登记册以备国家之用。1933年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的帝国博物馆发现了一份新罗的人口登记册中的一部分。一般认为其日期为755年，涉及清州附近的四个村落，该文件的内容表明新罗人口普查每三年进行一次，除统计户口外还载有牛、马、桑树、核桃、胡桃树等数字及不同类型的土地的面积，还标明从上次普查以来人畜总数的变化。

在这一普查材料中，人口按年龄分六类：壮年组男女、青年、少年、小孩、中年、老年人。划分以上年龄组是为了从人口中征发劳役有依据。家庭也是按其中壮年人数（他们要服徭役）来划分的，家庭分九等，而且由于随意一个家庭调查单位都代表一个固定的壮年人数，用来记载服徭役的人数，因此计算某一个村落

国家可以利用多少劳力就很容易了。

该材料记载的农田有水田、旱地和麻田等几种类型，由村民耕种。材料记载了特别分给村长的水田，也分别记述了分给村民土地的情况。一般认为，后一种情况与所谓的“丁田”相符，据其它资料记载，丁田首次分配是在722年。已指定的一种水田和“麻田”的产量很可能是归国家，一般认为职田的产量用来支付官员，某些水田的收成——租用这些水田的有“村头”也有普通家庭——则归那些当地住户。从该材料不仅记载了土地，而且记载了三种特别有价值的树这一事实看，可以推断这些树也要征税。这又表明，京城的贵族不遗余力地从农民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实际上，在新罗的地方行政结构中，与村很相似的还有乡、所和部曲。但与村的普通居民身份自由不同，住在这些行政单位的人没有自由身份，实际上是一种奴隶。他们不是被征服的民族便是反对国家的罪犯，被放逐到这些特殊的拓居地从事农耕、饲养或其它体力活。在全国各地有许多这样的无自由身份的农民村社，这是新罗社会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第三节 新罗文化的繁荣

佛教的发展

在统一的新罗，佛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受到上自国王下至广大民众尊重与信奉的宗教，佛教在新罗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杰出的僧侣自然要到唐朝中国去旅游，甚至到更远的印度去学习佛法。继六世纪后期前往隋朝中国的圆光之后，像慈藏、义湘和圆测这样的著名僧侣也在中国研究佛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圆光高僧，他在唐帝国住了很久，通

过翻译佛经和撰写文章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慧超去了印度，并在著名的《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述了前往佛都圣地朝圣的经历。

许多僧侣在中国学习后返回新罗时将各种在唐朝兴起的佛教学说也带了回来。这样在新罗就形成了以下五大教派：涅槃宗、戒律宗、法性宗、华严宗和法相宗。在新罗全盛时期，华严宗在这些教派中被贵族社会称颂为至诚的信仰。华严宗教义由中国高僧智俨的掌门徒弟义湘传入新罗。一般认为是他回到新罗后建立了浮石寺，使该寺成为广泛传播新教义的宗教中心。许多门徒出自他的门下。华严宗阐扬了一切和谐的教义，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一概念试图将所有千变万化的感觉包容在单一的佛教意念之中。这种教义很适合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也是华严宗教义为什么受到统一后新罗贵族社会的统治集团欢迎的原因。

另一方面，元晓（617—686年）对代表不同教派立场的观念的彼此抵牾进行谴责，元晓与当时大多数高僧不一样，没有去中国旅游，然而他对佛教的渊博学识甚至赢得了唐朝的称道。他对法性宗的思想作了原则性的阐扬，而且他的佛教学识异常广博，他通晓华严宗的经典，造诣之深以致常被归入华严宗。除了这两派的经文外，他还撰写过关于般若经、法华经、涅槃经、阿弥陀佛经、金刚三昧经、大乘起信论以及其它许多经文的评论文章。他并不拘执于某一部经文作为自己信仰的根本，而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博采众长的佛教思想，证明有必要从更高的抽象水平来看待佛教学说，以便使许多宗派矛盾对立的观点趋于和谐一体。他的著作《十门和诤论》便阐述了这一思想，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身后被尊称为和静国师。元晓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为消除与新罗统一社会集权结构固有的那些冲突相并存的宗教领域的各种扞格所作

的一种努力。

净土宗特别在平民当中极为流行，这是新罗统一时期佛教历史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净土宗是大众的佛教，是一种连文盲也能理解和接受的信仰，无需去领会深奥的教义，因为只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念出佛祖的名字以表明对阿弥陀佛的信奉就够了。净土宗教义的核心便是这种简单的祈祷，一个人只要进行了这种仪式，便能在“净土”亦即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境界得到再生。净土宗之成为大众的佛教主要是因为它为那些日复一日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净土宗不在尘世去寻求慰藉，它称尘世为“苦海”，而是宣扬来世在极乐境界中再生才是值得向往的。随着净土宗风靡新罗社会，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进入山间寺庙去修行。有些故事甚至说有人仍生活着却已飞往天堂，在西方极乐境界中再生了。净土宗的流行给新罗佛教带来了重大变化，可以说它反映了在平民中有一种脱尘出世的趋势，一种因专制统治下新罗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引起的绝望之感。净土宗也由于元晓才得以广泛传播。元晓在佛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作为巡游僧起的作用，他是在违反自己的誓言以新罗王子身份认了薛聪为子之后出家为僧、巡游在外的。他巡游各地以苦行赎罪，宣讲净土宗关于人人都可以在极乐园中再生的教义。他自己对净土宗信仰的理解在其著作《游心安乐道》中有清楚的表述。他写道：

净土宗的深义在于它总是为了一切人，而不是为了菩萨。

有一份资料告诉我们，由于他的努力，新罗人民十有八九信奉佛教，这一记录清楚证明元晓作为普及佛教的伟大传播者所起的作用。

儒教的兴起

儒教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与佛教分庭抗礼，这是新罗在统一后中期出现的一个新现象。682年设置了一所国学便是这一发展的结果。此后不久，717年，孔子的“十大弟子”和“七十二位贤人”的画像从唐朝带来，安置在国学中。750年左右这所国家机构被重新命名为大学监，并为在那里任教的人设置了两种职阶。课程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的教授科目如下：

- ① 论语、孝经、礼记、易经
- ② 论语、孝经、左传（春秋左传）、诗经
- ③ 论语、孝经、书经、文选

每学期的必修课是论语和孝经，课程中还有其它的中国经典，包括礼仪、历史和文学等。只允许有第十二等官阶大舍或以下包括没有官阶的贵族成员进入太学监，一般推测实际上这主要是指那些有六头品身份的人。

在国家教育制度建立的基础上，788年颁行了一种遴选政府官员的国家考试制度。参加这一被称为“读书三品科”考试的候选人按其对中国典籍精通的程度被分为三等，并授以官职。考试依据于在太学监所学习的课文，不过也有记录表明那些学问更广博的人将被破格委以高级职位，这些人要通晓五经、三史（司马迁的《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和诸子百家。设立国家考试制度明显反映了一种强调儒家学问而不是骨品世系乃是遴选政府官员依据的意愿。

新罗政府对儒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儒教就其本质含义是与传统的骨品制的价值观念、真骨贵族集团以及背后支持它们的佛教学说相抵触的。拥护儒家思想的主要是六头品身份的人。这些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适用于人间俗世的道德标准，他们

批评佛教强调来世生活而对凡人俗世所持的矛盾的观点。新罗统一时期有两位儒家代表人物：即强首和薛聪。强首是任那地区（加耶国）的六头品，他以处理新罗对唐的外交事务功绩非凡而著称，但是他也攻击佛教，称之为“来世”的说教，认为道德品质是比社会背景更重要的晋升标准。薛聪是元晓僧之子，出身于六头品，他以发明了用朝鲜本国语法来解释中国典籍的“口诀制”著称。他也上书规劝君王，这就是《讽王书》，他在信中争辩说，君主应节制追逐享乐，严守道德规范。因此，可以说，在新罗的专制政治结构下，儒教是与传统的真骨特权相对立的，也确实是伴随着王权而发展的。

学术与技术

在历史研究领域，金大问是八世纪初期活跃的一位学者，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他编纂了许多关于新罗历史和地理的著作，如《鸡林杂传》、《高僧传》、《花郎世纪》、《乐本》和《汉山记》，他对新罗本国传统的深刻关切在唐朝的中国文化风靡之际显得很突出。但不幸的是他的著作无一幸存，我们只能在很晚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发现一些遗迹。真骨出身的金大问似乎力图唤醒新罗传统文化意识以与中国儒学影响相抗衡。

这一时期有一种信念，即好的政府依赖于阴阳两种力量保持和谐平衡，便能使自然现象造福于人类。于是，天文学和历法脱离了原始占星术的窠臼而发展起来。结果之一是在三国末期（632—647年间）的某一时期建造了观察天象的瞻星台。据推测在那里基本的天文观察是利用日晷和其它一些简单器械进行的。金大问是八世纪后期相当著名的天文占星家。他在研究了中国的阴阳学

说的玄术后，写下了题为《遁甲立成法》的论文，后来回到新罗，被任命为“天文博士”。据另一份文献记载，金岷在任坝江镇（现在平山地区）镇守使时，曾教他的军队演习六阵兵法，根据这一记述可以推测，他也很精通军事学。

数学知识也有很大进步，并且在许多方面得到实际应用。庆州石窟庵的平面图和圆拱顶的设计，庆州佛国寺中多宝塔和无影塔以及其它类似的新罗塔婆的匀称布局和协调比例，都反映了精确的数学概念的应用。科学原理知识也体现在其它新罗建筑中，例如，非常注意提供充足的流动空气以防过分潮湿受到损害。

最后，为了复制各种课本，特别是佛经和儒学典籍，木版印刷术也发展起来。陀罗尼经的副本不久前在无影塔中发现，由此可以推测其时期一定在751年建塔以前，这是世界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

乡歌

已经提过乡歌是一种诗歌流派，其主题与佛教和一般宗教习俗有关。早在三国时期，新罗已有人写作这种歌谣，统一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许多诗歌，如得鸟的“慕竹旨郎歌”、月明师的“兜率歌”和“祭亡妹歌”、忠谈师的“赞耆婆郎歌”和“安民歌”等。在九世纪，真圣女王命令大矩和尚和朝臣魏弘编纂乡歌选集，这个歌谣集题为“三代目”，但没有流传下来。

欲唱散花曲
请赐花与我
诚祈弥勒佛
自兜率驾临

这是现代对简洁难解的原始的多歌兜率歌的翻译，这首歌谣深情地表达了一个祈祷者以鲜花为礼物对菩萨同情而献出的炽热赞颂。新罗的乡歌题材多样，有时祈求上天给国家带来和平，有时颂扬佛祖的贤德，有时寄托对已逝的亲人的哀思，有时仅仅是祷辞。总之，乡歌代表了新罗时期宗教感情的一种优美的文学表现形式。

艺术

统一新罗的艺术创作是一些技巧完全成熟的作品。此时艺术已经脱离了三国时期的朴拙而显出一种高度发展的审美意识。虽然，统一新罗的艺术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但目的并不是将对象描绘成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样子，而是试图表达一种理想美的概念。而且，在这时创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为创造一种完美和谐的境界而作的努力。这样，统一的新罗时期艺术的特点是企图通过运用精炼的艺术手法创造一种理想的和谐之美。

在统一的新罗时期，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是庆州的佛国寺和附近的石窟庵。据说两者都是在 751 年由当时的中侍金大城建造的。在建筑物的总面积中，这座庙宇最初占地面积就超过了 2000 间（面积单位，一间内有 4 根柱子），它的木制结构建筑可以追溯到新罗时期，在 16 世纪晚期日本入侵期间毁于大火，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现代修复的。美丽的云桥栈通向人口紫霞门，它分两段，上段白云桥，下段青云桥；右边即西侧函影亭的前两根石柱造型新颖；多宝塔和无影塔布局匀称，成为大雄殿（寺庙主体）的左右两翼——所有这些都展示了这同一种成熟的和谐之美。尤其是石塔更是受到交口称赞，被誉为新罗艺术技巧的独特的表

现，相比之下，中国看重的是砖塔，日本推崇的是木结构塔。在许多保留下来的石塔当中，无影塔和多宝塔以及华严寺的狮子塔，被视为统一新罗时期建造的这类历史遗迹中的瑰宝。

石窟庵仿照中国的石窟寺修建，不过在中国石窟寺是在悬崖峭壁的表面开凿成的，而石窟庵是人造的石穴，里面安放一尊大佛像供人参拜。石窟庵有一个矩形前室和一个圆形内窟，圆形拱顶用一块块精心凿磨的石头垒成，这一圆拱顶不仅显示了高超的技艺，而且还显示其稳固性，反映出压力学的知识也相当精深。使石窟庵独具特色的还是它的雕刻。在内室中央，最突出的是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大石像，四周墙上呈半圆形刻有11面观音、各个菩萨和罗汉（佛祖的弟子）的浮雕。前室墙上有两个仁王像，过道上四大金刚站岗。所有这些，再加上石窟庵所特有的美的韵律，构成了一个整体。诚然，在众佛的圆脸和宽身上看得出受唐朝佛雕的影响，但石窟庵佛象体现了一种更深的精神美的意境。新罗其它著名的佛雕还有堀佛寺的四面石佛、甘山寺的阿弥陀佛和弥勒佛。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出现了许多关于弥勒佛（他掌管西天）的艺术品。

在考察与佛教相伴生的艺术形式时，青铜寺钟是不容忽视的。新罗现存最古老的钟是725年铸造的五台山上院寺钟，最著名的是奉德寺的圣德大王神钟（现在收藏于庆州国立博物馆），771年为纪念圣德王而铸。据测量，这口钟直径为2.27米，高3.3米，是朝鲜现存最大的古钟。就钟的外形以及附属装饰品飞天佛雕和花纹之美而论，它也是做工最精美的铜钟。我们知道，皇龙寺一口巨钟，重达500,000斤（按现在斤的单位超过300吨），但是没有保存下来。新罗的钟外形独特、型式多样，有钟锤和钟铃按古代中国式样铸造的，加上作工精美的凸花图案，使它们具有一种

中国或日本的寺钟不可比拟的美。统一的新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古钟，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好的石灯、石塔、石水盆、铁旗杆的柱石、屋顶砖瓦、铺地砖瓦以及与佛教建筑有关的其它实物。

坟墓是与佛教无关的新罗艺术品的宝库。以上已经提到，新罗统一前采用竖井式埋葬法，墓穴用数层石头砌成，其上再隆起土丘，这样便不易盗掘，因而金玉冠和各种珍贵的随葬品得以保全。但是在统一后，坟墓建筑的流行样式有所不同，其特点是一条水平通道连接一个石穴。在建造这些墓时，盖在墓穴上的土丘要小得多，坟前竖立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十二生肖神像。所有动物（鼠、牛、虎等）都佩戴着武器，似乎在守护死者的灵魂。十二生肖概念取自中国，但将它运用于坟墓建筑却是新罗的独创，这是中国所不及的。复制这些动物需要极精巧的技艺，因为分寸稍微失准便会使形象流于滑稽可笑，这也再次证明新罗人民技巧圆熟、手法老到。十二生肖的最好范例是在金庾信的墓中和挂陵（一般认为是元圣王的墓）中发现的，特别是挂陵多出两个文武官员石像和两个狮子，代表统一新罗时期这一类坟墓的最充分的发展形式。

最后说一说书法艺术。书法风格的发展和成就可以从金仁问在武烈王墓的石柱拱顶上的题词、从刻在华严寺石头上的一段华严经以及从新罗佛寺中许多残存的石柱略见一斑。新罗最著名的书法家是金生，其作品因技法之精妙据说曾被误认为是出自中国四世纪王羲之的手笔。金生的书法真迹今天已经失传，但新罗后期的和尚朗空大师（832—916年）依照当时保存的金生作品的样本而仿其风格题写的柱石经文，则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一大师的风范。

第四节 渤海的社会和文化

政治和社会

我们已经提过，渤海是高句丽族人建立的一个王国，因此把持渤海政治权力的也是他们。例如，渤海派到外国的使节大多数都姓高，这是高句丽王室的姓，或姓其它中国式的姓，一般认为这些重要人物都出自高句丽世系。

受这一权势阶级统治的人当中，靺鞨人占大多数。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成功地晋升到统治阶层，特别是支持大祚荣建立新王国的乞四比羽一伙人。这些靺鞨人一般都有“首领”或“头”的称号，他们在渤海的统治结构中虽系外围，但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些渤海使臣人数不多，也有靺鞨人的姓，这些人可能也属于这少数靺鞨人的权势集团。不过大部分靺鞨人都是臣民，其中有些人甚至沦落到奴隶地位，变成无自由身份的阶级，为高句丽血统的统治阶级的主子服役。虽然，渤海社会的上层吸收了高度发达的唐朝文化，并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政府制度，但这不能掩盖其社会结构因种族对立畛域分明而固有的脆弱。

渤海中央政府的主要行政机关为三省六部。其中政堂省掌管国家实际政务，宣诏省为下达诏令的秘书处，并有一定的议政权，中台省则是拟定诏敕的机关。政堂省下设六部：掌管人事的忠部、掌管财政的仁部、掌管礼仪的义部、掌管军务的智部、掌管刑罚的礼部、掌管土木工程的信部。很显然，在形式上这是模仿唐朝的体制。不过，在渤海政堂省的长官称大内相，其地位高于主管其它两省的右相和左相。这样，在实际职能方面，渤海的中央官制并不完全遵照唐朝的官制，而且在机构的名称上别具一格，有

浓厚的儒家味道。渤海官制与统一的新罗的官制也不相同，新罗尽量使早期传统的行政建制大体上不变，而只创建一种总揽全局的机构，即执事部。简言之，渤海在精心建构这一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行政制度时，显然力图使其政府机构权责分明，一目了然。

渤海也制订了一套地方行省组织。渤海的都城叫“上京”，位于现在中国黑龙江省的东京城，还有四个次京即“中京”，在现在中国吉林省的敦化，“东京”在吉林省的琿春，“南京”在朝鲜咸镜南道的新昌，“西京”在吉林省的临江。此外，还在全国设立了15个府，铺设了5条驿道将渤海与其邻国连接起来。看来，渤海行政组织是井然有序的，然而对于生活在其中的靺鞨人民的境况却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

文化方面

渤海一旦与唐建立了和平外交关系，便将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进来。象新罗那样，大批学生被派到唐朝学习，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通过了唐的科举考试。由于这种文化的影响，渤海不仅其官制模仿唐朝，而且其它制度也与唐朝相似。例如，渤海的都城上京是仿照唐朝长安的形式修建的。全城由一道矩形的外墙环绕，内墙建在城市的北部中区，围绕王官和各官署。一条宽阔的通衢将内城的南门与外城的南门连接起来，从而将全城一分为二，每边都建有居住区。

不过，在渤海文化中也发现了许多高句丽派生的因素。例如，渤海的五京显然是依照高句丽的王府这种行政组织而设置的。渤海文化还有一些特征也可以看出高句丽的影响，比如在上京内城

渤海王宫的遗址发现的温突装置（朝鲜的取暖设施，将燃料铺在地下取暖），又如渤海的坟墓是石室结构，有一条水平通道。此外，在渤海寺庙遗迹中发现的佛像式样，以及渤海屋瓦上用以装饰的荷花纹和织布图案，也具有高句丽的独特风格。不过，我们仅依据这几件渤海文物还难以就渤海文化与高句丽文化的有机联系作出全面的阐述。然而，在这少量的渤海工艺品中便有许多可能与高句丽模式有关，仅这一事实就已经为今人可信地推断渤海文化的主要来源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渤海在历史上的地位

渤海王国的文化水平如此之高，连中国的史书都称它为东方的繁荣土地（“海东盛国”），但由于人口分成两个不同部分，一部分是高句丽的后裔构成的统治集团，另一部分是本地靺鞨人构成的被统治阶级，因而渤海国的内部结构相当脆弱。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正是渤海在926年遭到契丹人进攻时如此轻易地被征服的主要原因。

此外，渤海一旦覆灭，其文化便无法传给后世。这是因为渤海文化的保管者、高句丽族裔的统治阶级这时逃到朝鲜新国家高丽国避难，而留下来的是当地的靺鞨人，他们既不曾分享过渤海文化的荣耀，也不能使之永续不绝地存在下去。靺鞨人在臣服契丹统治近两个世纪之后，再次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女真人的金国），赶走了契丹人并以整个满洲和中国北部的主宰者出现。对渤海的强大还记忆犹新，这无疑有助于靺鞨人最终了解他们自己具有发展成这样一个强大的东亚国家的能力。

随着渤海的覆灭，满洲不再是朝鲜历史剧目上演的一个舞台。

渤海是朝鲜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统治满洲的最后一个国家。渤海在朝鲜人民历史中的地位被认为就在于此。在渤海灭亡后，高句丽族裔的统治阶级来到高丽，并对该国再次统一朝鲜人民作出了贡献。但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他们却不能在以后朝鲜历史的生活主流中扮演主要角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渤海和新罗实质上是一个被分开国家的南北两部分，但是，朝鲜历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却是把新罗看作是朝鲜历史的正宗代表。

第五章 豪族时代

第一节 骨品身份制的矛盾

真骨贵族的分裂

虽然新罗文化在景德王时期（742—765年）达到了鼎盛，但在表面之下，统一的新罗社会内部已出现了种种勾心斗角的迹象。因为真骨贵族发起了一场运动来削弱王权的独裁。为了挫败这些图谋，景德王制定了一项围绕加快中国化政策而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然而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下一任国王惠恭王（765—780年）统治下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政治骚乱是768年由金大恭策划的一桩反君主密谋引发的。这起事件激化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冲突，一场被描述成竟有96位（数字肯定夸大了许多）担任高官（角干）的新罗贵族卷入其中、持续达三年之久的权力斗争。几年之后（于774年），一位出身高贵的贵族金良相成功地攫取到权力，把国王贬黜为傀儡。金隐居和其它人曾几次试图恢复王权但都告以失败。最后，惠恭王被金良相及其支持者所杀。金良相声称是四世纪后期奈勿麻立干王的第十代后裔，径自夺取了王权（宣德王，780—785年），其后由金敬信（元圣王，785—798年）继位，据说他是奈勿麻立干王的第十二代，后来新罗的统治者都出自元圣王的后裔。这样，新罗统一的开创者武烈王的世系便与新罗历史的中期一道终止了。通常所说的统一新罗的后期（下

代)是指元圣王的后裔占据王位的这最后 150 年。

新罗历史从繁盛的中期转变到没落的晚期,是由贵族抵制王权的独裁统治趋势所促成的。结果,在新罗后期的政治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贵族势力的短暂联合起着决定性作用。再度占据显赫位置的不是执事部的中侍,而是和白的首脑上大等。但很快对这些变化便作出了反应,在 822 年金宪昌的叛乱中反应达到了极点。金宪昌是金周元之子,武烈王的后代,宣德王于 785 年死后元圣王在贵族支持下篡夺了他对王位的合法权利。在这一宿怨的驱使下,金宪昌从熊州(现公州)的基地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以至宣布建立一个新国家(长安国)并为其统治采用了一个年号。一时,现在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的广大地区都归附在他的麾下。但庆州贵族的联合势力终于将他打败。后来,其子金梵文继续斗争,试图在汉山(汉城附近)建立一个都城,但也归于失败。贵族成员原来已结成各种势力来削弱君主独裁权力,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正是那些显贵们个人财富的增长破坏了全体贵族的团结一致,他们成功地废除了“职田”和“岁租”报酬法,而恢复了先前的“禄邑”制。抱着攫取政权的目的,野心勃勃的显贵们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资源组建私人武装,不仅装备起他们的奴隶,还把在新罗乡间流浪的无地农民招募起来。到了这个地步,在决定王位继承中至关紧要的已不再是血缘而是政治力量和武力。836 年兴德王死后爆发的王位继承斗争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

起初,兴德王的堂弟金均贞被推举为王,但被其侄子金悌隆所杀,金悌隆于 836 年成为僖康王。统治不到一年,在其它王位竞争者制造的严重骚乱中,他自杀身亡,他的第二个堂弟继位为闵哀王(838 年)。金均贞之子金祐征获得了清海镇镇守使张保皋

指挥的军队的支持，进攻庆州，把闵哀王赶下王位而自立为神武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王位竞逐中获胜的人便不可能再代表整个贵族，而只代表拥立他为王的那些亲信。因此，每个新国王都成为被他打败的各派的众矢之的。在新罗后期大约 150 年间有二十位国王占据过王位，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成了无休止的政治骚乱的牺牲品。仅此事实便表明新罗社会秩序已陷入危险的境地。

六头品势力的抬头

由于社会身份带来的种种限制，六头品身分的人没有机会担任政治上有实权的职位。正是因为他们在新罗社会所处的地位，这些小贵族中的许多人并不企求在官阶、官职上出人头地，而走的是用得上他们学问见识的政治参与途径。这种六头品背景的人作出突出贡献的例子为数甚多，如强首和薛聪是深为国王信任与赏识的儒家学者。徐三因善于圆梦而声誉鹊起，他巧妙地解释了一个曾使已故的元圣王烦恼的梦。禄真的明智忠告消除了上大等忠恭对委任官员的忧虑。崔致远向真圣女王呈进过一份详细的建议以论当时的重大问题。这些人都意识到唐朝的科举制度为量才录用、仕途晋升提供了机会。因此，从这些对新罗骨品制的不平等深为关心的人那里开始听到了批评之声。崔致远在以上提到的那份尖锐的上书中，无疑会劝告采取象唐朝那样的科举制度为有才之士授以官职。但这一做法与新罗的习俗大相径庭，故未被采纳。据记载，崔致远在他的建议遭到冷遇后便弃官而去，远离京城，在飘泊退隐中度过了余生。崔致远不是唯一的例子，因为其它六头品出身的学者对骨品身份制也持有同样的批评立场，甚而至于同他们母国的那些利益集团公开作对。崔承祐在后百济任职，

崔仁浣（崔彦撝）为高丽国效力都说明了这种不满的严重性。对新罗真骨贵族愈益高涨的不满，便这样在六头品这些低级贵族当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节 地方豪族的兴起

海上贸易的发展

九世纪中期，真骨贵族中由于王位斗争而引起的激烈的政治冲突开始显出缓和的迹象。在以前敌对的派系中间一种和解精神占了上风。这显然是因为需要对付实力开始显露的地方势力中心对贵族霸权的威胁。正是在这一时刻，随着权力从京城庆州转移到外围地区的各个中心，新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地方权力中心的首领发现真骨制遮断了他们参预中央政府的途径，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新罗海外为他们开放的机会。这样他们便将海上贸易作为自己的主要用武之地。新罗的外贸在此以前都是在完成官方贡税的名义下进行的，但从现在起，私人贸易开始兴隆起来。当然这表明出现了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到足以使他们能够进行这种贸易的新势力。不仅跟唐朝的贸易十分繁荣，跟日本也是如此，为此，日本甚至在对马半岛上另设了新罗语翻译。

这些贸易活动导致在山东半岛和江苏省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朝鲜人的居民点，经常有新罗人来访，被称作“新罗坊”。在这些居住区设置了所谓的新罗所以掌管居民的事务，这些机构的官员从朝鲜人中任命。居民也建有自己的佛寺，在那里为海员和船只祈求平安。这些寺庙被叫做新罗庙，其中最有名的是张保皋在山东文登县赤山村设立的法花院。840年赴唐旅行的日本和尚慈觉（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曾记述有一次在法花院宣

讲佛经，聚集起来听讲的新罗人多达 250 人。清海镇（在现在全罗道南海岸的莞岛）张保皋因其海上贸易的规模而最为知名，此外，我们还知道一些人的名字——如在康州（现在的晋州）活动的王逢规，在开城地区活动的作帝建（高丽王朝的开创者王建的祖父），至于在南阳和罗州这样的繁荣港口操纵海上贸易的那些人，虽然史未留名，但想必也是这些地区的世家望族，而且其财富与权势均得自于海上贸易。

军事重镇的出现

新罗的军事要塞起初设于战略要地以保卫国土边界，三陟的北镇和现在平山的湍江镇即为重要的两例。但是当海盗对新罗海上贸易威胁日趋严重时，在重要的沿海点也开始设立一系列要塞，如清海镇（在莞岛），官城镇（在现在的南阳，离汉城不远），穴口镇（在江华岛）。其中最主要的是清海镇。清海镇由张保皋建于 828 年，张保皋年轻时曾到过中国，并在唐朝服过军役。当时常发生海盗掠卖他的同胞为奴的事件，他对此忿怒不已，回到新罗后便请求兴德王（826—836 年）在莞岛正式设立一个要塞，扼守朝鲜南方水域的海上交通干线，他在那里早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基地。兴德王同意了，并委任张保皋统率清海镇。他拥有一支 10,000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在新罗沿海水域巡弋，从而终止了中国海盗的劫掠。同时，他还控制了与中国和日本的繁盛的贸易，实际上成了黄海的主宰者。

张保皋不仅控制了海上通道，而且还卷入了京城政治冲突的漩涡里，他提供的军事援助使早先在王权之争中失败的金祐征（神武王）能够攻陷京城登上王位（839 年）。不过，几年以后，在

京城贵族的反对下，文圣王（839—857年，神武王之子）未能娶张保皋的女儿为第二王后，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张死于刺客之手（846年）。此后不久，清海镇也被撤销了（851年）。在一个时期里，张保皋以及他在清海镇的武装力量确实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势力。但是他费尽心机既未能打入京城政坛，也未能创建一支可以同庆州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政治势力。京城贵族虽因纷争不止已经分崩离析，但仍有足够的力量维护其安身立命的骨品制度。这样，岛民张保皋因凌蔑新罗社会秩序而遭到了失败，他统率的10000人的军队也被调到碧骨县（现金堤），在那里再也不能犯上作乱了。不过，其它的军事要塞还是象清海镇那样得到了发展，而且不久便成了新罗各地世家望族实现其野心的军事靠山。

城主的自立

张保皋看来象是在莞岛起家的一门豪族的后裔，因此他很自然地以家乡岛屿为活动基地，建起一支以其家族成员为中心的私人武装，最后又在那里建立了军事要塞。肯定当时有许多像这样的豪族，他们世世代代实际上控制着远离京城的某一片地区。有代表性的是那些为首的世家望族在他们发号施令的人口中心区四周筑起堡寨，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城主”。在历史记录中也把他们称作“将军”，因为他们掌握着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并在堡寨中驻防的私人武装。

有些城主好像是从早先有京城贵族背景的那些人中产生的，由于某种原因被迫迁移到新罗乡下。这些往昔庆州的贵族无论出身于真骨贵族还是六头品，无疑试图以这种方式在他们及其族人避难的某一地区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基地。另外还有许多

城主则是在地方上长期担任村长的本地权势集团和家族。在早先新罗地方行政结构中，这些低级官吏本来只掌管农村人口，但现在有势力的村长们把周围其它人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扩充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这两种背景的城主在地方舞台上都担任了职务，因而实际上篡夺了从京城派来的郡县长官的职位。

城主在其权力所及的村庄实施经济管制，不仅对农村人口征税，也向他们课征徭役，对农村经济实施控制的地点发生的这一变迁标志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不断受到侵蚀。这是新罗赖以生存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节 后三国

农民起义

城主势力不断增长削弱了新罗中央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使政府不能向农民征税。此外，在新罗后期由于京城贵族越来越沉湎于侈靡享乐致使财政要求变得空前迫切。而同时，庆州政府可能获得的资源却在锐减。为了克服这一财政危机，政府于889年恢复了向省县地区强制征税，但这给农民带来了双重负担，因为农民现在不但要承受统治他们的那些城主的剥削，而且要交纳中央政府的赋税。甚至在统一新罗的最繁盛时期，税赋和徭役负担已经迫使许多人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这些没有上地的流浪者当中，有些人一直到处漂泊，勉强维持着生计；有些人与盗匪为伍以掳掠为生；还有一些人则设法托庇于地方豪族而开始过另一种生活。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些变化都给以京城为中心的旧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政府决定运用强制手段向农村征税是维护贵族秩序而进行的最后努力，但其结果却逼得农民纷纷造反。

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于 889 年在尚州地区熊熊燃烧起来。这场起义规模相当大，据说派去镇压的官军也不愿意与排成阵式的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作战。连续不断的起义当时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原州的梁吉，竹山的箕萱，全州의甄萱，梁吉的副手弓裔是叛军领袖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另外有一支强大的土匪军自称“赤袴贼”占据了京城西南部地区。于是，历史文献中称作“草寇”的无数农民叛军便在各地自发地揭竿而起。

后百济和泰封

早期的叛军领袖们不过是一块块范围有限的地区的叛军首领。但是不久，出现了两个首领，他们统率的军队相当强大，足以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王国，并向新罗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一个叫甄萱，另一个叫弓裔，他们声称他们建立的国家分别是百济和高句丽的复兴，并为统治朝鲜半岛而展开了三角竞争。这场斗争绵延了半个世纪，这段时期史称后三国。

甄萱出身于尚州地区的贫农家庭。他从普通士兵起家，在保卫新罗西南沿海地区中因功受奖得以擢升。各地发生叛乱以后，他率领一伙追随者攻占了光州，而后又在全州建立起活动基地，892 年在当地宣布建立后百济王国，公开的目的是为后百济的义慈王报仇。尽管他出身于农民，早期只当过一介步卒，但他一旦登上自己设立的王位便证明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残暴的统治者。他最后打算褫夺其长子的王位继承权而将后百济王位传给自己宠爱的第四子金刚，其任性固执的性格由此暴露无遗，这也最终成为他的祸根。他对新罗怀有刻骨的敌意，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他不仅宣称代表复兴的百济，而且于 927 年对庆州大肆劫掠，杀死

了景哀王，携走了景哀王的弟弟和许多高官显贵，攫取了大量的珍宝、武器和京城的工艺品。如果不是弓裔和王建从中牵制阻挠，他肯定会毫无困难地消灭新罗。

弓裔是新罗的王子，很可能是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被撵出京城的。他起初当过和尚，但新罗陷入骚乱时，他先是与箕萱一同起事（于891年），而后成了梁吉的助手。他指挥梁吉军队的一支分队，攻占过江原道、京畿道和黄海道的广大地区，在他麾下曾集结了一支大军。这时，他推翻了梁吉（于901年）宣布建立后高句丽国，作为以前高句丽王国的继续。弓裔先把松岳（现在开城）作为都城，但稍后他给国家改名为摩震，并在铁圆重新定都，在那里他再次给国家改名为泰封。弓裔还着手设立广评省和文武官僚机构，制订九品官阶制。这样在形式上弓裔便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机构。

弓裔由于被迫放弃了他在新罗社会作为王子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对他的祖国怀有强烈的仇恨，他要求臣民把新罗称作该死的国家。据说他杀死了从新罗来到他的领土上的所有的人。像后百济的甄萱一样，弓裔残暴地统治着他的国家，他利用佛教的神秘性为其残暴统治护法，自称是弥勒佛，指定其长子和次子为菩萨。像通常的暴君一样，弓裔对他周围的人疑心太重，他自称有洞察别人心思的神力，许多为他效力的人都成了他的这种猜忌心的牺牲品。弓裔不得不靠恐怖手段维持自己的权力，最终却被他自己的将军赶下王位，在逃跑时被他统治的人民杀死。

高丽的建立

王建被推举出来继承弓裔作为北部地区的国王，王建出身于

松岳（开城）地区的豪族。他倚恃新罗在边境地带早已建立的像溟江镇和穴口镇这些军事重镇的实力，力图在当世显身扬名。以江华岛上穴口镇为中心的海上活动看来与他的关系特别密切。起初，王建作为弓裔的副将参加过多次战役，但他已经因西南沿海地区的海上军事行动而赢得了特别的赏识。他占据锦城（罗州）、珍岛和其它沿海要津后便截断了后百济与中国和日本的联系，同时显示了向北进攻的实力。这一策略想必是王建根据长期对海上活动的透彻了解制订出来的。由于这些成就他被任命为侍中（首相），所以当弓裔被将军们赶下台后他便被拥立为王了。

王建将他的国家改名为高丽，年号天授，迁都松岳（开城）。与弓裔没有差别，王建也认为自己是高句丽的继续。但他迁都到自己的家乡用意在于建立一个新王国。他迁到开城不仅巩固了他的军事政治基础，也清楚表明了他的地方豪族的立场。与弓裔和甄萱不同，他属于地方权势阶层，这意味他拥有一个支持他的地方权力基础，一个不致被一场政治危机所动摇的坚固基地。而且，作为地方豪族的头面人物，他可以同其它地方豪族建立牢固联系。正是这些重要条件，使王建得以统一后三国。

在外交上与弓裔不同，王建采用了与新罗友好的政策。他与新罗建立紧密联系，是为了消灭他的对手甄萱，但同时他试图用这种办法巩固他作为新罗传统和权威继承者的地位。当听到甄萱入侵新罗都城杀死景哀王时，王建亲自率兵反击后百济的统治者。据说他访问新罗都城时，赢得了新罗人的敬重，新罗人像欢迎自己父母一样接待他。不过，王建并未忽视制订一种针对新罗的军事策略。他在距新罗京城以北50里处设立了昵於镇（神光镇）作为高丽军队的永久驻防地。

第四节 高丽的统一

后三国的统一

高丽和后百济曾一度以交换人质来谋求休战，但总的说来，两国一直是处于无休止的敌对状态。战场就在洛东江以西的地区，从古昌（安东）经过尚州到康州（晋州）（见图，第110页）。在争夺新罗仅存的领土的斗争中，新罗边境地区成了战斗舞台。新罗完全失去了对其偏远地区的控制，现在已经孤立无援。身陷围城的豪族领袖只顾本身的利益，向王建的高丽和甄萱的后百济提出求和。

无论是高丽还是后百济都没有忘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后百济主要与南中国交往联系，而高丽通过山东半岛与北中国保持联系。这个时期不仅是韩国的内乱时期，也是中国混乱无序的五代时期。虽然中韩两国的交往很频繁，除贸易目的外，还表现为外交上的冲突；但是，后三国的的问题是在韩国境内解决的，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中国无法影响它的结局。

随着高丽军队于930年在古昌获胜，僵持局面被打破了。战争形势变得对高丽有利。后百济被迫从新罗边境地带撤走，而高丽则加强了对后百济的正面压力。高丽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南忠清道地区，于934年在运州（洪城）击溃了后百济的军队。从这时起，战争变得完全对高丽有利。

后百济不仅失去了战争优势，而且面临着内部的混乱。甄萱指定其第四子金刚继位，甄萱的长子神剑于是将其父囚禁在金堤的金山寺中，径自登上了后百济的王位。甄萱设法逃到高丽归附了宿敌王建，策划向其子报仇。同时，新罗末代王敬顺王统治的

仅仅是名义上的王国，实际版图仅限于庆州这一小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于935年便向高丽主动投降了。于是王建牢固确定了他作为新罗传统与权威的继承者的地位。次年，高丽军队以甄萱为前导又消灭了后百济。最后，王建完成了后三国的统一。

渤海也在这同一时期毁于契丹之手，它的统治阶层中有许多是高句丽的族裔，当时逃到了高丽。王建热情接纳了他们并慷慨地授予他们土地，王建给渤海王太子大光显赐名王继（王室继承者）并将他的名字列入王室名簿，以表明他们属于同一世系，还举行仪式来纪念他的祖先。这样，高丽便完成了真正的国家统一，不仅把后三国甚至也把渤海王国的高句丽族裔包括在内。

与地方豪族联盟的策略

太祖（王建的庙号）成功地从后三国的混乱中恢复了秩序，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王朝。他以高句丽继承者自许，推行向北扩张政策，把边界延伸到清川江，并同时打破了一直束缚新罗社会的骨品身份制锁链。但是，另一方面，他仍打算保留新罗历来固有的权力外壳。因此，他从新罗王室中选了一名女子为妻，他对待新罗最显要的贵族敬顺王金傅也极为慷慨。因此，许多新罗世系的人得以进入高丽的官僚集团。这与后百济人所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建已不再是一个从边远地区突然发迹、默默无闻的城主，而已成为继承了长期历史传统的一代伟人。

可是，太祖的统一仅标志王朝竞争的结束。城主们仍保持着他们的地方堡垒的半独立地位，与混乱的后三国时期没有多大差异。因此，从中央政府无法派出官员来治理地方。此外，那些对太祖登基有功的人、出身地方豪族在战场上曾与他胜负与共的军

事将领们，既有战俘和各种战利品，又有自己的武装卫队可供驱遣，他们成了位尊权重的一股势力。太祖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们的同意与合作来维护其统治。他与全国二十多个地方豪族有姻亲关系，如贞州柳氏、平山庾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在有些情况下，他是用赠与王室姓氏的办法建立假的家族关系来巩固联盟。尽管有以上政策，但这些地方豪族政治势力的存在仍让王建忧虑不安。他所撰写并颁行的《政诚》一卷和《诫百寮书》八篇可以看作是他殚思竭虑的结果。这些文件的内容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它们显然探讨了为高丽国效力的人应遵循的那些行为准则。虽然太祖没有能建立稳固的王权便死去了，但他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被称为《十训要》的遗嘱作为政府的规范和后代王必须遵奉的道德准则。

太祖的忧惧不久便应验了，他死后两年便爆发了王规的叛乱。王规是王亲贵戚，他的两个女儿嫁给太祖作第十五王妃和第十六王妃，有一个生了儿子，即广州院君。另一个女儿也送进宫给王建的长子亦即继承人惠宗作第二王妃，同时，他为了让广州院君继位，向惠宗虚报两个弟弟对他不忠，更有甚者他还试图杀死惠宗。这样惠宗的地位便受到威胁，一度甚至岌岌可危，整日卫队不离左右，不久终于死去。王规在惠宗的继承者定宗即位初年最后被平壤镇守使王式廉除掉，这一事件充分说明这时王权尚不稳定。

王权和地方豪族

在粉碎王规的叛逆阴谋后，定宗便考虑将政府所在地迁往“西京”平壤以加强脆弱的王权，太祖在《十训要》中所强调的风

水理论肯定对这一想法起了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定宗本人也极欲摆脱那些开国功臣的紧密包围，这些人正在开城周围扩大自己权势。不过，定宗在位仅仅四年便去世了，他没有能够迁都。

在高丽要等到光宗改革才为王权的稳固带来转机。奴婢按检法的颁布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个行动。在后三国的混乱时期，军事长官和地方豪族强迫俘虏和难民为奴隶，奴隶的增长标志其主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为了遏制这种增长，必须缩减奴隶数量。为此，奴婢按检法决定恢复以前曾是平民的那些人的自由身份。

此外，光宗采纳了中国学者双冀的建议于958年设立了科举制度。其目的为在官府中用有学识的新文官来取代那些参与创建高丽王国、出身行伍的老军官。现在新人的任用，是按照新的标准。因此，科举考试制度的颁行成了建立有助于加强王权的新官僚结构的主要步骤。为了使这一新设立的官僚结构具有强烈的等级性，他于960年制定了朝服的等级，官阶等第按每人朝服的着色紫、赤、绯、绿来区别。除了这些改革外，光宗为加强王权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做法，如自称为“帝”，称开城为“帝京”，称平壤为“西京”，以示尊贵，采用独立的年号等等。

对这些改革深感不满的是那些开国有功的高级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后人。结果，发生了一场无情的清洗。即便是一位与其父王建并肩战斗过的军事统帅也未能幸免，因为光宗就是要把所有不服从王权的人除掉。这样他可以表明至少对王国的中心开城的贵族实行了王权。接着采取的步骤是颁布田柴科制度，这是由下一位王景宗于976年制定的，这项措施用意在于为在光宗改革基础上重建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创造一种经济支柱。

第五节 豪族的文化

儒学的发展

在新罗王权强盛时期，儒学逐渐作为一种为有效率的政府提供独特的道德基础的教义而被广泛接受。然而，儒学还未能发展到可以提出强有力的政治措施以达到其政治理想的地步。但是在新罗后期，当骨品制衰落时，儒学便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种思想体系而出现了。

起初，儒学是在国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在新罗后期，前往唐朝学习第一手儒学的儒家弟子的人数急剧增长。崔致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与崔承祐、崔仁浼（崔彦撝）一起被称为三崔。特别是崔致远以其文学才能而知名于中国。他的许多著述令人难忘，如两部文集《中山复篋集》和《桂苑笔耕》以及一部编年史《帝王年代历》。

这些人敦促政府应优先任用学识出众的人而不是只符合骨品资格的人。他们希望以此创建另一种类型的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一个以受过儒学训练的有才能的人士为其核心的国家。由于崔致远的政策建议书不幸没有留传下来，我们不能确定但可以推测该建议书也贯穿着这一理想。可是这一理想在直至崩溃为止都顽固坚持骨品制度的新罗是不可能被接受的。结果在儒家学者中发出了批评新罗骨品制过时的声音。在真圣女王时期以利用文字隐晦批评政府而获罪被捕的王巨仁便是这一类抗议的一个例子。崔致远也是在其上书遭到搁置后弃官而去，在半强迫的放逐中度过余生的。但是，最终正是崔致远上书中所说的那种儒家学者起了为新高丽王朝提供政治思想体系的职能。

禅宗的流行

禅宗的流行是新罗后期佛教的新趋势。禅宗（沉思学派）具有与教宗（经文学派）不同的地位，两者是在各自信仰的教义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教派。简言之，禅宗认为信仰不需要根据文字，而强调摒弃繁琐的教义开发人的心智。因此，禅宗一边宣扬顿悟之道，一边反对诵读经文，这一顿悟的方法就是禅宗或静思。通过禅宗或静思理解本来就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佛性是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禅宗具有个人主义的性质。

禅宗据说最初是在7世纪善德女王在位时（632—647年）传入朝鲜的，但当时的理解是很模糊的。9世纪初，在宪德王统治下，以道义和尚在宝林寺创建迦智山派为开端，禅宗信仰逐渐开始广为传播，以致建立了所谓的禅宗九山。

禅宗的广泛流行可以由它受到各地豪族的热力欢迎来说明。禅学九派中的大多数都与地方豪族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庵堀山派受到溟州的一位豪族王顺式的庇护，而开城的须弥山派与王建关系密切。实际上，九山派的许多创始人都出身于地方豪族。其中有些人的家世可以追溯到京城贵族，但他们的家族长期以来定居乡村已经成为当地的豪族，因此，自然九山派都扎根于支持他们的地方权势家族的堡寨附近地区。

总之，禅宗是作为豪族的宗教发展的。禅宗的个人主义因素为地方豪族要求独立的主张提供了思想基础。他们反对京城的中央集权结构。诚然，新罗的王室曾力图利用禅宗以谋求恢复支离破碎的中央权力结构，不过，这个时代禅宗的基本特征并不是起这种作用。

风水理论

随着豪族兴起而广泛传播的另一种思想是风水理论。道洗和尚将风水理论与佛教的行善积德、道家的阴阳五行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它的吸引力。按照道洗的说法，一块土地的自然特性及其外观都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地势关系到兴盛与衰败、有利与不利。挑选到一个兴旺有利的地点建造房舍和庙宇，国家与个人都可以交到好运。反之，地点颓败不利便会带来恶运，所以人们要防止灾难就必须建造庙宇来弥补地形的缺陷，就像人们用泥土敷在身体上治病一样。道洗把朝鲜半岛比作一棵根植于白头山的大树，有时也认为它呈船的形状。据说，他游遍整个朝鲜，占卜地形的休咎祸福。

从这种风水理论的观点看，每个地方的豪族都认为自家的地点是吉利的，他们还力图以此为根据来证明其豪族地位具有合法性。开城王氏家族的情况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因此，王建统一后三国被认为是开城地形贤德育人的结果。具体而言，我们知道王建的先人就笃信风水预示，如果王氏在松岳山上种植松树使山陵长青，而后举家迁到山南坡的某处，那末统一朝鲜古三韩的英雄便将从他们王氏的子孙中出现。王氏家族果然这样做了，结果王建实现了统一。王建本人也是这一风水地理说的虔诚的信奉者，他在其《十诫要》的第五条中写道：“吾借三韩山水之潜在阴德，完成国家统一之大业。”

虽然，所有的地方豪族肯定都认为自家地形是吉祥的，但显然吉祥的程度依各个豪族的实际权力为依据。“大花现象”这一术语表明，树开大花的地方预示是最吉祥的地方。反之，对手的堡垒被认为是不祥之地。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王建在其《十诫要》中把后百济这一与他抗争到最后的地点称作“悖乱之地”。

艺术

新罗后期通常被认为是艺术的没落期。但是，不应忽视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社会有关，出现了几种新趋势。首先应指出的是在贵族中盛行祈禱塔。由于围绕继承斗争权力更迭频繁，真骨贵族竞相建造祈禱塔以祈求好运。例如，庆州昌林寺文圣王的三层石塔，大邱八公山桐华寺毘卢庵闵哀王的三层石塔，长兴宝林寺宪安王的三层双塔。修建这种祈禱塔的不仅有国王们，也有京城的贵族和地方豪族。

在佛像方面，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毘卢舍那佛（至高无上的神）像大为流行。与早期不同，有许多佛像是用铁铸成的，长兴宝林寺和铁圆到彼岸寺的盘腿而坐的毘卢舍那佛堪称典型范例。在光宗时期（十世纪中期）建于论山灌烛寺的站立的菩萨（所谓恩津弥勒）大石像和在岩壁上雕刻的其它佛像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塔婆在这个时期也开始盛行。塔婆是保存那些高僧遗体的坟墓。禅宗原则上不依靠经文而靠领悟来传授心得。因而它把师徒关系看得至为重要。一般认为其原因是，在一位大师死后，其火化的遗体作为他所教导的教派或学派的象征而格外受到尊崇。于是纪念禅宗大师的塔婆便大量建造起来，已知最早的塔婆是790年为廉居和尚修建的。通常佛塔有八面垫座，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和顺双峰寺为禅宗九山之一的师子山派的开创者道允修建的澈鉴禅师塔和公州甲寺的塔婆。与塔婆一道通常还有记载禅宗大师业绩的石碑，其中突出的一例是从原来忠州迁到现在汉城景德王宫的圆郎禅师的石碑。这些塔婆和石碑有凸出的拱顶石和气韵生动的水漩石刻图案，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是色彩纷呈的。

这些石碑上镌刻的文字既是研究书法风格的主要资料，也是

传播禅宗发展史话的历史文献。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出自崔致远之手的“四山碑铭”。

第六章 高丽的贵族世袭制度

第一节 高丽贵族制度的形成

迈向贵族政治

光宗（949—975年）的改革沉重打击了地方豪族出生的高官显宦。光宗主要任用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没有显贵家世背景的学者和在高丽没有权势基础的中国人为他效力，但是，随着光宗的死去，这些官员的影响也风流云散了，新罗六头品出身的儒家学者则开始担当起主要的政治角色。崔承老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崔承老以创建一个具有中央集权结构的贵族社会为己任。与地方豪族不同，他是一个在农村没有根基的学者，但在新罗投降时已是高丽政府的官员。因此，他关心的是在中央官僚政府中的晋升，而这一倾向自然使他的政治观点偏向中央集权。不过，他反对王权专制的膨胀，厌恶不顾贵族意见的独裁君主。他希望建立一个政治程序的运作以贵族为中心的贵族社会。崔承老的这些观点明确地表现在他于去世前不久即989年呈给成宗的二十八点政策奏疏中。

成宗（981—997年）在应付光宗改革失败后的政治局势时，依赖的就是像崔承老这样的儒家学者的观点。在成宗统治下，第一次从京城派官员去担任外省行政单位的首脑，他推行了一项标志高丽郡县职官制开创的地方政府结构的改革，从而导致地方豪族

地位的下降。但成宗仍希望尽可能多地把地方豪族吸收为京城贵族，所以不遗余力地教育他们的青年。他一向注意听取那些通晓中国典籍的贵族官员们的意见，试图在自己的政治决策中反映这些观点。这样，便为高丽贵族制度奠定了基础。

贵族制度的确立

新罗六头品世系的贵族在巩固自己地位的过程中对重建高丽社会和政治结构作出了许多贡献。同时，开城周围地区的豪族也越来越多地以文官出现在中央的政治舞台。因此，与新罗王室世系的真骨成员在政治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不同，高丽依赖许多不同家族的贵族来治理。这些贵族家族称为庆州（以前新罗的都城）或以他们前辈发迹成为地方豪族的那个地区即本贯相称，“本贯”已变成贵族势力与特权的一种象征。高丽社会看重家世背景，而且，贵族家族与普通平民确实是登录在不同的人口册档上的。

这些贵族世家用婚姻作为扩大其家族权力的一种策略。一个家族如果和一个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家族联姻，那么这个家族便会赢得更大的荣誉，其地位将升迁得更快，从而给它带来更大的政治声望。因此，最高的目的便是与高丽最大的贵族家族王族通婚。这不仅能带来莫大的荣誉，而且还提供了一条攫取政治权力的捷径。于是，以王室姻亲垄断权力的尊贵世家便应运而生了。

安山金氏和仁州（仁川）李氏就是这样的家族。安山金氏像这样垄断权力历经四个王达 50 年，从金殷博时出嫁三个女儿为显宗（1009—1031 年）王妃直到文宗在位（1046—1083 年）。与安山金氏联姻的仁州李氏，随着李子渊的三个女儿嫁给文宗开始把持政治权力。仁州李氏把持政权持续了 80 多年，直到第六个国王

之后仁宗（1122—1140年）继位初年。其政治权力之大可以从以下事实略见一斑。李资谦（李子渊的孙子）甚至梦想建立一个仁州李氏新王朝，自己作为第一位统治者。除这些家族外，尹瓘的坡平尹氏、崔冲的海州崔氏以及金富轼的庆州金氏也是当时的名门世家。这样在高丽出现了一个以新世袭贵族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而且是它们控制着政治程序的运作。

这一贵族集团的中心地区当然是京城开城。开城毕竟是全国的中心，所有操持权柄的人集中在那里。在中央政府中任职的贵族是开城的永久住户，只有当他们渎职犯罪才会被遣送回原来的出生地。王宫建在松岳山麓的满月台，据风水先生认为此地大吉大利，其四周街衢纵横，官署林立，庙堂民舍错落其间，将城市区分成街区、坊院。虽然平民百姓的茅舍像蚁冢或蜂巢一样挤在一起，但王宫、官署和寺院建筑却蔚为壮观。在市区外缘有城墙环绕，建造这道城墙用了三万多劳动力，于1029年才完工。

社会身份制的重建

在高丽主宰社会命运的是新社会阶级的人，而不是新罗真骨出身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重建社会身份制度是不可避免的。在高丽早期统治阶层由京城周围各地豪族出身的人和具有新罗六头品背景的贵族所构成，新的社会结构是围绕这一统治势力而形成的。

高丽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有着密切联系，这是高丽社会结构的首要特点。高丽设置了许多“班”，“班”的名字表明政治职能是固定的，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每一班人有权利和义务行使各自的世袭职能。例如，文班的人任文职，武班的人任武职，南班的

人担任宫中各种差役，军班的人担任军中的官职。诚然，地方和中央官府中当差的办事员和低级官员以及手艺人等形式上不称作“班”，但实际上他们也世代被固定在自己的职位上。被称作“白丁”的农民没有资格担任官员，白丁以下是奴隶地位的贱民。

这几个等级的社会地位限于一定范围的亲属继承。虽然现在还不清楚亲属范围有多广，但似乎限制在一个家族即一个血统而不是整个氏族。为了保护社会地位的继承采取了许多措施。国家制订了五品或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之子可以得到一个官职的“荫叙”制。士兵和地方官吏也把他们的职位传给后代。国家分配的永业田则为这一世袭身份制提供了经济基础。

• 虽然在高丽的社会身份制度中原则上是世袭的，但实际上身份变化一直不断，身份低的上升到身份高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吏进入文班，士兵进入武班。因为，文班中的贵族大多数来自于地方豪族，而文官与地方官吏出于同一个世系的例子比比皆是。地方官吏不能享有荫叙的特权，他们唯一的晋身之阶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因此，高丽的科举考试对于社会变化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

士兵因战绩卓著而升为军官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而且，由于士兵的队伍不仅靠招募自由农民（白丁）而且靠招募奴隶来补充，这些阶级中有许多人就是通过军班跻升于武班的。在世袭的社会阶级的原则之上制订的身份制框架内不断发生这种变化正是高丽时期的一大特点。

第二节 贵族的统治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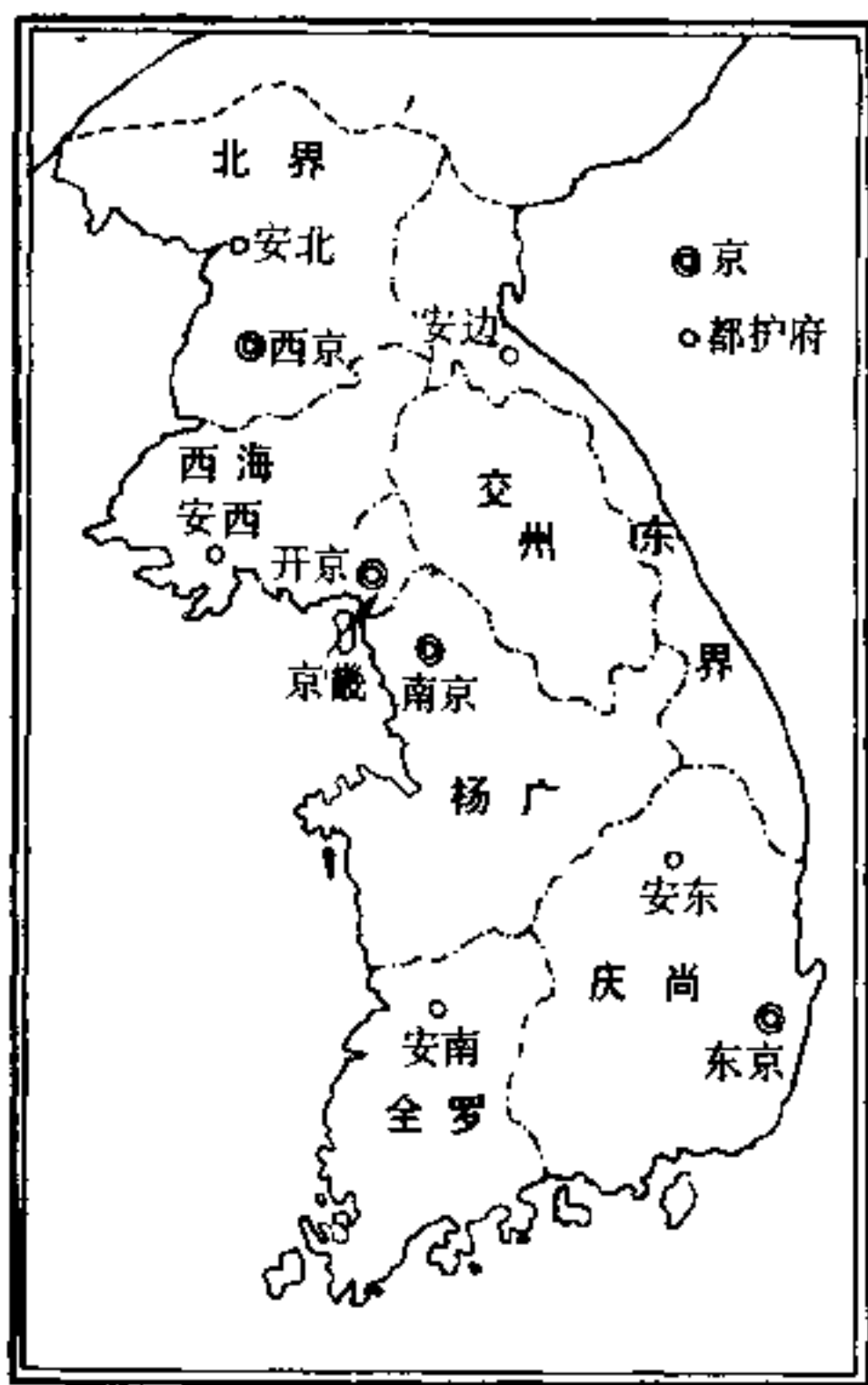
政治结构

新高丽的政治结构于 983 年成宗在位时开始形成而于 1076 年文宗在位时完成。高丽的行政结构是围绕三省而建立的，所以也可以称三省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名称与每个部门行使的职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实际上前两个已拼成一个机构叫做中书门下省或“宰府”。宰府的官员由作决策的二品或二品以上的长官以及负有提出政策和评议督察政策之责的三品或三品以下的副长官所构成。相反，第三省即尚书省则通过下属处理实际政务的六部负责执行政策，六部包括吏、兵、户、刑、礼、工。吏部掌管文班官僚的人事；兵部掌管武班官僚的人事以及其它军务和邮驿；户部掌管全国户籍和租税事务；刑部掌管刑法诉讼；礼部掌管祭祀庆典、外交、官学和国家考试；工部掌管国家林地、鱼池、官府作坊的手工业者的产品以及一般建筑事业。

高丽中央政府中另一个与三省同等重要的机构是中枢院，后来称枢密院，有时也称枢府。中枢院于成宗在位时建立，其职责不仅是承递国王的敕令，而且也处理紧急军务。

宰府和枢府也称两府，其最高官员的联席会议称“都堂”，国家的重大事务在这里作出决定。高丽贵族政府中设置这样一种全盘考虑国家政策的议事机构，这正是它的重要特点。

两府以外是御史台，后称司宪府，其重要职责是对官员进行考绩和纠弹官员的错误举措。御史台与宰府的副长官一起被称为台省，他们有权监察官员的委任、提议变更法规（称署经），这一关键机构起着限制土权独断专行的重要作用。



高丽 5 道两界图

至于农村，于 983 年设置了 12 个省(牧)，这标志已开始从京城派遣官员去管理地方政府。几经变化后，地方政府的组建在显宗在位的第九年即 1018 年达到了最后阶段。这时，整个国家分成京畿、道和界，并在全国设立了三个京城，五个都护府和八个牧，牧下再分为郡、县、镇。道是国家的主要行政区，其数目不同时期有增有减，但最后定为五个（杨广道、庆尚道、全罗道、交州道和西海道）。此外，还沿着高丽的北部边界和东北沿海设立了两个边

区，即北部或西部的“北界”和东部的“东界”，这些是特别军事区（见图，第 122 页）。因此，被委派统辖边境区的兵马使在职责上与道的按察使不同。边境区与道不同之处还在于边境区以下主要分成镇，而道下则设郡县。

三个京城的位置与风水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起初分别座落在开城（主都）、平壤（西都）和庆州（东都），后来在汉城设“南

都”取代庆州，成为三个京城之一。五个都护府设在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和安边。正如它们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都护府设在四个方向上（易受攻击的北疆需要两个），并且负有保境安民的重要职责。

中央政府的官员被派去掌管各省和地方行政单位，但不能回本乡本土任职主事，而且任期也是固定的。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害怕地方权力中心坐大。在这些京城派来的官员之下是户长以及其它低级员吏，他们在直接与广大百姓接触中履行管理之责。这些出身于地方豪族的下级官员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上流阶层，而且因为他们比在短暂的任期后便要离任的中央委派的官吏更了解家乡的情况，他们的影响也更大。为了遏制他们的权势，往往将来自某地的中央政府官员派到他的家乡地区当监察官（事审官）。此外，还发展了一种人质（其人）制，要求地方上名门望族的年轻人到京城去效力。最后，郡、县、镇这些行政单位都是由村长为首的村所构成的，这些人在管理村民方面起一种中介作用。

军事组织

高丽是在军事冲突背景下崛起的，它曾经利用军事力量摧毁了强大的敌人后百济，也与北方的契丹有过多次数军事较量。因此，高丽相当注意军事组织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太祖王建曾亲率一支大军征伐，这支军队以开城地区的军事力量为基础，是他统一后三国的核心力量。太祖亲自指挥的这支军队已成为中央官府组建的两军六卫的核心。六卫指的是左右卫、神虎卫、兴威卫、金吾卫、千牛卫和监门卫。一般认为六卫的组建于995年前后成宗在位时期完成。六卫中的前三卫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不仅担负

京城的防卫还戍守边疆。金吾卫负责京城治安，千牛卫承担国家典礼，监门卫守卫王宫、城门和官署。两军指的是鹰扬军和龙虎军，组建稍晚充当国王的侍卫，地位在六卫之上。

两军六卫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统领和副统领，统领叫做上将军，副统领叫做大将军。这些上将军和大将军是最高的军职，他们有自己的联席议事机构，叫做“重房”，以与文班官僚的“都堂”相对应。不过，在文臣位尊的高丽，重房是无法与都堂相抗衡的。两军和六卫由许多个领组成，每领有士兵1,000名。领有各种，分步兵、骑兵、狱卫、水陆仪仗和门卫，总数有45个。领的指挥官是将军，将军们都在将军房这种联席机构议事。

两军和六卫的步卒是属于军班家庭的职业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军役义务是世袭的，作为军户单独登录在军册上。国家授给士兵“军人田”，还拨两家“养户”来耕种，以此为士兵提供给养装备。士兵数目不够时便实行招募。挑选入伍的人作为军户登记在册，也得到一份军人田。募兵制通常从白丁农民中挑选年轻力壮的人，不过也可以挑选贱民，而这正是士兵社会地位下降的一个原因。

虽然，起初农村豪族的私人武装被合并成所谓的光军，并受中央政府的控制（947年），但后来又把这些武装力量组建成省驻军。驻守在边境区的省驻军与道的军队不同。在边境区，由于这些地区是紧邻边界的军事地带，正规军队都驻守在每个镇里。这些军队可以称为边防军，其核心是突击队，再辅之以左右两翼。这支常备军能在突发事件时应战，各道的地方军队则是由负责治安的保胜军、地方民兵精勇军和一品军等几部分组成的。

科举考试和荫叙制

科举考试是任用官员的基础，主要有三类：制述业、明经业和杂业。制述遴选人材依据的是考生按规定的中国文学形式如诗、赋、颂、策作文的能力，而明经考查的是对诸如《书经》、《易经》、《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的知识。这两类考试都是为选拔文官而进行的，但作文考试被认为特别重要。这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高丽王朝时期有6000多人通过作文考试，而只有450人通过明经考试。显而易见，这个时代的贵族阶级推崇的是文学成就而不是儒家典籍的知识。

相反，举行杂业考试则是为了挑选能以需要的技术知识效力的专门人才，主要是行政法规、计算、医药、占卜，以及风水地理方面的知识。因此，这一类考试的地位低于制述和明经。而且，由于选拔军官的国家考试是在王朝末年恭让王在位时才开始出现，因此认为高丽时期没有武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在高丽一个人只要是良人便有资格参加考试，而贱民与和尚的孩子则不得参加考试。但是实际上一般农民尽管身份是自由的，也不可能参加考试。主考官叫知贡举，受命担任这一职务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誉。主考官与及第的士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师生关系，彼此像父子一般相处。这种关系维持终生，而且社会集团确实就是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集团成为其成员在官府中擢升的支柱。

在新罗的骨品制度下，委任官员的标准是社会等级，因而不大需要用考试制度来选拔官员。不过，在高丽，虽然许多世袭的贵族家族成员、一切有特权社会地位的人都有权参与政治生活，但也为那些低级官吏跻身中央官府和进入贵族行列开辟了一条道路。换言之，与新罗时代迥然不同，高丽时期很多人都可以成为

官员。这样一种新的遴选人材的办法即科举考试便显然十分必要了。这些考试不仅对于各地的低级官吏具有这样的吸引力，也为所有世袭贵族家族的成员致身通显提供了一条途径。因而，这一官僚招募制度对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都有利。

但是，高丽的科举考试不是选拔官吏的唯一方法，这是因为高丽的贵族社会还没有形成像后来李朝的两班贵族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宽阔的社会基础。高丽的世袭贵族家族另外想要一种可以保留其社会特权地位的招募制度。荫叙制适应了这一要求，它规定五品或五品以上的官员有一个子嗣可以得到官职，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担任了中级官员，他的一个子嗣便可以自动进入官场。这说明高丽的官僚体制是靠强大的贵族制度所支撑的。毋庸置疑，高丽是一个尊重世袭特权的贵族社会。正如仁州李氏的例子表明的那样，有些家族还往往滥用荫叙制，他们一旦攫取了权力使用它作为扩大其特权社会地位的手段。

教育制度

在太祖在位时，开城和平壤便有了学校。但是，要到992年成宗设立了国子监才算为高丽的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像现代大学一样，高丽的国子监内含许多学院即所谓东城六院——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虽然学院是各自独立的，但并不是自设一套课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如五经、孝经、论语的场所，它们的区别在于对学生入学资格要求不同：国子学录取三品或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之子，太学录取四品和五品官员之子，四门学招收的是六品和七品官员之子。最后，八品和九品官员以及平民之子，则进入律学、书学和

算学学习某一种专门技术。对入学资格的这一规定再次揭示出高丽贵族社会的身份意识。

成宗在位时（981—987年）地方教育设施尚未建置。但成宗热心于向农村普及教育，他先是让地方上青年到京城来学习，当这一计划失败后，他又派擅长古典文学和医药的学者到农村去传授知识。这样，在仁宗在位期间，随着京城六院的设立，农村也兴办了学校教育当地的青年。由于科举制度的一个目标在于把地方豪族出身的人吸收到中央官僚机构进而使他们转变为京城贵族成员，因此政府自然对地方教育表现出相当的热情。

第三节 贵族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土地制度

在高丽的土地制度中田柴科制度居于中心地位。田柴科是从940年实行的役分田制度演变而来的，役分田制度对统一有功者授予土地作为奖赏。田柴科这一名称早在976年便使用了，但当时它仍保留把土地授予少数特权者的特点。最后到998年，穆宗即位的第一年才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制度，按成宗在位前三年创立的官品结构列出的十八等级来分配土地。一个官员按田柴科制度的规定所得到的土地便成为自己的薪饷。官员死后分到的土地要归还国家。此外，地税由国家征课，官员不得直接收取。田柴科制度也为编入军班的那些农户提供军人田。

除了田柴科外，另一种酬劳高级官僚的重要形式是功荫田。这种土地通常是按等级授予五品或五品以上官员作为永业田。功荫田由佃农耕种，受田者有权收租。因此，这种土地实际上归私人所有。可以说功荫田对贵族阶级的支持比对占有它的官员的支持

更加有力。如荫叙制使五品和品阶更高的官员的子嗣能自动获得官职，功荫田的目的在于使高级贵族的特权地位世代延续。

授予地方政府官员（乡吏）和士兵的土地也很重要。前者得到的土地叫外役田，是作为他们履行公职的报偿。正像他们的服务是一种世袭性的职责，这种可以继承的土地也是世袭的，因而可以称之为永业田。而且由于他们能自己收租，这种土地又近似于私田。“军人田”是酬赏军役的土地。虽然，有关军人田分配的法规已包含在田柴科制度中，但其性质与田柴科制度不同。军人田是可以继承的，因为军役义务是世袭的，“养户”则附属于每个士兵耕垦他的土地。不过，如果一个士兵在他退役时没有儿孙来接替他服役，他就只得交还他的军人田而领取口分田维生。这种口分田也授予官员和患病士兵的家属，包括生活无着的军人遗孀。

此外，还有属于王宫的内庄田，虽然实际上归王室私有，但这种土地具有由特别行政区经营的特点。最后，为了支付政府地方行政费用还划分了“公廨田”，寺院也拥有一些田产。

贵族的经济基础

高丽的土地制度反映了全国所有土地都是国王的土地这一基本前提。不过，这是一个极端理想化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土地都归国家所有。诚然，国家直接管理的公田确实存在，这部分土地的租金用船运到开城，用于公共支出，其中大部分作为官员薪俸。虽然科田收入归官员个人，但由于国家对这种土地征课租金而官员死后土地又要转归国家，因此可以把科田归入公田一类。换言之，这种“公田”的特点便是向整个贵族这一“公众”的重要部分提供经济利益。

与此形成对照，还有为贵族个人私利服务的私田，对此功荫田是最好的证明。名义上国家按各种科田的方式来分配这种土地，但实际上领受者可以将土地传给后代或自行处理，也可以直接收租。因此它跟私有土地一样，这就是它被称为永业田的一个原因。外役田和军人田也属于永业田，但这两种是作为对国家效力的报偿，所以虽然可以传给后人，但不能随意处置。寺院的土地也叫做永业田，但性质不同。以上各种“私田”，尽管存在着少许限制，但实际上与私有土地并没有什么不同。

随着贵族权力的增长，科田也象功荫田一样成为世袭性的并变成由贵族直接收租的私田。通过占有荒地、接受国王的特别赏赐以及倚恃武力侵占别人的土地等手段，贵族的私田进一步增长了。按当时流行的分成制，与公田收 25% 的地租相比，私田的地租占收成的一半。贵族之所以对于积聚私田特别感兴趣，原因就在于此。贵族财富就是在私有田产的基础上膨胀起来的。

贵族利用其财富去攫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建立谷仓，储存他们所分享的收成，然后按高利出借粮食牟利，经营这类谷仓的不仅有贵族个人，而且有国家和寺庙，还有一种叫做“宝”的赈贷机构也从粮食借贷的利息中获利。“宝”的类型有多种。按其服务的目的，有些是为资助儒学弟子或和尚学习而兴建，有些则是为了赈济贫民或支付八关会的开销而设立。

用于这些营利活动的有粮食布帛。由于商业总的说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因此对货币的需求不大。成宗在位时于 996 年铸造了货币。肃宗统治时期于 1102 年制成了“海东通宝”铜币，但并未普遍使用。不过同一时期仿照朝鲜半岛形状制成的银瓶（俗称阔口），重一斤（相当于现代的 600 克）却广泛用于贵族之间的大规模交易和贿赂。

民众的生活

高丽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而那些直接耕种土地的农民构成社会的基础。自由农占农业人口的大多数通常被称为白丁，这个名称反映他们不是国家部门某个固定的角色，因此，没有资格接受国家的土地。他们耕种的土地通常称为“民田”，公田的一种，这意味他们要把收成的四分之一作为地租上交国家。他们也耕种贵族的私有土地，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占到产量的一半，他们的义务也更大。农民不仅要交纳地租，而且承担税赋，通常以布帛来交付。在有些场合，征课的是一个地区的特产如水果或麻布。成年男子从16岁到60岁有服劳役的义务，他们被征调去兴建各种建筑工程，一边服劳役一边还要自己谋生，因此有很多穷人起早贪黑地劳作仍衣食无着。

比自由农待遇更坏的是那些住在特别行政区如乡、部曲、所、驿、镇和馆的人。乡和部曲是限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贱民居住的地区；与此相反，所通常是矿工和加工金银、铜、铁的劳工、制丝造纸制陶瓷的劳工的聚集地。虽然，驿和镇是建立在重要地区和海岸地带的交通设施，馆是专供夜行人投宿的客栈，但在这些设施中服务的人，社会地位比平民还要低。应当指出，这些特殊群体的存在可追溯到新罗时代，但由于与自由民融合，他们的特殊性渐渐消失了。

在社会最低层的是奴隶，有隶属官府的官奴和属于私人所有的私奴。官奴的任务是在王宫和官府里服杂役，有的也分给文武官僚当侍从。私奴属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寺院，承担的是下厨打柴一类家务。当然，他们世代为奴，是不能被买卖的。除了这些家内奴外，还有在农村为主人耕种土地的户外奴，但是这些户外奴有自己的财产，只向主人交租，因此他们的地位实际上很像佃

农。这些户外奴的人数不断增长，而且，随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积累财富从而上升到平民的阶级地位，高丽的社会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如屠宰工和柳条编织工（禾尺或杨水尺，李朝的白丁）或招待（才人，李朝的广大），他们的职业为人鄙视，结果他们的社会待遇也像奴隶一样。

自由农和其它直接从事财富生产的人大都过着贫困的生活。艰难困苦迫使许多人四处潜逃，这对农村的经济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制订一种社会政策来应付这种形势，至少得采取一些救济措施。高丽采用的救济措施有以下几种：特别的赈贷基金称济危宝，即利用某些商品当作资本，用它的利息来救济穷人；东西大悲院是照料贫苦病人的；惠民局起着公共诊所的作用；仓贮网如义仓在正常年份贮藏粮食供歉收年用作公共救济；常平仓用来平稳物价波动。还有佛教设立的许多救济机构如开城的开国寺，在临津渡口设立的普通院，在饭堂里为一伙伙四处流浪的乞丐放粥。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权宜性的社会政策，它并没有成为基础稳固的济贫方案。

第四节 对外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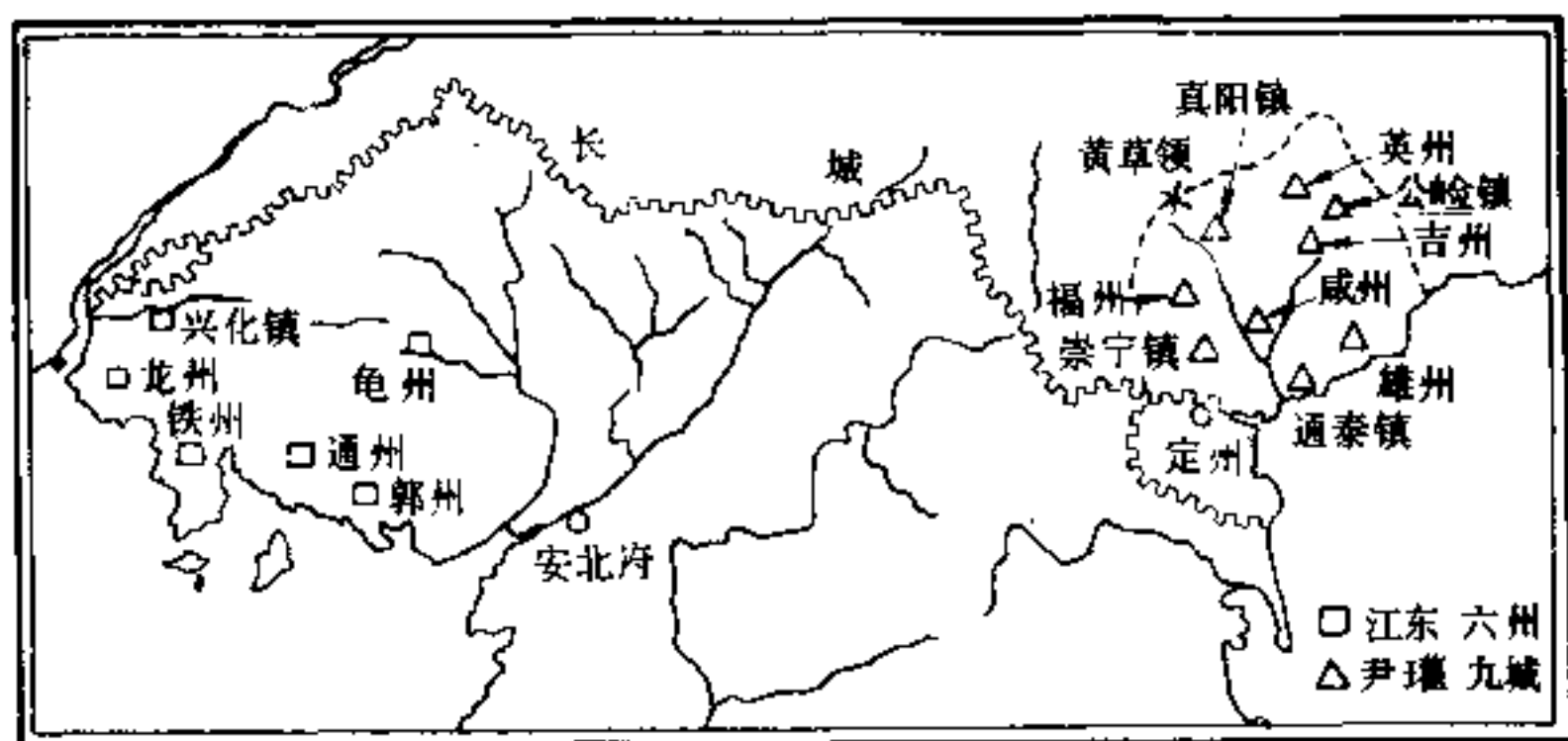
与契丹的战争

与契丹的接触始于太祖统治时期。契丹于926年推翻渤海因而与高丽有了共同边界以后，不久便派使臣赠给高丽国王50匹骆驼（942年）。但太祖将契丹视为未开化和不道德的，于是把契丹的使节流放到一个岛上，让骆驼饿死在开城的万夫桥下。同时，太祖对来自渤海的难民却表示欢迎，着手修复了以前高句丽的都城平壤，还采取其它一些办法来力图实现恢复高句丽王国往昔版图

的梦想。结果，在太祖时，高丽的边界线便已经向北扩张到清川江。

后来的诸王继续这一北进政策。定宗（945--949年）计划迁都平壤，在该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他还组建了光军准备反击契丹的入侵。稍后，从光宗时（949—975年）起，高丽开始积极地向鸭绿江推进，越过清川江兴建了许多要塞。

高丽在执行向北扩张的政策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契丹发生冲突。虽然契丹的最后目标是中国宋朝，但它对高丽的企图不能不怀有戒心。渤海残存者建立的安定王国（安定）崛起于鸭绿江中游地区，安定国利用女真人（满洲东部最原始的满洲人）的使臣经由海路与宋朝交往，而对契丹则采取了敌视态度。这进一步刺激了契丹，结果不久便发生了契丹对高丽的入侵。



高丽北境图

契丹于991年在鸭绿江下游的来远城建立了一个要塞，将女真与宋朝的联络切断，又于993年派萧逊宁率领一支侵略军越过了鸭绿江，但这时由于徐熙施展了灵活的外交手腕，高丽克服了这场危机。徐熙不仅设法说服萧逊宁的军队自动撤退，而且还获得契丹同意将上至鸭绿江岸的土地并入高丽版图。这一切之所以

能发生，是因为契丹当时正卷入与宋朝的战争，没有足够的实力对高丽施加压力。不久，当女真在鸭绿江以南的土地成为高丽属地从而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地缘联系，契丹不得不满足高丽的要求建立友好关系。徐熙的外交政策的成功无疑应归功于他正确地估计了国际情势和高丽所处的地位。契丹撤军后，高丽着手在鸭绿江的东南部地区建立了许多要塞，后来的江东六州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它指的是在现代义州、龙州、宣川、铁山、龟城和郭山等地的要塞（见图，第 132 页）。此后不久，契丹对高丽控制鸭绿江东南地区表示了不满，要求高丽交出江东六州，实际上是高丽驻守在这一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契丹的警觉。当然高丽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契丹利用了高丽的政治骚乱，在契丹皇帝圣宗亲自指挥下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此时西北边境地区的强大军事将领康兆将穆宗赶走，消灭了竞争对手金致阳一派，拥立显宗（1009—1031 年）继位。但康兆低估了敌人的力量，结果遭到挫败，被俘后身亡。他到最后也不肯效忠契丹皇帝，为此慷慨赴死。契丹军队此时占据了开城，显宗向南逃去，一直逃到罗州。出于害怕供应线被切断，契丹在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好处的情况下便撤退了，提出的唯一条件是高丽国王要亲自到契丹朝廷表示效忠。这当然不是高丽乐于视为荣誉的一种义务，因此，这种王室朝觐从来就没有举行过。这以后直到 1018 年第三次大举入侵前契丹发动了几次小规模进攻，逼迫显宗朝觐和放弃江东六州。在萧排押率领下，契丹军的第三次入侵在各地都遭到挫败被迫退却，在姜邯赞实施的高丽对龟州（龟城）的大举进攻中全军覆没。高丽的胜利是压倒性的，10 万侵略军中只有几千人幸存下来。这样契丹对高丽的多次侵略便以失败而告终。高丽顽强抵抗外国侵略并把入侵者赶了回去，终于使两国建立了和解，以后两

国便维持着一种和平关系。

与女真的战役及与金的关系

在与契丹建立和平的同时，高丽开始受到女真的骚扰。在1033 - 1044年的12年间，为抵御契丹和女真，高丽修筑了一道从鸭绿江口东至海滨都连蒲（现连蒲）长达一千里的城墙。

女真一直处于渤海的统治下，渤海灭亡后，它便将高丽和契丹当作宗主国。女真还没有达到自己创造国家实体的社会发展水平。因此，由于高丽文化先进，女真特别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母国”，看作是自己渴望获得的文化的源泉。高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布帛、铁制农具和铁制武器，女真则以马和皮毛作交换。许多女真人虽然仍在原来的住所，但已受高丽管辖。还有些则迁移到高丽，高丽分给这些人土地房屋，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活的手段。

高丽的北部疆域

但是当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要求在北满完颜部落首领乌雅束的领导下越来越具体时，这种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随着完颜部落势力扩展到已臣服高丽的那部分女真，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曾经发生过多次数军事冲突，但由于高丽的常备军六卫已经退化，加之大部分是由步卒构成，所以常常被来犯的女真击败。肃宗为此创建了一个新的军事组织，称别武班。顾名思义，它是在六卫常备军以外设立的一种特别军事组织，包括神骑军、神步军和所谓的降魔军。神骑军和神步军主要由贵族家庭成员和自由农

(白丁)所构成,而降魔军招募的是佛教僧众。他们每年轮训,准备大举反击女真。

1107年尹瓘发起了这样一次反击。他越过现在定平的关口,占据了北至洪原的咸兴平原,该地区迄今一直是女真部落的居住区。他在占领区修筑了九城,并屯兵驻防。但由于女真不断进攻与交替进行外交呼吁,再加上高丽朝廷对尹瓘成功的妒忌,结果九城地区仍归还给了女真。

以后,乌雅束的弟弟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并于1115年建立了国家,国号金。金不仅于1125年进犯了契丹辽王朝,而且还攻陷了宋朝的京城,虏获了宋朝皇帝和他的父亲(他于1127年在其子以前在位)。在以上事件进程中,金也对高丽施加了压力,最后要求高丽建立一种宗主与附庸的关系。许多高丽人对此义愤填膺,斥之为无理要求。但当时当权的李资谦认为与大陆的和平关系将有助于维持他自己的政治统治,因而他同意金的要求,结果,金朝便没有对高丽发动军事侵略。

与宋朝的关系

高丽从一开始就崇尚宋朝的先进文化,并力图通过与宋朝维持一种和谐关系来满足它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于是通过官方使节的访问和商贾的旅行,高丽出口了金、银、铜、人参、松子等原材料以及宋朝人喜爱的如纸、笔、墨、扇等手工制品,作为交换则进口了丝、书籍、瓷器、药品、香料和乐器。这些进口物品对高丽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宋朝木版印刷对高丽木版印刷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宋朝的瓷器对高丽的青瓷有很大影响。这样,两国之间的关系便建筑在文化与经济交流这一和平基础之上,这

也大致符合高丽贵族的意愿。

由于辽的军事压力和金的崛起，高丽和宋朝的关系需要作微妙的调整。这是因为宋朝希望与高丽结盟从两边进攻契丹与金。但是，高丽不愿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动来激怒辽或金，所以没有同意宋朝的要求。在宋朝两个皇帝被俘获，宋朝撤到长江以南以后，宋朝请高丽代为斡旋，以促使释放两个皇帝，但高丽再次拒绝帮助。高丽知道这是介入大陆的事务，因而决定继续回避金与宋朝的冲突。

在这种情势下，高丽和宋朝甚至一度中止了互派使节。但总的说来，通过商人的旅行，贸易仍在进行，使节也像以前一样继续来往。甚至连繁忙地从事宋朝贸易的阿拉伯船只也进入礼成港、开城港，带来了水银、香料和药品，这样，礼成港在当时便成为一个国际商业港口兴旺起来。

第五节 贵族文化

儒教与私学

在一个原则上由文臣按照儒家政治理想来治理的国家，儒教自然会兴盛。儒家政治思想抵制佛教关于因果报应的教义，它的理想是由一个精英集团来治理的中央集权国家，制约其统治的伦理基础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关于宇宙人类的理性观点，这种政治主张逐渐赢得高丽贵族的广泛支持，结果，儒教从过去的新罗时代没有什么吸引力而发展到有朝一日竟能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起到遏止佛教的地步。

在高丽社会重视贵族家世，反过来对于修改儒教教义的某些特点也不无影响。作为教育贵族青年的主要机构，私学兴起这一

新现象便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一个后果。在文宗统治时期(1046—1083年)，有朝鲜孔子之称的伟大的儒家学者崔冲建立了一所学校(九斋学堂)讲授九个专门领域的知识，这被称为文宪公徒，是私学开始的标志。文宪公徒是当时涌现的12所这类私学的先驱，这些私学称为十二徒。正如崔冲曾经担任过政府高官一样，十二徒的创办人中大多数也是以前的高官显宦，而且许多都是主持过科举考试的一代杰出学者。这种环境再加上看重家庭背景便在贵族子嗣中形成了一种时尚，似乎进入十二徒比进入官学国子监更为荣耀。因而，当时高丽贵族所关心的不外乎新的世家动向和学派传衍。私学的繁荣当然带来官学的衰落。鉴于这种情况，连续几代的国王都试图振兴国家制度。首先，睿宗(1103—1122年)仿效崔冲的九斋学堂在七种专门领域设立讲座，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礼记、春秋以及一个新的关于军事研究的科目，任用每个领域的杰出学者来执讲。他还设立了一种奖学金，叫做养贤库，并在王宫庭院开设了像清讌阁和宝文阁一类学术讲座，招募学者、收集书籍以供历史古典的研究。仁宗(1122—1146年)是睿宗的后继者，他继续努力，也设立了京城六学和一些地方学校，从而完成了高丽官学系统的创建。许多杰出的学者像金仁存、金富轼、尹彦颐 and 郑知常等都是从这些讲座崭露头角的。

儒家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倾向于理性方法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儒教被认为是一种用以调整家庭关系和治理国家的正统教义，而且无论是君主还是贵族都认为它对于政治领袖们的道德修养是极端重要的。~~《三国史记》~~确实就是从这一角度编纂的。作为~~朝鲜的官方史书~~，《三国史记》是一部以编年史形式编成的正统的儒家历史。但是，正如朝鲜的价值观限制了高丽科举制度的运作，高丽贵族归依儒家理性主义也受到种

种限制。高丽的儒家决不是完全排斥佛教，相反，认为它是达到心灵宁静的教义，也就是救世的教义；他们认为它可以与儒教并存。因此，许多人对两者都信奉，在这方面他们与后期高丽和李朝的儒家学者不相同。

大藏佛经和天台宗

由于木版印刷了由中文译本翻译的大藏佛经，高丽佛教便已系统化了。佛经的雕刻始于显宗（1009—1031年）在位初年，而完成于1087年。印刷大藏经最初是用来祈求中止契丹侵略的。但是除这一目的外，应当看到印制大藏经还受到将佛教教义系统化这一意图的驱使。这一印刷的木版曾藏于大邱符仁寺，在13世纪蒙古侵略时被毁。而今天海印寺收藏的《高丽大藏经》则是在江华岛开始着手而于1251年完成的一个新版本，当时朝廷在该岛躲避蒙古的袭扰。《高丽大藏经》尽管是在战时条件下完成的，但就其准确性、书法的优美和木版雕刻的精致被认为是东亚制作的20多个大藏经本中最好的一个。同时，义天和尚（1055—1109年）设立了教藏都监，并出版了高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教百科全书《增补高丽佛学论》。这就是《增补高丽佛学论》。虽然现存的已非全部，但其内容可以从义天的另一部著作《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所列举的书目中推测出来。

总之，大藏佛经是一部佛经总汇，它的出版实际上将教宗即经文学派的各种教义系统化了。连赞同经文学派与沉思学派（禅宗）统一的义天在他的《续藏经》中也未将与禅宗有关的著作包括进去。尽管高丽贵族对经文学派有这种偏爱，但在地方豪族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高丽禅宗像以前一样兴盛。这样，高丽的佛教界本身已分成两种并存的教派信仰，冲突不和来源于它们各自的

偏见。天台宗以试图解决这些冲突改革佛教制度，于是在高丽扎下根来。

早在光宗统治时期（949--975年），像《天台四教义》的作者谛观（？—970年）这样的人就鼓吹过天台宗。但这些高丽和尚主要活跃于中国而不是他们自己本国，因此，天台宗在高丽早期并没有生存下来。后来义天（也称大觉国师）确立了天台宗的独立教派地位，这个教派便很快成为高丽佛教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义天是文宗第四子，从早年起便醉心于佛经和注释的研究，而且他对儒教和道教也有渊博的学识。在中国曾研究过华严宗和天台宗，1086年从中国回来后他试图对经文学派（特别是华严宗）与禅宗冲突不已的高丽佛教进行改革。义天促进了经文派与沉思派的统一，鼓吹天台宗教义是一种可以使两派信奉者都接受的信仰。天台宗虽然教义沉闷，但认为排除杂念、凝聚心力、正确观察物性是一种可以得到终极真理、清晰认识的方法。由于接受这一教义，高丽的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创立天台宗的过程中，义天将禅宗九山的杰出人士招集到身边，又采取了一些像把禅宗文献排除在他的《续藏经》以外的行动，于是唤醒了禅宗，为它注入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内聚力，进而产生了曹溪宗。这样，高丽的佛教界便呈现出新的局面。

佛教和贵族社会

佛教之影响日常生活较之它发展成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对高丽的社会更有意义。高丽贵族继续认为佛教不仅是一种修来世的宗教，也是一种可以影响国家和个人的现世命运的信仰。从这一基本看法衍生出行善救世的信仰和积德致福的教义。这种信仰充分

解释了为什么高丽建造那么多的寺庙和恪遵各种佛教礼节。

从开城的十所开始，太宗本人就兴建了许多寺庙，包括法王寺、王轮寺、兴国寺。他在《十训要》的开头说道：我们王朝大业建立之成功完全归功于众佛的保护之力。因此我们要为禅宗和教宗兴建寺庙，并为寺院委派住持，以便他们主持仪式，修身养性。

因此，可以认为，兴建寺庙不仅有宗教意义。兴王寺占地面积 2,800 间（相当于现在的 9,270 平方米），历时 12 年，于 1067 年完工。它也许是为保证王朝福祉而兴建的最值得注意的一座庙宇。高丽寺庙之多——仅开城就多达 70 座——本身就表明高丽是一个地道的佛教国家。

高丽还举行各种国家佛教庆典。最大的是一月十五日的燃灯会和十一月十五日的八关会。这些庆典将佛教仪式与当地习俗结合起来。在庆典上，表演音乐、舞蹈和各种娱乐，国王及其臣僚恳请众佛及天地神灵给国家和王室带来安宁。除此面外，还有其它一些每年举行一次的庆典，如国王诞辰举行的“祈福道场”；每年纪念先王忌日，有“忌辰道场”。还有庆祝佛祖生日的“僧众大会”（4月8日），纪念国王宣誓寻求佛性的“菩萨戒道场”（6月15日），“盂兰盆道场”（7月15日要为解救亡灵供奉祭品）和标志一年终结的“除夜道场”。为祈求国家和平的“仁王会”，是与目的相同的和尚素食宴一道举行的。用餐的和尚一次多达 100,000 名。规模更大的一种盛宴叫做“无遮大会”，不限于和尚，凡是参加的人都可以进餐。必要时还要遵守其它一些规定，如按照佛教不杀生的戒律释放家畜，烧毁鱼网，以及和尚讲经诵经。已经说过，大藏佛经于 11 世纪出版是出于抵抗敌人侵略的目的，而将佛祖箴言用金银精细地抄录在深绿色纸上这一类虔诚做法实际

上则是受祈求佛祖实现个人希望的心愿所驱使。和尚一边诵读经文（经行），或仅仅展示一下经文，一边沿街祈求国泰民安，已成为当时人们熟知的场面。

这种对佛教的尊崇导致按科举考试的模式而设立了对寺院主持的考试。“僧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针对经文学派的僧众，另一部分是为禅宗和尚设立的，通过考试的人被授予各种教职。这些分成等级的称号从“大选”开始，经文学派和尚的最高职称是“僧统”，而禅宗和尚的最高职称是“大禅师”。比这些还要高的是“王师”和“国师”，这两个称号被认为是和尚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和尚享有国家分给的土地，还免除了徭役，这些措施对和尚人数的增加十分有利。许多王子也入了佛门，王室和贵族成员常常成为和尚，这无疑与寺院拥有财富有很大关系。

寺院通过王室和贵族的捐赠、农民的托管以及直接侵占扩大了它们的土地。由于这种土地享有免税的特权，所以佛教机构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寺院利用它们土地的收入，设立佛教赈贷基金、救济仓以及类似的高利借贷粮食的机构，聚敛了更多的财富。此外寺院积聚财富的途径还有经商、酿酒、饲养牲畜等。

为了保护它们不断增长的财富，寺院感到有必要利用武装力量，于是将僧众训练成士兵。武装僧侣的数目似乎逐渐增加了，连国家都把他们当作军事力量看待。在这方面有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就是曾经动用降魔军抗击女真的侵略。和尚携带武器这一现象也与贵族权力斗争有关，因此他们的影响也渗透到政治领域。

崇尚中文写作

在高丽初期新罗的乡歌传统仍有相当的活力。保存下来的只

有均如和尚（917—973年）的著作，而且他的“普贤十愿歌”中的十一首诗确实占了仅存的乡歌集的大部分，不过，这些作品技巧之精胜过它在艺术上的启示，而且在感情上比刻板的赞歌更少诗意。在均如之后，虽然乡歌还继续写作过一段时间，但不久这种形式便踪影匿迹了。

用汉字写作的文学作品开始兴盛。高丽贵族在偏好上颇不同于三国和统一新罗时期的贵族。文官喜爱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学。他们以能够记诵中国古典文学的章句或吟咏中国诗歌而自豪。一种叫作“月课”的习俗要求文官每月按国王规定的题目作诗，而在校的学生则要通过在规定的时间内写诗来磨炼他们的文学技巧——这种比赛叫作“刻烛赋诗”。采用这种方式，对中国文学特别是诗的知识长进很快，逐渐成为贵族青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中国诗只是吟诵，但后来也像乡歌那样用来演唱、合唱。这样许多中国诗便被当作民歌或用中国曲调或用本国曲调来演唱了。

艺术

青瓷器皿作为高丽贵族生活的产物，无疑是高丽贵族艺术成就的最好范例。高丽的青瓷器是受宋朝青瓷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被认为又高于宋朝样品，而中国人历来也称赞它为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艺术。高丽青瓷的优点首先表现在它的美丽的色彩上。虽然有些做成了黄绿色或黄褐色，但绿玉色尤其为人喜爱。其次，高丽瓷器型式多样，——不论长颈瓶、罐、杯、酒罐、盘子、滴管（用于混合墨水）、刷子柄、香炉、茶壶、花瓶还是花盆——配上完美和谐的图案更显得高雅。特别富有魅力和吸引人的是模仿菊

花、荷花、石榴、竹笋、西瓜、鸚鵡、鸳鸯、凤凰、兔子、猴子、乌龟、龙、狮子、鱼等动植物外型而制成的香炉、水罐和滴管。高丽瓷器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装饰优美。起初图案既有阴刻也有阳刻，后来便用了镶嵌工艺，这种独特的工艺仅在高丽青瓷器上见到。在采用的许多图案花纹中有云、鹤、水禽、柳树、牡丹、菊花、石榴、葫芦、葡萄、荷花、卷形花叶、时兴的花束等。高丽青瓷以其形状、色彩和图案的和谐结合展示了它的精美绝伦。这些瓷器是供陈设而不是为实用制作的，所以它们粗犷不足而精巧、纤美有余。确实可以说这些青瓷体现了高丽贵族对道教虚无和佛教宁静的向往。因为在这一完美无瑕的结合中他们似乎找到了自己对超脱俗世的精神境界渴望的表达方式。

在贵族家里发现的许多青铜制品——最引人注目的是用银镶嵌的香炉、祭神的水罐、烛台、镜框。这些青铜制品不仅是另一种优美的艺术，而且能使人联想起高丽贵族生活方式的富裕。但青瓷器仍被认为是高丽艺术至高无上的荣耀。它们是贵族情趣的产物，不仅极为优美，而且雅致迷人，除此而外还有其它表达高丽贵族典雅趣味的艺术作品。以其精致典雅的工艺而受到称赞的石塔便是一例。其中杰出的作品有1017年为弘法国师而建于忠州净土寺的实相塔（现移至景福宫），还有1085年为智光国师而建于原州法泉寺的玄妙塔（现也在景福宫内）。

相反高丽的建筑物和雕塑形体越大，工艺就越粗糙。虽然，早期高丽的佛塔沿袭新罗的风俗，但令人有一种退化的感觉。后来，高丽终于发展了自己的特点，出现了一种外形柔和的佛塔而不再具有新罗佛塔那种尖锐直线的美感。在这方面有一个出色的范例，那就是十一世纪早期建于开丰玄化寺的七层佛塔。受宋朝风格影响的八面塔也很流行，其最好的代表是五台山月精寺的九层塔，它

也是贵族情趣的高雅之作。还有一些佛雕作品，如荣州浮石寺的阿弥陀佛，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雕刻不突出。

绘画艺术也极为繁荣，高丽人对于中国作品似乎并不推崇，高丽画家留名后世的也不多。仁宗时代的李宁（1122—1146年）被誉为大师，他的“礼成江图”据说赢得了宋朝皇帝徽宗的称赞。李宁的儿子李光弼也很有名，他的艺术技巧在当时被誉为高丽的光荣。不过，这两位的作品没有保存下来。至于书法艺术，柳仲（1104年）、坦然和尚（1070—1159年）和崔瑀（1249年）最著名。此外还有新罗的金生，他们被称为“神品四贤”。总的说来，早期高丽的贵族更喜欢欧阳询书法的清新简洁。

第六节 贵族秩序的紊乱

李资谦的谋反

高丽的世袭贵族创立了诸如科举制和田柴科制度等许多制度用以限制王权的独断专行，从而维持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但是当豪族利用荫叙制把持官府职位、扩大私有土地（通过王室赐予，开拓荒地，或侵占贫苦农民的土地）时便打破了世袭大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在这种形势下，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冲突是很自然的，冲突往往具有武装叛逆的性质。几场这样的骚乱接连发生于仁宗（1122—1146年）和毅宗（1146—1170年）在位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正是贵族文化顶峰的标志。

首先打破高丽国内平静的是李资谦，他将仁川李氏家族带到了权力的峰巅。李资谦将他的一个女儿嫁给睿宗为王后，并于1122年设法将他们的子嗣拥立为王，是为仁宗。后来他又将其两个女儿嫁给了仁宗，利用这种重复联姻来确保自己对权力的垄断。

他的亲属和党羽很快都飞黄腾达，而那些妨碍他的人都被褫夺了官职。在反击女真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拓俊京是他的支持者之一，他以武力为李资谦作后盾。这样，凭借手中的政权，李资谦及其同党通过巧取豪夺扩大了私有土地和财产，进而确立了在高丽社会的经济垄断地位。

利令智昏的李资谦深信“十八子”（他的姓）为王的预言。于是萌生了废黜仁宗，僭取王位的野心。为了挫败这一阴谋，仁宗及其亲信大臣拟订了剥夺李氏权力的计划。可是，由于拓俊京迅速采取了军事对抗，国王的预谋失败了，结果仁宗遭到软禁，而他的亲信则被处死（1126年）。在获得胜利后，李资谦更加骄横地炫耀自己的权力，甚至谋杀国王。但在1127年，他本人被见机行事的拓俊京撵下台后遭到了放逐，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曾经不可一世的仁州李氏的权势就这样顷刻瓦解了。

妙清的叛乱

李资谦事件证明了王权的式微和贵族的潜在势力。因此，当这场严重危机一过去，仁宗就打算采取一系列恢复王权的政治改革措施，他在1127年发布的15点政令中勾画出这项计划。这个时期也是外交上多事之秋。女真建立了金朝（1115年），正不断对高丽施加压力。就在这个时期，平壤有几个人试图利用国内外的混乱局势攫取权柄，其中最著名的是妙清和尚、白寿瀚和郑知常。

妙清催促仁宗放弃开城（开城的王宫已被李资谦焚毁），迁都平壤，为此目的，他利用了风水地理理论。妙清争辩说开城地气已衰，平壤却生气勃勃，断定平壤可以使王朝复兴。这样一旦王朝复兴论功行赏，妙清便会处于掌权的地位。在妙清的一再催促

之下，仁宗决定在平壤附近营建大花宫，该宫于 1129 年竣工。妙清及其支持者进一步建议国王在平壤建都，自定年号，称其军队为天遣忠义军。他的根据是只要迁都平壤，地形有利便可以保证大业成功。

妙清及其周围人可以称作平壤笃信风水地理说的排外派，他们的主张遭到以金富轼为代表的开城儒教亲中派的攻击，前者的迷信活动成了后者尖刻指责的口实。起初，妙清对深受李资谦谋反所扰的仁宗颇有影响力，但是当开城方面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使他不能如愿地左右国王时，妙清便决定付诸武力。他在平壤发动叛乱，其短命的王国为大为国，定年号为天开元年，称其军队为天遣忠义军（1135 年）。但在次年初，金富轼统率的官军攻陷了平壤，妙清叛乱被镇压下去。

第七章 武臣统治

第一节 武臣的掌权

武臣叛乱

高丽贵族统治依据的是文尊武卑的原则。武臣在政治上品级低于文臣，在经济上待遇也较低。甚至原则上应当由武臣担任的武职也让给了文臣。著名的姜邯赞(948—1031年)作为抗击契丹的军事指挥官而扬名，但他却不是武官出身。尹瓘(?—1111年)和金富弼(1075—1151年)也是如此。总之，武臣是文臣歧视的对象，也是文臣利用的目标。就是因为这一缘故，早在1014年，象崔质和金训(这二人都在抗击契丹中屡建战功)这样一些心怀不满的武臣就发动过政变，而且取得了初步成功。

在毅宗(1146—1170年)统治下对武臣的虐待变本加厉了。正是这位君主要用他对宁静艺术的爱好来反映那个时代的安宁。毅宗建造了许多亭子，取名“安宁”、“怡乐”、“达美”，在亭子周围还开凿了荷花池、雕塑了假山以供观赏。他一心追求骄奢淫佚的生活，几乎完全不顾及朝政。追随他的文臣当然也能分享余沥。但许多被派去保卫国王及其亲随的军人待遇却很糟。不光是普通的士兵，甚至连令人敬畏的指挥官们也被派充当武士。武人还受到文臣的侮辱。在一起有名的事件中，金富弼之子金敦中用蜡烛燎着了一个名叫郑仲夫的武臣的胡须，韩赖竟然痛殴大将军李绍膺的面颊，这

种无礼行为激起了1170年武臣的叛乱。武臣发动叛乱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问题只是发动要有新的借口。

武臣叛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职业军人经济地位恶化。已经指出，作为服军役的人，职业军人的生计是由政府赐予的土地来保证的。不过，这是法令所规定的，实际上很少进行这样的土地分配。相反，连他们分到的土地也被拿走，重新分配用来支付官俸。这些职业军人不仅战时要服役，和平时期也要服劳役，因此被认为比苦力好不了多少。有时，他们的境况变得很坏，许多人干脆便逃走以规避劳役。他们的不满已经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武臣叛乱爆发于1170年毅宗在位的第24年。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人在奉命护送毅宗巡游开城外的普贤院时趁机煽动哗变，高喊：“处死所有穿文官袍的人！”由于官兵上下齐心，叛乱很快便成功了。武臣撵走了毅宗，拥立其弟明宗为王（1170—1197年）。在叛乱过程中，毋庸赘述，冒犯过武臣的金敦中、韩赖和其它文臣都遭到了杀戮。三年以后，金甫当图谋使毅宗复辟的尝试失败后，他在临终前供认说所有文臣都参与了这场预谋，这又给早先幸免于死的文臣们带来了杀身之祸。后来，赵位宠和其它人试图用武力驱逐开城军事政变集团的努力也都告以失败。政权就这样从文臣手中转移到武臣手中。

武臣内部的权力斗争

在夺取权力后，武臣通过重房这一最高军事机构来处理政务，他们力图对上自最显赫的职位下至官僚最底层的所有政府职位实行武臣垄断。像以前的文臣一样，武臣也利用职位扩大私有土地，控制国家经济资源。在赢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后，他们马上将家

丁家奴武装起来，发展私人武装力量。在这个时代主宰一切的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这与文臣统治的高丽初期看重显赫的家世背景截然相反。这样，成功地攫取政治权力已不取决于与王室联姻而取决于可以聚集多少现有武力。结果，权力便一次又一次地从一个军事强人转移到另一个军事强人手中。

起初，政治权力在郑仲夫、李义方和李高这三个武臣叛乱的领导人之间分享，他们利用重房会议联合作出决定。但不久李义方杀死了李高，又通过将女儿嫁给王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势。旋即李义方又被郑仲夫一派所杀。这样郑仲夫便独掌大权，变得愈加专横跋扈，直到1179年被年轻的将领庆大升剪除。暗杀郑仲夫造成了一种使各级军人明显不安的气氛，这些人把庆大升（贵族出身）视为共同的敌人。庆大升意识到这种敌视的危险，便创建了一支包括几百名精兵的队伍（都房）以自保。但不久，庆大升终于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患病死去。他死后，李义旻从他隐居的乡间住所返回，夺取了权力。出身奴隶的李义旻实行了极其强暴的统治，直到1196年他被崔忠献和崔忠粹兄弟所杀。在这25年里，军人像走马灯一般接连出现在舞台上，执掌一阵权力便又消失了。崔忠献的上台标志着这几十年混乱的终结。

崔忠献执政

武臣叛乱大大地改变了高丽历史的进程，因为它导致了军事统治的确立。政治权力转移到武臣手中使高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武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奴隶起义是这混乱的几十年间的主要现象。崔忠献（1149—1219年）控制了局势，他出身军人，在平息赵位宠叛乱中受到重视，于是脱颖而出。在逐走李义旻后，他继续清

除那些违抗命令的人，即使这些人可能是自己的支持者。其弟崔忠粹和外甥朴晋材也在这一强化权力的牺牲者之列。这样，在镇压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对者之后，他最终成功地确立了个人独裁。

他也使王权变得软弱无力。在短短的十六年间，他废黜了两位国王，明宗和熙宗，拥立了四位国王——神宗（1197—1204年）、熙宗（1204—1211年）、康宗（1211—1213年）和高宗（1213—1259年），国君完全受他的控制。《高丽史》的神宗评传记载了这一事实：

“神宗被崔忠献扶上王位，一切生杀予夺都掌握在崔的手中。神宗徒有空权地站在万民之上。呜呼！他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崔忠献既保留了王室和君主，又事实上自行处理着政务，其原因无疑在于他不可能清除世袭贵族传统对高丽社会的强有力的影响。他与李义方和崔忠粹不同，并不想像过去文臣那样与王室联姻来提高自己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目的。

崔忠献也利用自己的力量破坏佛教寺院的权力，寺院是与国王和文臣密切联系的仅存的后备军。确实，有几次数千名武装僧众涌入开城，企图推翻武臣统治。但崔忠献迫使佛教住持特别是那些已入佛门而没有合法身份的王子离开京城。他用武力粉碎了武装僧众。

崔忠献也扑灭了威胁其统治稳定的农民和奴隶起义。在用武力平定了这些叛乱后，他还采用了安抚政策。对某些领袖人物，他授予官衔，他释放了部曲、乡和所这些强制劳动区的贱民，并把这些行政单位并入常规的县制。贱民和农民的起义便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平息下去。崔忠献倾其毕生的努力奠定的崔氏王朝的基础，经由其子崔瑀（也称崔怡）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后者完成了武臣统治的建置。

第二节 农民和奴婢的起义

人民起义的爆发

农民放弃土地过流浪生活的趋势在 12 世纪初睿宗(1105—1122 年)在位时便已出现。这种现象在开城周围地区和西海道尤为严重,显然是因为这个地区为中央贵族的利益负担的赋税和劳役过于苛重。这些漂泊无定的农民不时结成帮伙骚扰地方。于是,在一个早已动荡不宁的国家,武臣叛乱带来的社会剧变现在进一步把农民煽动起来,在武臣叛乱之后,出身低贱的人跻身于高贵已司空见惯。因此,在全国许多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不足为奇了。

在武臣统治下第一起这样的人民起义于 1172 年发生在西界(平安道)和昌城、成川、铁山等地区。由于这是军事区,居民实际都是士兵,武臣叛乱也使他们深受鼓舞。不过,他们之所以起义,还是出于对地方官员高压行为的义愤。此后,赵位宠的余部在农民支持下,在妙香山掘壕固守,一直骚扰了许多年。

南部地区的农民起义由于 1176 年鸣鹤所强制劳工区发生的亡伊和亡所伊的叛乱而迅速蔓延,叛乱者打败了公州的驻军,在向直趋开城的行军中占据了清州和乐山地区,但在据守了一年多后,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几年后于 1182 年,在全州爆发了士兵和官奴的起义。全州士兵矛头指向残暴不仁的地方官吏,在他们的高压下,士兵们被驱使去造船。由于官奴迅速加入,他们占据了城市四十多天。同时,在国内的许多地方也接连爆发了多起小的起义。

这些早期的人民起义总的说是自发的,都是由士兵、农民和奴隶反抗地方官吏及其爪牙的压迫而引起的。反叛的目的只是为了

摆脱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可能也希望解除高丽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卑贱身份,不过,这不是主流。形势还没有发展到可能联合其它社会底层的人谋求共同解放的地步。

人民起义的蔓延

金沙弥和孝心于 1193 年揭竿而起,人民起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两支反叛队伍能够联合起来,结成一个统一战线,而且反叛已发展成持久的势头。开始时金沙弥在清道、孝心在北庆尚道附近的某处(一般认为是现在的蔚山)分别起义,但后来他们汇成人数上万的一股力量。派去平定叛乱的指挥官遭到挫败后被杀身亡。直到来年官军才在密阳之役中赢得了胜利,这样便削弱了起义军的实力,叛乱者在密阳一战中就死亡了七千余名,仅从这一事实便不难想象这场反叛的规模。

此外,1199 年在溟州(江陵)起义的农民军在加入庆州一支义军的途中攻陷了三陟和蔚珍。1200 年,晋州的起义奴隶联合在陕川暴动的下层农民共同起义。1202 年在庆州起义的叛军以复兴新罗为战斗口号,与清道、蔚珍和其它省的叛军共同作战。这样,在庆尚道地区,叛军之间的这种密切合作使他们有力量将斗争持续了十多年。到此为止,高丽掀起的大规模叛乱显然目的不仅在于重建社会秩序,而且在于夺取政权。

这些起义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开城。崔忠献掌权后仅两年,于 1198 年便发生了万积暴动。这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城所有奴隶都投入了并且公开要求解放和夺取政权。虽然,起义实际进行之前就已暴露失败,但它因万积在开城召集官私奴隶的大会上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讲而著称于史。万积说道:

“自从 1170 年和 1173 年的事件以来奴隶阶级中间已经涌现了许多高官显宦。难道将相生下来就该享有这些荣誉吗？不，一旦时机到来，任何人都可以担任这些官职。那么我们为什么只能做工到死，在鞭笞下受苦呢？……如果每个人都杀死他的主子，把他的奴隶身份簿烧毁，从而结束我们国家的奴隶制，那末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将相。”

这些人民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但它们仍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他们证明高丽社会秩序的基础本身已经动摇。直接肩负经济生产重担的大众表达了要求改善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而且他们选择了一条行动的路线，这将保证从政治上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回应，首先包括解放奴隶阶级，还有就是彻底修改等级身份制度。他们的运动不会不影响政府的政策，更直接的后果是广泛建立监务制和取消特别强制的劳工区。武臣叛乱不仅把新的统治集团推到权力顶峰，而且在高丽社会低层引起了巨大的变化。

第三节 崔氏武人政权

私人武装的建立

作为军事统治者，崔氏家族的权力依赖其私兵的实力。在武臣叛乱后的几十年里，有权势的军事人物通过武装其门客、家奴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这些门客像欧洲封建制度中他们的同类人一样对强大的领主极尽忠诚，在高丽，他们在主子的恩荫下甚至可以进入官府。私人卫队由门客任官佐、家奴充当士兵首先是在庆大升的都房私人警卫中成为制度规定下来的。崔忠献的私人卫队即按这种模式组建，他将私兵分成“六班”，轮流让每班守卫其宅第，后来扩充为“三十六”班。这样，崔氏私人武装较之庆大升的一百来人的

私人卫队不知大多少。结果，正规武装削弱了，也不再起作用，因为大多数健康男人已加入崔的卫队。除这支基本力量外，崔瑀组建了一支号称“马别抄”的骑兵。虽然“马别抄”不过是崔的私人武装的一部分，但似乎特别负有庆典仪仗之责。

三别抄(三支精锐巡警)为崔的统治提供了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它起源于崔瑀为禁止青年无赖的打家劫舍行径而建立的“夜别抄”(夜间巡警)，已经发展成一支军事力量。随着其人数增加，夜别抄分成了左、右两部，后来又将与蒙古作战中被俘后逃跑的兵士编成一队，取名“神义军”，这三支力量合在一起称“三别抄”。与崔忠献的私人卫队主要任务为保护个人安全不同，三别抄行使的是治安警察和战斗部队的公共职能。组建以上各部来接管这些职能清楚地表明，当初行使这些职责的正规军“六卫”已名存实亡。为了取代六卫，现在崔氏而不是某个适当的国家机构创建了三别抄。因此，虽然三别抄仍由公费维持并负有公共职责，但实际上无异于崔氏的另一支私人武装。当军人统治覆灭之际，三别抄也随之被废除似乎便证明了这一点。

武臣集团的私有土地是这些私人武装急剧膨胀的经济基础。私有土地在贵族统治的全盛时期已开始扩张，武臣叛乱后，武臣侵占了文臣的土地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明显。武臣派家臣和奴隶用武力夺取他们看中的土地，并直接征收粮食税。对崔氏而言，整个晋州地区实际上都被划成他的私产，全部岁入都取自于该州。这样，崔氏作为高丽武人统治者所享有的财富与权力的缩影，得以积聚盈仓溢库的粮食，以致他们可以靠自己的私产付给官员们以空荡荡的官仓所不能提供的薪俸。这巨大的财富便构成崔氏豢养的私人武装的经济基础。

崔氏执政时期的统治机构

重房是武臣叛乱后武臣用来进行统治的机构。这一联席议事机构包括全体将军和大将军，无疑是适于反映军事统治者意愿的一个工具。不过，在武臣激烈倾轧过渡到崔氏专制统治的这段时期，重房由于毕竟是武臣联合统治的工具，因而逐渐受到冷落。取而代之，崔氏设置了一些更适于自己独裁的新的统治机构。

崔忠献接受了国王所册封的晋康侯称号，还设立了兴宁府作为官署。封侯授爵和设立官署使崔氏的军人统治具有了正式的合法性。但崔氏幕府的最高机构看来是“教定都监”。直到武臣统治崩溃，这个机构的首脑职位一直是由实际掌权的军人来把持的。继崔忠献首创该机构后，其后裔崔瑀、崔沆、崔珪以及武臣统治的最后岁月攫取权力的金俊、林衍、林惟茂和其它人都轮流执掌过教定都监。崔氏发布征税或调查官员失职的敕令都是以该机构长官的资格做出的。在形式上，这一职位由国王授予，但实际上，在武臣统治时期谁掌握了权便自动拥有了这一最高官职。

崔氏不同于他以前的那些军事强人，他不甘心充当仅有军权的一介武夫。作为高丽权力的最高主宰者，崔氏在其私宅设立了政房来处理官员任免升迁。创立这个机构的是崔瑀，当然早在这之前崔氏在这类事务上就已经有权作主了，不过确实到这时才实现了制度化。这也表明武臣统治已经相当稳定。文职人员依附于这个机构——“政色承宣”称号似乎就是授予这种人的——从中可以看出政房在军事统治机构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一设施为文臣逐渐重登权力岗位铺平了道路，也有助于解释政房为什么在其创建者复灭后仍单独继续存在。

与文臣所起的作用有关，也应当提一提书房的存在。书房也是崔瑀设置的，由其家臣中的文人组成。据说分成“三班”，轮流当

职,所谓的政色承宣很可能便是从书房的成员中挑选出来加以委任的。这样在崔氏周围不仅有都房警卫和三别抄的武人所组成的卫队护卫,而且也簇拥着一帮文臣。这表明,作为武臣,崔氏不仅热衷于军权,而且准备在文武两个领域都实行全面的统治。总之,崔氏已经成为文武两班的统治者——实际上,在十三世纪的高丽操纵一切政务的正是两班。

第四节 对蒙古的抗争

武人政权对蒙古的抗争

蒙古人是一支游牧民族,崛起于亚洲中北部的干旷草原地带。在它南部的农业民族所生产的财富自然激起了它的贪欲。于是,金、宋和高丽便成为蒙古侵略的主要目标。在打败金以后,蒙古为将其征服带延伸到高丽找到了又一个原因——其目标在于确保有一个征服南宋和日本的基地。

高丽与蒙古的首次交往始于他们通力合作击溃从满洲越过鸭绿江以逃避蒙古人的一支契丹残军。当金受到蒙古的不断进攻时,契丹趁机宣布独立,但是,金的都城于1215年陷落后,契丹在蒙古的压力下被驱赶到高丽境内。在高丽北部造成两年多的骚乱之后,契丹在江东城设立了一个据点,不过很快便向蒙古与高丽的联军投降了(1219年)。这一事件之后,蒙古便自封为高丽的恩人,开始每年收取贡税。但是,蒙古人诛求太苛,有几次都遭到高丽的拒绝。这是双方关系出现裂隙的直接原因。不久,1225年蒙古使臣著古與在从高丽返回途中被杀,蒙古最后便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借口于1231年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一次入侵。

撒礼塔率领的蒙古军在龟州遭到朴犀的顽强抵抗,只得放弃

对该城的围攻，向首都开城逼进。高丽要求媾和，蒙古人便将其军事长官达鲁花赤留在朝鲜西北部，而后撤出了军队。但崔瑛决定对蒙古人进行抵抗，于是在第二年（1232年）将都城迁至江华岛，采取这一行动是利用了蒙古人有怕海的弱点。在统治阶级进入江华岛的同时，一般百姓则躲到山寨或沿海岛上避难。高丽抵抗蒙古人的决心导致蒙古人的进一步侵略。诚然，1232年下半年撒礼塔在处仁城（龙仁）战役中死于僧人金允侯之手时蒙古军再次撤退了，但后来蒙古人的攻势像以前一样。在三十多年间，蒙古总共对高丽发动了六次入侵。

对于站在大陆山丘上的人来说，江华岛的海岸线隔海可见。然而，蒙古人却只能隔着这道狭窄的海峡观望，呼喊高丽守军到陆地上来。高丽人的反应是，蒙古人先撤兵，他们就出来。而蒙古人答复说，高丽人先回大陆他们则撤军。这种夹杂着互相辱骂的交涉毫无结果，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崔氏家族决心继续抵抗。只要他们矢志不渝地抵抗，蒙古人就几乎不可能占据江华。

同时，以江华岛为避难所的统治者们能够继续他们的享乐生活，几乎与在开城没有两样。他们似乎把京城的一切设施一样不缺地搬到了这座岛上。宫殿、官邸、庙宇、马球场应有尽有，连每年的大庆，像八关会和燃灯会也跟从前一样热闹。之所以能够盛况如昔，是因为用船舶沿着安全的海岸线运来的岁入数量差不多也跟从前一样。

农民的抗争

起初，武臣政府抵抗蒙古人是在农民和贱民的支持下进行的。在第一次蒙古人侵时，在冠岳山兴起的一支游击队，参加了反击蒙

古敌人的战役。在池光守领导下，忠州奴隶军的抵抗尤为著名。他们坚守城池奋战到最后，虽然贵族官员全都逃走了。

在迁都江华的同时，武臣政府命令农民躲藏到山寨或沿海岛屿上。这些地方成了反击蒙古人的基地。蒙古人战胜不了这些据点的顽强抵抗，于是采取了破坏政策，将成熟的稻田付之一炬，从而造成了粮食供给短缺，使农民陷入严重困境。不仅如此，一旦山寨落入蒙古人手中，抵抗者的力量消耗殆尽，征服者便进行血腥的屠杀。1254年车罗大的侵略造成了惨绝人寰的浩劫。据说，这次蒙古人仅掳走的俘虏就达200,000人，死亡者更是无以数计，蒙古人所到之处都被夷为废墟。人口锐减，村落萧条。这期间许多稀世的文化珍品毁于一旦，其中杰出的有庆州皇龙寺的九层木塔及二百年前产生、珍藏于大邱符仁寺内的木版活字大藏佛经。

由于乡村荒芜，农民的生活日益困苦。然而在江华岛上的政府当局不采取保护农民的积极措施，反而加重课征，致使情况更加恶化。贵族的横征暴敛不仅激起了农民对统治者的仇视，而且还挫伤了他们抗击蒙古人的意愿，这种使人民离心离德的做法只能给江华当局带来严重恶果。

武人政权的没落与对蒙古媾和

崔氏在农民的支持下抗击蒙古，但现在他们的支持削弱了，武臣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能否克服这场危机将决定政府能否存在下去。出于对佛力的虔信，政府着手重刻了另一部木版大藏佛经。这就是以精美著称的高丽大藏佛经，至今仍收藏于大邱附近的海印寺。政府还焦急地向天地神祇祈求。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在国王特别是文臣中间放出与蒙古媾和的风声。

以上说过，崔氏开始曾经利用过文臣，但后来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现在文臣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听取他们的呼声。他们一开始就对迁都江华持相反的意见，迁都以后仍利用一切机会敦促议和。文臣提出的与蒙古议和的政策直接关系到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的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目标在于通过与蒙古人议和来遏止武臣势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和平，而为了实现和平，就必须把那些鼓吹继续抵抗的军人统治者搞下台。因此，文臣与一部分武臣串通起来，发动了一场既是倒崔也是求和的运动。

最后一个崔氏独裁者崔谊于1258年被文臣柳璈和武臣金俊暗杀。权力暂时回归国王，并做出了与蒙古人议和的决定。翌年，太子（稍后的元宗）亲临蒙古，转达了高丽求和的愿望，为了表明终止抵抗，江华岛的城垒也拆除了。

然而武臣仍不乐意与蒙古议和。虽然金俊是带着当时流行意见要求他不要为实现和平从中作梗前去议和的，但他本人对和平政策并不热情。稍后林衍杀死金俊接管了权力，反对议和便逐渐公开化了。最后，林衍废黜了奉行亲蒙政策的国王元宗。上述事件表明，推行抵抗蒙古的政策与延续武臣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是，与蒙古睦亲则意味着高丽屈从于蒙古的干涉，同时国家一盘散沙再也不能用抵抗政策把民众集结起来。不久在蒙古的压力下元宗便复辟了，应他的请求，蒙古军队开赴进来。在这种形势下，由于王室总管暗杀了林惟茂（林衍之子，在其父死后掌权），从而最终结束了崔氏下台后苟延残喘的武臣统治。同一年（1270年）高丽返都开城，完全放弃了抗蒙斗争。

三别抄的对蒙抗争

以上说过，三别抄是武臣统治的军事基础。他们用突然袭击和

骚扰战术与敌军周旋，也站在反蒙抗战的前列。三别抄是武臣统治的支柱，抗蒙的核心力量。因此，当武臣政权被推翻，拟定与蒙古和平条款时，他们义愤填膺。还都开城的政令一宣布，三别抄便立即起义，在裴仲孙的领导下，首先封锁了江华岛与内陆的所有通道，推举王族承化侯王温为王，建立了政府，任命了官员，这样便创建了一个与开城政府对立的反蒙政权。

江华岛诚然是四十多年来开展反蒙抗战的基地。但现在的形势不同，元宗政府在开城与蒙古人勾结起来。三别抄必须有一个开城当局鞭长莫及的永久性活动基地。起义者往南来到半岛西南端的珍岛。在那里他们不仅建起一套规模宏大的宫殿，准备了京城要用的其它设施，而且还将邻近的岛屿和毗邻的海域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样便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海上王国。

不过珍岛于1271年中在高丽——蒙古的联合进攻下陷落。领导人几乎全部丧生。幸存者在金通精的率领下逃到济州岛继续抵抗，但济州岛也在1273年失陷，从而结束了近四年的叛乱。三别抄艰苦卓绝的斗争确凿地表明高丽军人反抗蒙古人的意志是多么坚强。

第五节 武臣时期的文化

散文故事和叙事诗

武臣掌权时，文人只有放弃出仕的想法，而别无选择。有些文人隐居山林，在那里饮酒赋诗以度时光。如吴世材、林椿、李仁老（1152—1220年）一伙人，他们将自己比作3世纪中国的竹林七贤。还有一些文人试图通过向他们开放的途径先当崔氏家臣，再谋求官职。李奎报（1168—1241年）和崔滋是这一类人中的两位杰出

代表。不过他们在政治上的晋升也受到一些限制，在这方面，倒是与那些完全逃避为政府服役的人境遇相同。

这两个集团于是结成了一个文学团体，散文故事成为他们共同表达的文学样式。例如，林椿的《孔方传》、李奎报的《魏先生传》、李穀(1298—1351年)的《竹夫人传》等，在这些故事中日常的事物被拟人化了。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和崔滋的《补闲集》则代表另一种风格，是奇闻轶事、诗词小说、随笔短论的荟萃。这个流派的文学先驱可以在朴寅亮(? - 1096年)的《殊异传》这部故事集中找到，但这种写法在武臣统治时期广为流行，后来影响了李齐贤(1287 - 1367年)的《栎翁稗说》一类作品。

谋求与一个好战邻国和解而蒙受的创伤激起了高丽民族个性意识的高涨，这种情况在当时文学作品中自然得到了反映。李奎报的《东明王》篇(东明王是半传奇性的高丽创始者)就是以叙事诗的形式表现这种民族意识的例证。李奎报声称他写作此文的目的“只是让世界了解我们国家历来是英雄和圣贤之邦”，换句话说，高丽是一个可以因其人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素养而自豪的国家。

曹溪宗教派的建立

在武臣掌权后，高丽佛教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禅宗的曹溪宗教派的建立。义天和尚鼓吹禅宗与教宗的统一，但他更重视后者。他在高丽成立了天台宗时吸收了禅宗九山派的许多有前途的年轻僧人，却没有将禅宗经文收入他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在武臣统治的某个时期，禅宗九山派被改名为曹溪宗，不久，在形势的配合下，便出现了该派兴盛发展的局面。

在曹溪宗教义的广泛传播上，知讷高僧（1158—1210年）亦即普照国师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将南全罗道的松广寺变成了传播其禅宗新方法的根据地。知讷以“顿悟之后需要渐修”作为自己的基本宗旨。“顿悟”意味着对人心即是佛心的醒悟，而“渐修”意味着即使在醒悟后仍必须不懈地修养心智。这条顿悟与渐修的途径要求做到定慧双修，这是真正心智的两个方面。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静思是优先的，但口诵佛名和朗读经文也同样重要。换句话说，与义天不同，知讷鼓吹将禅宗放在首位的那种禅宗与教宗的和谐。包含知讷这一观点的朝鲜曹溪宗教派在直觉国师（惠谔，1178—1234年）这样杰出的继承者的主持下继续得到了发展。曹溪宗教派在武臣统治结束后兴盛起来，这意味着高丽佛教发展已经本土化。朝鲜的曹溪宗代表对佛经教宗学说已树立的权威的挑战，它宣称按照佛经的教义人在现世便可以积善受益。它也是对迎合王室和贵族文臣的世俗佛教的一种否定。这样，在武臣统治的有力支持下，曹溪宗在朝鲜各地的山间寺院中作为佛教信仰和实践的一支独特流派而不断地发展。而且，由于曹溪宗着重于心性修养，便为不久接受新儒教而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八章 士大夫的出现

第一节 亲元政策与权门势族

投降蒙古

与元朝(蒙古于1271年建立元朝)媾和后,高丽经受的第一个严峻考验是被迫参与蒙古对日本的远征。在一个时期元朝通过高丽这个中介力图促使日本正式承认它的主权。蒙古统治者显然主要是出于以下战略考虑,即**通过日本进攻中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蒙古的霸权,以瓦解抵抗的南宋王朝**。在元的要求下,高丽至少被迫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与蒙古军一道出征,但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一个原因当然是蒙古人生来不适应朝鲜和日本海上的夏季气候。不过,同时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如当时在日本掌权的镰仓幕府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至于高丽也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参加侵略战争。这两次入侵都由高丽负责建造战船和供应给养,这样就给已因30年反蒙抗战消耗殆尽的高丽农民带来了不堪忍受的重负。

然而,在高丽官员们的坚决反对下,出征日本尽管对高丽来说是极度痛苦的经历,但毕竟是短暂的阵痛。更重要的是与元朝关系引起的高丽自身结构所发生的一些有害变化。为了加强高丽的王权,元宗**遣其子**即后来的忠烈王迎娶元朝的公主。元朝皇帝在采取亲善政策后同意了这一要求。忠烈王于是得到了元世祖皇帝的

一个女儿为妃，此后高丽国王连续几代都以元皇室的公主为主要配偶，而这些后妃所生之子都正式地继承了王位。这样，高丽便成了元的“女婿国”，蒙古皇室的属地。后来高丽王太子在登基前作为人质留在北京便成了惯例。甚至在继位后他们也经常访问北京，而让在开城的王位空着。在蒙古时期，高丽国王开始采用蒙古姓，梳蒙古发式，穿蒙古衣服，用蒙古语言。两国的王室已变成了一个家族。

高丽国王现在不再是他的王国的独立的统治者，而成了元皇室的女婿，~~在元朝皇室中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他可以利用这一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权威，但这一小小的得益是以高丽王室蒙羞受辱为代价的。汉字的“祖”和“宗”再也不能用作国王死后的“庙号”。在使用“王”这一汉字时，还要加上“忠”字作为后缀，以表达高丽国王对蒙古元朝的效忠。与国王和他的活动有关的其它所有用语也都相应地降级了，如王的第一人称，对国王的称颂方式，对王太子的称谓，王室敕令的名称等。而且，有几次元朝竟决定了高丽王位的继承，将一位王废黜掉而扶植另一位来代替。还有几次高丽贵族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伙同蒙古人策划将一个国王赶下王位。在这种情形下，王权在高丽政治中变得更软弱了。

高丽的政府机构已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三省被并成中书省这一机构，枢密院改名为密直司，这表明其重要性下降了。六部不仅名称改了，而且重新作了建置。吏部和礼部被合并为典理司，户部变成版图司，兵部变成军簿司，刑部变成典法司，而工部则被撤消了。以上机构的重建和易名具有与贬低和国王有关的术语相同的贬抑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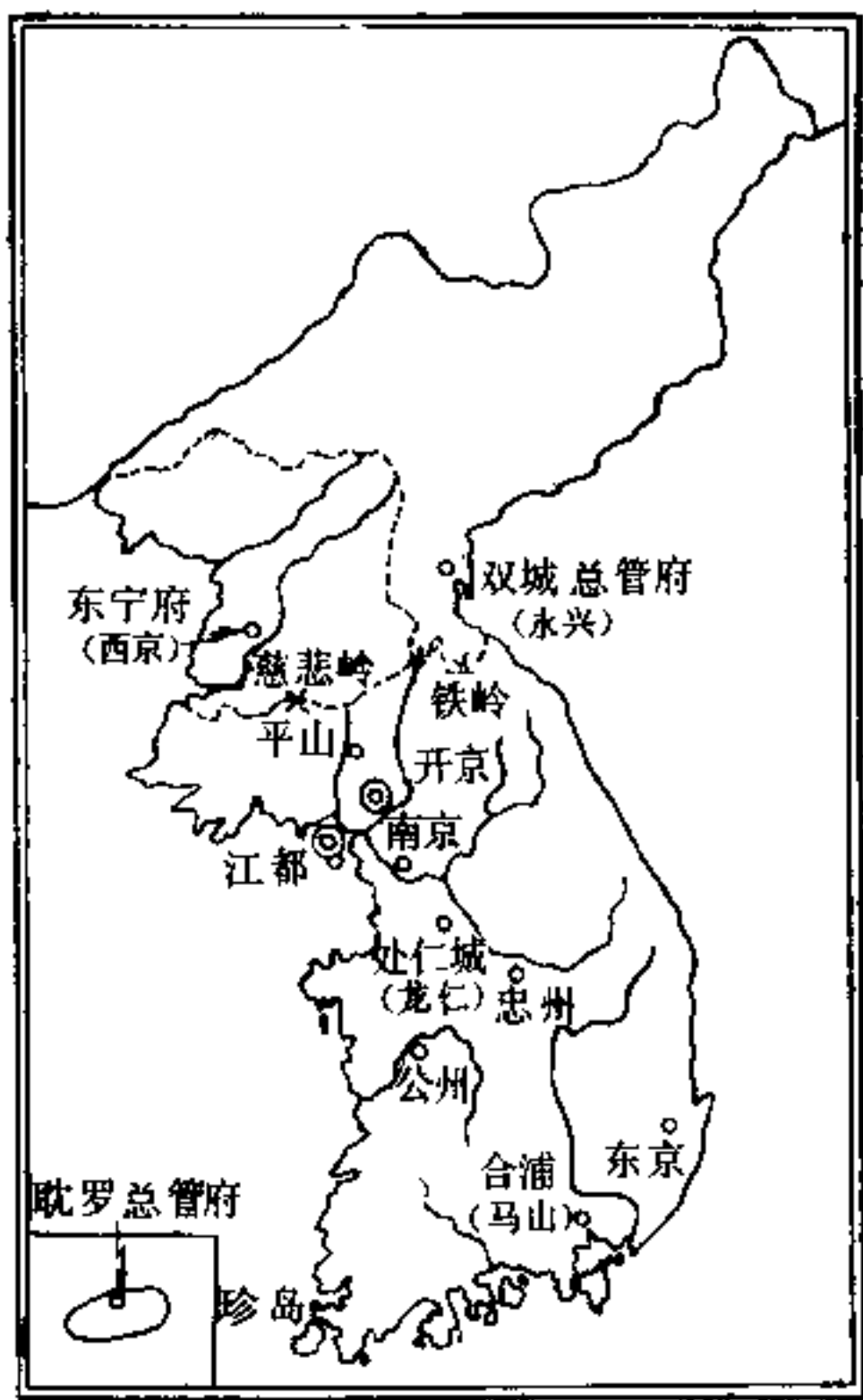
发展与元朝的关系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高丽王室一直将它的独立国家主权统治者的地位维持到最后。这是武臣政权进行反蒙抗战的遗产。元朝确实庆幸一个顽强反抗它达 30 多年的国家竟然和平地归顺了。这样，元朝方面对朝鲜严加管束，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安抚高丽人的感情。高丽与元朝的关系便一直是在这种压制与安抚并存的背景下发展的。

蒙古人于 1280 年在朝鲜设立了征东行省以进行第二次征伐日本。甚至在完全放弃征服日本的念头以后，这个机构仍继续起作用。高丽国王自然被任命为该机构的首脑，冠以左卿的头衔，有权任命下属官员。因此，征东行省只是高丽与元朝之间联系的一条渠道。不过，元朝偶尔也企图通过征东行省干涉高丽的内政，在蒙古的阔里吉思出任该机构的要职时便发生过这类事件。但是由于高丽的反对，他想发布政策的企图没有得逞。此外，高丽叛徒发起的废除高丽王国、直接归附元朝成为它的一个行省的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然而，高丽版图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元的直接控制之下。咸镜道的双城总管府、平安道的东宁府和济洲岛的耽罗总管府都是元朝为管理这部分地区而设置的机构（见图，第 136 页）。双城总管府设在现在的永兴，铁岭以北的领土都归它管辖；东宁府设在平壤，管辖慈悲岭以北的地区；耽罗总管府设在济州，管辖蒙古人在那里设立的广大牧场。应高丽的请求，后两部分领土不久转为高丽控制，而双城总管府则一直保留到 1356 年恭愍王用武力光复这一地区。结果这成了明朝设立铁岭卫引起种种纠葛的起因。

元朝在经济上对高丽的征课也使这个饱受长期战乱之苦的国家不堪忍受。元朝巧立名目要高丽提供金、银、布帛、粮食、人参和



高丽、元关系图

猎鹰。更有甚者还向高丽强征年轻妇女和太监。对猎鹰的需索尤其带来了种种弊端，因为许多猎鹰训养人依靠蒙古的势力享受着各种特权。所有这些负担归根到底都落到农民头上，他们不得不承受元朝和自己政府的双重剥削。结果许多农民离乡背井四处流浪。而拥有大量田产的高丽统治阶级则将这些流民聚集起来，使他们成为农庄的劳工。久而久之，蒙古人便将

这些富有资财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无权的王室当成了增进元朝利益的更可靠的工具。

在高丽与元朝之间出现的另一个政治问题是与所谓的沈阳王有关。在满洲生活的高丽人由他管辖。忠烈王作为太子留在元都时便被封为沈阳王，而后忠宣王放弃了王位住在元都，他也接受了同样称号。任命高丽王族为沈阳王的原因不仅在于容易控制在该

地区生活的高丽人，而且有利于维持蒙古对高丽本身的控制。结果，不足为奇造成了沈阳王与高丽王的对立。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忠宣王的侄子王嵩与他的继承者沈阳王之间、忠肃王与忠惠王之间都为继承高丽的王位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两王之间的火并显然是元朝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

权门势族和农庄

随着元朝在高丽影响变得愈来愈明显，在元朝的庇护下高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势力。有一些人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为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升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时作战英勇，曾接受像“万户”这样的赏赐。诚然，当有些家族在武臣统治时期声望日隆时，还有些家族仍保留着高丽早期以来的权势，但是在蒙古人的卵翼下滋生的新势力即所谓权门势族的出现毕竟给高丽后期社会带来了新的局面。这是因为这些权门势族凭借他们无限增殖的私人财富，贪婪地占有了整个统治阶级在统治进程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利益。

参与都评议使司这一政府最高议事机构审议的不仅有文臣武将，而且有了一些新的成员即这些权门势族的成员。结果，参与这一最高决策过程的人员由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现在的七、八十人。而且，这些人广有田产，奴婢数以百计，因而要求有更大的经济权力。原先的田柴科已经废除，政府便采用禄料田制来代替，并于1271年开始施行，而就在前一年已经与蒙古媾和并将京都迁回到

开城。但禄料田制是将京畿八县的土地分给现职官员，实际上对豪族利益没有太大关系。他们真正关心的经济问题是他们靠王室赏赐、新垦辟的土地以及巧取豪夺聚敛的那部分私人田产。私人土地已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农庄”这个用语是在武臣政权垮台以后才流行，而武臣统治时期权门势族的强权确保了他们享有课征税收的特权。国王直接控制下的大片土地也具有以上特点。高丽后期豪族的财产有一些是大片田庄，以山河为界，有的遍及全县，至于王室的田庄我们已知道，数目竟多达 300 个。

拥有这些田庄的权门势族是住在开城的不在地主，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财产。因此，田庄所有者只得派家臣或家奴去收租，在田庄耕作的有佃农也有奴婢，他们之中有些人是连同土地一起投献的，有些人是从流浪的农业人口中挑选出来的。由于完全侵占的情况很普遍，这倒像是一种靠强制的办法让农民接受的分成制。此外一个佃农要向几个主人交租的情况也有发展。因而，佃农常常宁愿成为奴隶，这样可以接受一位庄园主的保护。奴隶的这一新成分的情况与一般住外奴隶相似：他们获准拥有自己的财产，因而实际上仍是佃农。

私人田产的增长侵蚀着官方的土地资源，从而造成国家岁入的严重枯竭。结果，如果一个新上任的官员没有祖上传下来的私产，那么不管他官职多高，也只得过清贫生活。私人拥有的奴隶人口的增长也造成国家可以征发徭役的人数的减少。这反过来要求官府改派自己的官奴。总之，形势已严重到政府再也不能保证它为之服务的利益集团本身的共同福利了。

第二节 士大夫权势的上升

士大夫的进退

继贵族政府在武臣统治时期崩溃之后，出现了一个新官僚阶级，这就是士大夫阶级。他们不仅受过教育有知识，而且擅长管理政府事务。总之，他们是学者官僚、士大夫。在武臣统治垮台以后，他们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这些士大夫不是依靠世袭贵族后裔所仰仗的荫叙制，而是凭借学术成绩、通过考试来谋求政治晋升。同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武臣，这些人或是靠军功卓著或是通过购买来达到地位升迁，结果谋到了一个闲职便有了正式官阶。这个新兴武臣阶级的成员俗称“闲良。”

士大夫也出自于中央政府的员吏，但多数出自地方政府的乡吏。这种出身的士大夫是在本乡本土拥有薄产的中、小地主或独立的农民。靠自己诚实的劳动，他们开辟新的耕地或通过购买建起自己的产业。这些地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利用佃农和奴隶或是自己耕种土地来经营农出，所以用来称呼他们产业的“农庄”这个术语与作为不在地主住在京城的豪族所拥有的田庄在意义上大不相同。因此，这些士大夫鄙视那些在政府力量支持下靠不法手段获得大量田产的权门势族，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士大夫往往就个人来说是诚实正直的人。

这些士大夫亦即出身地方乡吏的农村地主也可能被擢升到中央机构里供职，退职后他们要返回本地生活。这些人并不害怕因为某些过失而被逐出京城，因为能回到家乡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要回到自己乡间的小田庄上，由于人数这么多，官府竟然对离开京城在京城外定居的官员们征起特别税来。最后，在

独立的农村地主中出现了士大夫，为高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恭愍王的改革

只要权门势族有元朝势力的支持，要纠正他们所造成的弊端便不会有成效。1298年忠宣王即位后第一年在词林院的青年士大夫支持下发动改革运动便是这样一次失败的尝试。结果很清楚，只要改革是在元朝对高丽内政干涉削弱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改革努力便可能取得某些成效。直到恭愍王（1351—1374年）即位才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此时元朝开始被新兴的明朝逐往北方。这解释了恭愍王的改革为什么有两个方面：对外奉行反元政策，对内努力镇压权门势族。

恭愍王撤除了元朝的联络机构征东行省，清洗了以奇辙（元顺帝的高丽后妃的弟弟）为首的亲元集团，恢复了往日的政府机构，出兵进攻元朝设在咸镜道的双城总管府，而后收复了高丽失去的领土。他在后几年里甚至派兵越过鸭绿江进攻元朝设在满洲兴京的东宁府。这些过份的挑衅性的行动当然引起了元和它的朝鲜追随者的反应。在高丽内部，金镛试图在兴王寺暗杀国王，而在元朝方面则宣称已经废黜了恭愍王。但是恭愍王挫败了反对他的阴谋，仍不妥协地推行其政策。1368年明朝一建立，恭愍王立即采取了亲明立场，交换了使臣。

在运用反元亲明外交政策的同时，恭愍王对内极力通过各项改革破坏权门势族的统治地位。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废除政房。政房在武臣统治时期已成为崔氏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甚至在武臣政权垮台后仍一直存在。它对人事实行控制，从而限制了王权的自

由运作，也妨碍了新的青年士大夫官员的晋升。恭愍王在统治后期，越来越宠信辛旽（和尚遍照）；任命他为国师，为他设立了特命全权首相这一非同寻常的职位，授权他进行彻底的政府重建。任命辛旽这个出身微贱的僧侣担任要职本身便表明政治改革只能在与权门势族毫无联系的人的帮助下进行。辛旽首先将李公遂和其它家世显赫的人撵走，任命一些与他们素无来往的人来替代。而后经国王的同意，他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田民辨正都监”，自己充任判事，开始着手将权门势族侵占的土地和奴隶归还原主，还将许多奴婢变为良人。这些行动自然受到全体民众的欢迎，辛旽甚至被奉为圣人。但他也激起了权门势族的敌视，最后在他们围攻下倒台死去。

不久，恭愍王也被杀身死。恭愍王是一个艺术素养高于政治才能的人，他胜任不了使高丽摆脱势力仍然可畏的权门势族控制的任务。

第三节 朝鲜王朝的建立

李成桂夺取政权

恭愍王在位时，高丽曾经两次受到来自中国的一支流寇武装的人侵，这支号称“红巾军”的武装力量于1359和1361年两次越过了鸭绿江。有一次竟占据了开城，迫使国王往南一路逃到庆尚道的安东。但这些都是短暂的袭扰，不同于旷日持久、影响整个国家的倭寇的入侵。倭寇从海上的侵袭早在高宗（1213—1259年）时就开始了，但在1350年后变得猖獗起来。虽然日本人的武装力量并不强，但他们从海上来去自如，可以任意在高丽海岸沿线登陆，任意毁坏乡村农田。结果，农民向内地迁移，沿海地区的良田沃野一

片荒芜。日本人甚至进攻京城的门户江华岛，使开城陷入恐慌。而且由于他们出没无定，海上交通陷于瘫痪，粮食再也不能依靠海运，地方的实物税也无法运到京城。这样贵族聚集的开城便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为了制止倭寇的进攻，高丽多次派代表到日本交涉，但是完全无用。日本当局本身就没有力量镇压他们。不过，崔莹和李成桂指挥的几次战役都成功地削弱了进攻者的实力。崔茂宣利用官方炮局生产的火枪摧毁了日本的船只，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朴葳于1389年还对海盗设在对马岛上的巢穴发起了直接攻击。这样日本入袭扰的事件便逐渐减少了。同时对日战役的胜利也提高了高丽军队统帅特别是崔莹和李成桂的声望。

但是在高丽对大陆的政策上，崔莹与李成桂之间发生了尖锐分歧。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从上一代起便在高丽争执不休。恭愍王之后王位由辛旽和一个奴婢所生的11岁的男孩继承，被称为禡王(1375—1388年)，他是依靠军队英雄与高级官员李仁任的支持继位的。李于是行使他的支配权，抛弃了恭愍王的亲明政策转而亲元。李成桂、郑梦周以及其它人都强烈地反对这一政策转变，指责这是严重的错误。

1388年初明朝宣布要设立铁岭卫时，这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仍悬而未决。由于铁岭是咸镜道沿海区南端的关隘，这就相当于明朝兼并了元朝双城总管府管辖下的整个西北地区。在这一危急时刻，李仁任集团被赶下台，崔莹和李成桂夺取了权力。听到明朝的宣布崔莹怒不可遏，决定进犯中国的辽东地区，经禡王同意后，在全国迅速调集了一支军队，不到两个月远征军便上路了，崔莹任统帅，曹敏修和李成桂任副帅。

但由于李成桂从一开始便反对远征，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

转折。他从鸭绿江口的威化岛撤回军队，矛头指向禡王和崔莹。在一场几乎未流血的政变中，李成桂解除了国王和崔莹的权力，亲自控制了政局。他就这样抓住了推翻高丽建立新王朝的历史瞬间。

私田改革

李成桂及其支持者诸如郑道传和赵浚等人还利用新得到的权力，以昌王（禡王之子，他在曹敏修的催逼下登上王位）是辛旽的孙子为理由将他赶下台，而拥立一名王氏王族的真正成员为恭让王（1389年）。然后，他们进行了一场由新兴的士大夫阶级鼓吹已久但迄今未能实施的彻底的土地改革。诚然，他们遭到了李穡为首的温和改革派的反对，但这个派别的成员已经从统治集团中被清除出去。士大夫改革鼓吹者基本上是新儒教的信奉者，他们不仅基于思想上的原因反对佛教，而且因为佛教势力像权门势族一样广有田产，正在侵蚀国家的经济命脉。换句话说，私田的改革预示着新兴的士大夫阶级破坏旧的经济秩序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土地改革是从对全国进行地籍调查开始的。1390年所有现存的公私田的册档都被焚烧毁坏。第二年颁布了管理新土地制度的基本法令——科田法。其有关条款规定，科田只能取自京畿地区，按每人已有的官阶对官僚集团的成员进行分配。不用说，这使李成桂集团得到了大量分配的土地。其它郡县的土地属于公田，这样一来，农庄实际就被充公了。因此，权门势族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从而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同时也象征着高丽王朝本身的没落。公田的增长使官方岁入也相应增加，便为朝鲜李氏王朝奠定了经济基础。

朝鲜王朝的建立

李成桂从鸭绿江回师夺取了军政大权，接着迫使禑王和昌王下台成为僭位者，而另立恭让王继位。他果断地进行土地改革，又将实际的经济权力控制在手。这样实现新王朝的建立还需要解决的只是形式问题。但在实现这个形式的过程中也引起了一些纠纷。像郑梦周这样有权势的人物仍在挡道，但李成桂的第五子李芳远（以后的太宗）将他暗杀了。在推翻这个最后的对手后，李成桂集团迫使恭让王退位，而拥立自己的领袖登上了王位。这样，李成桂便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推翻了王氏高丽。

李成桂代表高丽王朝末年出现的一股新势力。李朝初年有一首“龙飞御天歌”，是李朝初年的一首颂歌，其序曲赞颂了李朝创建者的先祖的贤德，将李氏比作根深叶茂的大树和源远流长的溪流。其词云：根深之树风中挺，花好果丰；源长之溪滔滔流，聚河汇海。

然而实际上王朝创建者李成桂并不是历史久远的名门之后。其祖先地位低贱，原籍在北全罗道的全州，后来才迁至咸兴定居下来。那个地区仍聚居着许多女真人，李氏逐渐得到了一个有影响的职位，出任军事指挥而成为当地的一门豪族。

李子春在元朝的双城总管府谋到一个职位后，便成了这个家族中第一位在高丽跻身显要的人。李子春的合作对于恭愍王收回双城总管府具有决定意义，于是他得到了东北区军事指挥的职位作为酬赏。李成桂是他的次子。

李成桂本人是凭他在当时多次战役中的功绩获得晋升的。他在击退红巾军和日本倭寇的进攻中以及在对满洲元东宁府的战役中都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以上这些战绩，他成了当时两个受人拥戴的军事统帅之一。在从鸭绿江回师后，李成桂逐走了另一名统帅崔莹，便以新进士大夫阶级的领袖夺取了权力。最后，在郑道传和其

它上大夫官僚的推举下，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李成桂仿照古朝鲜王国将他的王朝命名为朝鲜，并将首都迁到了汉城，这两个重要行动表明建立的是一个新王朝。确实，创建者没有费多少周折便建起了一个新都。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规模大小上，他都力求让汉城能够反映出新王国的庄严。从这时起，汉城便一直是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第四节 新兴士大夫的文化

性理学的传播

忠烈王在位时(1274—1308年)，在安裕和其它人的努力下，由于重建了国学和文庙以及为学生募集到充裕的资助金，儒学研究一时大受鼓励。学术兴趣从以往关注于词章和训诂注释现在转到了对中国经学和史学的实质性研究，并创立了经史教授都监。忠宣王在1298年将王位归还其父后，也与~~高丽~~正一道前往元都，并与元朝的学者们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在十年后回到高丽继承了王位，但在元朝又度过了几乎五年的在位时间，于1313年退位后，在元都建立了“万卷堂”，一道合作的有李齐贤等高丽学者和以前结识的元朝的学者们。这些情况也给予高丽后期儒学研究的发展以有力的促进。

高丽后期儒教的特点在于它接受了性理学的学说。性理学是一种用形而上学方法解释人和宇宙起源的富有哲理性的儒学。同时，它所阐述的政治伦理强调君臣的相互关系，又是一种敏于抵制任何其它教义的排他性学说。当时的新进士大夫阶级既不能在佛教又不能在以纯哲学为中心的儒教中得到满足，于是便将性理学当作他们的精神支柱。首先承认这一新学说的是~~高丽~~1241—1306

年),随后,白颐正(1275—1325年)也在中国研究了性理学,其弟子李齐贤(1287—1367年)步武其后,高丽后期其它的性理学者有李崇仁(1349—1392年),李穡(1328—1396年),郑梦周(1337—1392年)和吉再(1353—1419年),还有像郑道传(1337?—1398年)和权近(1352—1409年)这样一些供职到李朝初年的人。

性理学的传播促使佛教愈益衰落。起初,李齐贤和李穡等人并未对佛教本身加以诘难,而只满足于攻击佛寺的陋习和僧侣的劣迹。而郑道传则不然,他痛斥佛教败坏风俗和毁灭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不仅攻击佛教,也对高丽生活中像家族内通婚、无节制地寻欢作乐等特点大加指责。这个时期首先见到的现象是佛教的祭礼不再继续,而是像《朱子家礼》所描述的在家里设立祭祖灵牌。

史学

从显宗在位(1009—1031年)汇编王朝的头七位先王的官方《实录》开始为高丽所有的君王都准备了实录。然而这些实录大多没有保存,留给我们的只有金富轼于1145年奉仁宗之命编纂的《三国史记》,这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史书。《三国史记》是一部含有各种年表、论文和传记的编年体官史,它以高丽早期的《旧三国史》一类原始资料为依据,还参考了中国的历史典籍。本书反映了作者及当时的背景,是按照贵族的观点并从儒家的历史编纂角度来编写的。我们知道稍后还有金宽毅的《编年通录》,但是该书没有保存下来。此外,觉训和尚奉王之命于1171年也编写了《高丽佛教正史》,但只有部分保存下来。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一种按照教宗的观点编写的朝鲜佛教正史,该派作为贵族势力的最合适的伙伴在高丽曾经兴盛一时。

后来,编写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发展了,结果产生了以下著作,元傅的《古今录》、郑可臣的《千秋金镜录》、闵渍的《本朝编年纲目》,以上著作都完成于1274至1313年间,李齐贤的《史略》稍晚一些。不过,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史略》中只有李齐贤的著作流传下来。《史略》中这些官方主编的史书都按《三国史记》的传统运用儒家伦理道德的观点把历史看作是政府可以借鉴的一面镜子。

一然和尚(1206-1289年)的《三国遗事》与李承休(1224-1300年)的《高丽史》是特点完全不同的两部著作,都写于忠烈王在位时期(1274-1308年),两者的独特之处都是以檀君作为朝鲜历史的开端。蒙古时期高丽人民的遭遇看来增强了他们作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民族的个性意识,也增强了他们对源出于一个祖先的认同。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对早期岁月的缅怀,流露了作者对传统和历史遗产怀有深深的敬意。这样,这两部史书利用了《三国史记》作者所忽视的许多历史资料,因此更有价值。

禅宗和尚一然的《三国遗事》关于古代风俗制度的资料特别丰富。在一般史书中,它不同于《三国史记》;而在佛教史书方面,它又不同于《海东高僧传》。

景幾体歌与“长歌”

这个时期士大夫表现自我的文学形式是所谓的景幾体歌。这一新发展的诗歌形式用中文赞扬了朝鲜自己的土地和学问。它起始于武臣统治时期翰林院的年轻儒家官员所作的“翰林别曲”,该诗生动地描述了进入政界的士子对人生的期待。随后有安轴(1287-1348年)的“关东别曲”和其它一些作品,士大夫官僚的高

尚情操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出现了关于渔人的诗篇，这些诗作描述了生活在农村的士大夫的孤寂生活。

如果说景幾体歌和那些打鱼题材的诗篇属于士大夫的上流文学，那么长歌则是平民文学，作者大多数是无名的。像“青山别曲”、“西京别曲”、“君将别”、“井邑词”、“动动”一类长歌按其文学特点一般认为应归入新罗的乡歌。由于这类诗歌是从民歌传统发展而来的，因而全而坦率地表达了民众的感情。像“双花店”诗这样极端的例子，甚至不加掩饰地描绘了淫荡的场面。其次，长歌也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现实，像“青山别曲”开头的一节便联想起无地农民背井离乡时的悲痛。诗中写道：

让我们活，让我们活。
让我们活在青山上吃野果，
让我们活在青山上。

不过，这些长歌开始经常在宫廷盛宴上演唱，结果也发展成为上层阶级享受的音乐。

艺术

高丽中期以前的朝鲜木结构建筑无法讨论，因为现存最早的建筑是13世纪修建的安东凤停寺的极乐殿。不过，高丽木结构建筑的最好范例是建于同一时期的荣州浮石寺的无量寿殿。它那锥形圆柱、匀称的三层斗拱、二层飞檐的曲线以及无顶厅内的透雕细工全面代表了高丽木结构建筑的庄严特点。高丽后期其它值得注意的木结构建筑有浮石寺的祖师堂、德山修德寺的大雄殿，能代表李朝初期建筑风格的还有汉城的南大门。

高丽后期绘画的特点是这种艺术越来越被非专业人员、士大

夫用来表达他们对具有浪漫情趣的事物的感受。例如这一时期的绘画经常将文人描绘成隐士，描绘郊游享乐，四君子（兰花、菊花、竹子及梅），尤以黑墨笔勾画的竹子为代表。由李奎报和李齐贤等文人提出的诗画合一的概念可以说是这一新潮流的产物，它是新兴士大夫阶级的风雅生活方式派生出来的。但是今天没有机会直接来评价高丽后期的绘画，已知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许不过三、四件，其中有一件“天山狩猎图”，还不能确定是否出自恭愍王的手笔。幸运的是，佛教绘画情况不是这样，像慧虚和尚的“杨柳观音像”这样一些作品，精美壮观已流传至今。其它出色的庙画有浮石寺祖师堂的智国天王壁画和修德寺的水花壁画，后者发现不到50年，但现在只保存了它的复制品。

开丰敬天寺内的石塔（现已移至汉城景福宫殿内）建于忠穆王（1344—1348年）时期，是高丽末期石塔中最出色的杰作。塔有十层，全用大理石建造，三重台基上竖起三层塔身，每一个或具有正方形或三角形，都刻有佛像；顶上的七层是方形塔身。这座塔显示了元朝的影响，又成为李朝世祖时期（15世纪中期）圆觉寺塔（在汉城塔洞公园）的范式。高丽后期的塔婆艺术采用了非装饰的石钟形式，这是高丽早期的装饰风格的一大变化。骊州神勒寺的慧勤和尚修建的石塔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形式的石塔也成为李朝石塔的先驱。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流传至今的壮丽的木雕作品如假面剧用的河回面具。

书法方面，在元初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出现后，高丽初期风靡一时的宋代大师欧阳询的瘦体字便让位于一种明显不同的称作“松雪体”的优雅字体，在朝鲜这一派的著名书法家是李崱（1297—1364年），这种书法风格在李朝继续成为主流形式。

科学技术

高丽自早期以来便十分关心建立图书馆，不仅搜求和收藏各种书籍，也对书籍进行复制。在高丽数以千计的稀有书籍被作为珍品保存下来，甚至宋朝也多次派人到高丽去收罗在中国收集不到的书籍。这样印刷便繁荣起来，各种书籍得以出版。起初，大部分印刷利用的是木版技术，大藏佛经的出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木版印刷当然是满足某种著作广泛传播要求的一种极便利的方法。一旦字板刻成，印刷本身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事，而且字版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制成许多副版。但是在副版有限而需要多种著作的情况下，活字印刷就更有效率了，尽管缺点是需要铸字排版。在高丽，书籍基本上只属于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少数人，所以通常第一版的印量也很少。因此高丽热心于活字印刷并继续发展这门艺术是很自然的。

据说活字是由北宋的毕昇于 11 世纪发明的，但他用胶泥活字，这一方法没有被广泛仿效，不久便停用被人遗忘了。在高丽，有关于 1234 年用金属活字印刷《详定古今礼文》一书的记载。印制这部书的活字显然就是金属活字，可能高丽开始用这种活字印刷还没有几年。这样看来，高丽使用这种方法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这一早期试验阶段持续到 1392 年。高丽王朝终止时设立了书籍院来负责铸字和印刷书籍。因此，高丽后期为李朝活字印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朝鲜衣服所用的材料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重大变化。迄止当时，麻一直是民众衣服的主要原料，而丝绸多用在贵族的华丽服装上。这时朝鲜已开始种植棉花，棉布成了衣服的主要材料。1363 年文益渐(1329—1398 年)从元代中国带回棉籽，当时他是高丽使臣秘书的身份前往中国的。他把棉籽交给了他的岳父

郑天益栽种,郑不但成功地培育出棉花,而且设计了一个轧花机,还建造了一架手纺车。普遍认识植棉的价值以及在全国推广棉花栽培是李朝的事情。但是高丽后期的这种发展对朝鲜民族衣服有明显改进不无影响。

这一时期的医药知识也有重要发展。虽然高丽医学受宋代中国的影响,但朝鲜自己传统的民间医疗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也促进了本国医学科学的发展。《乡药救急方》,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医学论文便是重视本国医学知识的结果,该书出版于1236年。这个时期编集的其它这类论著还有广泛用作诊断指南的13世纪的《三和子乡药方》,这些都为李朝初期《乡药集成方》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朝鲜首次制造火药也是这个时期的一大发展。火药在中国宋元两代已经使用,但制造火药的方法严格保密,从官方途径是传不到高丽的。这时倭寇的袭扰已达到毁灭性地步,一位名叫崔茂宣的低级官员认识到需要有更有力的武器,便不辞辛劳地研制火药。终于他从元朝中国学到了制造火药的诀窍,劝说高丽朝廷建立可以制造各种火炮的火炮都监。此外火药也用于别的武器上。他还用配有火炮的新建船只来武装海军,获得了驱逐倭寇的重大胜利。

第九章 两班社会的建立

第一节 朝鲜两班社会的建立

士大夫和王权

军事实力是李成桂得以建立一个新王朝并成为开国君主(太祖,1392—1398年)的重要支柱。同时,如果没有士大夫的支持,他肯定也不能夺取王位。在朝鲜初年,那些拥立李成桂为王、出身士大夫的“开国功臣”是凭借“都评议使司”这个联席审议机构来行使政治权力的。李太祖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批准都司的决定并命令付诸施行。稍后,这些掌权的士大夫便着手制订一部渗透儒家治国理念的行政法大全,一部包含李朝政治运作中通行的主要原则和惯例的法典。郑道传编纂的《朝鲜经国典》以及1388年从鸭绿江回师后郑道传与赵浚一道准备的行政法汇编《经济六典》,便是致力于将儒家原则全面编集成典而作出的成果。

开国功臣的这种治理方式只是给人留下了高丽贵族统治重现的印象,而这正是国王和官僚机构中显贵以下许多其它士大夫深感不满的原因。太祖的第五子李芳远(后来的太宗,1400—1418年)清除了郑道传。野心勃勃的太宗首先指使人谋杀了太祖指定的继承人,幼子李芳硕,继而又除掉了他的竞争对手二哥李芳幹,最后夺取了王位。实际上太宗在登基前已经把持了政治权力,废除了私兵制实现了对军队的集权控制,并将“都评议使司”改为权力大

大缩小了的议政府，此后他将政府的一切事务交给六曹，六曹直接向国王负责。太宗下令修订和扩充《经济六典》，以反映这些新的结构安排，于是产生了《元六典》和《续六典》。

继太宗之后世宗(1418—1450年)设立了“集贤殿”，并为该机构指派了一些杰出的学者让他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法令制度。他想按这种模式来重建朝鲜的政治结构。“集贤殿”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六卷《正典》，通过这一过程集贤殿学者们的政治见解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让人们感到他们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政治。世祖篡位可以认为就是对这种发展作出的一种反应。1455年，世祖在士大夫中的那些不满分子的支持下将他的侄子端宗(后来被处死)赶下台，径自登上了王位。在这一过程中，他杀死了自政治元老皇甫仁、金宗瑞以及与他们接近的其胞弟安平大君以下许多反对他的人。世祖接着又发动了一场清洗，在这场清洗中罹难的有成三问、朴彭年、河纬地、李埏、俞应孚、柳诚源，后世把他们称作“死六臣”。此外还有集贤殿的另一些学者。他还下令着手再制订一部规定朝鲜政府结构和职能的行政法典，后来编出了《经国大典》。成宗在位的第二年(1471年)这部法典在稍作修订后予以颁行。这样便确定了朝鲜王国的行政结构，这个王朝与其说看重居于最高地位的联席审议机构的统治方式，毋宁说更加重视文武官僚按规定程序进行治理的方式。

两班社会

士大夫是指导李朝政治生活的社会统治阶级。“两班”作为在官僚机构中供职的文武臣僚归根到底是由士大夫组成的。这就是后来“两班”一词被广泛用来专指李朝社会有权担任文武官职的那

部分人的原因。

正因为支配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是这个两班阶层，才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两班社会”。

李朝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两班阶层较之高丽或时代更早的统治阶级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因为在李朝被承认为两班的家族世系的数目远大于真骨贵族或高丽时期的少数门阀贵族的数目。两班阶层人数的增多反过来又大大提高了招募官员的考试制度的重要性。为了维护全体两班阶层的共同利益，李氏王朝发现高度重视国家考试是明智的。因此“荫叙”入仕的途径受到严格限制。结果，单凭家世背景入仕晋升就变得很困难了。儒家的学术训练是通过考试获得做官资格的必要条件。而两班阶层可以从许多教育机构中接受这种训练。两班按实际惯例已被免除劳役和军役这些通常对国家应尽的服役义务。他们只需专心致志地学习、潜心钻研儒家的治人学说，于是他们入仕为宦的特权便代替了向国家应尽的其它服役义务。

这样光享有各种特权的两班自然成了养尊处优的人，以往一直向乡吏阶层敞开的社会晋升大门便逐渐对他们关闭了。两班只在他们中间通婚，两班的地位当然也就成了世袭的。两班与那些不是两班的人甚至不住在一起。两班的住所在汉城的南北两端，在农村则是住在分开的村子里而不住在城镇。在两班阶层内部有一些差别。首先，武班不如文班显要。其次，法律禁止非法出生的人担任重要官职，在李朝的大部分时期使得两班的庶子及其后嗣难以或不能参加他们有资格担任文官的考试。两班的遗孀再婚，其子便不能在官府供职。此外还有地区差别，住在北部平安道和咸镜道的人除少数例外，不能获得较高的官职。以上这些限制可以看作是在两班社会内部起作用的一种自我淘汰的机制。因为两班担心他们

人数的增多会侵蚀他们的特权地位。

人仕为宦是两班的唯一职业。不过他们并不担任同样是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的那些技术官职。像医学、翻译、天文、阴阳、钱粮、律学、书办、官伶一类职位都是为中人世袭保留的。胥吏、衙前或军校的日常公务也跟两班无缘。这些低级职务也是为各种世袭小官保留的。诚然，在广义上，那些技术官、胥吏和军校在官府也担任重要职务，也算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们显然不同于两班。两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也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不过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职业。两班学者企望通过对朝鲜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来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但这实际上并不意味他们准备消除社会身份的差别。

第二节 两班官僚国家的统治机构

政治机构

李朝政府的最高机构是议政府。李朝的议政府是高丽都评议使司的延续，也是一个审议机构，由三个议政作出联合决议。这三个官员讨论国家的事务，并将他们的一致意见呈送国王，然后接受国王的决定，交给适当的政府机构去实施。不过，与高丽的都评议使司相比，朝鲜的议政府官员人数要少得多，因为政府的许多重要事务已直接交付“六曹”，议政府的权限已经缩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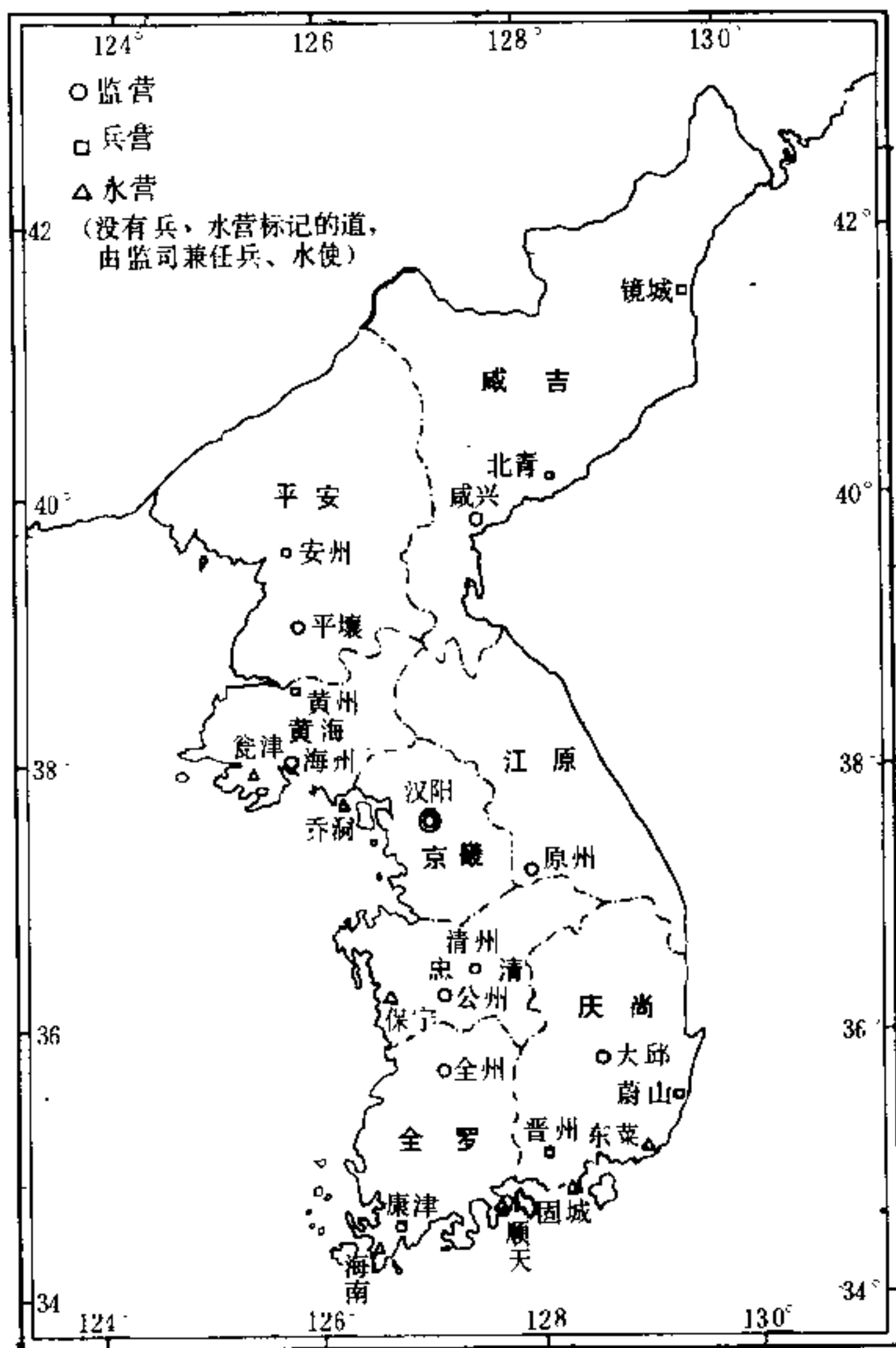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六曹有权就其职责范围的事项直接向国王上疏，而后实施国王的决定。虽然，朝鲜六曹（吏、户、礼、兵、刑、工）各自的管辖范围与高丽的六部没有多大差别，但前者的政治作用要大得多。因此，李朝的政治结构可以简单地称之为“诸曹”，这表明朝鲜的政治结构比高丽更具有官僚集权的特点。另一个主要机构是承

政院，该机构负责向国王呈递文件和传达国王的敕令，有时它无视其它机构而自行其事。

三司是弘文馆、司宪府、司谏院的统称，是为防止政治、行政权力滥用而设立的机构。弘文馆是世祖所废除的集贤殿的延续，它有一处藏书阁，负责查寻行政法律惯例、承撰国家重要文告，因而相当于国王的咨询机关。司宪府是一个监察机构，批评现行政治，监督官吏行为，纠察公众习俗。司谏院的职责是批评国王言行，其职能在于限制王权独断专行。这两个规谏机构享有-一种署经权，即审查提名担任中下层官职的那些人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这是赞同还是否决对他们任命之前进行的初审。总之，一方面有三司这样的咨询和监察机构，另一方面议政府和六曹负责政策和实施政策，这样的设置便造成一种牵制和平衡的机制，防止权力集中于政府的某一个部门。三司的存在以其对国王和高级官僚的公私行为的不断严密的监察，为理解以上大夫为中心的李朝两班社会的性质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地方官制方面，全国分成京畿、忠清、庆尚、全罗、黄海、江原、平安和咸镜等八道。道下设州、府、郡、县。各道任命有长官（观察使或监司，也称方伯），州、府、郡、县分别配备牧使、府尹、府使、郡守、县令、县监。地方长官统称为守令，是直接治理民众的官员，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政府收税、征发徭役。因此，地方政府正如李氏朝鲜所设想的几乎是另一套支撑两班阶层的行政机构。

道和郡县的官员负有广泛的行政司法权限，任期受到限制，方伯为一年，守令为五年，但后者不得在他们一直居住的郡县任职，这是惟恐守令和身为他们亲属的当地两班串通一气侵害两班整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每县的两班住民都组织了“乡厅”，并通过它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机构类似于高丽的“留乡所”，由“座首”



朝鮮八道图

和他的副手“别监”掌管，其职责为帮助守令，纠察公众习俗、监督乡吏行为。结果，乡厅成了当地两班的权力基础，对地方行政影响很大。同时，各郡县在汉城设有“京在所”，以本郡县出生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为首，这些官员力求乡厅为国家而不是为地方利益服务。

在各道郡县按京城六曹的模式即吏、户、礼、兵、刑、工将职权分摊给“六房”。这些部门的职权由本地出生也在本地任职的世袭乡吏（也称地方衙前）来行使。为了便于联络，各郡县都有衙前留驻汉城和道衙，前者被称作“京邸吏”，后者被称作“营邸吏”。实际上，地方官府是靠衙前即乡吏来运作的，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可以在代表国王进行统治的守令与代表地方两班势力的乡厅之间充当桥梁。高丽时期也有过乡吏，但那时乡吏是不断跻身于京城贵族行列的人们所组成的权势集团，李朝乡吏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被禁止上升到两班的地位。

军事组织

高丽后期以来军事制度一直极其混乱，因此，李太祖不遗余力地加以整顿。他建立了义兴三军府以控制军队机构，但由于宗室功臣以及其它人仍保留私人武装，他不能将军权集中到政府手中。太宗坚决取缔私兵并达到了目的。1400年太宗（在其兄成宗统治下，他已经是国家事务的实际决断者了）完全取消了私兵并将它们归附于义兴三军府。1464年世祖将军队指挥权划归五卫都总府，该机构总管驻守京城的五卫军务。

1457年中央军重新编制，从此确定了李朝军队的组织形式。“五卫”是指中、东、西、南、北等五卫，各自对相应地区实行军事管辖。每卫包括五部，每部有四统，统下设旅、队、伍。五卫的核心部

队如甲士是通过军事技术考试选拔的职业军人(当然也从平民中间征募兵员作为“正兵”进京服役),但这一制度没有认真实行,而且,这种军队也不是李朝常备军的主要部分。

总的看来,与京城的五卫相比,地方军队实际上是李朝防卫结构中更重要的部分。各道都有管辖本地陆军和水军的兵营和水营,道以下是若干镇。咸镜道、庆尚道因要抵御女真和日本的侵略,设有四个陆军兵营和两个水军兵营,全罗道由于海岸线长也设有两个水军兵营(见图,第187页)。在各道,归镇指挥的军队叫做“镇守军”,可分为三类:营镇军、守城军和船军。其中最重要的是地面卫戍部队,其主要成分是良人身份的农民。按照轮流服兵役的制度,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兵士,退役后,便回到自己的农村。

中央军和地方军原来分属不同指挥系统,后来合而为一。这就是镇管体制。其中心在于以前轮流驻防京城或派驻各道戍守要塞的农民现在都归军镇指挥。这两种军队于是合并为在一个指挥体制下服役的正兵。结果,良人出身的农兵,国家防御力量的核心便一下子变为征募兵,他们平时务农,但要轮流被征召到汉城或军镇服现役。这种体制是靠保法制才最后形成的。不过,并不是说所有良人身份的农民都去当正兵,因为有些要当“奉足”,为服役的正兵提供经济资助。在保法制度下,两三个成年男子为一组,其中一人履行兵役时,其它保人要给予帮助,供给正兵一定数量的棉布,而轮到他们服役时,别人也要帮助他们。最后,为了迅速将各道发生的军事危机通报京城,还有一种烽火制。为了快捷传送更详细的军情,建立了驿站网。驿站系统也常常用来传送一般公文,用于官方运输和官方巡游。

科举和教育

在高丽作为招募官员的手段曾经施行的考试制度在李朝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于朝鲜限制二品以上官员之子荫叙，所以除非通过科举考试，晋升高级官职便无路可走。这样，对两班来说，科举考试确实是获取功名的途径。虽然任何良人的确都有资格参加考试，但是说两班垄断了通向为朝鲜两班社会如此看重的文官职位的考试并不过份。各种教育机会几乎都被两班独占了。

任命文官的资格考试在两个等级上进行，生进科即小科和文科即大科。生进科有两类：生员科考中国的四书五经，进士科考写作、诗、赋、表、策的技巧。两班的年轻人从幼年起就进书堂学习汉字和练习写字。从7岁起，进汉城“四学”中的一所，或各地的乡校。这些学校的儒生在学习几年后便有资格参加生进科考试，如果他们通过在道里举行的第一次考试，便继续到汉城参加决定他们能否升级的第二次考试。依照他们所选择的考试，合格者或称生员或称进士。这样生员进士可以进入设在汉城国家最高教育机构成均馆，而进入成均馆的学生可以参加文科考试。在这里也获得成功的应武者必须初试和复试都合格，一般人数为33人。最后，在国王面前举行殿试，考试及第者逐个列出等级，有优秀和合格之分。考试得第一名的人称状元，会受到特别优待，被授以从六品中级职位。

以上描述的代表招募文官作为一项制度实施的几个程序，并不是说实际情况都是这一个模式。比如就准备考试的办法来说，两班社会越来越喜欢他们自己的私人书院，而不是官方设在汉城的四学和各地的分校。此外，虽然最初规定定期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但事实上考试在其它时候也不定期举行。为了祝贺像新王继位这类重大庆典，要举行增广试。在王室喜庆日子则举行别试，国王视查成均馆学生的学业时还经常亲自主持谒圣试。随着这些不定

期考试的增多,三年一次科举的“式年试”的重要性便下降了,这种情况不过反映了两班士大夫社会性质的变化。

高丽末期首次举行的武科考试,在李朝时继续进行。考试科目有箭术、骑术、枪术等军事技术,还有儒教和军事经典知识。武考跟文考程序一样,也分三段进行。有28人通过三年一次的考试,叫做“先达”(也许指这些人到达了获取官职的门槛)。虽然,武科考试远不如文科考试重要,但是它正式成为朝鲜科举制度的一部分,意味着已经开辟了定期召募武官的途径。这标志两班官僚结构已正式形成,不过武科考试后来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连贱民也可以用来晋升的门路。

除文武科外,还有挑选技术官的四门杂科考试,科目有外国语、医学、天文学(包括气象学和命课学)、法律。考试合格者将分别在司译院、典医监、观象监和刑曹任职,对有抱负的技术人才进行正规训练的也是以上这些机构。李朝士大夫蔑视这些专门性的研究,称之为“杂学”,从事这些研究并以世袭身份参加这些考试的大体上都是“中人”阶级中的年轻人。

第三节 两班官僚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

两班土地所有制形式

李朝的土地制度以高丽末期李成桂(太祖)所推行的改革为基础,按照当时实施的“科田法”,在职官僚和退職官僚按其在官府18级官品结构中的品级受地。该法规定,授予官僚的土地只限于京畿之内,用意在于防止两班官僚的经济势力伸展到各地农村。虽然,原则上科田的授予限于受田者生前,但官僚的妻子如果不改嫁,也获准拥有其丈夫的一部分土地(称守信田),同样,如果双亲

亡故，也将留下恤养田抚养其子女。结果，从开始起科田便有一种世袭的明显趋势。

这些情况不久造成了土地短缺，已经没有土地可分给后来有资格得到科田的人了。“功臣田”大多也在京畿地区，由于功臣田的赏赐不断增加也加剧了土地短缺。李朝的功臣田只授予功臣，与高丽名称相似的功荫田不同，但允许土地世袭。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和接踵而来的王位继承争端，功臣名录颁布了几批，相应赐予这些官员的赏田进一步减少了京畿地区的土地存量。结果，世祖于1466年颁布了职田法以取代科田法。根据该法，土地只分给现职官员，不再分给退職官员。但这项新制度实际上也未能维持很久，1556年前后便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官员付给薪俸而不再赐予土地。

除科田、职田和功臣田外，还有军田。这种土地分给在农村仍有势力的低级武人亦即“闲良”，与高丽的“军人田”不同，它像科田一样，也往往成为世袭拥有，原因在于孤儿寡妇的生活需要靠它来维持。

另外还有内需司田，是为满足宫廷需要仿效高丽的“内庄田”划出来的一片土地。另一方面很快将分给许多中央官府的公廩田取消了，以便应付政府超出粮食税和地方贡赋的开支。但仍继续分给地方政府机构土地当廩田，只是将以前分给乡吏的外役田取消了。最后，分给政府教育机构的有“学田”，分给佛寺的有“寺院田”，为道邑军事设施提供给养的有“国屯田”。

李朝土地制度原则上规定国有土地形式上都属于国王，但是公田并不意味土地由国家所有，而是指土地由国家直接收租，最初定的比率为收成的百分之十。同样，私田分给了官员个人，但政府授予他们的是收租的权力而不是所有权。可是，得到这种授予的两班常常可以将对指定地块的收租权传给自己的继承人，久而久之

便将这一有限的权力变成了完全的私有权。因此尽管形式上仍是国家所有,但土地的私有程度一直在上升。

事实上,土地私有制从一开始起已经相当普遍。按科田法分配的大部分土地实际上属于“民田”,这意味土地的私有权得到了国家的承认。这些权力大致在高丽后期已经存在,在科田法改革之前发生过多起直接没收大地产的事例。典型的民田所有者只拥有够他们自己耕作的土地,多数人的土地不够自己耕种,只有两班拥有的土地要多得多。两班当然是让奴婢或佃农来耕种他们的土地,而土地养不活自己的小农则在别人的田里当佃农出卖劳力。在一般情况下,田主与佃户实行对半分的分成制,田主从自己的那部分中拿出10%给国家交租。这种分成制也逐渐推广到科田、功臣田和其它种类的土地。由于以上这些情况,从李朝开始起,两班拥有的土地的收入(他们可以用来买更多的地)都不断增加,“农庄”一词开始再次用来描述统治阶级当中那些富有者的大地产。

农民的生活

耕种土地的当然是农民。这个时期的农民掌握了比他们的前辈更好的农业技术。他们知道怎样使用各种肥料来改良土地,结果,他们能够年复一年地耕种土地而无需让地休闲。此外,虽然直接播种仍很流行,但已经知道插秧的方法。还修筑了水库来应付干旱,仅庆尚道就有六百多处。为了培育更适应朝鲜气候的种子品种,进行了许多努力。农业技术上的这些改进必然导致产量的增长。

李朝社会农民的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个时期独立的农民即利用雇工来耕种自己小块田地的自耕农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然,

典型的农民仍是作为佃农耕种两班所有的各种土地的农户，但他们的社会身份是良人或常民的社会身份。还有一种外居奴婢，耕种他们主人的土地，属于“贱民”，但由于他们已经自立门户并自谋生计，所以他们与佃农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同时，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迁移，为了防止他们抛开他们所耕作的土地，实行了“号牌”法。号牌上有登记者的名字、出生日期、阶级身分和居住的郡县，跟现代的身份证一样，要求时刻随身携带。在1453年李澄玉和1467年李施爱的起义后，号牌法进一步加强了，因为这两起反叛都得到了迁移到咸镜道的农民的支持。此外，根据五家作统法的规定，五户编成一组，邻里互相担保组内成员不得离开当地的住所。于是，李朝的农户便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单位，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衣食住方面的需要大体上都由自己来解决。

作为对有地耕种的回报，要求农民交纳地税。科田法规定为收成的十分之一，但世宗在1444年颁布了贡法将税率降到二十分之一。官府征收的“公田税”先送到征集点，然后由水路或海路运抵汉城。贡法还力图纠正在对不同地块进行估产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弊端。新法令规定，土地按肥瘠分成六等，年候分成九等。田品制运用了一种灵活的土地丈量单位（称结）力求按估产而不是按土地的面积来定标准。另一方面，推算出天气对收成影响的程度直接与税收挂钩，歉年减轻税负。按照这些规定，农民上交的地税首先不仅不过份，而且在年景不好时似乎还可以酌情减免。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就错了。因为在农民和国家之间还有地主，农民的劳动成果要同地主均分。由于这种分成制最为流行，农民的实际负担是其收成的一半以上。

贡税是农民的另一负担，也叫做“土贡”，因为征收的是当地

的上特产,要满足官府各方面的需要。贡物包括各种手工制品,如器皿用具、织物、纸张、编席以及精制的金属制品、海产品、皮毛、水果和木材。对农民来说,贡税是比地税更重的负担。因为其花费代价起初由地方官承担,后来都转嫁到农民的身上。

最后,成年男子还要负担兵役和徭役。兵役轮流服,而徭役则每年要服一定的时间。这种劳动包括耕种国王在每年象征性仪式上亲手耕种的土地;修建王宫、王陵、城墙,开矿和开采其它资源。尽管一个劳力耕 8 结地(相当于一等田 16 亩)一年服劳役不超过 6 天,但实际上官府定多少天便要服多少天徭役。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不光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才要求农民终日佩戴号牌,不得擅离他的住所。

手工艺

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棉布生产,被看作是农民家庭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手段,传统的编织丝、麻和夏布的技艺当然继续应用,但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布的制作越来越普遍了。棉花不仅被农民用来做衣服,而且由于棉花是军衣的原料和朝鲜对外贸易的项目,对政府也很重要。因此允许其它的税用交纳棉布来代替。制作农具是农村的另一项职业,由铁匠承担,但一般认为他们已将这份零活跟日常的农事活动结合在一起了。

与高丽时期一样,李朝初期的手工业者的工作大多在官府支配下进行。一般规定,有专门技术的工匠都得按工种类别登记,作为“官匠”,隶属于汉城或省、道邑、军镇的各种机构。在军器监注册制造武器的工匠大约有 600 名,在尚衣院制作官服的工匠有 590 名,在司窰院有 380 名工匠生产供王室饮宴用的器具,在造纸署有

91 名工匠生产政府的用纸。

像这样有技术的工匠，汉城总共用了约 2,800 人，各道用了 3500 多人。这些工匠虽然已在官府名册上登记，但并不只是为官府干活。为官府当差一年里只在某一个时期，其它时间是按私人主顾的定货为自己工作，不过向官府交纳一笔特许税而已。在许多场合，这些手工业者是官奴，社会身份是贱民，但实际上又是独立农户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他们显然不是奴隶劳工，而且这部分平民手工业者的比例已不断增加。

在朝鲜初期，手工业者的产品大多在官府支配下生产，但同时市镇私人自主经营的方式也有发展。起初，手工业者只能在不为官府当差期间承揽私活。后来私人手工业者才完全为自己经营。他们按照两班顾客的定货生产奢侈品，不过主要还是为一般人生产日用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其中突出的物品有铜器、马鬃帽、皮靴。

商业和货币

从早期起，在汉城中心大街钟路两边就有店铺。但都是官府设立租给商人经营的。后来，六矣廛承办丝、棉布、线、纸、夏布、鱼的销售，可以代表这种商业活动。这些店铺实际上在政府的特许下，享有经销某些商品的特权，而代价是交税，即向国家提供各种必要的物资。此外，还有一些小店铺，不用交任何税，许多地方还开设了集市。

在地方上有一种叫做“场门”的永久性集市，从李朝初年便发展起来。这种集市是为逃荒或逃避兵役税负而抛弃土地的农民开设的，但被认为构成对李朝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受到压制。以这些集市为中心的市镇在发展上受到了阻碍，繁荣起来的只有定期

市场。定期市场一般每五天开市一次，交易的货物有农产品，手工制品，海产品和药材。经营者为行商又叫裸负商，前者（指永久性集市上的商人）主要销售精制的手工艺品这类奢侈品，后者即裸负商主要贩卖农产品或海产品一类生活必需品。这些行商甚至自己组织了行会，称为负商厅，并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批准。裸负商在乡间活动，相应的还有在沿海一带做买卖的行商，但他们的生意不那么兴隆。

由于李朝的商业活动是以这种形式进行的，所以货币经济不容易发展。1401年，用桑皮纸印制了货币，1423年铸制了铜币“朝鲜通宝”，1464年输入了呈箭簇形的铁币，但总的说来，这些都是官府为收税用的。因此，不管从行政措施的角度看它们多么重要，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而未能广泛流通，像以前一样在重要交易中充当媒介的还是布。只是随着棉花生产的增长，交换单位现在已由麻布变成棉布了。

贱民的地位

在李朝，婢是贱民的最重要成份。奴婢主要有两种：官奴和私奴。官奴又分为服劳役的和交代役税的。前者听从政府的指令一年要干一定时期的活，后者要交纳人头税。私奴当中也有这样的差别。率居奴婢在主人家里干杂役或在邻近的田里耕作，外居奴婢则向主人交纳一定的费用。根据孩子身份随母亲的法律，奴婢的身份是严格世袭的。像牛马一样，奴婢按官方的标价买卖。不过，官奴和外居奴婢已构成独立农户，并可以自谋生计，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入务农。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佃农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奴婢外，白丁也是贱民身份，这部分人世世代代从事屠

宰、制革、编筐一类职业，住在各自的村子里。早在高丽时期，他们就被叫做“扬水尺”和“禾尺”，为了把他们同化为一般农民，世宗授予他们土地，教化他们怎么耕种，这就是他们被称为“白丁”的由来。这称呼早先是指一般农民。就是说，按法律观点，白丁已按平民来对待，但实际上，这并没有使他们变成农民。相反，他们继续从事他们世代相继的职业，像以前一样被当作贱民对待。最后，被划为贱民的还有四处流浪的艺人，称为“广大”和“寺党”。

李朝仍有大量的贱民，但奴婢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白丁在法律上已被定为平民。此外，高丽时期，乡、所、部曲等贱民的强制劳动居留区也全部撤销了。这一过程虽然延续了几百年，但毕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那就是贱民上升到平民即自由人地位是总的趋势。

第四节 朝鲜初期的对外政策

对明朝的外交

李朝用“事大”一词描述它对明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尽力设法保持友好关系。奉行亲明政策的李朝创始人李成桂在与高丽旧贵族斗争的过程中也需要赋予新政权及其统治者以合法性。而且由于李氏王权在法统上软弱，就更需要这样做了。出身寒微的李成桂受到旧贵族的鄙视，他们几乎都不愿为他效力。他需要有权威来认可他的政权，为此他选择了在政治上利用明代中国。

李朝政府每年都派三名正式使臣前往明朝，有恭贺新年的贺正使，庆祝明皇诞辰的圣节使，祝贺皇太子诞辰的千秋使。后来，还定期派使臣去纪念过冬至节（冬至使）。此外，无论朝鲜还是中国每逢先君亡故、新君继位或王后选出都要派使臣吊贺。派遣这些使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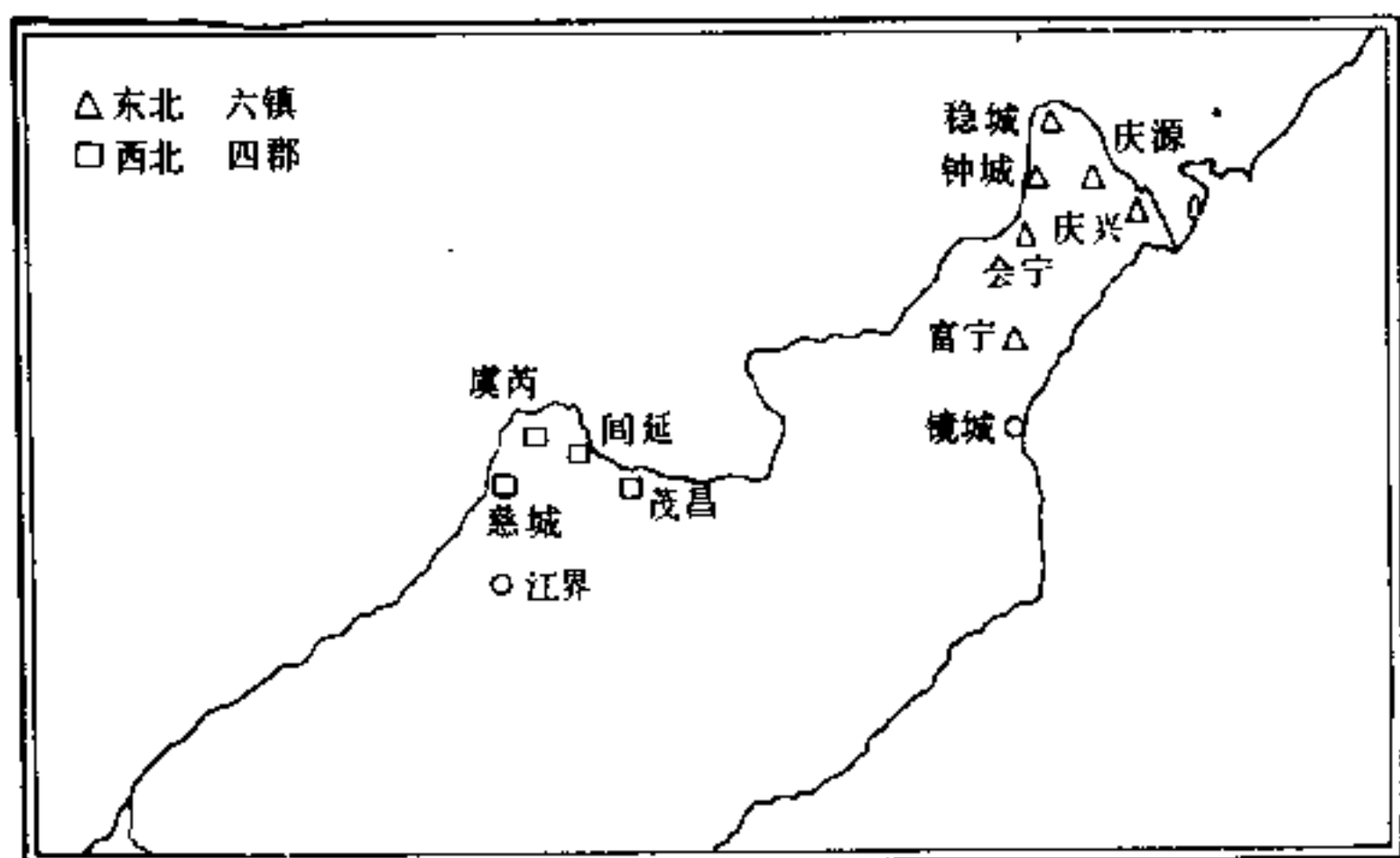
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但他们也充当了文化引进和经济交流的媒介。朝鲜方面出口的物品有马、人参、毛皮、夏布、花纹席，朝鲜回收的有丝织品、药材、书籍和青瓷器具。

与明代中国的交往大体上是满意的，但也不是没有纠纷。“澄清王族世系”便是这样一个问题。1511年，《大明会典》颁布时，再次记载了明朝长期所持的一种误解，认为李成桂是臭名昭著的反明人物李仁任的儿子。由于从朝鲜初年起，便多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李朝政府曾要求予以更正。但这一请求一次次被明朝搁置一旁，直到成为激烈争执的问题。最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争执，这一纠纷于1584年得到了解决，在明朝《大明会典》的新版上加了一个脚注。

北方拓边和女真问题

李太祖是从他在东北部的基地登上权力舞台的。他首先采取措施控制了这整个地区，并成功地将上至豆满江边境的领上都并入自己的王国。但是当地居民，亦即朝鲜人称之为“野人”、“蛮人”的女真人经常对其新主人发动进攻，李朝一度被迫退到镜城（见图，第200页），直到世宗时，才又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保住了对该地区的主权，他派金宗端去完成这一任务。结果，在东北地区设立了六镇即钟城、稳城、会宁、庆原、庆兴和富宁，并使豆满江城为永久性的边界。同时派遣崔润德和李葳率领的军队去征讨鸭绿江地区的野人，结果沿鸭绿江上游设立了4个哨卡，即闾延、慈城、茂昌和虞芮。这样也就将该地区并入朝鲜的版图。后来这4个鸭绿江哨卡作为行政单位一度被取消，而鸭绿江像以前一样继续是朝鲜北部边界的标志。开拓北方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新的耕地，还在于

将边界延伸到两条江形成的自然防线；为了巩固控制，政府曾多次派人在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拓居点。今天朝鲜的版图就是从这时起形成的。



6镇·4郡图

最初，野人保持着半农业、半狩猎的经济，他们必须从朝鲜获得粮食、衣服以及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以及像工具一类生产工具，他们之所以侵犯朝鲜领土便是要弄到这些东西。朝鲜绥靖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镜城和庆原开设集市，野人可以在集市上用马和皮交换布、农具和粮食。政府也鼓励他们移民和接受宗教仪式，那些表示效忠的人会得到挂名的官职、食物、衣服和住房。然而，他们的掠夺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1583年一个名叫尼荡介的部落酋长率领野人叛乱，发展成一起重大事件。庆原和其他一些军镇接二连三地落入他的手中，他的势力达到了相当可观的地步，但在一场激战后他们归顺了中砬领导的官军。

对倭政策

日本掳掠者带来的威胁到高丽末期已逐渐减退,但没有完全消除,在李朝初年,掠夺事件仍时有发生。由于日本是多山多石的岛国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自给,一旦朝鲜不同他们进行贸易,对马岛上的日本人便失去了外援,只好像他们早先所做的那样出动船只袭扰邻国。1419年世宗派李从茂进攻对马岛,其目的在于清除日本海盗发动进攻的基地。

日本人当然尝到了朝鲜强硬政策的苦头。对马岛上的统领宗氏一再派使节到朝鲜表达他们的悔悟,于是李朝政府报以安抚政策,授予日本人有限的贸易权。在朝鲜的东南沿海向他们开放了三个港口,“乃尔浦”(熊川)、“富山浦”(东莱)以及“盐浦”(蔚山),在每个港口设倭馆以便日本人经商。这样,日本船只便可以正当地出入这三个港口,运走大量稻米、棉布。后来,朝鲜方面决定订立一项条约,对于日本人带走或可以交易的商品数量加以限制,1443年订立了癸亥条约。根据其条款,对马岛每年派出的商船不得超过50艘,并且只准许可以出示带有对马领主印记的信任状的船只进港。此外,规定每年作为特别补助给予对马领主的稻米、大豆的数量只有200石(够养活100人)。

以后不久,1510年侨居这三个港口的日本人,针对与他们有争执的朝鲜镇守使发动了武装起义,造成了很大骚乱。骚乱平息后,日本人在这三个港口的特权被取消了,贸易关系也中断了。但是应对马领主的请求,1512年缔结了壬申条约,这项条约再次允许进行贸易,但商船数量和可以交易的稻米大豆的数量比1443年癸亥条约所规定的减半。

这个时期出口日本的物品是稻米及其他粮食、棉花、麻布、夏布等必需品,以及螺钿镶嵌、陶瓷器皿、花纹席等手工艺品。贸易中

也包含文化物品如大藏佛经、儒家著作、历史文献、寺钟、佛像等，这些都对日本文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日本用来交换的是朝鲜不出产的矿产，如铜、锌、硫，以及药材和香料一类两班消费的奢侈品。

第五节 两班贵族的文化

训民正音的创制

训民正音这一朝鲜人民本国字母的创制是李朝早期文化史上必须大书特书的成就。世宗设计训民正音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人民必须有适合表达他们日常讲话语音的文字系统，也注意到他的所有臣民要能够容易地学会和运用这种表音文字。世宗在阐释训民正音的前言中讲清了创制这种文字的想法。“我们的语音不同于中国的语音，不容易用汉字表达出来。因此，即使我们的无知臣民中有人想表达他的想法，但在许多情况下始终不能如愿。想到可怜的臣民，我们重新设计了一种由 28 个字母组成的文字，只有这种文字是每个人都容易学会，容易使用，方便自己日常生活的。”

出于这些考虑，世宗排除了他周围的士林官僚们的反对，在集贤殿的学者如成三问、郑麟趾、申叔舟的支持下创制了训民正音这一朝鲜人民最为自豪的文化成就。新字母于 1446 年他登基的第 28 年颁布于世。

然而不幸的是为朝鲜人民所作的这一巧妙创造却没有受到当时两班统治阶级的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想继续使用难学的汉字系统，保持他们对学习途径的垄断。但是世宗出于增进全体臣民的道德教育的目的，顽强地推行“训民正音”字母的发展。

新字母宣布不久，世宗设立了“正音厅”（也称“谚文厅”），并令其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主要有赞颂王室祖先功德的《龙飞御天

歌》；还有《月印千江之曲》和《释谱详节》，这两首赞美诗合称《月印释谱》；学习汉字的课本《东国正韵》。世宗之子世祖接着设立了“刊经都监”，用训民正音翻译了许多佛经，这一派称为“谚解”。农民阅读的农业手册以及内容对外保密的军事教本也都用“训民正音”写成。同时，王宫内院的贵妇，两班家族的妻女也开始广泛使用训民正音，例如书信来往。不过，政府的许多重要著作一般仍用汉字来书写，这表明在训民正音的推广应用上还有一些限制。

实用的学问

李朝初年各科学问都发展得很快，学术著作也广泛出版。国家本身热衷于编纂和出版各种学术著作。特别是世宗至成宗(1469—1494)时期，集贤殿和弘文馆的学者通力合作完成了许多官修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按儒家观点写的，用来指导朝鲜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因此，当时许多学问都是实用的，而且与新王朝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这时朝鲜已经发展成为儒教国家。

在官修著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史书。历史是政府的镜子或范本，这个概念自然提高了国家编史的兴趣。为每位君王修史的惯例由1413年编纂《太祖实录》开始。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王朝终结，为我们提供了总称为《朝鲜王朝实录》的基本文献。《朝鲜王朝实录》是由春秋馆的史学家们编纂的，为了保证安全无虞地传给后人，其抄本被收藏在汉城、星州、忠州和全州等国内四个相距很远的史库。《国朝宝鑑》是为教诲后代从实录中选出前朝君王嘉言懿行的范例编纂而成的一部著作。从1458年这部书就一直在编纂直至王朝终结。朝鲜还决定编纂一部关于前朝的官史，从太祖起经过长期努力，多次修改的《高丽史》的最后版本于1451年完成。作为

一部官修史,《高丽史》对高丽时期的情况作了叙述,以便将新李氏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交代清楚。几乎同时,《高丽史节要》也于1452年编竣,它采用严格按年代顺序的形式,不同于《高丽史》集编年、文献和传记于一体的结构。1485年也出现了朝鲜的第一部通史,名为《东国通鑑》,为了便于查阅,该书采用编年体,概述了从檀君到高丽末期全部朝鲜的历史。由于这时正是朝鲜人的民族意识高涨时期,为此在平壤设立了民族祠,举行了祖先朝拜,檀君被尊奉为朝鲜族的祖先,所以一部通史自然要从檀君时代的叙述开始。

接着应提到地理志或地志。1432年首先编纂了《八道地理志》,该书后被收入《世宗实录》。它包括治理国家需了解的各种信息,如各地政府的行政沿革,山川形胜,关防要隘,土地面积,人口物产,道路驿站,军镇兵员,烽火台,陵墓,地方姓氏以及谱牒等。《东国輿地胜览》是更完善的一部著作,按新的编纂方针于1481年完成。该书扩充了文化地理方面的内容,举凡名胜古迹、名人诗文都收录在内。因此,这部地理志反映了士林的情趣与价值观。1531年出了增补本,增补本一直留传至今。

《治平要览》是第一部行政官吏手册,于1441年完成。该书选出过去治理中功过得失的实例供官员借鉴。《属朝五礼仪》是一部介绍国家庆典礼仪的著作。世宗在位时开始编纂,于1474年完成。该书叙述了王位继承、婚媾丧葬以及迎接外国使节和军事检阅的礼仪。1432年还制作了一部《三纲行实》,用画配文来表现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存在的忠孝贞这些理想化了的关系。毋庸赘言,编写该书的目的在于广泛鼓励已构成儒家道德基础的伦理规范,进一步巩固两班社会秩序。

科学和技术

李朝初年,在许多领域科学技术也发展了,出现了许多发明和出版物。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430年世宗在位时编写的农业手册《农事直说》。这部手册适用于朝鲜农业的特殊条件,朝鲜的气候和土壤不同于中国,因此原封不动照搬中国农业的一套做法便大成问题。世宗首先让各地进行调查,报告当地有经验的老农所用的方法,然后将留种、增加肥力、插秧等各方面内容汇集成书。成宗在位时,姜希孟(他是地位很高的官员兼学者)根据在家乡始兴(汉城正南)的个人经历,或别人对他的讲述,再加上个人的亲自观察,编纂了一部关于农事的综合性著作《衿阳杂录》。虽然本书是他个人按其家乡的特殊农业技术编写的,但很有价值,在1492年出版的新版《农事直说》之后广为流传。

同时,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天文学和气象学也有很大进步,特别在世宗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应用科学技术的最好范例是1442年制作的测雨器,比西方发明的同类装置要早二百多年。测雨器是一个铁筒,深约42.5厘米,直径为17厘米,各地也设有陶器量具,用来测量和记录降雨量。除关心降雨外,也很注意风力对农业的影响:“风旗竹”是一种简单的测风器械,安置后可以测定风向和帮助估量风速。1434年,在景福宫的庭院中设立了一座观象台,里面放置了一台可以观测天体的浑天仪。富有创造力的蒋英实和他的助手还制造了多种天文钟、日晷、漏器。随着天文知识的进步,日曆法技术也大有改进,李纯之的《七政算》达到了顶峰。李纯之在利用中国和阿拉伯曆法系统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适合于朝鲜特殊地理区位的新算法。世宗时期制作了一种测量土地高度和距离的三角形装置和测量杆用来进行土地测量。

在医学方面,1433年《乡药集成方》问世。这部书继承高丽时

期的传统,其内容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使建立独立的、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朝鲜医药学的过程得以完成。它讨论诊断的方法,并将药材按其主要的医学特性分为内科、外科和眼科详加记述。1445年医学百科全书《医方类聚》完成,此书在形式上与《乡药集成方》类似,它以其编者已汇集查阅的各种中国以前和当代的医学文献为基础。1610年另一部里程碑式的医书《东医宝鑑》完成,它是李朝早期努力的成果。

这些国家主持的编纂活动必然促进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活字的大量铸造和应用于书籍出版。铸字场最早建于1403年,当时制作的铜字模称为“癸未字”(因为1403年按干支是癸未年)。这样便为李朝发展金属活字印刷的新技术开辟了出路。但是在这个阶段,活字是被固定在浇蜡的铜版上,活字往往会移动位置,印刷起来很麻烦。世宗改进了方法,使活字固定在铜版上一个一个方格内,这样不仅方便了排字,而且还可以连续印刷。1434年,世宗命令铸造一种新字,称“甲寅字”,它以汉字式样精美而著称。随着印刷业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其它金属活字。

在军事技术领域,火炮在征伐北方女真部落的战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推动了火炮制造业的发展,并且从历来强调火炮的防御作用转变为把火炮当作进攻武器来应用。1448年出版了用训民正音写成的教课书《銃筒胆录》,书中附有插图,详细叙述了铸造和使用火炮的技术。此后不久,1451年发明了一种发射装置,火炮安置在炮架上,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发射出上百枚像飞弹一样的炮弹。为了在海战中使用,建造了一种近距离攻击的军舰,在标准的高丽军舰之上加一个保护盖,用来冲撞和击沉敌舰。

艺术

李朝的两班阶级认为艺术是手艺人的创作活动，不是两班应当染指的事情。即使两班有兴趣于此道，也只是业余爱好或消遣。结果，在绘画方面，一种称为“文人画”的笔墨画相当盛行。李朝初期，这个画派的大师是姜希颜（1419—1464年），他曾在世宗朝为官，是出身名门的两班。他以卓越的创造才能为我们留下了至今仍在欣赏的杰作，不过，他作画是出于个人消遣，而且就其娴熟老到的用笔技巧而言，他的作品显得太少了。与此相反，李朝初期最受推崇的画家安坚（世宗时期）以及著名的崔泾（15世纪后期）和李上佐（16世纪初期）都是官府画家。安坚博采众长创作了著名的风景画《梦游桃源图》，被认为是当时的最佳作品。据说它艺术地再现了世宗之子安平大君的梦境。崔泾擅长风景画又精于素描；李上佐画风相似，原系家奴，因绘画才能卓越被选为图画署画员。

官府画家大多数要按两班的要求，以适合他们情趣的样式来绘制风景画。这些作品描绘的是自然世界看不到的理想化的景致，大部分常仿照北宋郭熙的画风。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朝鲜画家也通过一些标新立异的手法来表现他们自己的风格。人物素描广为流行是由于两班需要肖像画，用来庆贺自己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肖像画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逼真的代表而且是对象内在精神的生动描绘。

在书法方面，像高丽后期一样，赵孟頫的松雪体继续为人喜爱。这方面的名家有安平大君。他是世宗的第三子，在艺术上乐于追求，运用松雪体创造出一种飘逸潇洒的书法。精于草书的杨士彦（1517—1584年）和擅长正楷的韩濩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与绘画不同，书法训练是两班教育中人人必修的学业，只是这时另辟蹊径的创新之作还不多。

在李朝艺术中陶器占有特殊地位。早期生产的陶器称为“粉青”，像高丽的青磁涂有一层色调渐呈灰青的釉面。这是迈向白磁的过渡阶段。李朝的白磁脱胎于高丽光滑弯曲的造型，而崇尚简洁柔和的线条。这种作品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底座，不仅实用而且给人以沉稳恬静之感。李朝的这种白瓷色调从纯白、乳白到青白，据说与两班士林的品性非常相配。

文学和音乐

在儒教国家，音乐是治国的重要手段。因此，李朝初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编制乐章。出力最多的是世宗时期的朴堧。不久，《乐学轨范》于1493年问世，这部著作深入研究了宫廷演奏的音乐。它将宫廷音乐分为雅乐、唐乐和乡乐三类，并全面地举例说明了音阶、音调到实际演奏。

在朴堧的倡导下，从高丽的乡歌民谣中编选出一本配有各种乐谱的抒情曲。但没有得到两班的喜爱，他们创作了许多新的乐章来代替传统的乐章。他们的乐章是对新王朝的建立和士林的丰功伟绩的最庄严热诚的赞颂。这类作品有郑道传的“新都歌”以及与郑麟趾和其它士林联合创作的“龙飞御天歌”。高丽后期就在士林中流行的“景几体歌”也属于这一类。权近的“霜台别曲”是保存下来的李朝初期的一部作品。1478年，徐居正编成了《东文选》，这是一部朝鲜人用中文写的旧诗文的选集。同时，稗说文学作为士林闲暇的消遣方式也开始流行，这类作品有徐居正的《笔苑杂说》，成俔的《慵斋丛话》和鱼叔权的《稗官杂记》。这些文学作品被认为作为丰富的源泉对于朝鲜历史文化口述传统也具有重要意义。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也属于这个时期，作者对儒教权威主宰的世界感到

厌恶。《金鳌新说》被誉为朝鲜小说的先驱之作。

佛教的衰微

在儒教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佛教的衰退是必然的。太祖制定了注册制防止僧侣人数的增长，他还禁止兴建庙宇。总之，他一方面对当时存在的佛教极力采取默认态度，另一方面又制止它进一步扩大。不过，太祖还在世时，其子太宗就已对佛教实行了严厉的镇压，全国只留下 42 座庙宇，其余的尽行拆除；同时裁减寺院的土地和奴婢（1406 年）。这样佛教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未能恢复过来。

在太宗的镇压下奄奄一息的佛教把希望寄托于世宗和世祖的个人信仰上。世宗置其儒教官僚的反对于不顾，在宫内设了一间拜佛堂。世祖则建了圆觉寺（今日的塔洞公园），并通过他设立的刊经都监出版了用训民正音阐释的佛经。这样佛教有所复苏，重建了一批庙宇，僧侣人数也有所增加。

但是成宗时，再次采取了强硬的压制政策，以至于干脆废止了僧侣注册制度，完全禁止削发出家。接着于 1507 年废止了以前遴选僧侣在佛教机构统治集团中任职的考试程序。这一做法表明佛教与国家的正式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明宗在位时（1545—1567 年），在文定王后摄政下，著名的普雨和尚鼎力扶助佛教，佛教界一度也有了一些生气。在当时，奉恩寺成为禅宗的主要寺院；奉先寺成为教宗的主要寺院也是在这个时期。“僧科”也是在这个时期重新开设的。但是文定王后死后，佛教又遭到镇压，成为主要是妇女们信奉的宗教了。

第十章 士林势力的成长

第一节 勋旧势力支配下的社会变迁

勋旧势力的统治

以上已经说过，在朝鲜早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是两班士大夫。但就是在这个阶级内部，实际掌握李朝政权的只是它的一个特殊部分，通常称作勋旧势力。

勋旧势力是指像郑道传、赵浚这样一批人士，他们在帮助李成桂创建王朝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并得到了李成桂给予的优渥赏赐。他们也站在继位的国王一边，参与王朝各项制度的规划，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还被载入“功臣簿”，并得到大量恩赐。如果尺度放宽一些，连世宗时期集贤殿的学者都属于这个集团。但是自从成三问等“死六臣”连同其它学者于1456年被世祖处死后，勋旧势力开始由郑麟趾、崔恒、梁诚之、申叙丹、徐居正这样一些最重要的人物组成。他们构成了掌握统治权的政治势力，占据高位，广有田产奴婢，这些财富大部分是世宗和世祖对他们的特殊功绩的酬赏。他们既是学者也是官僚，精通几科实用的学问，也参与官书的修订。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住在汉城周围，因而这股势力也可称为“近畿派”。

此外，也有许多人对勋旧势力感到不满。首先是那些抛弃仕途生涯的人，有的一直闭门隐居，有的则远离京城居无定所。他

们援引儒家一臣不侍二主的原则，将世祖的篡位斥之为不仁不义之举，就是说，既已向先主宣誓效忠，如再效力于武力篡位之王便会感到无地自容。包括金时习在内的“生六臣”就是这样一类人。金时习的才能为世人所知，但他一生以和尚身份飘流四方，以赋诗作文来抒发未竟之志。

那些蔑视当时社会，用清淡度日来维护自己道德完善的人士组成了另一个不满集团。其中有南孝温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以中国古代的“竹林七贤”为楷模。这个集团还包括被法律排斥在官府之外的王室成员和地位卑微的地方乡吏阶层。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他们在官府任职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于是这些人便以诗歌和狂放不羁之谈来渲泄愤懑之情。

因此勋旧势力的统治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只是他们享有稳固的政权地位，又拥有大量田产，这样才保住了他们的经济基础。

农庄扩大和贡税增加

刚才说过，可以称作勋旧势力的两班官僚拥有大量田产。他们先从政府那里得到科田，然后又得到大量的“功臣田”。太祖建立王朝时以及后来每逢王位继承发生危机——太宗与其兄弟的争斗、端宗被逐、世祖巩固他的王位时，继位的国王都另外赏以功臣田。正如已指出的，这些土地可以永远占有。此外，两班官僚扩大他们的地产还有其它一些办法，如通过购买，直接强占或开垦荒田。他们的眼光特别盯住占全国三分之一良田的南部三省的公田，并逐渐侵占了这些沃土。在职田法被废除后，两班官僚对土地的贪欲更加强烈，因为这时保证他们生计的唯一办法是扩大个人的地产。

田产的扩大一方面造成了政府税收的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农民生活更加贫困。最终为了使两班官僚生活富裕而以地方特产和手工艺品等名目课征的贡税，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痛苦。因为不仅贡税的数量不堪忍受，而且交纳的程序极其繁琐。结果，产生了一种“防纳制”，按这个制度，有权势的人将贡物交给国家，然后向农民征收贡物费，这样一来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由于不能履行交税义务，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于是负担都转嫁到其亲属和邻居头上。为了革除这些弊端，后来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李珥于16世纪中期曾提议可以用稻米来交付贡税。然而两班官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动作是非常缓慢的。

兵役制度的改变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苦难。起初，个人的兵役和家庭的劳役是截然不同的，但按照保法制（农民征募制要求轮流服兵役，并要直接负担正在服兵役的正兵）列入军籍的人数大大增加，因而不能满足服劳役的名额。此外，当时士兵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因为服劳役而被调来调去，为了逃避这双重负担，他们便利用保人提供的实物资助，另外雇入来替自己服劳役。但后来下令代役金直接由地方上负责调配服役人员的官衙经手。而一旦代役金由官衙经手，它们便使用官私奴婢、无地流民来抵役。但因为代役金少得可怜，为了规避这种负担而逃跑的保人和正兵越来越多，以至军队没有兵员，村庄荒无人烟。

最后，还谷制度变成了另一种损害农民的高利贷，使得农民的处境更加悲惨。原本规定冬麦下来之前的春荒时节向缺粮的农民提供粮食，秋收时再归还所借的粮食。粮食借还最初都由义仓管理，但由于义仓贮粮不足，于是改为由管理物价平准的政府机构常平仓来负责此事。但归还借粮时，需加上名为“耗谷”的利息，虽然按规定利息为10%，但官府耍了许多花招来提高利息率，

这样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凡此种种都使得农民生活朝不保夕。许多人被迫流浪，村庄被任其荒芜，而各地盗匪猖獗。最有名的盗匪头领是林臣正，1559—1563年这三年间他活跃于黄海道地区。

第二节 士林势力的登场

士林的进退

以往一直由勋旧势力统治的李朝社会，由于成宗在位期间人数众多的乡村士林登上了中央政府的舞台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士林”一词通常指根基在乡村的两班学者集团。他们是一股宁愿通过乡厅对国家管理施加影响而不想在中央谋求一官半职的势力。

在庆尚道的士林中，许多人奉行吉再的处世原则。吉再拒不接受李朝官职，一直矢忠于高丽王室。金宗直（吉再的大弟子之子，1431—1492年）和金宗直自己的门生金宏弼、郑汝昌、金驹孙出现后，这个集团成为颇有影响的一股力量。作为最尊重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学问的儒家学者，他们的学术是一种理想主义和道义上的追求，而有别于京城学者官僚们的学术。起初他们致力于农村青年人的教育，当成宗为防止勋旧大臣权势进一步膨胀而授予他们官职时，他们才在中央官府中露面，主要在御史台和弘文馆供职，负责监察和拟制某些公文。不久勋旧大臣与士林这两股势力之间便发生了冲突，结果造成了一连串的政治迫害，史称“戊午士祸”。

第一次“士祸”，即戊午士祸在1498年爆发于燕山君统治时期。这起事件之所以也称为“史祸”是因为它肇始于官修史书

《成宗实录》的一篇文章。当时，金宗直的弟子金驹孙正以史家身份编修官史，他将他老师的一篇文章“吊义帝文”收入他的史稿之中。在这篇文章中，金宗直用隐喻的手法借哀悼中国年轻皇帝义帝死于项羽之手来批评世祖篡位又处死其侄儿王端宗。成宗之子燕山君继位初年设立了《成宗实录》的编修馆，这时发现了金驹孙的史稿，勋旧大臣便怂恿燕山君下令处死金驹孙以及同他有牵连的人，一时间大批士林遭到了流放。结果，士林的势力急剧削弱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燕山君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给国家财政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燕山君甚至企图没收勋旧大臣的土地和奴婢，他们自然极力阻挠王室的决定。于是，燕山君回过来找机会消除一切反对他行使王权的势力，当因联姻而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一伙廷臣挖掘出前朝成宗配偶被废黜、而后燕山君之母尹妃被处死的事件时，燕山君便再次发动了清洗。他在激怒之下，这次不仅下令将勋旧大臣而且将许多在1498年清洗中幸存的士林处死或流放。第二次大清洗发生于1504年，史称“甲子士祸”。

充满恐怖的两年之后，燕山君的暴虐放纵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终于遭到了逃脱了他的清洗或原来曾支持过清洗的官僚的反对，被撵下了王位，由中宗取而代之。新君主与他的同父异母的兄长燕山君不同，倾向于抑制王权的独断专行和尊重士林的意見。中宗提拔了年轻的士林学者赵光祖（1482—1519年），很快委以显要的官职。赵光祖的政治目标是按照儒家的理想，以道义上的规劝来建立政府。他摒除了与儒家行为准则相违背的迷信，实施“公约”即一种倡导公正待人和必要时互助的地方自治方式。他也鼓励准备用本国语翻译儒家的重要典籍，以便在广大民众中灌

输儒家思想。他还提议并保证实行“贤良科”，要求京畿道邑的负责官员推荐品行端正的人士参加廷试以备官府录用。结果使更多的士林有可能在政府中谋到高级职位。随着赵光祖及其派系的权势的增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勋旧大臣的嫉恨，不久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促使国王来打击这些年轻人。赵光祖曾发动一场攻势取消了许多“靖国功臣”的赏赐。他先把封赏过多的人列出来，然后让国王从13年前颁布的“靖国功臣簿”中删去76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在以后的4年中，忿怒不已的勋旧大臣利用中宗担心王位倾复的恐惧心理，挑唆他逐走了改革派，处死了赵光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这起事件发生于1519年，史称“己卯士祸”，这场清洗对士林势力是个致命打击。

1545年又发生了一场清洗即“乙巳士祸”。这次清洗是围绕中宗的两个后妃之子（年龄仅相差8个月）继承王位事件引发的。中宗逝世前，两班官僚围绕两个后妃之子已形成不同的派系，虽然这些派系实际上属于同一个有影响的贵族小集团。中宗的长子仁宗继位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那些赞同赵光祖和“己卯士祸”人士的人们已经得势。但是仁宗过早死去，从而导致11岁的明宗继位和他的意志坚强的母亲在幕后掌权，便又开始了一场清洗。许多士林领导人再次被迫沉默，而那些随意发动清洗的人却因靖国有功而受到奖赏。

四次士祸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是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勋旧势力与士林之间的权力斗争，而这场冲突是由于士林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央政府的舞台上而引发的。在半个多世纪里，士林作为一次次清洗的牺牲者遭受了一次次的打击。但是尽管遭遇了这些挫折，他们仍缓慢而稳步地掌握了政治统治权。

书院和乡约

在一次次的士祸中，士林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不过，士林凭借在京城以外地区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势力通过书院、乡约和田产仍不断地发展。在宣祖统治时期（1567—1608年），他们又能进入京城官府并最终左右了政局。

单纯与教育有关的私学“书斋”自高丽末期就已存在，但像书院这种兼作供奉先贤的祠庙的学校却是首次出现。先贤的奉祠为学校的权威带来了一种灵光。最著名的是庆尚道丰基郡郡守周世鹏于1543年创办的白云洞书院。周世鹏为这所书院采用了中国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章程，以此纪念高丽著名儒学者安裕。稍后丰基郡郡守李滉（当时最重要的朝鲜儒家哲学家）请求国王为书院颁赐了题名为“绍修书院”的手书匾额。绍修书院得名便成为第一所赐额书院。

当时书院遍布各地，1608年即宣祖末期时已有一百多所。赐额书院的数目也同时增加，理所当然，政府很快便赐给这些书院书籍、土地、奴婢。这样书院在李朝逐渐取得佛教寺院在高丽时期所享有的地位，而推动其发展的正是士林。遭到士祸沉重打击的士林利用书院为工具，为他们的复兴和重新掌权奠基铺路。

乡约是士林用以巩固其在乡村地位的另一种手段。乡约的精神体现在它所强调的四个目标上，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赵光祖于1519年试图推行乡约，但由于他的下台，这方面的努力也失败了。后来，乡约虽然在有一定基础的一些地区实施过，但在全国广泛实行则是在宣祖时期。执行乡约的通常是当地士林中有权势的人物，不过普通农民也在其中。结果，士林实际拥有的对农民的影响力超过中央政府所任命的郡守和其它地方官员的权威，这进一步巩固了士林在地方社会的地位。

士林的生活来源不仅依靠汉城官府的俸禄，而且要靠他们在地方上的农庄来维持。因此，虽然他们可以接受任命去中央政府任职，但这决不意味他们要切断与自己的土地和故地的联系。因为他们抛弃了故地就等于抛弃了故乡和亲族。然而仕途生涯结束以后，他们是要返回养育他们的土地去度日的。而且，创办书院要靠这些土地提供经费，执行乡约也要这些亲族一道参与。士林的胜利正是靠这些社会经济条件才取得的。

党争的发生

士林的复兴，再加上其它许多因素，如和平、人口增长以及他们当中科举名额的增加，导致两班中担任官职的人数显著增长。但是两班乐于担任的官职基本上是固定的，在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如果两班阶级中许多人都想占据这为数有限的官职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抗与冲突。朝鲜历史上的“党争”就是这样发生的。

党争早在宣祖在位时便已开始，通常定为1575年，对抗的这两派官员分别以沈义谦和金孝元为核心。这两人冲突的直接原因是争夺吏曹“铨郎”这一既有权又备受尊敬的职位。虽然铨郎只是中级官职，地位在宰相以下，但这个职位负有推荐和挑选候选人就任某些要职的重任。此外，铨郎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还在于如果想要稳步升任卿相一类高官，一般都必需在铨郎这个位置上任过职。因为权力由铨郎行使，连吏曹判书也不得过问铨郎职位任命，而由在职者推荐其后继人便成了惯例。起初声望很高的年轻官员金孝文被推荐担任铨郎，而当时任吏曹参议的沈义谦却谴责他奉迎权臣，反对这一任命。但金孝文最终还是获得了铨郎职位。

当他离任时，沈义谦的弟弟被提名为有潜力的继任者，这时金孝元从中作梗。不久，两班官僚开始形成相互敌视的两派。以东人和西人相称的这两个派别便是由于这种有人事权的官职所引发的事件而产生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李朝党争的性质。

朝鲜党争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朋党之争，党人基本上是前世已定，代代相续的。党人的子孙一代接一代接任本派的职位。他们同族人也参与本派的政治活动，而且他们在农村有地产提供经济来源，使这种朋党斗争可以一直进行下去，这种性质的党争也不可能因某起事件、某次胜败而终止。即便一个党派暂时失势，失去了他们在农村的某处地盘，其后代也会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为其前辈雪耻。结果，党争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卷入倾轧的不仅有中央政府的官吏，也有全国各地的士林。

随着党争的激化，书院不仅是学术的殿堂，也变成了朋党争辩的场所。统治集团的儒家价值体系意味在教育同族子弟过程中形成的师生关系恰似父子血缘关系一样对个人行动的自由主动性具有约束力。老师的看法尽管可能有错，他的弟子也不能反对。这种师生情谊不仅保护了他们共同经历所形成的联合，而且在党争和出仕问题上也使他们立场和行动一致，从而形成了一种超越任何是非的牢固团结。

第三节 同日本人和女真人的斗争

壬辰倭乱

16世纪中叶，朝鲜沿海一带开始受到日本人的零星攻击，政

府设立了备边司，这是一个由文武官吏联合办事的机构，政府并将国家防御事务都委诸于这个机构。但是两班官僚习惯于息事宁人的方式，满足于采取一些权宜措施。而正在这时，日本国内出现了新情况，丰臣秀吉结束了所谓战国时代的内乱。在统一全国后，丰臣秀吉力图显示他对海外用兵的才能，以此巩固和安定日本国内，海外见闻也使他跃跃欲试。他内心萌生了一个雄心勃勃不顾后果的念头，发动一场经由朝鲜进击明帝国的战争。

日军于1592年春在釜山登陆，釜山使郑拨与东莱府使宋象贤在两处滩头防御，直至战死，但最终还是陷于敌手，而后日军分三路向北进攻直趋汉城。张皇失措的政府这时寄希望于申砬，申砬在与北方女真人作战中赢得过胜利而闻名一时。但是申砬在忠州战役中遭到了失败，于是宣祖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派他的两个儿子到咸镜道和江原道组建新军保卫王国。

政府的无能和不负责任激怒了广大民众，当宣祖和大臣弃城出逃时民众拦住他们的去路，愤激地责骂他们。国王及随从弃城逃跑后，城内的奴婢纵火烧毁了存放奴婢花名册的登记处和刑曹官署。两个王子发现没有人响应他们的号召准备战斗，最后也被日本人俘虏了。政府官吏要对这一切惨状承担罪责，他们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听任村舍夷为废墟。整个国家几乎毫无防御，饱受了日军的蹂躏。入侵的日军有陆战的经验，在日本战国时代曾喋血沙场，并且拥有火器。因此没有理由指望缺乏训练、经验不足的朝鲜军队能够抗击他们的攻势。

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将军就是在这个时刻开始在斗争中崭露头角的。他在就职的前一年，已痛感需要加强国家的水军力量，并且精力充沛地着手建造战船，训练水手。特别是他仿照15世纪中期使用的船只样式建造了著名的“龟船”，这种船有一层保

护盖（是用铁板做的），可抵御敌方的箭矢和炮弹。他还在船的四周放置了大炮，另外还嵌入了无数枚尖铁以防敌人靠拢，以便任何一边都可以攻击。准备就绪后，李舜臣带领其战船前往日本舰队出没的水域。在玉浦他首战告捷，接着在唐浦、唐项浦、闲山岛和釜山也取得了胜利（见下图）。闲山岛外的海战在抗倭战争的三次大捷中是特别著名的一次。李将军的成功使海上的航线完全处于朝鲜军队的控制下，结果粉碎了日军从海上北进与陆军相呼应的图谋。而且，盛产粮食的全罗道一直安全地留在朝鲜人的手中，也归功于李将军。不仅如此，李将军的军事行动还威胁了日军的供应线，迫使他们不得随意发动新的攻势。



倭乱海战图

同时，在内地，义军四处涌现。民众以前对政府募兵漠不关心，而现在却自动拿起了武器保卫家园。有一个地区，两班农民和奴婢都聚集在一位义军首领的周围。随着他们力量逐渐壮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展。义军首领一般由当地有声望的士林担任，其中杰出人物有赵宪、郭再祐、高敬命、金千镒、郑文孚。赵

宪在忠清道沃川起兵，曾将清州日军击溃，在攻锦山时被杀身亡。郭再祐在庆尚道宜宁集结义军，将日军撵出宜宁、昌宁地区，他还联合金时敏挫败了敌军首次占领晋州的图谋。高敬命带领一支义军离开他的家乡个罗道长兴向北进发，但也在进攻锦山时战死。金千镒不断骚扰在水原附近的日军，稍后又参加了第二次晋州战役，并死于这次战役。与此同时，郑文孚活跃于北方咸镜道，收复了镜城和吉州，还迫使日军撤出江原道。以上不过是遍地兴起的大小数百支义军的缩影，其中甚至有休静和惟政这样知名的高僧领导的僧兵。朝鲜义军的偷袭强攻常常给日军的军事活动以沉重的打击。

这时，明朝五十万救援大军也到达了，明军在李如松率领下，收复了平壤，并向南追击日军。但明军在汉城正北的平安道战败后，撤回到平壤，在那里一度按兵不动。朝鲜军在权慄领导下则夺取了汉江北岸的幸州山城并欲同明军一道收复汉城。但是明军撤到平壤后朝鲜守军便陷入孤立受敌的境地，日军对他们的阵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在每次鏖战中都打退了日军，幸州大捷被认为是1592年抗倭斗争中三大胜利之一。

和议在进行时，日军已撤退到庆尚道东南海岸。这时早先进攻晋州而被金时敏击退的日军再次来犯，尽管金千镒和黄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晋州最后还是失陷了。抵御两股日军围攻的晋州防御战的激烈程度并不比幸州之战稍逊，晋州城的第一次固守在朝鲜三次大捷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击退日本人和战争的后果

在日军入侵的第一次高潮中，其陆军横扫了整个国家，但是

海军被打败了，并且丧失了制海权。此外，在朝鲜义军的袭扰下，日军正设法向南撤退。同时，日军从汉城撤退的行动也终于触动了在平壤的明军。但是明军并没有与日军交战，只满足于防止日军重新纠集，再次北犯。这种形势导致了明朝与丰臣秀吉开始和议，但是谈判最后还是破裂了。一方面，中国试图在贡纳制度方面给日本方便以使形势对自己有利，许诺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授予他对明朝正式入贡贸易的特权；至于丰臣秀吉，则以胜利者自居，竟提出一项不现实的荒谬建议作为回答，要求明朝皇帝出嫁一位皇女为日本皇帝的后妃，割让朝鲜的一部分给日本，并将朝鲜的一位王子和几名高级官员送到日本作人质。由于谈判双方在以上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所以无法指望谈判会取得成功。

在旷日持久的和议破裂后，日军于1597年发动了第二次征服朝鲜的入侵。不过，这一次，事情的进展不像日军预计的那样，因为这时朝鲜人已经装备起来并做好了准备，而明朝援军也迅速采取了行动，结果，日本陆军只能在庆尚道交火中取得局部胜利。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在海上的行动则异常凶猛，其原因在于，李舜臣将军在汉城方面的阴谋反对下，被解除了三道水军统制使，改由元均来代替，而后者在一次与日舰的遭遇战中竟使全军覆没。惊恐不安的政府急忙重新启用李将军，李将军指挥仅有的几艘战船，与日军正驶向鸣梁口外黄海的舰队遭遇，并取得这次海战的大捷。日军被迫龟缩到南部和东南沿海的狭小地带，发现自己在海陆两方面陷入包围。此时正值1598年中，丰臣秀吉亡故，日军借机于年终前全部撤出了朝鲜半岛。为了全歼撤退的日军，李将军在露梁海上身中流弹壮烈牺牲。

在7年的战争中，整个朝鲜几乎有8个道沦为日军抢劫屠戮的场所，庆尚道的损失最严重。人口锐减，乡村荒芜，饥馑与疾

病流行，正是这种状况推动了战后《东医宝鉴》一类大型医书的编纂。为了克服粮食匮乏造成的财政困难，政府靠卖官鬻爵来换取一定数量的纳粟。由于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地还不断地发生民乱，其中以李梦鹤于1596年在忠清道发起的最严重。此外，由于土地台帐和户籍册遭到了毁坏，政府难以课征租税和征发徭役。日军纵火使文化宝藏受到重大损失，包括庆州的佛国寺和景福宫的木结构建筑，当时四处史库中有三处史库的藏书化为灰烬。另一方面，与日军交战促进了战术发展，如明朝军队采用的浙江兵法，还发明了如飞击震天雷和机动火箭发射器一类新武器。

壬辰倭乱不仅给朝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场大战乱也震动了整个东亚，当明朝忙于朝鲜事务时，女真人在满洲迅速壮大了势力，不久便征服了明朝而入主中国。在日本，德川家族也建立了武人政权。应日本的请求，朝鲜从1606年起建立了与德川幕府的友好关系，但是朝鲜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此后仍长久存在。战乱不仅引起了东亚各国的政治变迁，也具有明显的文化影响。有技术的朝鲜陶瓷工匠被当作战俘劫走使日本人受益匪浅。这些工匠大大推进了日本陶瓷工艺水平。日本从朝鲜抢走了大量的书籍，这对日本学术的发展特别是性理学的研究也很有贡献。

丙子胡乱

内外交困的宣祖将王位传给了光海君(1608--1623年)，光海君在指导内政外交上表现了不同寻常的才能。他在国内重大的政绩有：重建了史库，印刷了许多书籍，重新厘定了牌号制。在外部事务方面，光海君灵活的外交政策使朝鲜免于卷入大陆发生的

冲突，在大陆强大的女真满人的兴起造成了对朝鲜有危险的新形势。当明朝派军队到满洲进攻满人的后金国时，光海君不能拒绝明朝要求帮助的请求。但是他在派出姜弘立将军率领的一万多名军队时却暗中命令将军要审时度势谨慎行动。这样，当战局不利于明朝时，姜将军找机会便归降了满人。结果，这次满人没有对朝鲜采取征伐行动。与此同时，光海君还不遗余力地整军经武，修复防御据点，更新武器，制定训练计划。就在光海君全力巩固国防的过程中，西人派将他撵下王位，拥立仁祖继位，史称“仁祖反正”（1623年）。

仁祖在拥立他继位的西人派的影响下，抛弃了光海君谨慎观望的立场，转而支持明显的反满亲明政策。这一转变被满人视为严重的冒犯。明将毛文龙在鸭绿江入海处朝鲜的椴岛安营扎寨，作为他收复辽东半岛计划的第一个步骤，这进一步引起了满人的警觉。后金人这时感到在大举进攻明朝之前必须消除朝鲜和毛将军对其后方所造成的威胁。

适逢其时于1624年初发生了李适的谋反。李适是拥立仁祖反正的功臣，但因得到的酬赏低于他认为理应得到的规格而怨恨不已，于是起兵谋反。他一度甚至占据了汉城。虽然不久政府军队将他击败，但是他的一些同伙逃到满洲，敦请后金进犯朝鲜匡扶光海君。至少，后金是在匡正的借口下于1627年发动第一次入侵的，史称丁卯胡乱。后金一边派出几支人马攻击椴岛的毛文龙，主力部队则迅速南进直抵黄海道的平山。至此，朝鲜被迫求和。后金同意军队撤出半岛，交换条件是朝鲜保证像侍奉兄长一般尊奉后金。

不久，后金太宗皇帝改国号为清，并派使节前往朝鲜，要求朝鲜承认其宗主权，但遭到朝鲜的一致反对。仁祖拒不接见清廷

使节，也不接受他们带来的文件，结果招致第二次入侵。1636年，清太宗亲率大军来犯，史称丙子胡乱。仁祖已先将王子妃嫔送到了江华岛避难，但因通往江华岛的道路受阻，他本人只得改去汉城正南方的南汉山城。不幸山城给养匮乏，援军没有到达。更糟的是，不久江华岛陷入敌手，王室避难成员成了阶下囚。仁祖听信了崔鸣吉等主和派的倡议，决定归降清朝，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松坡）与清太宗签订了城下之盟。根据投降条款，仁祖立誓与明朝断交，交出两个王子为人质，向清朝俯首称臣，派军队助清反明等。结果，昭显世子与凤林大君兄弟二人作为人质随清军而去，洪翼汉、尹集、吴达济等三位激烈反对议和的文官被拘后处死，年高望重的金尚宪以67岁的高龄也被投入清人的牢狱囚禁了三年之久。

与倭乱相比，清人的入侵历时较短，朝鲜仅有小部分变成了战场，遭到的损失也相对较轻。但清军所到过的朝鲜西北部地区，由于抢劫和屠杀却是满目疮痍。由此激起的不断蓄积的仇恨，在朝鲜文化优越感的作用下终于迸发成对清的强烈敌意。行侠仗义的军官林庆业联名反清的方案和仁祖继承人显宗（前凤林君，被抓去当了8年的人质）发动北伐的计划都源自于这种郁积已久的敌意。同时，显宗修缮北汉山城和南汉山城的要塞来加强国防。

第四节 士林的文化

性理学的繁荣

士祸频仍使许多士林放弃了从政的念头，而以前所未有的精力转向以书院为中心的事业上，即研究学问和教育年轻一代。脱离官场后，这些学者自然对实用学术也冷淡起来，而对思辩的和

理论的研究则发生了兴趣。他们发现性理学最适合他们的治学兴趣。这也是他们兴趣转移的一个原因。性理学是一种试图通过证明“人性本善”的前提为儒教的教化政治确立伦理根据的学说，但它也是一种力图发现宇宙万物本源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当时，迫切要求产生一些大思想家，能以他们的著作繁荣朝鲜的性理学。

性理学把所有实体分成理和气这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理是事物构成的根据，说明事物是什么，怎样运行或应当怎样规范地运行；气则是事物生成的具体材料。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没有气，理便不能具体有形地存在；而没有理，气只能是没有形状没有方向的能量。基于这种理气二元论，朝鲜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性理学，一派着重强调理，另一派论证气是首要的。

主理派的最早的思想家是李彦迪（1491—1553年），但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是李滉（1501—1570年）。李滉是朝鲜哲学史上的一位伟人，有朝鲜的朱熹之称。他在阐释朱子思想时进一步阐述了理在人类精神作用中的地位，强调个人体验和道德的自我修养是学问的本质。他继承了朱子的理气二元论，认为二者是构成宇宙的根本，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但是他特别强调理是主宰和制约气的最高本体。这种主张显然是以理为主。主理说认为理解作为宇宙根本的理比认识支配大量个体现象的原则更重要。进而言之，这种推理承认由理来规范并以理为存在依据的人的道德意志的重要。由此派生出一种高度评价个人内在体验的内省趋势。因为它存在于个人对道德原则的感知中并在发现个人完善和精神本质的实践中实现。继李滉之后，主理派的传人李滉的弟子柳成龙（1542—1607年）、金诚一（1538—1593年）和郑逵（1543—1620年）等人，被称为岭南学派。它对日本的儒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后成为近代日本儒教思想的主流之一。

主理说遭到主气说的反对。徐敬德（1489—1546年）是主气说的早期代表人，他毕生从事学术事业。奇大升（1527—1572年）在他与李滉的争论中也强调了气的作用，但是主气说的集大成者当推李珥（1536—1584年）。主气说认为形成宇宙万物的基础是物质的、有活力的气，而不是理这种神秘的力量，这种观点最终导致认为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主气派认为应尽力主张真实地把握支配物质世界的事物的规律。作为朱子哲学体系的继承者，主气派也强调探索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但其方法偏重于外向而不是内省，偏重于求知而不是灵感，因此他们尊重外在的经验和学识的广博。于是，在朝鲜性理学内部派生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派。李珥不仅以哲学家而知名，而且以其对政府、经济、国防提出许多改革建议而享誉一时。他支持的主气派经由其同代人成浑、宋翼弼和弟子金长生、郑晔等人的传统而成为后来的畿湖学派。

谱学和礼学

在以士林为中心的两班社会，同姓同宗的血缘集团即宗族或其支系已经成了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一个人与其宗族或支系中的权势人物有什么关系在编定的族谱中都列了出来，族谱从纵向确定了血统关系，从横向记载了同族关系。从这时起之所以广泛制作族谱是由于族谱不仅可以确定享有各种社会特权的两班的身份，还可以表明与同族的其它人士的关系。通过族谱，可以确定自己与同族中知名人士的关系。正是两班的这一需要引起了朝鲜谱学的发展。背诵族谱已成为两班应当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

正如谙熟同族内各种关系是一门重要的学问，通晓由于同族

关系而必须遵守的丧葬祭礼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即礼学。从性理学传入朝鲜之时起，家礼便一直接《朱子家礼》的规定来执行，但朝鲜两班执行这些家礼不仅草率从事，而且颇不情愿。这时出现了金长生的《家礼辑览》等著作，为礼学作为一门学问奠定了理论基础，金本人也被誉为朝鲜礼学的泰斗。金长生认为礼学的真正宗旨在于自觉实践和身体力行。其子金集继承了他的事业。此后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有许多著述问世。

歌辞和时调

李朝中期，抒情歌辞广泛创作，代替了深受汉文学影响的景几体歌和用汉文写的宫廷乐章。这种歌辞是一种散文诗，常写成数行，每行包括两个4音节的语句，因此这种体裁表现了典型的朝鲜抒情诗的特点。通过歌辞士林生动地表达了他们对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自然美的深切感受。诗人郑澈很喜爱歌辞，创作了《关东别曲》、《思美人曲》和《续美人曲》等作品，时调诞生于高丽晚期，而在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已成为用朝文写的本国文学的重要样式。虽然，有时它被看作是浅薄的诗，但已经成为教育每个两班的重要教材。政治家、学者和武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时调作品。因此，可以说两班对于他们社会生活的感受通过时调这种形式真切地表达出来。

李朝的时调文学，成形于朴仁老（1561—1643年）和申钦（1566—1628年）等人，经尹善道（1587—1671年）之手臻于极致。当然，还有无以数计的其它时调作者，他们演唱的题材多种多样，有些时调表达了对国王的忠诚，有些则向人们灌输道德信条；有歌颂武士勇敢精神的短章，也有抒发对倭乱与胡乱满腔仇

恨的篇什。还有一些时调赞颂了自然之美，倾诉了希冀在自然界找到避难所的渴望。精于时调的尹善道的《山中新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他在《五友歌》中写道：

你问我有多少朋友？
水石和松竹；
东山升起的月亮，
我也欢迎你。
这五友已足矣，
何须更多！

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渴望在小溪、礁石、松树、竹篁和月亮这五位友人的陪伴下体验安宁静谧生活的乐趣。他将充满政治斗争的世界抛在脑后，试图在一种正直的生活中找到慰藉，然而却是枉然。应当指出，时调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都是写这样的主题。

第十一章 广作农民和都 贾商人的出现

第一节 閔閔政治

閔閔政治

东西两派分裂伊始，东人便很快占据了优势并压制了西人。东人主要由李滉和崔植的门人组成，而西人当中有李珥和成浑的许多追随者，派系分野与哲学思想上的学派分歧有密切关系。但在东人内部，围绕西人郑澈提出的王储问题（宣祖没有合法子嗣，需指定一名后嗣继承他的王位）派生出两个支派。这两个支派随即发生了冲突，被称为北人的支派敦促严厉谴责和惩罚西人，而对立的南人支派却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从哲学渊源看，南北人之争代表崔植门生与李滉门生之间的龃龉不和。壬辰倭乱后的几年，北人巩固了权力对光海君的继位发挥了影响，因而光海君即位期间，他们控制了政治舞台。而在野的西人则一直等待时机，当光海君因政治失控受到指责，并于1623年被罢黜时，他们便支持了仁祖反正。此后很长时间西人基本上是独行其道，特别是孝宗在位时期（1649—1659年），由于国王以前的老师宋时烈（1607—1689年）身居高位，这样他们的政治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当然这不是说，西人没有遭到对他们掌权的挑战。在孝宗母后赵太妃的丧服引起的争论中，西人被迫放弃了权力而由南人来取代（1674年）。当肃宗长期无嗣提出要立他的爱妃张禧嫔的新生

子为王太子，西人顽固反对，从而再次导致他们的失势，宋时烈还招致杀身之祸（1689年）。每逢这种情况，南人才能掌几年权，因此实际上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的是西人。同时，西人本身也分裂为宋时烈为首的老论派和聚集在尹拯周围的少论派，此后掌权的主要是老论派。

在长期的党派政争中，特别是在老论派当中出现了某些世代掌握权柄的阀阅世家。这些世家利用他们把持的高官显宦，操纵科举和官职的任命，以确保他们子弟的升迁，从而使他们永远掌权。两个世纪前，士林出现在中央政府舞台，争夺勋旧大臣牢固占有的特权。到16世纪末，性理学在哲学和社会准则等方面的学说已被普遍接受。但是这个时期的政治遗产是党争不断和权力集中于属于老论派的少数阀阅世家手中。

许多士林既然被摒于政治参预之外便力图以各种活动来实现作为宗族成员或某种学术传统的传人的抱负。他们在农村的住所附近建起了书院，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新的寄托，在那里既能教育年轻人又能传衍士林前辈的教义。结果，在肃宗统治期间（1674—1720年）建立了近三百所书院。这些绝意仕进一心办学的学者们关心的是古典学问和道德操守而不屑于讲授科举时文。他们代表了儒学的主流，赢得了儒林敬重，被誉为“山林”。同时政府为防止他们离心离德也采取了一项措施，有时授予他们一些特殊的头衔，如太学的祭酒，这一官职在理论上要主持国家的儒教仪式。他们愿意以这种方式作出某些让步与阀阅世家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所用。

荡平政策

西人特别是老论派的政治统治以及少数阀阅世家行使政府权力所引起的反应，也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许多因此而被禁止担任任何重要政治角色的人对李朝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失去了信心并怀恨在心。这些人批评将性理学奉为至上，他们发现了可以自由而不拘一格地进行思考的精神源泉。实学思想作为改革李朝制度的另一种主要的方法，就是在这些富有批判精神的头脑中形成的。否定当时既存社会制度的各种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滋生植根的——郑鑑录的命课学，西学（天主教）的破坏性教义，阳明学的利己主义学说，对正统的朱子哲学的强烈谴责。同时，一直靠对立派别的均势来维持存在的王权现在面临一派掌权的威胁。因此，李朝采取了使各派势力平分秋色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荡平政策”。

荡平政策首先由英祖（1724—1776年）采纳，正祖统治下（1776—1800年）继续推行，其目的在于在委任官职方面给予所有人即所谓“四色”以同等优惠，四色指老论派和少论派，南人和北人。结果，党争相对平息，在两班官员中达到了一种新的均势，王权威望由于“英正时代”的长期政治稳定而得以大大提高。

但是荡平政策未能根除党争原因，倒可能激化了这种矛盾。因为这种政策的后果是使谋求官职的两班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时派和辟派之间的倾轧。官场中的两派围绕英祖下令残忍处死其世子庄献太子的问题而形成，时派对其命运表示哀悼，辟派则为国王的做法辩护。两派冲突已超越了党争，结果这时的政治斗争具有派中有派的复杂性。

第二节 税收制度的变革

大同法的实施

随着政权日益集中于少数阀阅世家手中，国家面临的财政状况也愈益严重。土地在战时已经荒废，可耕地日益减少。更糟的是许多土地台帐散佚毁坏，未入台帐的“隐结”数量增加了。结果可征税地由倭乱前的 1,700,000 结减少到光海君在位时的 540,000 结，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国家的土地税也相应地急剧减少。如何改善租税不足状况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讨论了用稻米支付贡税这一完全不同的办法，这种想法早在倭乱之前就已提出。人们早已注意到许多问题都与贡税制有关。普遍实行“防纳”使纳贡人的负担更加苛重。农民唯一能做出的然而却是消极的反抗是继续逃离他们的土地以规避这种负担。提出“收米法”当时就是为了缓解纳贡人由于“防纳”的弊害而遭受苦难。

但是，这项提议在倭乱前终于没有实施。只是后来政府面临税收减少而带来的财政困难时，才同意以这项措施来代替其损失的岁入。在李元翼的催促下，该法于 1608 年首先在京畿道实施。1623 年推广到江原道，孝宗时期推广到忠清道和全罗道，最后于 1708 年在全国实行。

根据新颁行的“大同法”的规定，每结土地征收 12 斗米（只相当于收成的 1/100），可以用棉布（称为大同布）或铜钱（称为大同钱）代缴。负责征收“大同米”的机构叫做宣惠厅。政府由于需要生活用品继续向农民征收贡物，但贡税制基本上是废除了。从贡税演变成土地税对李朝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农

民的经济负担减轻了。此外，由于政府指定的“贡人”充当了采购政府所需物品代理商，从而促进了商业资金的积累。相伴也出现了按“贡人”定货生产商品的独立手工艺者。这些连带发生的情况引起了李朝社会的重大转变。

徭役的变化和均役法

壬辰倭乱时，李朝初年的五卫已名存实亡，如果撇开各地兴起的义兵，国家已没有值得一提的军事力量。不过，在壬辰卫国战争期间，为训练兵员设立了“训练都监”这一专门机构。要教会士兵掌握三种技能，成为“三手兵”即兼有炮手、射手和杀手的本领。这种训练计划取材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戚是一位在中国抗击倭寇中发展起来的《浙江兵法》的权威。从肃宗在位时起在京城地区创建了五军营，另外四个是樞戎厅、守御厅、禁卫厅、御营厅，并且从这时起，五军营成为李朝军队的核心。

从最初的五卫转变成新五军营不是某项首尾一致的计划或政策的结果，而是适应时机或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不是前后连贯的。新计划的一部分是征募半农半兵的乡军轮流戍守汉城，但不久便打破了这种规定，有偿兵制实际上成了使军队满员的主要办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壮丁一律免除兵役。农民如果要免服兵役就得每年交纳两匹棉布，来支付士兵的武器费用。换言之，交纳军布已单独成为另一种税了。

每年交纳两匹布并不是没有实在意义的负担。交纳军布的人便可以获得官府的默许免除兵役，所以这种税主要针对无法逃避的穷人家庭实施。他们肩上的负担确实很沉重，因为许多非法的做法使他们苦不堪言，例如将儿童登记为成年人再向他们征税

(称为口签),或将死者的名字留在税册上(称为白骨征布)。如果农民为规避这些苛捐杂税而逃离了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没有缴纳的税额要由其邻居和家属负担。这样一来又促使更多农民逃亡,农村更加贫困。

李朝国家以农业经济为命脉,很明显,它不能建立在农村荒芜的基础上。政府意识到军布税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军布税不可能马上废除,因为它是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两班贪墨之吏中饱私囊的源泉。政府一直对它能否制订一项计划通过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来保证财源没有把握。最后于1750年英祖才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布匹从二匹减到一匹,国家岁入损失由渔税、盐税和船舶税及粮食附加税来弥补。后一种税称为“结作”,除去最北的咸镜道和平安道外各道的收成一律按每结收米二斗的比率征课。这是一种使税负平均化的尝试,因此新措施称“均役法”。

然而,“均役法”名不符实。两班仍像从前一样免于交纳。而且,由于农民现在必须交纳税米来补偿征布的减少,因此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负担换成另一种负担而已。过去在征布中出现的所有弊端仍没有纠正,以致农民实际交纳的多于法定的一匹。不过尽管均役法有这些弊端,但作为阻止农民逃离土地的一种十分必要的措施,“均役法”还是有某些效果的,它毕竟多多少少地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

第三节 经济的增长

广作农民和农村人口的分化

从17世纪初起,农业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移秧技术有了发展。稻子先种在小块苗圃,生长到适当的阶段,再移植到

稻田里，这样同一块土地还可以用来种植冬麦。这种复种制（称“二毛作”）的好处全靠用水便利，无论是养苗还是移植大田都靠有水可用，所以灌溉工程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迫切问题。因此兴建了许多堤堰蓄水以供灌溉。1662年设堤堰司，1778年提出了一项维修全国灌溉工程的综合计划。到18世纪末，出现了6000座水库。广泛应用复种制的结果是农业产量明显增长。旱田耕作技术也有类似的进步。那就是，犁耕田地形成垄沟，种子播在沟里，这种畎种法很快就推广开来。

与直播不同，移秧法明显地减少了所需要的劳动力，以致一个农民可以耕作的土地增加了七倍。耕作旱田的畎种法也大大减少了所需要的劳力。结果，“广作”即一个农民独自耕作大片土地很快便成了普遍现象。利用广作法务农最先成功的一般是富农，他们变成了农业企业家，既为个人消费也为市场生产。这个富农阶层不仅利用自己家庭的劳动力资源而且雇佣农工。农业新技术用不了那多么劳力，这样大量的劳动力便不需要了，所以很容易在无业的农民中找到帮工。总之，新技术在农村带来了富农阶级和保不住自己小块土地的人们之间的分化。在这种耕作背景下，乡村无地劳动力当中大部分变成了其富裕邻人的雇工，而另一部分不是成为流民便是入伙当了盗贼。

实行“广作”的不仅有地主和自耕农，而且有佃农。佃农向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动力，实际上也就在从事“广作”，他们的经济状况也逐渐改善，这样又产生了有偿使用别人土地的赌租法。至此，打租法一直是通例，据此佃农固定地向地主交纳收成的一半。按这一制度，地主与其佃农平均分担生产费用和欠收的风险，而这必然意味地主主要就其土地如何耕种参预决策。这就经常使佃农不可能如其所愿地安排农事，因为地主的社会地位通常比他高。但

是现在出现了“赌租法”，佃农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以使用土地，同意生产费和风险费都由自己承担。这样他就从地主的监督下解放出来，第一次可以按他认为最好的方式经营。而且，在这种土地租佃关系中，地主与佃农身分差别缩小实质上已不能再插手干预。最后，从打租法到赌租法的逐步转变为现金支付代替实物支付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同时，专门作物的商业性生产也发展起来，特别是人参、烟草和棉花的生产。开城地区的人参尤其受人欢迎，几乎全部为上市销售而栽培。有一些甚至出口到中国和日本。烟草于17世纪初传入后，种植也逐渐推广开来。栽培烟草不单为国内消费，还出口到中国，从而导致烟草种植区逐渐扩大。烟草的赢利大于粮食的收益，因此一些上好的良田沃土被专门用于烟草栽种。至于棉花的栽种，这时也逐渐超出了自家消费而变成了为市场生产。

这样，一个新的平民地主阶级出现了，构成这个阶级的富裕农民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增加产量，通过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以及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发展来积累财富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富裕农民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甚至能买到空白的官职委任状，填上自己的姓名便享有通常为两班保留的某种官职的权利。同时，有些两班被罢免了官职沦为佃农。因此，即使两班与平民之间的身分差别没有消失，但在以经济财富为基础的阶级结构中，两者关系的性质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然，有许多农民陷入了像佃农一样悲惨的境地，还有一些农民则沦为雇佣劳动力或无地流民。但所有这些现象都清楚地证明，李朝社会的身分制度在发生着变迁。

都贾商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商业方面，最令人瞩目的发展是“贡人”的积极作用。由于颁行《大同法》废除了地方贡纳，政府所需物品从“贡人”这种采购代理商那里得到。采购代理商自然是特许的市廛商人、京邸吏和工匠，这些人都与以往贡纳制有联系。贡人先从农民那里收取税款，然后采购政府所需物品并将物品送交政府。但往往贡人是先用自己的资金采购运送货物，而后再收取农民的税款。在这一过程中，贡人逐渐积累了资金，因此，尽管他们担当的角色是政府的代理商，但在经济作用方面，已完全不同于过去靠不法勒索费用获利的中间人“防纳”。他们与汉城的“六矣廛”客主和旅阁做生意，也直接与生产商品的手工业者有业务往来。后来，他们发展成为专门的批发商人阶层即都贾商人，经手数量可观的某一类商品。

同时，私商在汉城和各地也日益活跃。他们的活动不限于他们的经营基地，还沿着交通干线扩展到各地的集市。如汉城的江商在京畿道和忠清道的汉江各段销售米谷、盐类和鱼产。由于要用船舶运送货物，所以他们开始在造船业投资，逐渐控制了这个行业。京畿道的开城松商还沿陆路将其活动扩展到北部的黄海道和平安道地区，南部的忠清道和庆尚道，在这些地区他们建立了分店“松房”。松商亲自经营人参的栽培，这是他们贸易的重要项目；他们也将人参或蒸或晒加工成常食用的那种“红参”。像私商一样，汉城的市廛商人则控制了手工制品的生产，并利用政府给予的特权地位，获得了对某些特别商品的专卖。因此，不论是私商还是特许的市廛商，这个时期的商人都是控制他们所交易的商品生产的都贾商人，都贾商业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商业活动形式。

这时的商人不仅在国内商业而且在国际贸易中也很活跃。特

别是在鸭绿江入海口附近义州的湾商与江中小岛和满洲凤凰市栅门的中国人进行的民间贸易。在釜山附近的东莱，莱商与日本的民间贸易也在进行。稍后，一种三角贸易发展起来，松商、湾商和莱商充当了经纪人，交易项目主要包括朝鲜的人参、中国的银和日本的铜。许多私商通过这样的国际贸易变成巨富，而在这类国际贸易中积累了资金的人当中有汉城中人阶层的译官。

随着私商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汉城商街的面貌也改变了。除最初的六矣廛外，市廛商人享有的特权于1791年完全废除，这个规定称为“辛亥通共”。在这种新形势下，汉城私商在梨岬东大门、钟楼（现在的钟路）和七牌南大门经营的三大市发展繁荣起来。在三大市中交易的不仅有朝鲜各地的商品，还有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商品。汉城市民可以从这些市场上买到各种日用品。

同时期，乡村集市也有很大发展。18世纪朝鲜有一千多处集市，规模较大的有常设地点。其中出现了为裸负商提供各种服务的批发商，他们被称为客主和旅阁。他们不仅包揽批发业务而且从事仓贮、托售、运输、旅馆等业务，还发挥银行的作用，办理借贷，发行支票和汇票，接受存款。这样便成了汉城以外地区的商业中心。

各种商业组织也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贡人首先组织了贡人契即行会保护他们的权利，市廛商人以六矣廛为基础也组成了称做“京都联合会”的行会来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在农村，裸负商也联合起来，组成了“裸负商团”以促进团体和互利。

商业活动的扩大需要更广泛地利用金属货币。自1678年铸制“常平通宝”铜币以后，钱币继续大量发行。到17世纪末，钱币已在全国通用，但最初铜钱不仅是交换媒介，还经常因本身有价值而被窖藏起来，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商人用现金而不是将货

币投入土地来积累财富，他们靠出借窖藏货币牟取高利来增殖财富。窖藏越多钱币越少，于是发生了“钱荒”，但尽管如此货币的使用仍渗入到各个遥远的角落，并加速了生产的商业化。这样，市场交易、支付工钱和交纳税款都用钱币进行变得越来越普遍，最后实施了规定地租要用货币缴纳的赌钱法。

手工业的新阶段

随着这个时期工匠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官营生产逐渐下降。武器和王室用瓷器的生产作为官营手工业仍维持了一段时期，但就是在这些领域私营化也是不可遏止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匠登记册不过是交纳匠人税的花名册。大约在18世纪末，工匠登记册也取消了。这标志所有行业的工匠都变成了不受官府控制的私营手工业者。

手工业的这一新发展对《大同法》的颁行有直接影响。这项法令规定官府需要的物品由贡入采购商供给，而如果手工业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生产充分满足官府所需各种物品的地步，那么《大同法》几乎不可能实施。另一方面，《大同法》实施以后，工匠现在按购买商的定货生产物品而收取现金作为报酬。

然而，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者还没有成为用自己的资金来经营的独立的生产者，大部分要依赖商人提供资金。一个手工业者在接受商人定货时，将得到原料和预付的工钱，因此，他只能向为他提供资金的这个商人出售制成品。这样，作为金融家的商人便控制了生产，而手工业者则处于工资劳动力的地位。例如，纸厘商人控制着造纸署的纸匠的产量，杂铁厘控制着冶匠的产量，面广州分院的匠人则依赖于资助他们的商人。在17和18世纪，这

是最盛行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但是同时，一部分手工业者开始自己生产和销售。例如，毛衣匠和刀子匠用自己的资金自行生产和销售皮围巾和妇女用的剃刀，同线镰和刀子镰的商人竞争。这种情况在铁器和黄铜制造业尤其突出。生铁匠本身享有对釜鼎炊具制造和销售的垄断。黄铜匠的情况也大体相似，他们集中于汉城南的安城和北方平安道的定州，用自己的资金雇佣劳工，在定期的上市日把产品出售给商人。他们与雇佣劳工签订契约，用现金支付工资。

在采矿业方面，为了生产出银来与中国进行非法贸易，在咸镜道的端川和汉城正北的坡州和交河开采了银矿。政府批准私人开采活动并收税，但税负沉重，私采人基本上是在为政府岁人开采。结果，官方许可的矿井的数量不断减少。后来，金矿的重要性超过了银矿，便在平安道东北部的慈山和成川及黄海道的遂安开采起来。用淘盘提取砂金更吸引人，这种方法需要的设备比开矿需要的设备简单。官府还批准在遂安和宁越等地开采铜矿以供铸铜币的需要，但是提炼矿石方法落后，税收又过重，不可能有很大发展。结果，铜矿开采逐渐避开官府进行，这些秘密开采使用了工资劳动力。

第四节 实学和其它新知识

实学的产生

17 和 18 世纪政权逐渐被少数两班家族所把持，许多不属于这少数家族的两班实际上便没落了。同时，在农村，随着实行广作而致富的农民的出现，贫农被迫放弃农事，无地流民越来越多。在城市也经历了种种变迁，都贾商人通过控制工商业积累起财富，

而小商人却而面临破产和价格猛涨。随着这些现象反映的社会弊病日益严重，李朝社会面临的问题要求其有识之士进行认真的反省。他们的反省便体现在当今称之为“实学”的学术思想中。

因此，实学的产生意味对当权者的批评和进行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希冀。主要的批评者是不准参与政治决策的人士，当然也有致力于实行改革的官员，许多实学思想家就出自于长期被排除在重要官职以外的南人中间。

实学主要关心的是说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作用。他们在缜密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详尽阐释了他们关于怎样达到理想社会的见解。他们的学术研究不限于政治、经济一类的科学领域，还深入到其它许多方面，如经学、史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农学等领域。确实说实学涉及了学问的每一个领域是并不过分的。

虽然，他们研究的问题多种多样，但所有实学的立足点是相同的。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事物的实际表现形式、事物的真相。因此，虽然大多数实学者是性理学者，但他们研究的重点不在理气说，而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实用学问自然要求实用的方法，所以实学者总是力求进行精确的验证。不经实证，不下结论。因此，实学者一般不墨守传统或盲目地接受其前辈现成的观点。如果他们发现有某种看法与他们调查的结果不符，尽管这种看法可能被视为金科玉律，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总之，他们的学问从一开始就是独创的。他们所关心的现实是朝鲜的现实，所以，他们的学问必然带有民族特色，就这样实学思想家使李朝的学问发生了一个新的飞跃。

以农业为基础的理想国家论

已经说过，实学的方法论是以实际情况为其出发点的，而且因为李朝制度主要以农村为基础，所以实学者首先谈到的便是改革农业的状况。他们所说的经世致用强调在土地制度、行政机构、军事组织等主要方面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在独立农民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使经世致用学成为一门体系的学者是柳馨远（1622—1673年），他在农村孤寂地度过了一生，根据个人对当地社会的切身感受潜心研究。1670年完成的《磻溪随录》是他一生研究的成果。他在该书中，详尽地考察和评论了李朝各项制度的特征，如田制、教选、任官、职官、禄制和兵制等。

李瀛（1681—1763年）步柳馨远的后尘，但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研究，使经世致用学成为独特的学派。其主要著作《星湖僊说》显示了他的博学多识。主要内容分为天地、万物、人事、经史和诗文等五大类。在人事类，他对政治、经济、家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专注于根据缜密研究和透彻观察提出的种种详细计划以及对李朝社会的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菴忧录》中还提出了其改革思想的主旨，详细阐述了他对李朝各项制度的看法。李瀛吸收了许多弟子，这样实学便逐渐成为李朝占主导地位学派。

李若鏞（1763—1836年）是经世致用学的集大成者。他过了18年流放生活，而后又因1801年镇压天主教时受到牵连被迫隐居了17年，在这期间他完成了许多著作，他在书中依据亲身经历和调查对李朝社会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他被誉为最伟大的实学者。在《经世遗表》一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政府组织的见解，在《牧民心书》中他建议改革地方行政，在《钦钦新书》中

他提出了有关刑政的想法。在其他一些著作如《汤论》、《田论》中，他进一步展示了他对于革除当时社会弊病的思考。

像柳馨远、李 瀛和丁若镛这一类实学思想家在处理他们的好政府对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关注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实际的耕作者。因此，柳馨远鼓吹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并分给每个农民一定数量土地的“公田”；李 瀛提出“均田制”，要永久保证每户农民拥有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土地；丁若镛则主张采用“闾田制”，土地为每个村庄共同所有共同耕作，收成按每个人的实际劳动量分配。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要创造一个由独立的个体经营的农民自己拥有和耕作土地的理想社会。总之，他们相信士农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希望通过消除社会身份差别，提供平等教育机会，按功劳遴选官吏来通止商业发展和向货币经济变迁所引起的农村经济的瓦解。

发展商工富国裕民论

在实学内部有一个新的学派发展起来，该学派兴起于汉城周围的都市，因而与那些以扶植健康的农业社会为己任的制度改革论者发生了争论。都市派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商工活动的逐渐扩展，它也主张通过这样的活动为李朝带来繁荣。这样，便为实学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有时这一学派也被称为“利用厚生”派，但更经常地还是被称为北学，该学派受到当时中国清朝学术思潮的影响。

利用厚生派第一位重要的学者也许首推柳寿垣（1695—1755年），他的主要著作《迂书》写于英祖在位（1724—1776年）初年，他在该书中以问答形式提出了系统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改革的计划。《热河日记》的作者朴趾源（1737—1805年）也值得一提。朴趾源保存了一部记述他于1780年随同朝鲜使臣出使北京的旅行记，他在描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情景时提出了与清代中国相比，朝鲜是何等贫穷的看法。洪大容（1731—1783年）在《燕记》中记述了他到中国旅行的见闻，他在《鑿山问答》中借“实翁”与“虚子”的问答，特别针对国家、历史的传统信仰进行了批判。朴齐家（1750—？年）和李德懋（1741—1793年）是两位几乎同时受人注意的学者，他们分别在《北学议》和《燕记》中记录了各自在北京的经历。朴齐家的《北学议》不只是一部旅行记，而且在不同的标题下谈到了改革当时朝鲜的种种社会弊端。北学论者正是用这篇文章的名称来命名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流派。

在北京纪行中，他们承认耳闻目睹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他们主张必需先了解中国成就的奥秘而后在朝鲜进行改革。北学论者所表达的观点的意义不在于他们对中国的赞扬，而在于他们强烈地希望在朝鲜进行改革。他们的作品是对当时两班社会的有力抨击。他们斥责两班儒生的寄生生活，两班自己不事生产却从商工活动和农业耕作中获取暴利。他们特别关心商工业的发展，主张引入新技术扩大生产，还主张发展马车和船舶等交通手段，以便促进国内外商业流通以达到富国的目的，他们继续论证任何社会身份的人包括两班在内都应当从事商品的生产 and 交易，还论证必须建立一个以专职官吏为核心的新式官僚机构，这些专职官吏是通过向所有人开放教育机会招募的。总之，他们认为应当通过废除社会身份制度和按能力决定分工使人民获得幸福。

国学的发展

实学思想家想要改革的现实状况是他们所在的李朝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因此，虽然他们一方面力图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理想社会模式，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关心韩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李睟光（1563—1628年）被看作是第一位对韩国历史表现出兴趣的实学者。他的主要著作《芝峰类说》写于1614年。他在涉及广泛的各卷中对天文、地理、儒教、植物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直率地提出了自己对韩国早期王朝社会政治的观点看法。李潢的《星湖僊说》在前面已说过，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著作，而且对韩国历史的许多方面都作了论述。《东国文献备考》收录了韩国历史各方面资料，堪称是一部名符其实的百科词典。该书奉英祖敕命于1770年编竣，是一部以年代为顺序关于韩国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概览。

在纯史学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安鼎福以正统儒家观点写成的《东史纲目》。安鼎福（1712—1791年）是李潢的弟子，该书于1778年完成，在精细考据的基础上按年代顺序概述了从檀君到高丽统治末期的韩国历史。安鼎福还著有一部《列朝统记》，论述了迄止他那个时代的李朝历史。韩致奭（1765—1814年）是活跃于正祖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史学家，他的《海东绎史》是一部出色的历史著述，它运用了高丽史的纪传体写法，还收入了见于中国和其他外国史籍中的有关韩国的记载。李肯綮（1736—1806年）的《燃藜室记述》描述了迄肃宗（1674—1720年）为止的李朝每代的重大事件，此书取材于各种个人的、多是当时人的记述。

还应注意，这时满洲史引起了很大兴趣。李种徽的专著《东史》便是一例，该书强调高句丽在那个地区所起的作用。在这类

著述中，最重要的当然要数柳得恭写于1784年的《渤海考》。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由于渤海王国在北方同时并存，所谓的新罗统一实际上并没有将全部朝鲜并于一统，所以这个时期应改称“南北国”时期。于是所有实学思想家都采纳了这种见解：韩国历史舞台已超出半岛而延伸到满洲，由此又引出了各种新理论，如古朝鲜位于辽东半岛等。在这方面，应当提到洪良浩（1724—1802年）的《海东名将传》，该书写于1794年，是仅有的一部记述那些指挥军队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名将的史传。

历史地理研究的繁荣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韩百谦（1552—1615年）的《东国地理志》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作。在稍后的这类著作中，代表性的有申景浚（1712—1781年）的《疆界考》、韩镇书（1770—？年）的《海东绎史地理考》和丁若镛（1762—1836年）的《疆域考》，这些都是关于韩国的历史地理著作。李重焕的《择里志》也称《八域志》，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著作。作者从在某地卜居择里的损益得失出发探讨了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习俗和社会价值标准。在英祖漫长的在位期间（1724—1776年），还出现了其它许多地理论著如申景浚的《道路考》和《山水考》以及郑尚骥（1678—1752年）也在同期完成的《东国地图》。实学思想家在作为史学家真实描绘国家生活的同时，也从亲手调查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理学的研究，并且随着商业活动网遍及全国，他们对交通运输等领域也越来越有兴趣。

同时，他们对韩国语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音韵方面的著作有申景浚的《训民正音韵解》和柳禧（1773—1837年）的《谚文志》。

民间学者整理国故所作的努力也影响了当权者。英祖和正祖时代是实学研究臻于鼎盛时期，情况更是如此。正祖（1776—1860

年)时,在内廷设立了王室图书馆和研究院,称“奎章阁”,并派学者在那里编纂对管理国家有实用价值的大部头典籍。英祖在位时,在政府主持下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如《续大典》,对15世纪的《经国大典》加以扩充和修改,是一部法规的选编。《续五礼仪》记载了典礼习俗的最新变革,《续兵将图说》则在15世纪的《兵将图说》的基础上增补了新内容。此外还有以上提及的《东国文献备考》。正祖时也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典籍编纂,如《大典通编》汇集了以前的法律文件和最近的变化。《文苑黼黻》是一部由馆阁诸臣撰拟的文章选编,有颂教、慰谕、祭文、教书、国书等各类文章。《同文汇考》汇集了韩国的外交文献,《秋官志》汇编了古今刑法文件,《度支志》收录了户曹的事例,《武艺图谱通志》对武艺作了详细图解。官修事业的这些重大成果与活字印刷术的应用有密切的关系。

西学的传播

西学(天主教)是在西方文化传入的早期来到朝鲜的,首先是住在明代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传入朝鲜的。最早对新宗教发生兴趣的是实学者。早在光海君统治时(1608—1623年)李睟光已在他的《芝峰类说》中参考了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以后的实学者像李潢、安鼎福也对西学感到新奇,并在作品中加以讨论。但他们的好奇纯系知识性的,当他们了解之后,非但没有信仰天主教的意向,实际上反而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它。

然而正祖在位期间,尤其在南人学者中间,信仰开始动摇,很快竟发展成一股大潮流。1784年发生了一桩有特别意义的事件,这一年以外交随从身份陪同其父的李承薰(1756—1801年),在接

受了一位西方天主教士的洗礼后从北京返回。当时，皈依天主教的南人派名士有李承薰、李蘖、李家焕、丁若铨、丁若钟和丁若鏞兄弟以及权哲身和权日身兄弟。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李滉的门人，中人阶层人士如金范禹也颇有名气。这样，最初皈依天主教的人士都出在长期与政权无缘的南人派以及技术专家的中人阶层中间。

朝鲜的这些西学信奉者并不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传道而是通过自己阅读从中国带回的《天学初函》一类书籍对西学发生浓厚兴趣的。他们在西学中找到了解决因权力集中于少数阀阅世家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办法。在这个弱者备受欺凌，阀阅世家、富农、富商贪婪追逐私利，社会问题丛生的时代，与保守的性理学迥然不同的西学的人间原罪说便立即博得了许多批评现存制度的在野学者们的热烈响应。可以想象，那些念念不忘改革的实学思想家，在孜孜不倦地寻觅出路以求改善周围令人沮丧的现状时，由于信奉新宗教而对在尘世创建一个天国萌生了新的希望。因此，接受西学构成了对两班社会的阀阅政治和正统僵化的性理学的一种挑战。李蘖身上体现了初期西学信奉者的心态，即对传道活动深信不疑并且感受强烈。

所谓的“礼仪之争”使西学对现存制度的挑战表而化，并动摇了李朝社会。结果，1742年罗马教皇裁定，崇拜祖先与笃信基督是不能相容的。1785年正祖指斥西学为邪教并加以取缔。第二年禁止从北京传人任何这类书籍。几年后于1791年出身于全罗北道珍山两班家族的尹持忠，因没有为亡母供奉神主（这是儒教悼亡仪式必不可少的一种器具）被判处死刑。这样，西学的天主教在典礼方面便受到压制。1795年中国传教士周文谟潜入朝鲜，使新教得以复兴，此后不久，信奉者达到了四千人。

正祖在位期间，由于南人蔡济恭在政府中出任要职，对西学采取默许宽容态度，没有出现严重的迫害活动。但是正祖死后，大王大妃金氏（英祖之妃）成为新王纯祖的摄政，一场残酷的镇压便接踵而至。在1801年这场对天主教的迫害（史称“辛酉邪狱”）中，李承薰、李家焕和丁若钟等杰出的朝鲜天主教徒和中国传教士周文谟被处以死刑，丁若铨和丁若镛则判处流放。发动这场迫害还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与摄政大王大妃金氏关系密切的老论辟派看到这是击败政敌南人时派的一个机会。1801年迫害适逢黄嗣永试图暗地向北京的西洋人递送帛书之时，此事败露黄本人被处死。他在帛书中，要求西方国家派遣海军和陆军强迫朝鲜政府准许信仰自由。可是天主教徒的这种反国家活动反而加剧了对天主教的迫害。

科学与技术

17、18世纪最受重视的是农业技术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一个标志就是出版了许多农书。早在1655年，申沅就将李朝初期的一些论文编成了《农事直说》和《矜阳杂录》，他又增补了自己的观察编成《农家集成》，开启了李朝后期农书的先河。不久，朴世堂（1629—1703年）的《穉经》问世，他关心的主要是果树、畜产、园艺、水利和气候。洪万选在《山林经济》一书中按农业、林业、畜产、养蚕、食品加工和贮藏等门类，逐项论述了每个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稍后，徐浩修奉正祖的敕命编纂了《海东农书》，这是力图将韩国农学体系化的一种尝试。

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是作为救荒食物的白薯，出现了许多有关白薯栽培的书籍。在英祖在位期间，姜必履著有《甘薯谱》、金

长淳著有《甘薯新谱》，在纯祖时期，徐有渠于 1833 年出版了《种薯谱》。

以上提到的著作从各方面讨论了动植物学，而丁若铨在流放全罗道西南海岸外的黑山岛期间于 1815 年撰写的《兹山鱼谱》则是以鱼类学而著称的。该书根据个人的观察和对近海鱼样所作的分析，记录了 155 种海洋生物的名称、分布、形态、习性和用途。丁若镛于 1798 年著有《麻科会通》，也值得一提。这本医书参考了中国许多有关的书籍，对麻疹这种流行病的症状和治疗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期间已传入朝鲜，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最初，西方知识和文化是通过明代的中国进入朝鲜的，宣祖统治末期，出使中国的一名使臣带回了一张欧洲地图，朝鲜才第一次对西方有了确实的了解。稍后，1631 年郑斗源从他在明朝任所返回时带回了一支滑膛枪、一架望远镜、一座闹钟、一张世界地图以及一些天文学和西方文化方面的书籍。此外，昭显世子在清朝作人质期间，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他于 1644 年返回朝鲜时带回了大量西方科学书籍。1628 年，丹麦人韦尔特弗里的船只在朝鲜海岸失事，他化名朴渊在朝鲜生活了一段时间。由于有铸炮经验，他被派往训练都监，对于火炮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在他之后，1653 年亨德里克·哈梅尔及其一伙丹麦水手在济州岛海岸搁浅。他们被带到汉城，后来许多人逃到长崎，哈梅尔记叙了被俘的岁月，使西方第一次直接了解了朝鲜。

大约从仁祖（1623—1649 年）时起，朝鲜对西方科学技术越来越有兴趣，在这种背景下，经金瑱的努力，研究了新的历法，并于 1653 年颁行了改良历。丁若镛凭借他从邓玉函的《奇器图说》中获得的知识（这本手册收入中国的《古今图书集成》），他用重金

从清朝搞到)，设计了滑轮装置并在水原城的修建中加以应用。西方科学增长了他们的见识，金锡文、李 溪、洪大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地动说。这样，一直以亚洲即使不是世界全部也是世界中心的假设为基础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性理学的批判

在性理学内部，有一些学者对朱子学说深表不满，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不同观点。肃宗时期（1617—1680年）很活跃的尹镌（1617—1680年）和朴世堂（1629—1703年）就是这样两位学者。尹镌在《中庸注解》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表示对朱子注解的不满，由此而被斥为“斯文乱贼”。尹镌在当时的“礼讼”中遭到宋时烈的抨击被处以死刑，他的《中庸注解》也一道被查禁。朴世堂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思辩录》，在该书中他对《四书》中的《尚书》和《毛诗》作了注解。他不仅与朱子注解大异其趣，而且通过对《老子》、《庄子》的解析，从道家思想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见解，因此也被斥为离经叛道。总之，这些学者以原教旨主义的观点研究儒家典籍，试图透过朱熹散布的迷雾揭示孔子的本来意图。丁若鏞是另一位有创造力的典籍注释者，他试图追溯孔子的原始概念。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期间一部分朝鲜学者接受了阳明学。这些学者主要来自京畿地区，属于主气论派和被排斥在仕途之外的士林（尤其是少论派）。此外，宗室，庶孽以及某些受到政治歧视的社会成员也对阳明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不过这些学者并未将阳明学与性理学对立起来，而是普遍认为这两种思想流派是互相补充的，因而力图使两者协调一致。

然而，李朝阳明学的主要阐述者郑齐年（1649—1736年）却表示与正统朱子思想完全决裂。他能采取这样的立场似乎是由于他迁到江华岛已免除了京都政治危险的缘故。郑齐年的《存言》不仅将阳明学体系化，同时还努力超越朱子注解去追寻经典的本意。当然，那些思想家不愿在朱子性理学占据正宗地位的李朝被视为异端，所以他们一般采取阳朱阴王的态度。然而，在学问上他们常有新意，并不拘泥于正统的朱子注解。

第五节 艺术表现的新方法

汉文学的变化

实学精神不仅表现在学术著作中，还表现为新的文学形式。朴趾源的小说也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的《热河日记》有《许生传》、《虎叱》，《放璫阁外传》有《两班传》、《闵翁传》，这些小说都辛辣地嘲讽了两班儒学者的寄生生活。在讲叙那些故事时，他使用了一种自然流畅的文体，改变了早期汉文作品的矫揉造作的文风。

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用汉文将民间故事加以改写的短篇小说。由于这些小说取材于非两班阶级的口头传说，所以首先具有自然朴实的风格。这些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在富裕的广作农和都贾商出现后在对待爱情和社会身份问题上传统观念受到的冲击和变迁。《东稗洛诵》和《青丘野谈》就是这样的两部小说。

还有一点也应指出，庶孽、中人、胥吏身份的文人以及常民身份的人也出了诗集。洪世泰在肃宗（1674—1720年）时编出《海东遗珠》，高时彦于1737年汇成《昭代风谣》加以补充。“风谣”一词意指下层社会的诗歌，不同于两班士林的高雅之作。这

类诗集在 60 年后才得以出版,《风谣续选》于 1797 年问世,1857 年出版了《风谣三选》。

古小说和辞说时调

17、18 世纪文学界最大的变化是产生了用韩文写作的文学作品。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使用韩文,而且表现在形式上,出现了小说和辞说时调一类作品。此外文学写作从两班阶层扩大到胥吏一类社会下层人士。总之,发生以上变化是由于这类文学作品在两班以外赢得了新的读者。诚然,像金万重于 1689 年写的《九云梦》一类小说,其基调流露出对富贵荣华的迷恋,带有两班文学的印记,尽管作者因其作品用韩文写作而备受重视,不过,大多数用韩文写成的新小说,虽然经常取材于说书人的传统剧目,但风格却是新的。

韩文小说涉及了各种题材。许筠的《洪吉童传》写于光海君时期(1608—1623 年),被认为是第一部韩文小说,在这部批评作品中,李朝社会存在的歧视庶孽和贫富差别一类不公正现象受到了强烈谴责。《蔷薇红莲传》、《昌善感义录》、《沈清传》和《兴夫传》一类作品被看作是劝善惩恶的道德小说。《壬辰录》、《林庆业传》则涉及军事题材。最受人喜爱的是《玉楼梦》、《淑香传》和《春香传》一类爱情小说。其中有一些内容对儒教道德的正当性给予了肯定。然而在这些作品当中,有许多小说作者几乎都鲜为人知,却勇敢地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正直情感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春香传》被视为这个时期最卓越的小说,它认为常民和贱民在人格上与两班没有差异。因此,使得书中女主人公春香大声疾呼:“忠孝烈女怎能有贵贱之分?”。

在时调中也有这种情形。早期时调属于两班文学，这种短歌颂扬儒教道德，赞美田园乐趣和武士的英勇气概。但是，现在时调被社会下层的人接了过去，他们的愿望是不仅要表达人物的感情纠葛，而且还要让时调具体表现他们自己的感受。因此，时调便成了长诗，其描写具有了现实性，主题也转化为男女爱情、家庭生活的艰辛，乃至不知羞耻的淫佚放荡。新时调作家大多是金天泽和金寿长这样一些在英祖政府任职的胥吏、没落的两班，或女优伶一类社会下层人物。为了更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情感，这些作家往往留下不署名的作品，因为他们不愿意拘泥于陈规旧律。

风要停歇的隘口

云要停歇的隘口

野鹰猎隼都得停歇的高峰长城岭隘口

但如我的爱人等待我越过关隘

我将毫不停留地逾越

在过去两班的诗集中也收录了许多其他社会出身和有名或佚名的作者的诗篇。以上提到的胥吏身份的金天泽和金寿长分别在1728年和1763年出版了两部重要时调集，一部名为《青丘永言》，另一部名为《海东歌谣》。总之，新时调诗的出现，像新小说的出现一样充分证明已经出现了一种清新文学。

艺术的新风尚

在绘画中新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一时期在风景画方面出现了现实主义。朝鲜艺术家不再墨守中国风景画手册规定的程式去描摹理想化的场景，而是刻意描绘亲眼观察的自然风光。郑歆(1676—1759年)是发展了这种现实主义风景画风的画家。在

形成自己现实主义技巧的过程中，他设计了自己的构图法，学会用泼墨技巧描绘朝鲜地貌峻峭的特点，给人一种隐隐绰绰的浑厚之感。《仁王霁色图》和《金刚全图》堪称是展示这些特点淋漓尽致的代表作。金弘道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活跃于18世纪后半期，但他的山川林木，用笔轻灵，具有线条美，风格与郑歆不同。他的风景画的代表作是“丛石亭图”。

风俗画在这一阶段也繁荣起来。风俗画艺术描绘的是日常生活的普通场景，金弘道和申润福（1758—？年）是最著名的风俗画大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官府画员。金弘道精于勾勒山水、神仙、花卉，以擅画树枝而著称。他的《风俗画帖》技巧娴熟，画题都是人们日常劳作生活的场面，如耕田、收获、打铁等等，其出名之作为《舞乐》和《摔跤》。金得臣（1754—1822年）是另一位在风格和主题上与金弘道相近的风俗画家。申润福的风俗画则不同，他主要描绘当时城市人特别是女性的活动。他的代表作为《女人图》和《风俗画帖》，在他笔下有荡秋千的女孩，溪边洗衣的家庭主妇，卖酒的女人，纵情声色的游冶女子。风俗画的盛行是艺术上对两班儒教社会的抗争，也是对人类美德的赞颂。

青华白瓷的生产是瓷器制作的重大发展。李朝初年，“回回青”要从中国进口，因此青华白瓷非常昂贵，在平民百姓中是禁止使用的。然而，到了正祖时期，朝鲜生产的颜料开始使用，青华白瓷才在民众中得到推广应用，而其技术也有了很大发展。只需用蓝色便可轻巧绘出山川、花鸟、草木。经焙烧后这种青华白瓷具有一种罕见的美，绝非当时中国和日本使用青、红、绿等颜色制出的色彩陶磁所能比拟。这些瓷器散发出一种朴素的诗意，表现了朝鲜人对不事雕琢的自然美的喜爱。

第十二章 两班身份制的动摇 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势道政治

势道政治

英祖和正祖长期推行任命官职不考虑派别隶属的“荡平策”，政局大体上保持稳定。确实洪国荣曾因排除辟派的阻挠保住正祖王位而获宠，在18世纪70年代，一度出任都承旨的高位，不久便去职下台，因为英正时代的75年间，王权一般说来是相当稳固的。

然而1800年正祖去世，年仅10岁的纯祖继位后，外戚势力便完全把持了王权，开始了所谓的“势道政治时期”，安东金氏的金祖淳以国丈身份几乎集全部政治权力于一身，他的许多同族人也都荣升要职。后来，安东金氏被迫让位于另一支外戚势力丰壤赵氏。这是因为宪宗（纯祖之孙和继位者）的母后是丰壤赵氏的领袖人物赵万永之女。这样丰壤赵氏在宪宗时期掌握了统治大权，赵万永之弟赵寅永任领议政，其同族人多被委以重任。但是哲宗（1849--1863年）即位后，安东金氏再次把持了政权，安东金氏金汶根把女儿嫁给国王为王后，其近亲金兴根、金佐根轮流出任领议政。

在这种形势下，李氏王朝名存实亡，安东金氏操纵权力致使王权一落千丈。宗室成员抨击安东金氏竟然遭到放逐或以谋叛罪

被处以死刑，凡此种种都说明真正的权力所在。由此可见，当时其它两班家族的势力就更是无足轻重了！任何可能向安东金氏挑战的力量都得不到宽恕。

这时，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权力既不再在所有两班当中乃至老论派中分配，权力也不再归党争的胜利一方所拥有。19世纪后半期，垄断政治权势的只有外戚一支势力。

三政的混乱

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个又一个外戚家族手中引起了国家治理的混乱，由此带来的灾难都落到了农民肩上。这是因为谋求官职需要行贿，这大笔款项都来自于对农民的横征暴敛。结果使人感到国家的财政机构简直成了官员中饱私囊的贪污工具。“三政”这一管理国家三大财政收入来源的机构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田政指土地税实际上包括按耕地的结数征课的各种税收。首先，每结收田税4斗（约为2蒲式耳），此外还要为供给训练都监的三手兵征收1斗2升三手米，征收12斗大同米以代替以前的贡物，最后是2斗多的均役税。尽管税目繁多，但总数不超过20斗，不到收成的十分之一。因此不算一笔大数。然而土地税确实是一项沉重负担，其原因在于附加费和管理费名目繁多，虽然各地做法不尽相同，但总的说这些额外征收的各种费用把税额提高到每结100斗，相当于收获的一半。此外，官吏还可以对废弃土地征税，称为“空地税”。他们也经常在固定数额外勒索所谓的附加税，以便弥补私人开销欠下的亏空。

至于军政是指向每个丁男征收一匹军布。诚然，按均役法税率已经减半，但一匹军布相当于6斗米，所以军役税超过了数额

为4斗的田税。此外，如前所述，农民还要承受各种横征暴敛，如“白骨征布”“黄口签丁”、“族征”和“邻征”等。实际上，与田政相比，军征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更大。

最后，在还谷制下，春荒时节贫苦农民可从官仓借谷，收获时，按10%的耗谷偿还。最初用“耗谷”补偿损失的想法带有许多照顾，但实施当中反而成了索取利息的借口。因此，本来是救济穷苦农民的办法，现在反倒成了放高利贷的工具。在三政中，还谷制的弊端最为严重，官吏勒贷，即强迫农民多借粮；“反作”即官吏编造虚假的借粮报告；“虚留”指粮册上载有存粮但仓库里已空无所有；“半白”或“白分”指在谷物中掺入一半谷糠，借出的粮数便翻了一番。以上种种使农民深受其苦。

地方官吏就是这样通过对广大农民的巧取豪夺中饱自肥的。不独郡县守令，连行政机构最底层的乡吏也从中渔利。乡吏为了获得一项职位得先向地方长官交纳一笔钱，然后再以适当方式用强制的手段征税来补偿自己的损失。换句话说，乡吏利用他们作为地方官府实际工具的地位，可以为所欲为，鱼肉乡里。他们虽然只是一乡之长，但具有官方权威的合法性，农民无法抗拒他们的诛求，乡吏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地方行政机构的腐败不仅给农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稳定。为此，政府派出暗行御史对官吏的腐败行径提出指控。暗行御史在各地微行暗访，调查官吏的渎职劣迹呈报朝廷。然而这并不是根绝恶行的有效办法，虽然暗行御史可能相当诚实可靠，但不可能扭转王朝衰败之势。

第二节 两班身份制的动摇

没落两班和中人阶级

广义上说，李朝两班社会是一个由两班阶级统治的、严格实行等级身份制度的社会。但是以两班为中心的身份制度从17世纪起逐渐瓦解。到19世纪，社会身份的急剧变动，使“两班”这个以往用来指一个社会阶级实体的概念变得愈益模糊了。

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首要原因是“没落”两班的人数增多，那些人实际上已不能行使两班享有的权力了。正如前面已经说过，在少数阀阅家族当政时期，老论派独揽大权，而在势道政治时期，权力则几乎全部被外戚世家一手把持。结果，许多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两班隐居于乡间，沦落为乡绅地位。此外，在两班家族内，如果几代无人仕为宦，有些人迫于形势只得屈身为小作农。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残班”，意为已沦落到不能再继续保持两班阶级身份所应有的尊严与权力的地步。而且这部分人数还在不断地增长。

同时，嫡庶的界限正在打破。早在18世纪的后期，正祖曾任命庶孽担任奎章阁的检书官，这表明他们长期承受的歧视待遇已有所改善。中人作为京城中有一技之长的世袭阶层，社会地位也在提高。译官不仅通过赴清代中国旅行接触到新文化而扩大了眼界，还通过私人贸易活动积聚了财富，从而扩大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是医官、观象监员、画员以及其它有学识和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有行政能力和文学素养的胥吏——所有这些中人都强烈要求享有与他们技艺才能相称的权利地位。同时，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同没落的两班有亲近感，并

引为同道。最后，如上所述，富农和巨商也加入到要求提高社会身份地位的行列中来。

社会阶级关系的另一种变化是地方社会实力不断增强，以往地方社会一直受到歧视待遇。例如，朝鲜西北部平安道地区的科举合格者人数激增，定州郡不大，而科举合格者的人数比南北任何一郡都多。诚然，这些人要在中央谋到一个重要职位还是有困难的，但出现了这些新因素毕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所有这些发展当时必然对少数大家族操纵的统治体制构成威胁。

农民的变化和奴婢的解放

在李朝社会的底层也掀起了一阵阵动摇两班统治体制的浪潮。许多农民变成了富农，身着标志两班身份的服饰；但是，随着王室与外戚所占有的土地的扩张，多数农民则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同时，一部分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而沦为雇工，因为众所周知，由于移秧法和畎种法的推广，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在插秧或收获等农忙时节在村里为人帮佣，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则离开农村当上了手艺人或矿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打短工，只是利用农闲期赚点外快，另一部分人则以此维生，完全变成了非农业劳动力。至于矿工，有定期集市为他们服务，往往便形成了新的村落。

但是，良人农民虽然失去了土地，再也不会沦为奴婢，因为奴婢制在逐渐消亡。官府在册的奴婢数已从15世纪的350,000人下降到17世纪末的200,000人。奴婢人数所以减少，部分原因是壬辰倭乱时奴婢册档被毁和奴婢的四处逃散，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奴婢一旦获准服军役、服良役，有些人通过军事技术考

核得到了自由，而有些人连续两代人服军役便有资格获得解放。还有些人凭借骁勇善战或其它特殊劳绩也可以获得自由。当然也不乏纳粟赎身的例子。连那些在册的官奴实际也不再为官府做工或交纳免役金，实际上也变成了良人。许多私奴婢更是如此，其两班主子在压力之下已很难把他们留住。

鉴于这些情况，官府决定让残存的奴婢获得自由，于1801年下令烧毁官奴婢册档。于是，除少数例外，官奴婢都抛弃了贱民身份成为良人。诚然地方官衙的奴婢仍没有自由，私奴婢制也没有废除，但是，一场大范围的社会变革终于发生了，因为以往严格维护主奴之分的旧身份制正在上崩瓦解。

第三节 农民的反抗

契的流行

农民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在两班官吏横行的社会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采取了一些维持生存的办法。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契”的发展，契是一种自愿性的互助联合。契完全不同于两班领袖们操纵的儒教“乡约”，乡约是从上面执行儒教的道德规定。而契则不同，是为了维护参与者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乡约”随着两班社会的解体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契”却愈益兴盛。

起初，大多数契是出于互助或仅仅是为了社会聚会的目的而缔结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宗契、同甲契、婚丧契、邻里契。显然，许多两班和富户也加入了这类契。但后来契主要是为了通过资源共享来克服经济困难。许多贫苦村民自然加入进来。结成这样的契是为了修缮对大家都不可缺少的堤堰，为了交纳军布税的共同目的，或是为了购买耕牛农具共同使用。可以说，广泛采用

“契”这种自愿性的联合形式反映了乡村生活的变迁。

这时与农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现象是对土豆和白薯这种救荒食物表现出很大兴趣。白薯的种子是1763年由出使日本返任的官员赵卬从对马岛带回朝鲜的。由于许多热心人士的努力与支持，白薯的种植不断扩大，终于成了朝鲜人的主要膳食之一。不过，白薯不适应朝鲜气候，也不易栽培。所以土豆于1840年前后从中国传入后传播得更为广泛。土豆因从北方传入，称为“北方薯”，白薯则被称为“南方薯”。

流民和盗贼

尽管农民努力自助，但他们靠租佃小块土地为生仍不免于贫困冻饿。在歉收年景，路有饿殍，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四处流浪。在某些地区村庄荒芜，整个乡几乎没有几户人家。有些农民设法在高山地区生存下来，被称为“火田民”，他们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没有固定住所，设法烧掉植被，在丘陵地带耕作。他们的收获当然很少，生活也很贫困，但至少他们能庆幸逃脱了官府的苛捐杂税。然而，官吏的贪婪之手也伸向了火田民，向他们课税。结果，农民越过朝鲜边界进入满洲的间岛地区或俄国沿海地区的入数不断增加。

农民的愤懑不平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之一是各地不断出现煽动性的横幅和标语，挂在树上的称“挂书”，写在墙上的称“榜书”。例如1804年汉城4座大门上贴出了“关西秘记”，同年在黄海道安岳郡发生了用隐晦的歌词诋毁朝廷的情况。1826年，在清州悬挂出一幅痛斥官府腐败弊端的横幅标语，其内容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以致清州被撤郡改县，从以上和类似的

多起事件可以窥见当时广大人民的心态。

既然有这样不满的理由，可以理解农民的抗议不会一直这样消极。首先，许多农民变为盗贼，扰乱了各地的治安。他们出没于乡间，活跃于沿海。策马携枪的被称为“火贼”，驾船沿河劫掠的被称为“水贼”。这些不法之徒逐渐有了完善的组织。零星活动、规模较小的团伙合并成强大的团伙，他们以活动的区域命名，如西江团、废四郡团。也有的因成员的背景而得名，无地流民组成的就叫做“流团”。

民乱的爆发

当时遍地而起的民乱自然是以农民为中心。但领导人通常是不满的两班分子和没落两班，而且大规模的叛乱往往一开始是由地方骚乱酿成的。1811年洪景来叛乱就是一例。洪景来是平安道的一个没落两班，因科场失意未能入仕而感到沮丧，便与禹君则和金士用等本地另一些对当局不满的人士密谋起事。他们宣称要结束对平安道人的歧视，秘密策动了一场有当地土豪、胥吏和商人参加的起义。而这时平安道由于饥荒严重、流民骤增，人民的不满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洪景来及其同伙借口为矿山招募劳工，集结力量进行训练，发动公开的叛乱。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清川江以北的几乎全部地区，不过不久官军在博川松林里将他们击败。起义军退回定州城后仍坚守了几个月，洪本人在守城的最后一仗中被杀害，起义旋即被镇压下去。

平定洪景来叛乱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谣言四起，纷纷传说洪景来仍在人世。有些团伙声称是他的余党也在各地起义。因此小规模叛乱几年里在全国就没有间断过。1862年的晋州民

乱是最严重的一次。晋州民众因不堪忍受兵使白乐莘的诛敛无已，在没落两班出身的农民柳继春的领导下揭竿而起。造反者杀死地方官吏，纵火焚烧官衙府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晋州民乱虽然被平息下去，但它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暴动。例如，大约40天后全罗道益山便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南三道的每个地区几乎都同时陷入民众骚乱之中。起义还蔓延到别的地区，连济州岛的渔民也奋起反抗当地官府。

这些民乱大多是自发性的，目的在于铲除作恶多端的地方官吏。但同时，他们也向因阀阅政治和势道政治而弊端丛生的两班社会本身发起了一次冲击。

第四节 平民文化的发展

学问和思想

除17、18世纪的实学传统外，19世纪出现了新的学术成就。19世纪的学术取向与以前一样，试图从朝鲜历史进程的根本之处着手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不过这时朝鲜学者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力图应用自己在一些新的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于是出现了启蒙思想，又称“开化思想”。

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学术动向是为创建综合性学问体系所作的努力。实学集大成者丁若镛的思想到19世纪才臻于成熟。仿照李睟光的《芝峰类说》和李瀾的《星湖僊说》出现一些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只有纯祖时期的两部著作，即徐有榘的《林园十六志》也称《林园经济志》，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文稿》，前者全面论述了农业，但也对李朝社会从日常生活到产业、六艺等各个方面有所论列。李圭景的著作广泛涉及天

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学科，并对产生的疑问和记述不正确的部分加以详细考据，予以订正。1908年正值王朝结束的这一年，以朴容大为首的一批学者完成了对18世纪末的《东国文献备考》的增补（题名为《增补文献备考》），这部著作堪称为韩国的百科全书。1865年，以赵斗淳（1796—1870年）为首的一批学者完成了《大典会通》的修订，从而提供了一部综合性的李朝行政法典。重新修订和资料新编是这个时期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

19世纪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研究方法上。李圭景十分热心于对他所用的资料进行考据，他在考证上用功甚勤，颇令人注意，但考证法的最主要的实践者则是金正喜（1786—1856年）。他采用清代的考证法，尤以精通金石著称。《金石过眼录》是其严谨治学的代表作，此书是对6世纪中期新罗真兴王巡狩碑所作的研究。在制图学方面，金正浩（？—1864年）以毕生精力实地观测整个朝鲜半岛的地貌，在此基础上于1816年绘制了“大东舆地图”。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在没落两班和中人当中涌现了不少学者，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反映了他们身份阶层利益的一些观点。他们之中以崔汉绮（1803—1875年）最著名，他是一位没落两班出身的学者。其代表作《人政》于1860年完成，他在书中证明善于招募官员是重建贤良政府之道，他建议出身于士、农、工、商的人才应一视同仁地施教任用。他持有历史进化的观点，这使他相信人类将来会在一个文明社会中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他极力敦促朝鲜摒弃闭关锁国政策，开放门户，与世界万邦同存共处。崔瑗焕是一位中人，他在《顾问备略》一书中鼓吹政府行政改革和合理化。他还主张用雇工制取代强迫民工服劳役的传统做法，纳

税应改实物为现金等等。上述这类著作对影响城市经济利益的问题以及政府机构日复一日的运作中所产生的问题都持有共同的观点和表现出深切的关注。

庶孽这一老问题也出现了。《葵吏》编于1859年，其作者曾蒙受过这种羞辱，此书强烈呼吁结束一切强加于他们的歧视待遇。稍早时候，1848年前后还出版过一部《掾曹龟鑑》，该书主要根据乡吏出身的李震兴在前一个世纪的历史编成。此书争辩道，既然乡吏与两班源于同一血统，两个阶级便应当享有同等待遇。此外，在赵燕龙（1789·1866年，中人出身的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的《壶山外记》，胥吏刘在建的《里乡见闻录》，李庆民（1814—1883年，出身于一个贫困潦倒家庭的两班）的《熙朝轶事》一类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技艺超群、品德出众的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只是因为出身卑微而历来被摈于正史之外而得不到世人公认。这些著作是朝鲜史学史上的新气象，它们反映了当时李朝社会正在经历的变迁。

天主教的传播

纯祖（1800—1834年）初年，国丈金祖淳为首的安东金氏把持大权时，天主教不再受到严厉镇压。从一开始起，对异教的政策便与党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辟派采取严厉的反天主教立场，而金祖淳所在的时派则持温和态度。其间罗马教廷曾为朝鲜教区委派过一名名誉主教，法国传教士莫尔邦于1836年，夏斯丹和阿摸拜于翌年也先后潜入朝鲜。这样，天主教信仰开始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是不久，当时左右朝廷的辟派丰壤赵氏便实施了镇压政策，在接踵而来的“己亥邪狱”中这三名外国传教士和许多朝鲜

教徒被处决。几年后，曾在澳门一所神学院受过训的第一位朝鲜传教士金大建秘密潜回朝鲜，并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设法从海路而不是漫长危险的陆路与中国传教士保持接触，但不久即被拘捕，并于1846年殉教。随着哲宗（1849—1863年）的登基，安东金氏再次掌权，反天主教政策也随之放宽。结果，许多西方传教士进入朝鲜，信徒多达20,000人，还出版了许多天主教书籍和传单。

天主教起初从被排斥在掌权之外的南人时派学者当中吸引了许多两班改宗者。尽管迫害使两班改宗的人数逐渐下降，但从19世纪末起，社会下层民众开始大批改宗入教。虽然也有一些来自中入阶层如医生之流，但绝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或商人。改宗者当中竟有许多是雇佣劳动力，女性信徒也有显著增加。总之，这时入教的是社会下层而不是上层，是未受过教育的而不是受过教育的，是穷人而不是富人。信徒主要集中于京畿地区，天主教仍是城市居民的信仰而不是乡村的宗教。

显然，使朝鲜人皈依天主教的首先是它的平等信条，这一信条宣扬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子女。对中入和平民来说能够被看作是上帝的子女并与两班平等参拜上帝，这确实是一种令人动心的感受。天主教对妇女也具有同样的感召力。而且，那些身处绝境的人无疑更乐于相信关于天国的福音。对来世的幻想似乎确实是诱使人们皈依天主教的强有力的原因。不言而喻，信仰天主教本身就是李朝社会的坟墓，也是对两班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

“东学”的出现

如果说天主教在京畿地区传播其信仰，那么东学则萌生于农村的人民之中。农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在称为“东学”的宗教运

动中表现出来。东学开始于哲宗时期，其首倡者为崔济愚（1824—1864年）。虽然他声称东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的精义以与西学相对立，但其教义仍含有天主教成分，也带有民间巫觋信仰的特色。他的折衷思想表现在《东经大全》、《龙潭遗词》等作品中。

崔济愚相信天人合一，人类和天主合一。他宣称人心即天心，因此，为人服务也就是为神服务。他主张人人平等，超越身份、超越阶级一视同仁。这是他的学说深受被压迫农民欢迎的主要原因。东学为农民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吸收了诸如称颂咒语、崇拜山神以及易为村民理解的巫觋信仰等内容。

东学不仅是信仰运动也是社会运动，它主要关心的是农民和农民处境的改善。东学主张“辅国安民”，号召改革腐败已极的政府。东学还不断预言时序更替，以上目标实现之日已经临近。这种憧憬太平盛世的宣传引起了官府的警觉，官府发现东学信仰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便以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崔济愚逮捕，并于翌年将他处以死刑。崔济愚曾预言1864年将会带来“喜讯”，这正是政府惧怕爆发人民起义而在前一年将他关押的原因。崔济愚被处决后，其追随者们隐遁山中，东学也一度陷入沉寂。然而培育东学的温床即农民的不满并没有缓解。不久，东学再度复苏，又蓬勃发展起来。

平民文学的繁荣

《歌曲源流》作为韩国民族文学的范例以收集时调为主，由朴孝宽和安攻英编于1876年。不过，这个时期朝鲜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说唱艺术，由职业艺人在一场持续几小时的演出中以说唱形式向露天观众讲述故事。“说唱艺术”起源已久，但只是到19

世纪才繁荣起来，这时出现了像宋兴禄和牟兴申这样一些使说唱艺术深受大众欢迎的说唱大师。说唱者的唱词是根据朝鲜古代白话小说改编的，最后创作了12个曲目。对“说唱艺术”的曲目贡献最大的是申在孝（1812—1884年），他在利用故事素材方面发挥了创造性，将寥寥几个字改编成充满情感的语句。唱曲含有嘲讽两班阶级的段落，演唱者和听众借以发泄他们对李朝晚期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

由社会下层人士即庶类、中人、胥吏用汉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已开始出现并确实相当繁荣。1857年以刘在建（1793—1880年）为主，编成了《风谣三选》，该书也收入了僧侣和女性的作品，因而充分表明选诗的作者和读者具有广泛性。诗集收入了305位不同作者的作品，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下层的作家人数之多。这些文人组成了“诗社”，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是中人张之琬在内的“七人诗社”。从郑芝润（1808—1858年）又名郑寿铜和金笠（原名金炳渊，1807—1863年）创作的讽刺诗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汉文学的性质。

一种以平民为观众的戏剧——假面剧这时也很繁荣。假面剧中歌舞、说白穿插，含有巫覡成分，从而赢得了更多的观众。而且，戏谑两班阶层的讽刺段落一般在说白部分，例如在《水营野游》一剧中，假面者（一种像蛇的动物）说道：

我要在低潮时生吃他们，在高潮时反刍，
吞下我的90个两班主子。
我还要吃更多的，瞧着吧！
我现在变成了一条龙，登上王位。

这种对两班憎恶之感的直率表达，解释了假面剧何以深受平民欢迎的原因。

艺术界的变化

从书法艺术中衍生的抽象风格的文人画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流派。金正喜（1786 - 1856 年）是最有声望的这样一位艺术家，在他的杰作《岁寒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的真实风景，还可以窥见另一个理想境界。大院君和闵泳翊的兰花也属于这类文人画。这种主观表现的倾向并不限于两班文人，在官府的画院中也相当盛行，成为流行一时的风尚。也许正是士林对势道政治下李朝社会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助长了画家将客观事物理想化的倾向。而且，早期山水画与风俗画中的自然主义趋势显然由于新表现流派的发展而受到压抑。19 世纪末最著名人物是张承业，他与安坚和金弘道被誉为李朝的三大画家。张承业是一个孤儿，靠暗中观摩其堂兄弟作画学会了绘画。但他的天才很快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并成为官府画师。张承业不为他不喜欢的人作画，不论其地位多高。他的“红白屏梅”气韵生动，享有盛名。

在书法方面出现了新的书法，过去那种墨守陈规、拘于形式的书法风格为之一扫。大画家和金石学家金正喜是著名的新书法大师。他悉心揣摩历代著名书法作品，将不同风格融为一体，形成了一般称之为“秋史体”的粗犷风格。申纬（1769—1847 年）和曹匡振（1772—1840 年）的才能也不逊色，他们对书法风格的创新也起了重大作用。

木工技艺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衣柜、箱奁、书柜、陶瓷工艺品的陈列架、书籍、餐桌以及其它家具都以简洁素雅保留了木材纹理之自然美而著称。同时，许多精美的工艺品是用竹子、骨头和螺钿镶嵌的漆木制成的。

第五节 大院君的改革和孤立政策

大院君的改革

1864年年仅12岁的高宗继哲宗之后即位。其父兴宣大院君掌握了国家实权，提出了一项旨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坚定的改革方案。最后，他决定从“四色”即四大派系中平等录用高级官吏，既不问地区背景也不问社会身份。大院君实行的按劳绩录用人材的政策打破了少数阀阅世家或外戚家族把持政权的局面。

大院君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针也反映在他的经济政策中。他将以前仅向平民征收的军布税改变成向平民也同样向两班征收的户布税。此外，他通过设立地方管理的社仓网重建了还谷制。他调查社仓实际存粮，严惩中饱私囊的官吏以推行廉政。

为了提高王室尊严，大院君着手重建景福宫。景福宫毁于壬辰倭乱，因国家财政支绌一直未能重建。大院君不顾财政拮据状况下令重建，并于两年后完成了这项工程。为了应付工程的巨额费用，他对所有地主不论身份都征课每结一百文的“结头钱”，还对出入汉城城门的商品征收“城门税”。大院君还强迫为这项事业捐款，美其名为“愿纳钱”。此外，由于不得不动用大批劳动力，大院君也难免会招致民工们的不满。适逢此时政府铸造了“当百钱”，其价格远远高出于内在价值，从而引起了相当大的经济混乱。不过，修复后的景福宫规模宏大，勤政殿、庆会楼和光化门等建筑为之增光不少。

大院君还坚决关闭书院。当时，数以百计的书院拥有大片农庄和做工的奴婢并享有免役的特权。这样，书院不仅侵蚀着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已成为一股不受政府控

制、在乡村擅自行使权力的势力。17世纪老论创始人宋时烈引以为荣的华阳洞书院，便是一个极端例子，该书院在公共事务上的看法比官府敕令更有权威性。因此，只要允许书院存在，就不可能出现君权至上的强有力的官僚政府。于是大院君于1864年禁止重建或私建书院和乡贤祠，翌年又撤销了万东庙，这是按宋时烈的遗命为纪念明代中国最后两位皇帝而设立的神祠。1868年大院君下令向书院征税，1871年又大幅度削减书院的数目。除47个分散的书院外，其它的一概予以封闭。他对书院的限制政策引起了当时儒家学者的强烈反对，这也是后来迫使他还权下野的一个原因。

孤立政策

从19世纪初起，西方国家出于贸易和其它目的就对与朝鲜通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英国和法国往东通过印度洋，美国向西横越太平洋，俄国往南穿过西伯利亚——西方列强一个接一个地叩开了朝鲜的大门。1832年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忠清道沿海试图进行贸易。1845年一艘英国军舰在朝鲜水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查济州岛与南海岸之间的岛屿。1846年三艘法国军舰在忠清道海岸抛锚，留下一封致朝廷的信便离开了。1854年两艘俄国武装舰船沿咸镜道海岸航行，在与朝鲜人的遭遇中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1866年，德国冒险家奥佩特曾两次要求准许进行贸易，他的请求遭到了否决，两年后他登陆上岸，企图盗掘大院君父亲南延君在忠清道德山郡的坟墓。1886年美国商船舍曼上将号耀武扬威地沿大同江而上直抵平壤，在江上遭到平壤军民的火攻，船上人全部丧命。

这些异样船（外国船）的不断出现只能被看作是弊病丛生的王朝所面临的另一种威胁。朝鲜也看到由于同西方国家不断冲突已经降临到中国的那种灾难——1839至1842年鸦片战争，1856年亚罗号事件等等。朝鲜政府把拒绝西方的贸易要求看作是防止这种灾难在朝鲜重演的手段。

朝鲜拒绝西方通商的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天主教传播。我们已经了解天主教虽然最初主要诉诸于不满的南人学者，但后来从中人、平民妇女和其它下层或受压迫阶级当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这种发展致使天主教成为与儒教传统相对抗的异教，从而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迫害运动。但是，哲宗在位时期（1849—1863年）包括伯纽克和赖德在内的12个法国传教士进入了朝鲜，由于他们的传教活动，使天主教再度复兴，到高宗初年，他们的信徒已超过了20,000人。

大院君在其统治初期，对天主教比较宽容。面对俄国的南进，他甚至采纳了天主教徒南钟三的建议，向法国求助以阻止俄国的扩张。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又接到了关于中国清政府镇压天主教的报告。在这种形势下，大院君采纳了领议政赵斗淳等高级官员所鼓吹的排外政策，于1860年初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运动。迫害结束前已有9名法国传教士被处死，包括南钟三在内的大批朝鲜信徒也横遭杀害。不过看来很清楚，朝鲜的孤立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排斥西方通商而是为了防止西方思想的侵蚀。

与西方国家的冲突

朝鲜的门户这时紧紧关闭。与西方人的所有交往都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连与日本的接触也被认为有危险，因为日本已与西

方列强建交，唯独允许与中国来往。通过和平谈判与闭关自守政策的制订者大院君统治下的朝鲜建立通商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列强企图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朝鲜与它们交涉，于是引起了两次较大的“洋扰”即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

第一次为“1866年洋扰”，是由朝鲜镇压天主教引发的。当时活跃于朝鲜的12名传教士中有9名已被捕处死，还有3名一直藏匿在乡间。其中赖德神父后来逃到中国并与法国亚洲军司令罗泽将军取得联系，后者保证对朝鲜采取惩罚行动。罗泽将军首先决定显示一下武力，他率领3艘舰船越过黄海沿汉江而上，对汉城侦察了一番，暂时返回到中国的营地杨花津。不久罗泽将军再次进入朝鲜海域，而这一次他带来的是一支由7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在完成了试探性的初次登陆后，他派出一支分队强占江华岛的行政中心，洗劫一阵后运走了那里收藏的武器、文件。但在江华岛对面大陆的文殊山城，在韩圣根率领的朝鲜军的阻击下，另一支企图向汉城进攻的法国军队却遭到挫败。另外，进攻江华南端鼎足山城的法国军队也被梁宪洙指挥下的军队击退（见图，第280页）。最后，法国军队没有完成任务被迫撤退。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5年以后，即“1871年洋扰”。我们已提过1866年美国商船舍曼上将号在大同江平壤下游被毁一事。事隔很久，美国政府决定以此事件为借口迫使朝鲜开放通商口岸。因此美国驻北京公使弗雷德里克·F·洛，美国亚细亚舰队司令约翰·罗杰斯海军少将奉命派出一支由5艘军舰组成的分队进入朝鲜水域。大院君已经修缮了要塞，兴建了新的炮台，铸造了更多的大炮，另外，还在其它方面加强了朝鲜的防御。美国军舰大胆穿过江华海峡向上行驶时，遭到了朝鲜海岸守备兵的炮击。美国海军特遣队攻陷了江华岛南端的草芝镇和广城镇，但鱼在渊面守广

城镇却使美国进犯者遭到了重创。另外，一支企图在江华行政中心外甲串登陆的军队也被朝鲜守兵击退。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军队被迫撤回到他们设在中国海域内的基地。

大院君在击退法美军舰欣喜之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排外政策。为了表明决不与西方国家有任何交往，他下令在汉城的通衢钟路和全国许多地点竖立石碑，碑文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以此表明他坚如磐石的决心。因此，尽管发生了两次报复性的入侵，大院君仍毫不动摇地实施其闭关锁国政策。

西方两次进攻江华均遭失败，部分原因是朝鲜的顽强抵抗，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由于法、美两国侵略意图不果断。法、美没有考虑派军队占领朝鲜，也没打算并吞朝鲜领土。这两个国家都相信光靠威胁恫吓就能使朝鲜开放与西方通商。而大院君在坚决抵抗这些有限的、仅限于报复的进攻上却既有决心又有实力。此时法国正在忙于安南的问题，美国在内战后则正全力向西部开拓。他们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朝鲜的顽强抵抗，几乎没有准备用足够的力量加以反击。同样，英国正卷入平息印度的反叛，俄国则忙于对西伯利亚沿海地区进行殖民占领。因此，他们这时无暇顾及迫使朝鲜门户开放。

然而，日本则不同，这时正准备推行强有力的朝鲜政策。日本在1854年与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后先后与其它西方列强订立了通商条约。明治政府在推翻德川幕府实现王政复辟后采取了有意仿效西方物质文明以富国强兵的政策。不久，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便暴露出来，唯一的问题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因此，大院君对现代化日本的了解并不比他对西方列强了解得多，不过他的反西方政策同样也是反日的。

第十三章 开化势力的成长

第一节 开化政策以及对开化政策的反应

通商开化论的抬头

早在18世纪后期,清学即北学论者朴齐家已论证说只有与日本和西方通商朝鲜才能富强。当英国商船于1832年要求准许与朝鲜通商时,李圭景也力主准其通商。崔汉绮在其《地球典要》一书中,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主张朝鲜需要开放门户与外国交往。该书是在阅读诸如《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一类汉文著作所获得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此外,这些作者不仅关心通过对外贸易获得财富,也热衷于引进西方技术。

朴珪寿、吴庆锡和刘鸿基等人是通商论的有力鼓吹者。实学大师朴趾源的孙子,朴珪寿(1807—1876年)沿袭其祖父的传统,也广泛了解西方国家的物质文化,论证说朝鲜应当开放门户,吸收西方文化。吴庆锡(1831—1879年)是一位出身中人阶层的译官,他在中国期间搞到了《海国图志》一类书籍,便不断敦请好友阅读它们。刘鸿基(1831—1885)年,常以其笔名刘大致相称)也是一位行医的中人。他是吴庆锡的挚友,从后者那里得到了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他阅读了这些书籍,结果也成了一名通商开化论的热心鼓吹者。这样,要求进行这种变革的呼声愈益强烈,而同时朝鲜内部有利于开国通商的形势也越来越有利。

其原因之一是顽固不化的孤立主义者大院君在其漫长摄政期的第10个年头亦即1873年,终于还权归政。实际上,大院君这时是被同他对抗的儒学者和新兴的闵氏家族势力联合罢黜的。大院君意识到安东金氏势道政治的种种弊端,于是为其儿子从势单力孤的驸兴闵氏的一支中挑选王妃。不料年轻的高宗却受闵妃的摆布,当崔益铉上疏弹劾大院君时,她抓住时机,迫使大院君放弃了摄政,从而结束了他把持政权的时期。随着孤立政策最顽固的维护者的离去,朝鲜孤立政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摒弃。

开放港口

日本政府觉察到朝鲜发生的变化,便抓住机会将一项旨在推进日本侵略计划的通商条约强加给朝鲜。为此目的,日本蓄意制造了一起与朝鲜的冲突,即所谓的云扬号事件。这起事件发生于1875年,当时日本军舰云扬号出现在江华岛外的水域,立即遭到该岛东南端草芝镇朝鲜守备兵的炮击(见图,第280页)。日本政府抗议朝鲜不经检查就向一艘正在执行和平使命的日本船只开火是非法的。但实际上,从日本启程前,船上指挥官就接到了命令制造事端,而后云扬号故意侵犯朝鲜领海,才有意引发了草芝镇朝鲜守兵开火。总之,云扬号事件是日本人蓄意导演的一幕闹剧。

日本以这一事件为借口于次年任命黑田清隆为驻韩特命全权大臣,并派他统领由两艘军舰和运载400名士兵的三艘运输舰组成的军队。黑田在江华东海岸的甲串海岬登陆后就要求朝鲜进行条约谈判。虽然,大多数朝鲜当权者坚持不与日本往来,但译官吴庆锡说服右议政朴珪寿采取通商修好政策。政府于是派申晄去接待黑田使臣与他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一项条约,通常称之为

“1876年修好条约”或简称“江华条约”。在12项条款中,最重要的一款是声称朝鲜作为一个自主国家具有与日本同等的统治权,另外规定朝鲜应在随后20个月内开放釜山和其他两个港口。条约允许日本随意勘查朝鲜沿海水域,还含有一项额外领土条款,准许日本人在开放港口的租借土地上建立住所,租借地上的日本居民享有治外法权。

日本声称条约中所含的对朝鲜主权的承认证明日本决无侵略意图。然而,这项条款的真实目的却恰恰相反:条约否决了中国向朝鲜行使宗主权的要求,而排除了中国的干涉便为日本侵略扫清了道路。而且,江华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日本获得了治外法权,这样就将西方国家早先要求它的同样的不平等条款强加给了对国际法一无所知的朝鲜。日本军舰船和军队等威慑力量进行通商协议的谈判,仅这一事实便充分表明条约的片面性。

江华条约最重要的特征是开放朝鲜港口的条款。釜山是日本通过对马岛的宗氏历来享有贸易权的一个港口,其它两个港口也予以开放。这两个港口由日本指定。因此,日本派海军船只对朝鲜海岸有潜力的港口进行全面调查。日本想挑选一个不仅宜于商业贸易活动,而且有利于阻止沙俄南进的合适位置。经过多次争论,指定了东海岸中北部的元山湾。另一方面,在西海岸,开放汉城门户仁川被认为在政治上很有用处。但是从仁川出口大米是受到禁止的,就是说米仓地区全罗道的大米只能加价经陆路运到其它港口后才能运到日本。日本人在新开放的港口租借了土地定居下来,在租借地居住的日本人在朝鲜主权领土上则享有治外法权。

江华条约缔结后,日本从逼进其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目标着眼在各个方面发展与朝鲜的关系。尽管日本一心在于侵略,江华条约对朝鲜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因为它使朝鲜首次置身

于国际舞台。它也促进了西方列强逐渐与朝鲜通商,进而促使朝鲜对外开放了门户。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新文化的影响也必然伴随着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活动。实际上,朝鲜港口的开放给朝鲜人民带来重大的历史考验,那就是他们怎样才能达到既实现了开化即现代化又维护了国家独立这一双重目标。

推进开化政策

江华条约缔结的同一年即1876年,朝鲜政府任命金绮秀为修信使派驻日本。金绮秀回国后向国王呈送记载他在出使期间见闻的《日本纪游》,这份记录对日本仿效西方新文明的历程作了合理而否定的评价。日本同时也派花房义质为驻韩使臣,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获准以西大门外的清水馆为临时公使馆。

1880年金宏集(1842—1896年,后以金弘集闻名)出使日本回国时,朝鲜对隔海相望的那个世界有了更详细的了解。金宏集亲眼看到日本惊人的进步,并意识到世界其它地方的发展也在突飞猛进,他急切地希望将这种开化带到自己的祖国。金在离开日本时,从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黄遵宪那里得到了两本注定要对朝鲜产生很大影响的论著。其中之一是黄本人写的《朝鲜策略》,作者论证了要想建成富强的国家,朝鲜必须采取西方制度和技術;要想保护自己不受沙俄侵略,朝鲜应当亲中国、结日本、联美邦以自强。另一本是清代思想家郑观应写的《易言》,作者主张要振兴像他的祖国那样的国家,仅仅输入西方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支撑西方技术发展的政治和其它制度。朝鲜政府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也逐渐转向开化政策。

1881年,即金宏集回国后的第二年,赵准永、朴定阳、鱼允中、洪英植和其它几个人作为参观使团的成员被派往日本,这就是所谓的绅士游览团,其实这是一个技术使团,其目的在于广泛考察日本现代化设备。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了70多天,这期间首先参观了行政机构,其次是军队、教育、工业和其它设施。同时在清政府敦促下,金允植率领一大批出身两班家庭的学生和工匠出访天津。在天津,他们被领到中国官办兵工厂,学习新式武器制造法和基础科学在军事上的应用。朝鲜为了跟上外部世界的前进步伐就是这样进行着有意识的、明显的努力。

朝鲜在获得新知识的基础上,当时沿着开化路线进行了政治改革。高宗本人特别热衷于军事改革。早在1881年,他就将旧式军队的五军营改组为两营即武卫营和壮御营,并任命将军来统领这些军队,担任将军的都是他的密友。同时,国王聘请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来指导按现代军事法组建的新军,国王对这支别技军特别示以恩宠。另外,他挑选两班子弟中的少年聪俊之士组成士官团,让他们受新式军事技术的训练。他计划在近期完全淘汰旧式军队。不过,高宗之所以急切需要加强军事力量,显然首先是出于强化主权的考虑。

同时,行政机构的改革也在进行。建立了与清朝行政机构一致的统理机务衙门,下设事大、交邻、军务、边政、识沿监察,通商、机械、军物、船舰、典选、语学、理用等12个司。从这些新机构如通商、机械、军物、船舰等司所承担的职责可以看出,新行政机构反映了朝鲜力图适应它所面临的新形势。

“反对异教”运动和 1882 年兵变

儒学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江华条约。例如，还在谈判进行时崔益铉就在他的“五不可疏”中表示反对。他在上疏中指出，日本与洋夷没有区别，如果缔结条约，天主教就将进入朝鲜。同时，他担心一旦时机成熟日本便会进攻朝鲜。

这还与以上提到的金宏集从日本带回《朝鲜策略》一事有关。高宗让大臣们审查此文，大臣们便将此文抄写数份加以散发，以期打开反对开化政策的儒学者的眼界。然而，事与愿违，《朝鲜策略》中提出的论点反而招致这些人士的强烈反对。反对的上疏如潮水一般涌向政府。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晚孙领衔的岭南万人疏。在这类感情激昂的疏状中，儒学者提出了“卫正斥邪”论，猛烈攻击开化政策。这些朝鲜传统方式的捍卫者是如此义愤填膺，以致竟然把大院君这个早先被他们撵下台的政敌看作是值得仰慕的人物。

大院君利用这种形势计划东山再起。他的第一个方案是于 1881 年将其庶长子李载先立为国王，以取代高宗，同时清除那些谋求与日本和西方列强建立联系的开化论者。但是，阴谋被告密者揭发，李载先和三十多个同党被处死。众所周知大院君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使人，但因为是统治君主的父亲，唯独他没有受到调查。这样，开化与守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同大院君与闵妃之间的斗争纠缠在一起，给政界带来了混乱。另外，民众对日本在朝鲜影响的扩大越来越愤恨，使得形势更加动荡不宁，结果爆发了 1882 年兵变，史称“壬午军乱”。

在早先实行军制改革时设置的别技军受到了高宗的特殊恩遇，可以预料旧式军队不久会被全部淘汰。结果，旧式军队的待遇日益恶化，军队已经 13 个月没领到薪饷和给养。恰在此时，几辆运输车满载从全罗道收来的粮税到达，于是决定用它们先支付拖欠

上兵的款项。但宣惠厅(为执行大同法而设立的官署)的库吏为了私人利益,在给养大米中掺入谷壳。当愤怒的军卒与库吏发生冲突时,宣惠厅堂上闵谦镐派人将煽动闹事的军卒逮捕处死。军卒们怒不可遏,一举捣毁了闵谦镐的住宅,闵逃进王宫寻求保护(因其兄是闵妃父亲选定的继承人)。军卒们于是赶到大院君处看他能否给予支持。在公开场合大院君虽然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暗地里却又是接见兵变首领,又是派其亲信指导他们行动。军卒拿起武器进攻监狱,把关押在那里的同伴解救出来。他们杀死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又武力袭击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他的职员侥幸逃出,经仁川返回日本。但公使馆被付之一炬。兵变军卒翌日闯进宫内,杀死了闵谦镐并四处寻找闵妃报仇。闵妃趁乱躲藏起来得以幸免。

为了应付危险局势,高宗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将大院君请回宫里,恢复了他的权力。下令此后一切政务都要呈报大院君来决定。这样就再一次将权力拱手让给了他,使他得以为所欲为,这时兵变也平息了。大院君应军卒的请求,撤换了两名新指挥官,撤销了别技军,恢复了以前五军营的建置。他还废止了成立不久的统理机务衙门。为制定开化政策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落空了。

清和日本的侵略以及与列强签订的通商条约

大院君的复辟是保守主义和排外政策的胜利,不过他的胜利是短暂的,因为此时日本和清已经介入了朝鲜事务。花房义质带着东京的最新训令返回朝鲜,依仗强大的陆海军与朝鲜政府进行谈判。事实表明,最终诉诸战争行动的作法并没有过时。日本在九州福冈集结了一支混成旅团,运输船队也在待命出发,以此证明它有

能力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日本还准备一旦有机会便提出割让朝鲜巨济岛和郁陵岛的要求。当花房义质催促下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并撤到仁川。但他显示军队实力的计划未能实施,因为这时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已经登场(1882年8月20日)。

日本出兵朝鲜严重妨碍中国。中国与当时仍在天津的朝鲜公使金允植协商,认为有必要派军队对抗日本,于是派出由吴长庆统率的一支4,500人的军队。中国的立场是作为一个宗主国在其依附国出现内乱时必须出兵援助。这与中国过去的主张是直接矛盾的,即宗主国无权干涉朝鲜的内政。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是为了利用这一机会恢复它在朝鲜已被日本篡夺的最高权力地位。吴将军率领军队进入汉城,中国军队先驻扎在京城战略要地。当大院君来中国军营进行礼节性拜访时,吴将军扣住了这个兵变策划者并把他押往天津置于保护性看管之下。这样,大院君再次被撵下了台。

中国劫持大院君使日本的专横态度急转直下,日本原本无意对抗迅速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加之朝鲜反日势力的领袖和兵变策划者大院君也已被撤换下台。日朝之间立刻重开谈判,缔结了济物浦(仁川)条约。按照该条约的条款,叛军头目要受到惩罚,日本死者家属要得到赔偿,日本政府得到的损害赔偿金为500,000元,准许日本在汉城公使馆驻扎一队警卫。

尽管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并没有达到其加强在朝鲜地位的目标。相反,清朝却重申了其宗主国的权利,扩大了它在朝鲜行使的权力。朝鲜宫廷的主流派闵氏变成了亲华派(事大党),期待着中国的支持。朝鲜政府由于不能有效处理各种复杂的外交问题,便向中国寻求帮助。中国向它推荐两名外交顾问,一位是德国人名叫穆麟德,他在中国任职多年,另一位是中国外交家马建常。这两位

顾问就任后鉴于大院君已废止了一年前创制的新官制，便实施了行政机构改组。这次，设立了两个最高机构，一个是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另一个是统理军国事务衙门（内衙门）；前者处理外交和通商，后者负责军国机务和内政。在军制方面，则建立了新军营，下设左右前后4营；新军由清军将领袁世凯按清军教程训练。

朝鲜这一次在政治上受到清朝的很大影响。至于经济和外交上，清的影响就更大了。按照双方达成的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国商人作为宗主国的国民获得了在朝鲜居住、营业、自由旅行的权利。结果，中国商人数量激增，给朝鲜商人的利益以很大打击。这当然助长了朝鲜人民的反清情绪。

在中国的敦促下，朝鲜与美、法和其它西方国家缔结了通商条约，这被看成是遏止日本侵犯的一个策略。1882年首先与美国签订条约，并于同年获得批准。同时也与英国进行了条约谈判，但英国未予批准，经过修订直到1884年春天才互换议定书。1882年，与德国签订条约，第二年修订，稍后互换议定书。1884年与意大利和俄国签约，1886年与法国签约。随后又与奥地利、比利时、丹麦以及其它国家订立了通商条约。

第二节 开化党的改革运动

开化党的诞生

随着外界知识的传播，朝鲜人所说的“开化思想”，尽管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已开始对两班官吏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支持开化政策的不仅有金弘集、金允植和鱼允中一类当时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有出身外戚的闵泳翊这样的人士。不过，这些官员赞成渐进的方

式,而且想借助清朝的帮助来实现他们的计划。

相反,在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和洪英植等年轻人周围形成了另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主张推行迅速变革的政策,因为外戚闵氏家族把持着高级职位的任命使他们的晋升受到阻碍。这些人都是当时开化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刘鸿基(刘大致)的门生弟子。刘鸿基出身中人阶层,以行医为业,笃信佛教。属于这股进步潮流的还有李东仁这样的僧侣,中人边树,柳相五父子这样的武人以及李昌奎这样的商人。这样,进步阵营的成员便超越了社会阶级身份的藩篱,齐心协力地聚集在开化思想的旗帜下,探索改革之路。

改良分子坚持平等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废除阶级差别,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革新政治,同时终止中国对朝鲜事务的干涉以赢得朝鲜国的名副其实的独立。他们相信只有采取非同一般的步骤才能达到目标,他们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这样就必须结成秘密团体,结果在人数上不能不受到限制。尽管如此,他们在当时的政界仍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势力,被称为开化党或独立党。

这个集团的活动是1882年的壬午军乱后才开始引起注意的,当时朴泳孝被派往日本出任公使,金玉均和徐光范陪同前往。由于他们对朝鲜以外的世界有广泛的了解,因而赢得了高宗的信任,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得到了批准。按照他们的建议,设立了“博文局”,出版了《汉城旬报》,派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和技术课程;开设了提供现代邮政服务的邮政局;在汉城附近的广州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尽管在闵氏家族的反对下,很快被解散了。此外,改良分子也意识到外交活动对保持国家独立至关重要,于是通过一切机会与外国使节接触。

虽然开化派希望进行迅速的变革,然而他们也只能实施这几

项措施。首先，他们受到闵氏集团的敌视，得不到重要职位。其次，日本的态度明显冷淡，开化派要求日本贷款以支付新军费用和他們想要实行的其它改革费用时，遭到日本断然拒绝。因此，开化派已不可能推行他们所希望的计划了。

甲申政变(1884年)

开化派于是准备考虑必要时采取任何极端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政策。他们似乎是在1883年开始拟定计划的，大约在这一年金玉均前往日本试图筹到3,000,000元的借款，以便回国时能带回火药。但是，他为谋求对他的计划至关重要的这笔贷款的努力落空了，暂时只得等待机会。

1884年，中法在安南发生了战争，终于等到了把清朝势力从朝鲜撵走的机会。开化派当时为这一行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他们将刚从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归来的徐载弼拉进了他们的密谋小团体。同时，日本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许诺一旦发生政变，日本派驻汉城使馆的警卫队将会积极协助。至此开化派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必须指出，尽管有竹添公使的保证，然而将这桩事业的命运系于微不足道的140名日军的支持却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失算，当时虽然撤走了一些部队但汉城至少仍驻有1,500名清军。

政变发生于1884年10月17日(按西历是11月4日)。密谋者利用邮政总办洪英植为庆祝邮政局开业而举行的宴会。主宾为各国使节，陪宾为4营指挥使。密谋者计划在安国洞的别宫附近纵火，除掉4营指挥使，再将国王监禁。虽然宴会一事的进行与计划不符，但金玉均一伙还是进宫向国王谎称清军骚乱，要求日本使馆

卫兵提供保护。他们把国王送进易守难攻的景佑宫，然后召集有权调动军队的4营使和其他保守派大臣，当他们赶来后便一个个被杀掉。最后，密谋者回到昌德宫制定政治改革方案。据金玉均在后来流放时所写的《甲申日录》记述，他们将采取以下行动：

1. 立即接回大院君，终止与中国的从属关系。

2. 废除统治阶级特权，建立人人平等权利；废止特权授官制，改行量才录用制。

3. 修改全国的地税法，根除税吏敲诈勒索的恶习，以减轻人民疾苦，并保证有足够的岁入弥补政府支出。

4. 废除内侍府，但有特殊才能的官员仍予留用。

5. 惩治臭名昭彰的奸贪之官，他们的恶行劣迹已使国家陷入困境。

6. 亏欠政府的粮食借款一笔勾销。

7. 撤销奎章阁。

8. 迅速建立巡警队以防止盗贼。

9. 撤销惠商公局。

10. 重新审理流放贬斥官员的案件并准予撤回判决。

11. 将4营合而为一，挑选精锐组成由王储统率的近卫队。

12. 国内财政统归户曹，废除其它财政衙门。

13. 定期召集大臣和参赞到宫内议政所议政和禀奏国王，而后将政令公布并实施。

14. 裁汰多余的政府官署，由大臣和参赞议政和禀奏国王。

第一步措施敦促中国立即送回大院君，不仅表明开化分子对中国的敌意，也反映他们意识到暂时还需要利用大院君（不可能长期与他合作），来对付顽固的闵氏集团。宣布所有人权利平等旨在消除社会身份的差异。惩治那些已对国家造成损害的贪墨之人是

对外戚闵氏家族的沉重打击。财政统归户曹和地税法改革是为了增加国家岁入。改革官制和实行议政所议决政事，目的在于制止王权的独断专行，扩大内阁会议的权力。开化派设想如果他们控制内阁议决权就能推行他们的改革方案。

但是他们的改革措施尚未公布，中国军队就采取了行动，从而决定了开化派的命运。金玉均、朴泳孝和少数同伴随同撤退的日本警卫队亡命日本。竹添公使焚烧了使馆大楼后也加入了撤离行列。一部分日本兵在日本警备司令部遭到攻击时被杀，死于战斗的还有少数日本侨民。

列强势力的渗透

政变虽然结束了，但是朝鲜复杂的外交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政府当然要处理竹添公使对朝鲜内政的军事干涉，并坚持他应对此事负责。日本意识到竹添的行为失当，却采取谈判的态度力图回避这起事件。这样，日本的谈判使节外务卿井上馨，提出了一项侧重于对日本的损失作适当补偿而不是为其暴力行径承担责任的解决方案。最后，《汉城条约》列入了赔偿日本死亡者、补偿日本使馆重建费用的条款。

日本急于并不失时机地削弱中国在半岛的统治地位。为此目的日本提出中日双方都从朝鲜撤兵。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和强有力的中国对手李鸿章谈判，结果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了《天津协定》来解决这一问题。协议要求双方军队在签订后4个月内撤出朝鲜，并规定签约国双方都不能向朝鲜派军事教练，如果将来要向朝鲜派兵，必须事先通知另一方。

虽然《天津协定》将外国军队从朝鲜国土上撤出，但这并不意

味朝鲜完全恢复了独立地位。中国的袁世凯以通商事务全权委员的头衔继续留在汉城并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保护下,中国商人充斥于汉城和各地孜孜以牟利,不仅损害了日本商人也损害了朝鲜人的利益。顺便提一下,由于朝鲜人对中国人越来越反感,袁世凯便让在京城的中国商人住在一起,结果形成了汉城的“中国人街”。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对朝鲜作出让步。相比之下,日本的地位则一直比较弱,日本反而成了朝鲜政府首脑强烈谴责的目标。

这时在朝鲜又出现了一个对清的图谋怀有敌意的势力。1884年韩俄签订了通商条约,俄国公使卡尔·韦贝派驻汉城。他是一位才干非凡的外交家,多次晋见朝廷,在政府中扶植了一帮亲俄派。出于对中国过分干预的反感,官员中开始逐渐出现了亲俄倾向,中国外交特别顾问穆麟德被推荐给朝鲜政府后更助长了这种势头。穆麟德认为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的影响需要由第三国来平衡,为此他鼓动俄国出场。于是国王和王妃开始倾向反清亲俄政策,有人甚至认为他们与俄国达成了秘密协议。

中国对亲俄倾向可能给它在朝鲜的地位带来的危险十分警觉,首先以遣送大院君回国进行反击。袁世凯甚至主张利用高宗与俄国达成秘密协定作为借口将其废黜。中国维护自己地位的办法是用美国人德尼取代穆麟德出任外交顾问,同时将穆麟德创办的朝鲜海关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但是出乎意料德尼也主张与俄国保持联系是结束中国干涉和消除袁世凯有害影响的最好办法。

可以肯定,在1888年陆路通商条约对俄国贸易开放庆兴(与俄国接壤的豆满江边的小镇),准许俄国人在租借地居住,甚至让俄国人享有在豆满江完全航行权之前,并没有签定给予俄国在韩特权的任何条约。不过,在1885年初盛传,按照当时商定的协议的条款,俄国将从朝鲜获得许多特权并确立它在朝鲜半岛的无可匹

敌的实力地位。而且，俄国使臣韦贝在汉城的活动似乎也增强了这些传闻的可信度。

俄国的侵入不仅激怒了中国也令英国人大为恼火。面对俄国的南方防线，英国不敢对俄国在朝鲜的南进掉以轻心。因此，对清朝深有了了解的英国于1885年派遣一支舰队占据了全罗道南海岸的巨文岛，以对抗俄国的进一步行动。英国在巨文岛建造营房、构筑炮台，以种种迹象表明打算永久占据该岛。

巨文岛地处大韩海峡的门户，扼守俄国东洋舰队行驶的要道。这样，英国挫败俄国图谋的用意便显而易见了，受到警告的俄国当局立即采取了反击措施。俄国一方面向朝鲜政府声明英国的行动不能容忍，另一方面以它将占据朝鲜领土为威胁对中国施加压力。这时，中国出面调停。经过两年谈判，英国于1887年从巨文岛撤军，但撤军的条件是俄国所作的不允许任何国家占领朝鲜领土的保证。这样，英国的行动对俄国势力的推进起了重大的遏制作用。虽然如此，巨文岛事件毕竟说明朝鲜已不是自己的命运主宰，它的命运由受各自利益驱使的外国列强来决定。

在勾心斗角的列强包围下，朝鲜发现自己置身于外界带来的严重危险之中。为了克服这一危机采取了以下措施，1887年派朴定阳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美国，以培植韩美亲善关系。也是出于同一动机，德国副领事巴德勒于1885年建议朝鲜应谋求获得国际保证成为不结盟的中立国家。这项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朝鲜的国际地位在当时所具有的严重性。

第三节 东学农民军的革命运动

农民的骚动

尽管朝鲜当时面临严重的国际形势，政府却没有始终如一的政策。高宗和闵氏独裁政府只想寻找外国靠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而不想争取朝鲜民众的支持。同时，国家长期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一方面，特别免税，抛弃土地，隐结漏税已经使政府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朝鲜开港后出现的一些开销如迎送外交使团，支付日本赔偿费和引进新式设备等都需要增加大宗支出。这些开销靠海关收入和外国借款应付一部分，但政府的活动主要还是从农村筹措资金。由于巧立各种名目征课新税，而负责征税的乡吏又采用了更苛刻的榨取手段，所以农民的负担实际上翻了两三倍。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对两班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往往一触即发，变成暴力行为。许多地方爆发了人民起义，武装盗匪抢劫定期集市，其它商品集散中心也受到骚扰。

同时，日本的经济渗透也在进一步侵蚀朝鲜的农村经济。虽然日本是第一个从侵略朝鲜中受益的国家，但政变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在半岛的地位。不过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活动达到了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惊人的规模。日本商馆在每一个开放港口如仁川、釜山、元山随处可见。1896年统计数字显示，在258个商馆中日本人的竟占210个。进入朝鲜港口的商船数量，日本也占绝对优势。进入朝鲜港口总吨位为387,507吨的1,322艘商船中，日本商船为956艘，总吨位为304,224吨。悬挂日本旗的船只占总船只数的72%，占总吨位数的78%。因此，日本在朝鲜外贸中所占比例相应也显得很突出：90%以上物品出口到日本，50%以上的物

品从日本进口。详见下表：

1893年三国对朝鲜进出口额比较 单位：元		
国名	出口额(%)	进口额(%)
中国	134,085 (7.9)	1,905,698 (49.1)
日本	1,543,114 (90.9)	1,949,043 (50.2)
俄国	20,917 (1.2)	25,414 (0.7)
总计	1,698,116 (100.0)	3,880,155 (100.0)

主要进口项目棉布来自中国和日本，中国商人只是再出口英国的棉制品，而日本商人则越来越多地带来他们本国制造的布匹。朝鲜出口品主要有稻米、大豆、黄金、牛皮，几乎全部出口日本。还应指出，日本商人大多是日本社会中无视法纪的浪人，他们毫无顾忌，一心想发财，不惜损害朝鲜农民的利益。朝鲜农民只有售出大米才能购买日本的棉布、水壶、罐、锅、农具、煤油、染料、盐以及其它物品。日本商人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借钱让他们购买，然后，等到收获季节向农民索回一部分乃至全部收成。处于贫困境地的朝鲜农民无法抵御日本货的诱惑，到头来发现在贪求利润的日本商人高利盘剥下自己已经一贫如洗。

政府发现抵御日本经济渗透的一个办法是禁止某些省出口稻米。1889年在咸镜道、1890年在黄海道实施了禁止谷物出口的“防谷令”，但日本抗议使之无效。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农村日益贫困，农民对国内外剥削者的仇恨也与日俱增。

东学农民军的起义

东学教祖崔济愚于 1864 年被处死，东学运动暂时转入地下。在第二代教主崔时亨的主持下，尽管困难很大，仍编出了《东经大全》和《龙潭遗词》，这样便将新教理体系化了。同时，还建成了教堂网，组织教徒入“包”（教区），创建了教阶制。东学运动能吸引大批新教徒，原因就在于农民对两班阶级的仇恨和对外国列强入侵的抵抗。

随着东学壮大成为朝鲜社会的一种势力，一场教祖伸冤运动便蔚然兴起。这场运动发端于 1892 年，当时数千名东学教徒聚集在全罗道的参礼（见图，第 295 页），要求全罗道和忠清道的监司为崔济愚平反昭雪，结束对东学的压制。为教祖伸冤的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监司无权这样做，但保证命令乡吏停止对东学信徒的迫害。聚集的东学教徒对此不满，为达目的决意前往汉城，直接到宫门前向国王请愿。他们于第二年付诸行动，然而伏阁上疏也遭到了拒绝，请愿者被军队驱散。东学信徒接到命令在忠清道的报恩再次集会。闻讯而来的 2 万多信徒在报恩设置防御路障，升起旗帜，发出“斥倭洋倡议”的号召。当局仓惶失措，威胁要使用武力，将东学入群驱散；同时又安抚他们，再次允诺要对迫害东学的乡吏严加制裁。这样，东学势力的壮大不仅使限制东学信仰的禁令归于无效，而且使这场运动更富有吸引力。

1894 年，声势浩大、组织严密的东学运动终于演变成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农民革命战争。古阜郡守赵秉甲以残暴不仁著称，赴任以来，他利用一切机会残虐郡内人民，非法勒索农民的大量钱财，例如他强征 1,000 多元（约相当于当时 1,500 美元）为其父坟墓修建碑阁。更令人切齿痛恨的是他竟然对万石泫水库的灌溉用水课税。他调集农民在老水库下游建筑一座新水库，然而为建造水

库辛苦劳作的农民却要交纳 700 石稻米作为水税。愤怒已极的古阜人一再上诉要求公断,但没有结果。这时,在古阜郡东学教区头领全琫准的领导下,农民们占据了郡衙,夺取武器,将不法征集的税谷发还给穷人,然后毁坏了万石泚水库。政府接到这一事件的报告后派出一名特别授权的按核使进行调查。可是,这个按核使把民乱归咎于东学,拟出一份东学教徒名册,下令部分逮捕、部分即刻处决。与此同时还烧毁东学房舍,犯下了进一步的暴行。这种践踏公正、是非颠倒的行径使农民怒火中烧,他们聚集在全琫准、金开男、孙化中等东学教徒周围再次起义。拿起武器的号召在农民中间不胫而走,呼吁众人奋起保国救民。宣言的结束语这样写道:

“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如果根本凋萎,国家将会衰败。官僚无视辅国安民之责,营建乡第,极尽奢华,损害国家之资源以满足一己之私利,岂非咄咄怪事!吾辈是远离京城之乡村贫民,靠君王土地之赐享有衣食。吾辈不能坐视国家危亡。邦国有如一体,亿万民众戮力同心,高擎义旗,誓死辅国安民。吾辈今日之行动或许惊世骇俗,但尔等不必为此忧虑。因为吾辈有幸早日迎来升平岁月,人人各安其业,一旦万民均沾圣化则幸甚幸甚!”

这时泰仁、金沟、扶安等地的农民都赶来参加东学农民军,队伍扩充到几千人。他们头上和腰间缠着杂色布,至于武器,有缴获的少量铳器和刀枪,但大多数人只有竹枪和棍棒。东学农民军士气高昂,举着与众不同的黄色旗,深信佩戴的护身符能够刀枪不入。占领古阜后,他们将基地往北迁到白山,在那里停顿下来整编队伍。全琫准在当地就任大将,在他的旗帜上印有“辅国安民”的大字。

执纲所的建立和抗日战争

东学农民军以密集的战斗队形，首次在古阜郡的黄土岬击溃了来自全州的官军，接着先后占领了井邑、高敞和茂长，然后挥师向南，控制了灵光和咸平（见图，第301页）。这期间农民军已壮大到一万多人。汉城政府于是派洪启薰任两湖招讨使，率领一支800人的中央军镇压起义。然而，到达全州时，他的军队已逃亡了一半，因此尽管官军在武器上占优势，援军也及时赶来，但没有办法击败士气高昂的东学农民军。东学军在长城战役一举击溃了洪启薰的官军，然后向北推进，没遇到抵抗就占据了全州。

情急之下，政府急忙向清军求援。中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一个月內一支相当规模的清军就在牙山湾登陆。日本同时也派出军队，这样两国军队相互对峙，形势日益紧张。政府认为东学会通过某种方式作出让步，农民军也会解散，便提议进行停战谈判。全琫准获悉政府愿意听取东学要求，认为这是不进一步诉诸战争就能达到目的的机会。结果，在政府改革弊政的条件下，双方停止了敌对行动。东学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首先两班不得苛敛诛求榨取农民的血汗；其次，政府应阻止外国商人的入侵。

至此，东学农民军撤出全州，返回家乡；而另一支在忠清道起兵的东学农民军也自行解散。但由于东学宣布其目标为村村设包，其组织网逐渐遍及各地。尤其在全罗道53个郡，建立了“执纲所”，着手改革地方民政机关的弊端。执纲所有一名首脑和几名书记员，与正式的郡行政机关并存。在全州设立了由全琫准为首脑的大都所。执纲所的职位一般都由行政经验丰富的残班人士和乡吏担任。执纲所提议实行的改革计划要点如下：

1. 消除东学信徒与政府之间长期互不信任，在处理行政问题方面合作。

2. 调查作恶多端和贪污受贿的官员的罪行,严惩不贷。
3. 严惩强征勒索而发财致富的人。
4. 惩罚行为不端的儒林和两班。
5. 烧毁一切奴婢文书。
6. 改善“七班贱人”的待遇(七班贱人指官方机构的佣仆和分配为国家做苦工的劳工)并一次释放所有白丁,不再戴他们特有的平壤笠。
7. 允许年轻寡妇改嫁。
8. 取消苛捐杂税。
9. 任用官吏,打破地域和门阀界限,量才录用。
10. 严惩与日本勾结者。
11. 取消公私欠债。
12. 平均分配土地由自耕农耕种。

总之,这里主要关心的是停止政府和两班对东学的压制,终止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剥削,废除以社会身份为依据的歧视待遇,惩罚那些勾结日本进行侵略的罪人。执纲所实施的这一革命性计划受到农民最热情的欢迎。这样一来,东学的强大吸引力不仅在全罗道可以感受到,而且波及南方诸道,向北远至平安道和咸镜道。

然而,停战对东学农民军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出现所造成的一触即发的局势不久便导致了中日战争的爆发(1894年6月末),而后日本实际控制了朝鲜国内的一切安全事务。同年10月,东学再次起兵并开始北进,公开表明了“斥倭”的意图。但在公州战役中他们在以日本军为后援的官军的攻击下遭到挫败,旋即又在泰仁失利。全瑛准和其它东学农民军领袖都被捕被杀,不久东学农民军便瓦解了。

东学起义是一场范围广泛的农民反对朝鲜暴虐的两班社会的

革命运动。东学信仰通过它的组织机构为这场运动指出方向,也使之具有内聚力。尽管崔时亨为首的东学“北接”大加反对,崔时亨斥责武装起义为叛国悖教行为,但是不能动摇东学“南接”农民以武力达到目的的决心。同时,东学农民军的起义也是反对日本经济侵略的斗争。起初,东学大声疾呼“斥倭”只是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但是当日本对起义进行军事干涉时,东学便与日本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战斗。日本干涉直接导致了东学农民军在与政府短暂休战后的第二次起义。这一次北接也加入了反日斗争,为了共同事业而并肩战斗。但是东学农民军没有力量同武器新式、训练有素的日本军抗衡。最后,这场对内反对两班社会体制,对外抗击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东学农民战争终于在内外夹击下归于失败。

中日争夺支配权的竞争

朝鲜政府由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平息东学农民军的起义,于是向中国求助。中国看出这是巩固它在朝鲜日益衰落的地位的机会,便派叶志超率领一支 3000 人的军队在牙山湾登陆。这一行动按照《天津条约》的条款向日本政府进行了通报。

除中国外,日本当时也看出这是扩大它在朝鲜影响的时机。日本不仅希望恢复它的政治优势地位,而且也强烈地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产品而确保朝鲜市场。如上所述,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地位一般说来是无可匹敌的。然而,日本对朝鲜的出口与中国对朝鲜的出口相比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其绝对数额也开始减少。中国人的竞争正在缩小日本的出口,详见下表的统计数字:

朝鲜从中国和日本进口的比较 单位:墨西哥元

年	中 国(%)	日 本(%)
1885	313,342(19)	1,377,392(81)
1886	455,015(18)	2,064,353(82)
1887	742,661(26)	2,080,787(74)
1888	860,328(28)	2,196,115(72)
1889	1,101,585(32)	2,299,118(68)
1890	1,660,075(35)	3,086,897(65)
1891	2,148,294(40)	3,226,468(60)
1892	2,055,555(45)	2,555,675(55)

1885年即1884年政变后那一年,日本在两国对朝鲜的进口额占81%,但只过了7年,日本的优势就下降到55%。这组统计数字生动地描绘出日本在1884年政治失势之后中国商品在朝鲜市场的迅速渗入。而且,正如我们已了解的,1893年即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两国在朝鲜市场的占有额已几乎相等,此外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其它地方生产的商品,而从日本进口的则是日本自己制造的商品,所以日本实际受到的影响比统计数字显示的更严重。日本商人也不愿放弃他们靠敲诈勒索得到的暴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感到必须对朝鲜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把中国出兵看作是可以利用的机会。

因此,日本在保护它在朝鲜的公民的借口下,派出一支7,000人的军队,以7艘军舰为后盾在仁川登陆。但是,此时东学农民军

已撤出全州,中国和日本在朝鲜驻军的公开理由已不复存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向日本建议联合撤兵,这项建议受到了朝鲜政府和外国列强的支持。然而,日本决心利用这种形势完全消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拒绝了中国的方案。反之,日本提议两国应联合承担朝鲜的内政改革。日本争辩说,从历史上看,要使动荡不宁不致酿成公开叛乱,就绝对需要进行改革;还争辩说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东亚和平才有保障。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日本的意图是提出一个使中国不能接受的难题,然后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开战。中国当然拒绝了这项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提案,因此,当对话陷入僵局时,中日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中日战争于1894年6月以日本在牙山湾的军舰首先发动攻击开始,于1895年初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在随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第一款详细记载了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但是这里仍要重申一下以前多次说过的一个观点,该条款的意图实际上并不是保证朝鲜的独立,而是否定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条约还要求中国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割让给日本,从而暴露出日本极欲扩张到满洲的领土野心。自然,日本确信朝鲜现在已牢牢地控制在它的手中。

第四节 1894年的改革(甲午更张)

改革的实施

日本在加紧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同时,变本加厉地要求朝鲜政府进行日本早先所提议的内政改革。但朝鲜政府拒不屈从日本的压力,反而提出日本撤军是实施改革的先决条件。同时,朝鲜方面以两条理由拒绝了日本的改革方案,一是日本方案的大多数

条款可以在朝鲜现存的法律规章中找到；二是关于日本提出的少数新措施，则作为改革方案由新设立的校正厅来实施。本来，日本打算用改革问题作为向中国开战的借口，而且日本更感兴趣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攫取朝鲜的经济特权。为此目的，就必须控制朝鲜政府，所以这时日本利用它派赴朝鲜的军队强占了景福宫并拥立大院君入宫执政，由亲日派和中立派人士组成新政府，以金弘集为首的“内阁”几乎完全独立地进行了1894年的改革（史称甲午更张）。

新政府为进行改革设立了军国机务处，1894年改革（甲午更张）就是由该机构负责实施的。在金弘集任总裁官的军国机务处，17位会议员仔细审查每一项改革建议并对此作出决定。该机构的核心是俞吉浚这样的曾参与1884年改革（甲午政变）的开化党人士。因此，可以说1894年改革（甲午更张）是老开化党以新形式进行的改革运动。军国机务处的运作不仅超出国王和闵妃的权限，而且对秉承王命处理政事的大院君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实际上，很明显使军国机务处成为超政府的机构的真正意图在于保证其自主性，以防止对其运作的干预。可是一旦国王和大院君发现自己实际上已被排斥于政治决策圈之外，马上便撤销了军国机务处，尽管可以肯定其改革方案已经实施。通过这个非常机构的努力付诸实施的重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先看一下政治范畴的改革。朝鲜采用了开国纪元的历法，于是证明它与清代中国传统的宗主——附属国关系已经终止。宫内府与议政府分离则是最重要的体制变革。为精简合并各种处理宫廷和王室事务机构，设立了宫内府。在总理大臣以下重建了议政府，由原来的六曹再加上外务和农商共8部组成。部下设局，每个局的权责及其在行政等级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细的划分规定。稍后，这种

体制又进一步精简,产生了由7部组成的内阁,分别为外部、内部、度支部、法部、学部、农商工部和军部。部下设有局、课(处)。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官吏品级制度的修订。月俸一律改实物为现金。传统的科举制度也予以废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差别。

地方官制也进行了重建,将原先的8道改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适应地方情况。府下设郡,这样简化了以前复杂的建制。不久23府又重组为13道,但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仍完整地保留下来。至此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军事权被剥夺了,地方官府对当地民众的权限也被削弱了,从而反映地方行政观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颁布了裁判所构成法,一切司法问题都由该机构管辖。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别设在开放港口的裁判所属于初级裁判所,受理上诉案件的为高级裁判所或巡回裁判所。对警察权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级改革。汉城警务厅负责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观察使属下的警务官负责地方治安;后者独立于郡守行政管辖之外。

对财政管理也进行了一元化的改革。按照开化党于1884年设计的改革模式,一切财务如会计、出纳、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和其它业务,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权限范围内。度支部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货币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货币章程规定国家实行银本位制,镍币、铜币、青铜币、黄铜币为辅助货币;旧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渐换成新货币。伴随货币改革,规定租税不得以实物而要用现金支付。同时还对至此为止标准不一的度量衡进行了修订和统一。

社会改革也是1894年实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

先,就法律而言,已完全废除社会身份制。两班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不复存在,致使各级官职可能不按社会出身而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公私奴婢法被废止,人口买卖也被禁止,驿丁、广大、白丁,以及其它受歧视的人都免除了传统的卑贱身份。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预示着两班体制下的身份制度的瓦解。

此外,还颁布革除社会陋习的法规。废止了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以及对罪犯家属实行株连的缘坐法。禁止早婚,规定男为20岁,女为16岁为最低婚龄要求。准许寡妇再嫁而不论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正式批准政府官员乃至那些曾任最高职位的官员,只要不再担任现职都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修改了养子续统法,庶子有权继承父业。修改了节约法令,简化了用以区别官品高低和显示两班与平民差别的着装法,鼓励穿更实用的衣服。

改革的后果

以上叙述表明,1894年采取的措施是朝鲜行政、经济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一次彻底改革,其本身对朝鲜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同时,1894年改革也附带促进了发展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对朝鲜的进一步渗入。例如,有助于稳定金融制度的货币改革是朝鲜继续成为日本商品市场的先决条件。度量衡标准化也为日本商人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对纠正军事制度这一重要领域的失误关心不够,这是改革方案的严重缺陷。改革没有保证军队有充足兵源或新式武器供应,而这两者对现代国家的安全是至为重要的。值得一提的唯一的改革是将现存的加起来只有3,000人的军队划归新军管辖。

改革的另一个缺陷是要求以现金纳税。这使农民十分为难,因

为当时货币还没有在农村广泛流通。农民必需先用粮食换成现金，然后再交税；由于当时朝鲜尚未开设银行，这一分两段完成的纳税过程仍相当麻烦。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政府鼓励经验丰富的粮商组建米商会社，发挥“税谷换金”的金融机构的作用，但政府没有办法资助这项计划，结果没有生效。

改革方案遭到了大院君的强烈反对，他阴谋发动兵变将高宗撵下台而拥其孙子李垞为王。为实现这一计划，首先必需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为此，大院君不仅与驻扎在平壤的清军指挥使而且与仍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东学农民军进行联络。虽然阴谋败露没有成功，但引起了日本人的严重关切。日本担心它在汉城的代表大鸟圭介控制不了局势，于是将他召回，另派声望卓著的高级政治家井上馨出任驻韩公使。井上馨利用日本军队占据平壤城时搞到的大院君与中国人秘密联络的文件，迫使大院君退出了政治舞台。然后，井上馨说服国王任命朴泳孝和其他结束了长期流放从日本回国的人士加入金弘集内阁，这样实际上扶植了一个以金和朴为首的联合政府。1895年1月初，高宗在大院君、世子和宗室簇拥下率领百官参拜了宗庙，在祖宗灵前他发誓要推进改革任务。他当场宣读的“洪范”14条，被称为韩国的第一部宪法，然而更值得纪念的在于它是1894年改革成果的体现。

井上馨出任公使增强了日本对朝鲜政府的压力。但是当俄、法、德三方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退还它在中日战争中作为战利品的辽东半岛时，形势急转直下。日本的虚弱暴露无遗，朝鲜政府一致要求摆脱日本的控制和谋求俄国的援助。闵妃和她的孙子是排日亲俄新政策的幕后操纵者，随着日本压力不断增强，她们的权力受到了削弱。当闵妃获悉朴泳孝在阴谋策划强迫她退位时，她反倒将朴及其亲日同僚从政府中清洗出去。朴泳孝再次逃往日本，以李范

晋和李完用为首的亲俄派就任内阁职位,从而使政府具有了浓厚的亲俄色彩。

日本自然不愿看到朝鲜受到俄国的影响。日本政策的目的在于清除亲俄派和闵妃对朝廷的影响;此外出于对亲日势力重新上台的绝望,日本还准备不择手段孤注一掷。最后,井上馨的继任者三浦梧楼公使批准了杀害闵妃的计划,并于1895年10月8日执行(史称“乙未事变”)。这样,一国的王后竟惨死在外国刺客之手。由于害怕外国的谴责,日本将三浦梧楼召回国内审判,但被告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

在刺杀闵妃后,又组建了以金弘集为首的新内阁。新政府推行更激进的改革措施,作为已实施的改革的继续和延伸。采用了西历,发布了为儿童接种牛痘的规则,在汉城兴建小学校,在忠州、安东、大邱和东莱开设邮局,颁布了新的年号(过去每朝采用一世一元,从高宗起年号称建阳),在军制方面也进行了重建,京城有亲卫队,各道有镇卫队。发布并实施了截去朝鲜传统顶髻的断发令。

后几项改革是在举国沉浸于王后被刺的震惊之中,民众对日本侵略满怀义愤时进行的,所以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断发令更成了众矢之的,有人甚至喊出“头可断,发不可截”以示抗拒。在反日的气氛下,被称为义军的游击队遍地兴起,以武力抗击着留驻在朝鲜土地上的日军。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人是柳麟锡、李昭应、李春永和金福汉等。为了镇压义军政府忍痛被迫派出大部分新建亲卫队去农村与同胞作战。

第五节 开化时期的商工业和社会思潮

开放港口后商工业的变化

在朝鲜开放港口居住的外国商人的活动促使朝鲜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迅速的增长。对这一变化报以最热烈反应的是朝鲜的都贾商人、客主和旅阁。那些都贾商颇有远见地在汉城的汉江岸以及各地的海河口岸落脚扎根，操纵各种商品的交易以积攒资金。与享有政府赋予的特权开设六矣廛商人不同，都贾商敢作敢为，富有魄力，而且与外国商人合作从事新的商业活动的也是这些商人。开港初期，外国商人的活动被限制在港口附近地区，因此，外国商人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都贾商进行交易。于是，通过向裸负商出售进口商品，向外国商人买进出口商品，朝鲜的客主和旅阁便进一步增殖了财富。

但是当外国商人不仅能够港口地区而且能够在内地经营时，朝鲜的都贾商和裸负商便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结果，更富有胆识的客主和旅阁组织起商事会社以应付外国竞争。从1894年改革起有案可据的这类商事会社有40多家，平安道商人组织的大同商会是其中的先驱者。其中有一些企业，如出版书籍的广印社、经营酿酒和出售酒精饮料的长春社，也加入了民间合资会社。与此同时，官设会社也开始出现，数目实际上比民间会社还多。但是这些官设会社跟过去的六矣廛一样既享有政府赋予的某些特权，而它们的经营自由也往往受到限制。

商人团体也建立起来。1883年，政府设立了惠商公局以保护裸负商的利益，由于开放口岸后取消了贸易限制，他们的垄断地位受到了威胁。惠商公局力图防止外国商人的不法行为或不良经商

以保护裸负商的权益。这样,受政府保护的裸负商团、裸负商联盟无法摆脱对传统特权的依赖性,从而妨碍了它们发展成现代的商人团体。反之,通商口岸的都贾商组织的实体则逐渐发展了现代商人团体的形式和职能。这类组织于1883年在元山,1885年在仁川,稍后又在釜山建立起来。商人团体对于破坏口岸贸易的日商的不法行为进行揭发和抗议,还通过其它方式与外国商人的经济渗透作斗争。同时它们也逐渐使自己适应了西方商业惯例。

在工业方面,政府带头兴办了各种制造业企业。1883年,创立了生产近代武器的机器局,铸造货币的典圖局、印刷出版物的博文局;1885年创立了专事纺织品生产的织造局;1887年创立了制造纸张的造纸局,和采用新方法开矿的矿务局。因此,在开放港口的初期,朝鲜近代工业的特点是,工厂是由官方而不是由私人所有和经营。

在造船方面,当日本船商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时,朝鲜政府最初也试图与一家西方造船商社联合投资来与日本竞争。但是政府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支付所承担的投资份额,这一最初的努力也宣告失败。1886年,政府设立了负责海运事务的转运局,并购买了4艘新式汽船投入海运业。几年以后,1892年转运局将汽船的经营委托给新成立的官民合办会社——利运社。利运社打算主要承揽税谷运输业务,但由于实行了税谷需用现金支付的改革措施,营业额锐减。总之,当汽船在中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征用时,政府为提供国营航运服务所作的种种努力基本上便完结了。

“开化思想”的发展

我们所说的“开化思想”是实学运动中北学传统的继续。因此,

它也具有引进新技术、发展工商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过，开化思想所讨论的新技术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因而开化思想家认为通过开放朝鲜港口，与西方通商，可以更快地达到他们的目标。

西方武器技术是当时朝鲜关心的头一桩事情。在两次“洋扰”（1866年法国的报复行动和1871年美国的远征）中间的五年里，朝鲜依照《海国图志》的描绘建造了一艘新式战舰和火炮。汽船的运行虽然不如人意，但大炮却在反击美国进攻的江华岛防御战中大显威风。朝鲜在开放口岸后当然更加积极地进口新式武器，实行新式军事训练。朝鲜人也热衷于寻求能使国家致富的农业新技术。崔景锡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他在自己的试验农场饲养美国进口的家畜，种植美国进口的种子。新建的官营蚕桑公司邀请了德国技师来试验新的养蚕法。与此同时，安宗洙于1881年完成了《农政新编》。郑秉夏于1886年完成了《农政撮要》，这两部农书对西方近代农业方法都作了介绍。

渐渐地这种最初对引进新技术的关心让位于主张优先考虑政治和其它制度变革的更激进的开化思潮。俞吉浚的《西游见闻》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金玉均在其《箕和近事》中也将韩国和日本的发展阶段与西方作了对比，但是没有一部著述在涉及的广度和思想内容方面能与俞吉浚的著作相比拟。俞吉浚从19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研究日本、美国。他访问过欧洲，对汉城的外国社区也很熟悉。他在1889年写成的《西游见闻》中描述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 and 学问，用韩国的情况与它们作比较，书中还提供朝鲜应按西方文明的模式努力进行近代化。

在俞吉浚看来，开化过程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不结实的，另一条途径则果实累累。前者不是先对别国发展的来龙去脉求得

了解,而是盲目地模仿别国的方法,因而一事无成。而后一条途径则不然,首先了解根植于其物质文明的西方运作原理,然后再使之适应于本国现实。这条开化途径必然会结出果实。从这个观点出发,俞吉浚系统地阐述了当时韩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方案。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创立一个法治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过对当时的韩国而言,他认为君民共治的政体即君主立宪制是最合适的。

在1883年初,一位当时鲜为人知的作者在新创办的政府公报《汉城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会社说”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有必要创办西方式的会社、联合股份公司,解释了怎样从许多个人投资者那里获得资本,讨论了股票的发行,提出了这种公司选举社长的规则。总之,他主张朝鲜必需采取近代商业体制。

“抵制异教”的主张

“抵制异教”的思想基础是,朱熹的性理学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体系,因此,任何异质文化都必须予以清除。这种信念在那些未能参政的儒学者中根深蒂固,这些人不可避免地要对引进西方和日本文化所代表的价值标准报以敌意。因此,他们对开化思想家的理念采取了强烈反对的态度。

因为1866年和1871年外国进攻江华岛以及1876年江华条约是法、美、日侵略朝鲜的结果,所以“抵制异教”的思想首先表现为“斥和论”。李恒老(1792—1868年)是最早的“斥和论”者,1866年他在辞去“同副承旨”职位而向国王呈交的奏疏中,提出了极端的儒家思想论据来支持继续武装抵抗外国入侵者,他认为主和论抛弃了一切道德文化所依赖的价值标准,从而使人类堕落到兽行

的地步。《华西雅言》是他一生的思想和活动的纪录，由其门生编于1867年，李恒老在该书中讨论了最近外国对江华岛的进攻，再次论证说西方价值标准将导致世人无君无父，行同野兽。李恒老不只试图唤起同胞为反对外国侵略而战，因为他确信为了达到攘外目标，内修（国内改革）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只有当政府注意到它的政策危机，武备得到改善，贤良之人被委任为官，总之只有在政府的以上政策措施发生变革之后，才有可能采取强硬的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他甚至主张应鼓励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组成义兵同官军反击外来的敌人。后来，在各地兴起的反日“义兵运动”与这种强烈的武装民众的号召不无关系。

李恒老不仅关心军事侵略，也告诫人们警惕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后果。他认为，由于西方国家与朝鲜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与他们贸易往来，只会耗尽朝鲜自己消费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因此，他主张朝鲜人只要不使用西方商品，这样贸易往来自然就没有必要了。

从根据江华条约开始与日本通商时起，“抵制异教派”的思想就不只是针对西方国家，而且还针对日本。这种认为日本与西方国家对朝鲜带来的威胁是同样的观点在上引崔益铉于1876年的上疏中有出色的表述，他在上疏中详细列举了五条理由反对与日本缔结的江华条约。不过，这期间有些人在支持“抵制异教”思想的同时，继续认为朝鲜从西方有选择地吸收一种东西，即西方技术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这种认为朝鲜在掌握西方技术的同时应保留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的思想，有时被称作“东道西器”观。

第十四章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节 独立协会的活动

“大韩帝国”的成立

乙未事变后朝鲜国对日本同仇敌忾，义兵遍地蜂起，在朝鲜境内驻留的日军四面受敌。俄国公使韦贝利用时局动荡以保护使馆为借口将 100 名水兵带到汉城。李范晋和其它亲俄派人士与韦贝秘密协商将高宗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高宗为自己的安全惶恐不安，也极欲逃脱日本的威吓。1896 年 2 月，高宗按事先的安排秘密出宫潜入俄国公使馆内。国王逃亡使政局风云陡变。亲日内阁成员金弘集和鱼允中被杀，俞吉浚和其它人则亡命日本。随后组成了包括李范晋和李完用等人在内的亲俄内阁。

国王留在俄国公使馆期间，政府受到俄国的强有力的影响。朝鲜政府部门的日本顾问以及日本军事教官被尽行遣散，而代之以俄国的顾问和教官。俄国武器也介绍进来，还设立了俄语学校。俄国顾问对度支部所起的作用给人以突出的印象，俨然是这个部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各种经济特权都移交给了俄国人。不过在俄国获得特权时，其它列强也受到了鼓舞，要求利益均沾。这样，国王移居俄国使馆后大量利权便落入了外国政府和商人手中。

列强争夺利权的竞争

高宗 20 年(1883)	日本——釜山海底电线敷设权
高宗 22 年(1885)	清——仁川·义州间电线敷设权 日本——釜山·仁川间电线敷设权
高宗 23 年(1886)	日本——釜山绝影岛贮炭所设置权
高宗 25 年(1888)	日本——沿岸渔获权
高宗 28 年(1891)	日本——{仁川月尾岛贮炭所设置权 庆尚道沿岸渔采权}
高宗 31 年(1894)	日本——京釜铁道敷设权
高宗 32 年(1895)	美国——平安道云山金矿采掘权
建阳元年(1896)	美国——京仁铁道敷设权 庆源·钟城 矿山采掘权 俄国——仁川月尾岛贮炭所设置权 鸭绿江流域·郁陵岛森林采伐权 法国——京义铁道敷设权
光武元年(1897)	德国——江原道金城堂岷金矿采掘权 俄国——釜山绝影岛贮炭所设置权 美国——汉城电气·水道 施設权
光武 2 年(1898)	俄国——韩俄银行设置权 英国——平安道殷山金矿采掘权 日本——{平壤炭矿石炭专买权 京仁铁道敷设权(从美国手中买来)}

国民一致谴责国王逃到外国使馆以及不断给予外国人利权。他们的义愤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新成立的独立协会所发起的运动中。结果高宗于1897年2月从俄国使馆迁回庆运宫(今天的德寿宫),8月将年号改为光武,10月向本国和世界宣布成立独立的“大韩帝国”。在体制上韩国现在变成了帝国,可以说这是国民舆论压力的胜利。然而,韩国现实并没有改变。国王前往德寿宫而不回景福宫居住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样容易得到俄、美、英和附近其它国家使馆的保护。国王虽然在自己国家的京城,由于害怕日本,竟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把握。结果,不断丧失利权,使国家更加衰弱,人民蒙受了更大的耻辱。

“独立协会”的创立与发展

公众看到国王及其大臣准备依靠外国列强的支持来保全朝鲜领土的完整。于是群起攻击政府的政策无能,并为保持国家的独立自由进行了无畏的斗争。对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新知识阶层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人组建了各种政治团体来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权利。独立协会是这些政治团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活跃的一个。

独立协会由徐载弼于1896年成立。1884年政变失败后,徐设法逃亡美国,而后再返回朝鲜。协会成员最初来自俞吉浚和甲午更张的其它领导人所组建的建阳协会(这一名称象征传统的中国宗主国关系的终结)、尹致昊和李商在等外交界人士组成的贞洞俱乐部以及像南宫樞这类政府中层官僚人士。因此开创阶段,独立协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在职的或卸任的政府官员。

但是不久,独立协会的会员资格完全开放,任何人无须介绍或

担保都可以自由加入。而且，协会官员的遴选与行使职责都以民主方式进行，会务是由现任会员的多数来决定。结果，协会的性质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汉城一般市民成为会员。协会还将其会员网延伸到农村。继第一个支会于1898年在公州成立后，在平壤、大邱和其它地方也先后成立了支会。地方都市的支会达到相当数目之后，每道指派一人代表该道，由他们与汉城的独立协会本部保持定期联系。甚至在汉城的本部被解散以后，这些分会仍继续活动。

随着独立协会对政府的批评及对政府政策的指责升级，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认为，明哲保身的办法是退出独立协会。这样，协会的领导人便落到了像徐载弼、尹致昊和李商在等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新知识阶层的代表身上。在重要性上列在第二位的是包括南宫揆和郑乔在内的“东道西器派”，该派具有儒家革新派的特征。除了这两个主要成分外，协会的其它会员还有开化派武官韩圭高以及许多参与商会或近代株式会社事务的市民，偶而也有白丁和刚摆脱了贱民身分的市民入会。此外，加入和支持独立协会的还有以下几类：通过东学农民武装活动已在政治上觉悟的农民，韩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新成分如矿工、开放口岸的码头工、先进妇女和学生。总之，独立协会领导人来自新知识阶层，而协会的壮大与繁荣则依靠已经觉醒的广大市民的支持。

独立协会的活动

最初成立独立协会的意图在于实现两项象征性的目标：其一是在不久前拆毁的迎恩门基址上兴建一座独立门，中国使臣一直是通过迎恩门被迎入的；其二，重修慕华馆，该馆历来是招待中国使臣的场所，并在那里兴建一座独立馆和独立公园。在韩国当时面

临的国际危机的背景下,这两项目标的宣布引起了国民的热烈反应,不出所料,果然争取到全体市民、王室和政府大臣的支持与为数可观的捐助。这样成功便有了保证。1896年9月举行了独立馆的奠基典礼,独立协会也于当年成立,翌年5月,独立馆竣工,独立协会也正式挂牌成立。

随着独立协会本身转变成市民协会,它已不限于这种象征性的活动而开始进行直接的社会政治运动。协会首先发起了一场大众启蒙运动。采用的办法是主办讨论会和创办报纸。几百名会员和听众参加了每个星期日在独立馆举行的讨论会,通过参与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种公众舆论。独立协会的正式报刊是名为《大朝鲜独立会会报》半月刊,非正式报刊是被称作《独立》的每日新闻。徐载弼通过在甲午更张中起过领导作用的一些开化派人士获得了政府支持。早在独立协会成立前就出版了《独立报》创刊号。为了在一般民众中吸引广大读者,它采用韩文而不用任何汉字。于是一旦独立协会成立,《独立报》便成为表达协会观点特别是新知识阶层观点及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工具,这样《独立报》在提高公众觉悟和认识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另一份日报《皇城新闻》成为独立协会中儒教新派的喉舌。

独立协会活动基本上围绕三个目标。首先它致力于在外来侵略面前捍卫民族的自主独立。毋庸赘言,它不仅谴责外国对韩国内政的干涉,而且反对放弃利权并要求将已经丧失的利权收回。协会还敦促韩国采取自主的中立外交政策,对谋求在朝鲜半岛利益的任何列强都不偏不倚。其次,协会发起了一场人权运动,以期使更多的人参与政治决策。协会以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自由权、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权、人人平等权和国民主权论为思想根据,论证了国民参政权。这样,独立协会实际上第一次在韩国发起了一场政治民主

运动。协会为达到这一目标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将中樞院改为议会，高宗一度甚至接受了这项提议。第三，协会试图发起一场自强运动，这项计划的要点是在每个村庄设立学校，提供新式教育，兴建纺织厂、造纸厂、钢铁厂，加速国家商业化和工业化，增强现代国防能力，保障国家安全。

由于独立协会的活动，俄国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被撤销了，韩俄银行予以关闭，国王离开了俄国公使馆，搬回庆运宫住。不过独立协会鼓动宣传的高潮还要数1898年10月在钟路广场召开的官民群众大会。这时，徐载弼由于同一贯仇视他的奋斗目标的那些当权者争执不下，已决定返回美国，但是，独立协会的热情并没有因此熄灭。政府大臣也出席了大会，在蜂拥而来的汉城市民的支持下，大会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六点建议，内容如下（据1898年11月1日发行的《独立报》英文版）：

1. 官员同心合力维护和加强专制皇权，不得依赖任何外国的帮助。
2. 一切与向外国借款、借兵和转让利权有关的文件，政府和外国人订立的任何条约都要由各部大臣和中樞院议长会签加印。
3. 对情节不严重的罪犯应在公开审讯并给予被告充分辩护（可以由本人也可以由律师代为辩护）的机会后进行处罚。
4. 皇帝陛下有权敕任政府大臣，但是如果内阁大多数人不同意某人，皇帝陛下也不得任命该人。
5. 全国财政由度支部统管，其它部门或私人会社不得干预，年度预算与决算予以公布。
6. 现行法律规章要执行无误。

“现行法律规章”是指1895年颁布的“洪范”14条及政府各机构的行政法规。因此，群众大会实际号召的是实行立宪政治与法治

相互协商,任何一方不能干预韩国的内政,也不能派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俄国方面还保证不妨碍日本在朝鲜的经济活动。与日本签订协议当然并不意味俄国放弃了对韩国的图谋,事实上俄国的阴谋一如既往。例如俄国于1900年力图租借马山建立海军基地,这个地点可以当作连结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与旅顺港的海上航线的中途站。这项计划引起了日本的密切关注,并由于日本阻挠未能实现。

这时,中国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一场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抵抗运动,在西方主要列强和日本联军的镇压下最后被扑灭了。俄国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大军进入满洲,而且在反叛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仍不撤军,从而给人留下了俄国企图永久占领满洲的深刻印象。这不仅对日本也对英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样欧亚大陆便与俄国在各方面发生了对抗。1902年2月签订的“英日联盟”协定旨在遏制俄国威胁。根据该协定的条款,日本承认英国在中国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则对日本在韩国的特殊利益加以认可。两国保证当一方卷入对第三国的战争时另一方给予援助。

英日联盟加强了日本的地位,当时日本与英国和美国一致要求俄国从满洲撤军。俄国于1902年4月所作的答复是分三个阶段撤出,但只有头一个阶段是按计划实施的。这样,俄军仍像以前那样继续留在满洲,不仅如此,俄军还于1903年7月穿过鸭绿江口直入龙岩浦,购买土地,建造房屋,不久便正式要求租借那里的港区。日本再次反对迫使俄国撤回,但俄国至少将龙岩浦开放成了商港。

至此,日、俄对韩国和满洲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如果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方肯做让步,便势必要发生战争,这是可以预料的结局。果然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表示。当俄国人违背它所作的

从满洲撤军的保证时,日本立即建议双方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方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先”利益。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的营运方面有特殊利益,但同时应准许日本发展商业活动;而另一方面俄方提出,假如日本保证不利用半岛作为军事演习的基地,则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优先地位。但满洲不在日本的利益范围之内。俄国继续提议,韩国北纬 39 度以北的领土应宣布为中立地带,应允许任何一国的军队进入。曲折的谈判经过了几轮但没有找到和解的基础。日本看到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便决定诉诸军事手段。1904 年 2 月日本对俄国在旅顺的军事设施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战争成了解决两国竞争的唯一途径。

国际上对日本侵略的承认

当俄日战云密布之际,韩国于 1904 年 2 月正式宣布中立。尽管如此,日本还是派兵开进了汉城,占据了许多建筑物来炫耀它的军事实力。日本以武力威胁迫使韩国签订了“韩日协定书”。这份文件含有日本同意尊重韩国独立及朝鲜领土完整这一礼仪性的条款。但协定书要求韩国接受日本关于改善政府行政的建议,授权日本在韩国君主的个人安全受到第三国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为此,允许日本占据全国的战略要点。总之,议定书为日本希望在韩国采取的任何政治或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保护。韩国在签订该协议的同时,宣布与俄国签订的一切协议无效。日本开始营建对进行反俄战争必不可少的京义和京釜铁路,强行征用韩国电话网,擅自利用韩国江河沿海的航行权。此外,作为在韩国有计划的土地掠夺的第一步,日本还要求对所有荒芜的国有土地有开拓权,由日本的殖民者来拓垦。但是在韩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强

烈反对下，最后的这项要求被撤销了。

作为放弃对荒地开拓权的交换条件，日本坚决要求韩国在它的重要政府部门内安置日本顾问。日本极欲通过这种方式干预韩国的内政。日本的这一最后要求写进了1904年8月签署的韩日协定书。根据其条款，韩国同意任用一名由日本提名的财政顾问，与财政有关的一切事务完全按他的建议处理。另外还聘用了一名由日本挑选的外国人任外交顾问，此人将负责与其它外国政府订立条约和其它重要的外交事务，当然这一切总是要先同日本当局商议。首任日本财政顾问是目贺田种太郎，原系日本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被提名为外交顾问的则是美国人斯蒂文斯（当斯蒂文斯于1908年回到美国赞扬日本驻韩国总领事的功绩时，他在旧金山遭到两位韩国侨胞田明云和张仁焕的暗杀）。不久，虽然协议没有规定，日本仍安插了军部顾问野津镇武，警务顾问丸山重俊，宫内府顾问加藤增雄和学政参与官幣原坦。日本就这样造成了当时韩国的“顾问政治”时期。情形正是这样，实际的行政大权都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这在外交上特别明显，因为被派到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韩国公使都被召回。

与国际间预料的相反，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自始至终接连取胜。由于俄国准备讲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于是出面斡旋。美国驻韩公使霍勒斯·N·文伦敦促本国政府干涉韩国局势，以阻止日军侵略，但罗斯福置若罔闻。在罗斯福看来，日本控制韩国是防止俄国势力进一步扩张的适当办法。而且，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默许日本在韩国的统治，以此作为对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霸权地位的回报。美日之间的交易体现在1905年7月的塔夫脱—桂秘密协定之中。英国在1905年8月重新谈判英日联盟条款时承认日本有权采取适当措施来“指导、控制和保护”韩国。俄日战争结束后于

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在这项条约中日本在韩国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国际承认。

朴茨茅斯条约的最重要的条款是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俄国保证不再妨碍日本从事它认为对“指导、保护和控制”韩国政府有必要的任何活动。日本根据条约的若干条款,进而继承了原先归俄国所有的在旅顺港和大连的一切权利,日本还获得了在与俄国平等基础上发展它在满洲的商业利益的权利。总之,日本现在赢得了它在以前与俄国一无所获的谈判中企望得到的所有特权,而且还要多得多。对韩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朴茨茅斯条约意味着日本成功地消除了对它在韩国统治地位的最后威胁。日本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韩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已不再有任何顾忌或障碍了。

1905年保护条约(乙巳条约)

日本在赢得俄、英、美对它在半岛的特殊利益的承认后立即着手确立对韩国的保护。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步骤,日本通过宋秉畷和李容九领导的一进会这个亲日团体鼓吹订立保护条约的必要性。这一遮人耳目的做法目的在于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订立保护条约不是出于日方的要求,而是对韩国人民希望的答复。但一进会是由汉城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宋秉畷和东学叛徒李容九组建的,从日本人那里领取财政津贴,并受日本顾问的指挥。这样一种组织只能是日本实现其在韩国图谋的工具。因此尽管有日本占领军存在,毫不奇怪还是出现了另一个与一进会对立并为人民说话而谴责其叛国行为的组织。那就是李俊和梁汉默领导的“宪政研究会”。

但是现在韩国人想要什么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日本政策已经制订。为了缔结保护条约,日本请出了政界元老伊藤博文。伊藤和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在日军护卫下进入王宫,威胁国王及其大臣,强迫他们接受日本草拟的条约草案。韩国官员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参政(首相)和前独立协会会员韩圭高表达了最强烈的不满,竟被日本宪兵拖出了会议室。日本士兵接着闯入外部,拿来外部大臣的印章,然后日本人亲手在条约上加盖了印章(1905年11月17日),条约尽管在程序上不合法却这样生效了。英文提到的“保护条约”,韩国人只简单地称之为“乙巳条约”。而日本侵略韩国的元凶伊藤博文在1909年安重根枪击事件中饮弹毙命。

乙巳条约首先将韩国与外国关系的各方面的权力全部交给日本外务省。其次,它禁止韩国政府签订任何国际性的条约或协定。除非日本政府充当中介。第三,它规定任命一名日本总监直接听命于韩国国王,负责韩国的外交关系。总之,日本完全剥夺了韩国保持与外国政府关系的自主权。

这样,韩国在国际社会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被破坏殆尽。日本于1909年取消韩国对满洲东南地区间岛的主权要求,交换条件是要求中国同意重建满洲的安奉铁路(现在的丹东至沈阳),这说明日本已取得对韩国外交权的完全控制。日本在韩国领土方面采取的这类专断行为可以举另一个例子说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竟然凭借武力强占了郁陵岛的行政属地独岛。但是对韩国外交的控制并没有到此终结。虽然条约措词将日本总监的权力“主要”限制在与外交有关的事务上,但事实上韩国的整个内政也都受他的控制。结果,韩国主权本身实际上已被剥夺殆尽。

乙巳条约激起了韩国国民的愤怒与反对,尽管日本对新闻和社论内容严加审查,韩国报刊还是率先动员公众舆论来反对条约。

一经发动，国民的愤怒迅速达到沸点。请愿书如雪片涌来，口头抗议不绝于耳，示威游行络绎于途，商业场所罢市停业。国王侍从武官闵泳焕出于激愤在为国民留下一封感人肺腑的遗书后，自杀身亡。洪万植、宋秉璿、李相哲和李汉应等义愤填膺的官员也相继追随闵泳焕殉国。同时，“义兵”遍地兴起以武力抵抗日军。闵宗植占据了忠清道的洪城，并控制了周围农村。崔益铉和林炳瓚在全罗道淳昌起兵，申芑石在庆尚道发难。不过，这些对抗行动没有一个引起日本政策的改变。日本专等机会在国际社会面前提出适当的理由，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绞杀韩国的独立。

海牙秘密使团和韩日新协约

乙巳条约当然不合高宗的心愿。1906年2月1日《大韩每日申报》刊登的国王的一封信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声称不同意条约，并吁请列强提供联合保护。第二年，第二届海牙和平大会于1907年7月召开时，高宗为李相高、李俊和李玮钟签发了信任状并派他们到荷兰去控诉韩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会主席裁定韩国已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丧失了外交权，因此没有资格参加大会。韩国代表抗议说没有王印，条约不能生效，但最后他们提出的要求仍被否决了。这时一位富于同情心的新闻记者安排李玮钟出席了同时于海牙召开的国际新闻记者大会。李玮钟在会上严辞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披露了韩国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各方支持，恢复韩国的自主权。但是他的努力也失败了；在三个代表当中，李俊因过度悲伤死于海牙。

虽然赴海牙秘密使团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这个范围内所作的宣传确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义愤，日本对此不予理睬，反而

利用这起事件作为借口进一步加强它对韩国的控制，逼迫高宗对此事件负责，将王位让给王太子。高宗不予妥协，日本又表示愿意让他的儿子作为摄政进行统治。高宗听信了他们的安排，殊不料却发现自己被哄骗交出了王位。于是纯宗于1907年7月继位，年号“隆熙”。退位诏书发布后，国民群情激愤，纷纷示威抗议，一进会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办公大楼被愤怒的人群捣毁，日本人也四处遭到袭击。

结果日本出动军队平息了这场暴乱。日本并不满足于高宗个人退位，还打算将韩国置于更严厉的管制下。韩日新协约的签订使日本总监正式有权干预韩国的一切内政。特别是条约规定，施政改善必须听命于总监的“指导”，法令和重大行政措施都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高级官员的任免必须取得他的同意，聘用外国顾问也必须得到他的首肯。协约更进一步强制性地规定经总监推荐日本人可以出任官员。这样，日本便抛弃了先前通过顾问进行统治的方式转而采取所谓的次官统治制，后者是将数名日本官僚派到政府各部担任次官或其它要职。

韩日新协约签订后，日本立即解散了在人数上已所剩无几的韩国全部在编军队（1907年8月1日）。当时汉城有两个步兵侍卫联队约3,600人，侍卫骑兵、炮兵、辎重兵不到400人，汉城以外有8个镇卫步兵联队约4,800人。两部分总共不到8,800人。然而连这么可怜的一点力量也妨碍了日本实现其在韩国意愿的决心。因此，日本一边借口资金匮乏，声称在实行征兵制以前，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云云，一边继续解散韩国军队。此时，由于缺乏任何自卫能力，韩国已变成徒有国家躯壳的傀儡，在军队解散之日，侍卫步兵第一大队长朴性焕在屈辱中自杀，他属下的将士手持武器，在第二大队支持下，在汉城与日本占领军展开了街巷战。在弹药耗

尽后他们撤出了城市加入到农村义兵行列。各道的镇卫队也与这些“义兵”联合一道继续武装抗击日本人。

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韩国是蓄谋已久的，只是等待时机作出决定而已，现在终于要付诸实施了。1910年5月，日本委任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为新总监，将实施吞并的使命明确交给了他。寺内在就任新职之前，入还在东京就搞了一份将韩国警察权让与日本的协议，他增添了2,000名日本宪兵，让他们承担警察的职责。他一抵达汉城，立即命令《皇城新闻》、《大韩民报》、《大韩每日申报》等出版物及其它韩国报纸停刊，以防止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后他与总理李完用一道制定了吞并方案，最后于1910年8月22日让总理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1907年高宗被迫退位后，李完用的寓所被愤怒民众夷为平地，1909年12月，年轻的独立活动分子李在明曾将他刺伤。但就是这些针对他的暴力行动也未能使李完用对自己的卖国罪行有所悔悟，他继续盘踞在历史上卖国元凶的位置上。当时他只关心正在草拟的吞并条约怎样保住王室地位以及他们这一伙卖国分子的地位。条约已经签订，但害怕国民强烈反对，日本迟迟不敢公之于众。为了给宣布准备条件，当局首先解散了韩国爱国团体，将为首的爱国志士迅速逮捕。最后于1910年8月29日，强迫纯宗发布了一道“让国诏书”，声明放弃王位和国家。就这样一小撮卖国者违背全体国民的意愿，将韩国民族拱手让给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任其宰割。

条约在序言中宣称日本吞并韩国旨在“促进两国的共同繁荣和保证亚洲的永久和平”。可是，日本不是韩国的友邦而是韩国的

敌国。日本吞并韩国是以损害韩国人的利益来增进日本人的繁荣。而且就在前几年日本便曾以韩国为跳板侵略过中国，从而实际上打破了亚洲和平。很明显，日本只是以堂皇而空洞的词藻来掩饰其侵略而已。

在将韩国变为殖民地后，日本通过总督府进行统治，该机构取代了以前的总监。总督由日本的陆海军大将担任，韩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首任总督寺内正毅的统治完全采取了高压手段。他宣称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他施政的最高使命，为此，他采用了宪兵警察制度。1911年，全国军警即宪兵已扩充到7,749名，普通警察6,220名，候补宪兵中有一半以上是从韩国社会渣滓中招募的。日本驻韩宪兵司令官是全国警务总长，宪兵队长是各道的警务部长。

在这种警察制度下，韩国人最轻微的言行都可能成为受罚的理由。结果，1912年被捕人数超过50,000名，1918年达到惊人的140,000名。1910年12月安明根刺杀寺内总督未遂，事后韩国爱国志士遭到专横的逮捕，其中包括尹致昊、梁起铎、李升薰和当时最大的韩国民族主义组织新民会的许多会员。稍后，被逮捕的人当中有105名受到起诉，因而这起事件也被称为“105人事件”（或韩国阴谋集团审判案），这起案件之所以在国内外广为人知，是因为对被告罪状的明目张胆的捏造和被告所受到的严刑逼供。

总之，日本对所有不与总督府统治合作的人士都加以逮捕。在无数案件中往往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作出鞭笞或罚款的即决裁判。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报纸一律查封，以防止有害舆论的扩散。为了进一步恫吓韩国国民，规定所有日本官员甚至连学校的教师都必须身着制服，携带佩剑。不言而喻，韩国人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受到禁止。日本人利用1907年维护和平法的条款禁止具有政治意

图的集会或有任何意图的公众集会，还发布了许多旨在禁止韩国人表达自由的附加法令。

作为总督府的辅助机构，日本设立了中枢院，中枢院的成员都是韩国人。这是一个对总督提交的事情进行讨论和建议的咨询性机构。但中枢院的议长是日本政务总监，即总督府的第二号人物，议员都由日本任命。中枢院首位副议长是李完用，几乎全部议席都被他这一伙狼狈为奸卖国求荣的败类占据着。仅从其成员判断，中枢院显然就不能代表韩国国民的态度。如果再检查一下总督府向它交办的都是什么事情，中枢院作为日本主子的傀儡就看得更清楚了。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是不提交中枢院考虑的。为中枢院规定的任务是研究韩国的传统习俗。换句话说日本想从中枢院得到的只是它在韩国统治所需要的情报。因此，日本声称中枢院是韩国人参与政治表达意愿的工具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上，日本需要的是不管日本把关心政治的韩国人看成是阴谋颠覆分子也罢，或更糟是公开的煽动分子也罢，韩国人在政治上必须逆来顺受。

义兵抗争的激化

在韩国反抗日本侵略有多种形式。首先是王室为恢复分崩离析的君权进行的斗争。秘密赴海牙使团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在两班官僚当中，有些人也采取了齐心协力的行动。然而，几乎从一开始起，王公大臣就主要寄希望于外部势力，希望得到这个或那个外国势力的支持以阻止日本的侵略。最后这种方针只能使韩国去迎合其它侵略要求，而保证不了韩国人在需要时会得到支持。因此当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就无法再应付日本的强大压力了。少数抗拒日本人的官僚只是采取一些个人的行动，他们不想依靠国民

的力量进行抵抗。事实是，高宗和他的政府害怕他们统治的国民的指责超过了对日本威胁的畏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镇压独立协会、秘密审议保护条约和吞并条约而不让人民了解的原因。结果，在亲日的卖国分子组阁随时听命于总监府的情况下，国王和少数人的反抗是不可能阻挠日本侵略的。

在两班儒学者中有些人以传统推崇的方式抵抗日本，试图通过向国王上疏来促成民族抗日政策的实行。有时数百名儒学者为此聚集在宫门外向国王请愿。但是，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无论国王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于是许多人在绝望之下便选择了自杀作为唯一的出路。还有许多人则积极活动，组成“义兵”以武力来抗击日本。

儒学者领导下的“义兵”，主要由农民组成，但旧军人参加农民义兵以后，义兵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以上已经提到，韩国军队于1907年被解散时，汉城侍卫队在京城与日军展开了街巷战，他们在弹药耗尽后便撤到农村，加入了义兵的队伍。在镇卫队中，原州镇卫队在闵肯镐领导下武装起义，而后在原州、忠州、骊州、春川和韩国中部的其它地区接连重创日军。江华镇卫队在刘明奎领导下，在当地击败日军后前往黄海道加入了“义兵”。另一个例子是许芳在1905年反日上疏指斥保护条约后辞官隐退，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儒学者和遭遣散的军人，活跃于积城和临津江地区的其它郡县。李麟荣出没于江原道、李康年转战于庆北、江原地区，他的义兵得到了安东镇卫队的补充；申丕石则在庆尚道坚持抗战。应当提到申丕石，这是一位出身平民的义兵将领。

从上述可见，义兵活动开始于乙未事变（1895年闵妃被刺事件）。但这些势力原来是出于抗日的敌忾心一哄而起的，既没有军纪可言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武器。然而在1907年被遣散的士兵加入

义兵的行列后,队伍便得到了整顿,也有了武器,因而提高了战斗力。闵肯镐的麾下有几千人,许芳和李康年的部队也达到了一千多人。当然其它义兵都没有超过几百人的规模,少的只有二十来个人。这些义兵大多以山区为根据地,不时袭击日本军的守备部队,破坏铁路和电讯设施。义兵有民众的支援,又熟悉地形,这样便弥补了他们在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

义兵主要活跃于庆尚、江原、京畿和黄海诸道,但其影响实际上已波及全国。整个韩国几乎没有一个郡县不曾受到义兵时不时的袭击。满洲东南间岛的韩国游击队甚至越过豆满江袭扰韩国北部的日本守备队。1907年,李麟荣和许芳聚集了全国10000名义兵,袭击总督府司令部,先头部队距汉城东大门不到30里。仅这一事件就证明义兵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多么蓬蓬勃勃。义兵活动在1908年达到高峰以后迅疾衰落。韩国被吞并后,义兵的活动舞台转到满洲和俄国沿海地区。在那里,义兵变成了独立军,继续无畏地进行反日斗争,到1910年,在战斗中牺牲的义兵超过了17000名,包括闵肯镐、许芳、李康年和其它指挥官。下表列出的虽然是日本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义兵运动的规模。实际上,义兵规模肯定比该表显示的大得多。

韩末义兵活动状况(日本方面统计)

年 度	武装义兵数	与日军冲突次数
隆熙 1 年(1907)	44,116	323
隆熙 2 年(1908)	69,832	1,451
隆熙 3 年(1909)	25,763	898
隆熙 4 年(1910)	1,891	147
计	141,602	2,819

第三节 日本的经济侵略与韩国的民族资本

日本对韩国土地的掠夺

港口开放后,日本商人渗入韩国农村,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稍后,日本大资本家开始积极对韩国土地进行投资,更加快了土地的掠夺。我们已经看到,1904年年中日本甚至试图以开拓荒芜土地为借口用武力接管大片韩国土地。但这一无耻要求遭到了韩国舆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不久,李道宰和其它民间实业者联合一些有权势的朝臣创建了“农矿会社”,声称开拓荒地是韩国人份内的事,不能让日本人经手,结果会社得到政府许可从事这项任务。同时,保安会也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组织公众演讲和其它宣传活动来反对日本要求。于是日本撤回了接管韩国荒芜土地的建议。可是,建立总督府后,日本颁布了《国有未垦地利用法》,以这种方式最后达到了目的。

这时,日本资本家竞相创办农业会社,不仅强占未开垦的国有土地,而且将韩国政府先前用来供养军队、官府、驿站网等国家服务设施的驿屯田也攫为己有。以1904年的“韩国农业株式会社”为开端,许多冠以“韩国兴业”、“山阴道产业”等名称的日本农业会社创办起来,并很快获得了大片土地,起初是在产粮的三南地区,不久即遍及全国,它们强占的韩国土地与日俱增。“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尤其臭名远扬,该会社创建于1908年,在开业的头18个月中,强占了大约30,000町步(73,500英亩)土地。随着土地掠夺的加快,日本农民的迁移人数也急剧增加。开始的时候迁来的日本农民中有一些是自耕农,但主要部分是一心想在韩国增殖其地产的地主。

日本的土地掠夺也在铁路用地、军事用地的借口下以强迫征用的方式进行。在许多情况下，国有地是无偿征用的，私有地则先由韩国政府购买然后再交给日本人，虽然，政府先要得到日本的贷款才能支付买地的款项。在许多这一类丑闻中，日本投机商都是先探听到某地要兴建铁路，便以低价向韩国土地所有者们收购路权，再以高价卖给韩国政府，以此中饱私囊。

韩国被吞并后，由于沦为殖民地，日本对韩国土地的掠夺得以在宪兵警察制度下以土地调查方式加快进行。土地调查事业是1910年成立土地调查局后开始认真进行的。1912年制定了土地调查法，该法令规定土地所有者要使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必需申报其姓名、住址、土地登记者的名称、土地用途、面积以及其它有关数据。申报者要在规定的短时间内送交土地调查局局长。

但是韩国人对将他们所有的土地向日本总督府申报深感不安。而且，土地登记的程序也没有让全体农民详细了解，许多农民没有把土地申报当回事。结果，许多没去登记的人的土地被总督府没收了。此外，以前拨给宫内府或各种官府的宫庄田乃至驿站的驿屯田也都自动成为总督府的财产。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私有地的所有权属于地主（顺便提一下这与承认佃农权利不符），属于官府的国有地则应加以控制。这样，总督府变成了韩国最大的地主。不仅如此，而且，根据新颁行的林地法条款，所有以前的这类国有地也成了总督府的财产。结果根据1930年统计数字，总督府占有的农林土地总计达8,880,000町步，占韩国全部土地的40%。

总督府这样接管的土地一部分出一点价卖给日本人经营的土地会社，特别是“东方拓殖株式会社”，或卖给日本移民。仅“东方拓殖株式会社”占有的韩国土地面积到1930年实际上已接近110,000町步，即269,000英亩。一年里从这些土地得到的租金达

500,000石稻米(相当于250万蒲式耳,或全国总收成的3%),再加上约两倍于此数的杂粮。因此所谓的土地调查与其名称是不符的,其真正目的在于使日本总督府和日本人的会社乃至个人变成大地主。

日本对韩国自然资源的垄断

除土地外日本还垂涎韩国的一切自然资源。为了进一步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日本不得不变成金本位制,这就要靠韩国来保证贵金属的供给。因此日本不择手段地从韩国搜括黄金,得自韩国的黄金对日本实行金本位制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吞并韩国后,总督府对韩国矿藏量进行了勘查,并把矿床交给日本财团去开发。结果采矿量显著增加。金、银、铁、铅、钨、煤等矿产量有的增长五、六倍,有的甚至增长几千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矿产量的增长尤其显著,因为日本是盟国原料的重要供应者。下表清楚地显示了韩国矿产量的明显增长,特别是大战后期日本企业拥有的矿产量。

日本也鼓励造林,声称其目的在于保护韩国的森林资源,但实际上,日本采伐运走的林木远远多于营造的新林木。城市周围山丘造林虽有所增加,但偏远地区的山林却一片片地被砍伐。这种趋势在1920年后变得反而更加明显了。

日本从很早起就采取措施保护日本的渔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将独岛非法合并到日本。在合并后,日本渔民在鼓励之下纷纷移居韩国,结果他们在日本驻韩侨民中的人数激增。他们的船舶器具都比韩国渔民优越,因此日本捕捞量急剧膨胀。这种情况如下表所示:

不同民族的矿产额

单位:元

年 度	韩 国 人	日 本 人	其他国家	合 计
1909	325,976	1,297,074	2,964,562	4,587,615
1910	331,248	1,968,034	3,768,670	6,067,952
1911	296,019	1,401,569	4,488,370	6,185,958
1912	181,769	1,683,931	4,949,418	6,815,118
1913	276,359	1,934,072	5,987,095	8,197,526
1914	313,335	1,783,577	6,425,506	8,522,418
1915	384,010	2,820,682	7,311,274	10,515,966
1916	1,042,284	3,622,695	9,413,209	14,078,188
1917	857,839	7,615,982	8,584,281	17,058,102
1918	299,100	24,673,745	5,865,219	30,838,074

不同民族的渔业状况

年 度	韩 国 人			日 本 人		
	出渔船数 (只)	乘船人员 (人)	捕渔量 (元)	出渔船数 (只)	乘船人员 (人)	捕渔量 (元)
1912	10,562	160,309	5,939,375	5,653	22,488	6,629,981
1913	18,570	114,160	5,055,051	12,059	49,646	6,001,232
1914	22,158	177,791	5,615,459	11,135	48,451	6,449,226
1915	30,187	261,213	6,365,669	11,995	54,772	6,869,272
1916	34,627	216,295	7,960,982	10,621	63,186	7,994,940
1917	45,892	247,139	9,760,592	12,897	70,184	11,152,700
1918	39,000	272,077	14,670,668	14,118	74,349	18,193,334

日本企业就是这样在总督府的庇护下,对韩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实际上,总督府本身就是当时韩国最大的联合

株式会社，操纵着铁路、港口、通讯、机场等设施，并对人参、盐、烟草、鸦片等产品实行专卖，通过这些行业牟取巨额利润。总之，日本企业有总督府作靠山，近乎垄断了韩国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经营，利润自然极其丰厚。

日本对公用事业的控制

对于交通和通讯一类公用事业，日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将它们完全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起初日本争辩说它在这方面的限制政策对阻止外国资本的侵入是有必要的。但在进行这种辩护时，日本偏偏忽视了它也是一个找机会在韩国投入其掠夺性资本的外国。日本总督府为发展那些实现日本在韩国的目标所需要的公用事业作过相当的努力。而后总督府又接着进行了不少活动。

韩国第一套电讯设施于 1885 年安装，它将汉城、仁川与鸭绿江口岸的义州连结起来。这条线很快延伸到凤凰城（现在的凤城）以适应中韩两国提出的利用迅速的通讯手段进行交往的需要。但这条汉城—义州通讯线完全由中国控制，这条线路的设置实际上是中国侵略政策的结果。汉城—釜山电讯线于 1888 年通过海底电缆与日本相连。汉城—釜山设施开始由韩国政府经营，日俄战争期间全部移交给了日本人，以后由总督府管辖，1910 年自动转由总督府控制。

邮政业始于 1884 年，也于 1884 政变失败而倒闭。1895 年又重建了一所邮政局，1900 年首次办理与外国交换邮件业务。日俄战争时邮政业也落入了日本的控制，随后经总督府转到总督府的管辖下。

日本为了推进其侵略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把铺设铁路揽在手

里。日本把仁川看作是进军京畿的门户，便强迫韩国政府同意铺设急需的仁川至汉城的铁路线。但在日本提出具体计划之前，“京仁铁路”铺设权已于1896年转归一家美国公司。第二年动工的路基工程在日本的反对下受阻，于是工程转归日本，最后于1900完成。韩国的铁路干线京釜和京义两线是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所必需的军事条件，因此日本迫不急待地加紧建设。这样，为军事目的而兴建的铁路先由总监府下的铁路局继而转归总督府来管辖。另外，电力设施是由一家韩美合资的汉城电力会社于1898年首创的，因此，市内电车和照明设施总监府没有接管。不过，韩国被吞并后总督府还是将这些事业直接控制起来。

这样，现代交通和通讯设施便几乎完全由日本一手兴建和管理，它们不是为了韩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殖民宗主国本身的利益。铁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韩国铁路是靠武力征发韩国劳工、在以低廉价格买到的韩国国土上建造的，但韩国人却很少利用它，铁路主要为日本人服务。结果，这些现代设施受到的与其说是韩国人民的欢迎，毋宁说是诅咒。

日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根据1904年韩日协订书而委任的日本财政顾问目贺田种太郎对韩国的财政拥有很大的权力，拥有实质性的干预权。他在1905年首次谈到自己的任务是改革韩国货币，当时韩国货币主要由所谓的叶钱（即黄铜币）和镍币构成。目贺以流通中的许多货币是劣币为理由用日本第一银行新铸的货币代替了现行货币。根据目贺制订的兑换规定，旧镍币按其内在价值分成甲乙丙三种，甲种每个值新币制的2.5分，乙种值1分，丙种无价值，因而不能兑换。

但两种货币占当时流通镍币的三分之二,结果韩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更糟的是,许多韩国商人对新货币没有信心,在兑换实行前就用自己的旧币投资于房地产,这样便陷入了没有资金维持其商业活动的困境。然而实际上新货币是增值的,倒给日本商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润。总之,货币改变的结果是为日本商业集团在经济上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不仅如此,它使日本银行成为韩国金融业界的举足轻重的势力。

日本金融机构是在港口开放后在韩国出现的。1900年前后,日本多家银行——最重要的当推第一银行,其它还有第十八银行、第五十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已在韩国设了支行和代办处,并在韩国金融界起着重要作用。1905年初,第一银行在韩国的支行被授权发行货币,从而承担了韩国中央银行的角色,购买金银锭,为政府贷款,征收开放口岸的关税以及其它中央银行职能范围的事务。1909年韩国银行成立后,这些职能成了它的责任。但韩国银行的总裁同时由第一银行在汉城总支行的经理出任。1911年韩国被吞并后,韩国银行变为朝鲜银行(日本发音为朝鲜,日本用这个名字称呼韩国),并具有中央银行的职责。另一家日本大银行是产业银行,始建于1906年,最初的名义是帮助韩国工农业发展。在韩国沦为殖民地后,产业银行变成了主要帮助日本商人和日本农民的金融工具。

在保护时期,韩国政府被迫向日本大量借款,借来的款项都用来资助日本总监府在韩国的活动,如资助新建的银行机构,扩建道路,雇佣日本官员。借款是通过中间人总监府这个中介从日本政府或日本银行那里得到的。例如,第一银行为货币改革提供了3,000,000元贷款作为基金,而后操纵货币兑换,牟取暴利。日本关于韩国政府借款以支付它在韩国计划的政策在合并前特别富有侵

略性,到1910年,韩国负债已高达45,000,000元。

债务负担只能使韩国政府更加依赖日本,因为这个缘故出现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偿还国债运动,向全体韩国国民征集适当比例的捐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事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合并后日本总督府便通过向韩国国民征收税金来清偿欠款。

韩国民族企业面临的困难

韩国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活动是在19世纪末期独立协会发起的公众关心大韩帝国发展的热潮后开始兴盛的。在这期间,商、工业界的近代企业活动并不是政府倡导的而是由民间企业会社来进行的。

大约同时,通商口岸批发商组织的近代商人团体开始变成了商会。政府随后于1895年颁布了“商会管理法”,1905年京城也建立了这种商会即“汉城商会”。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韩国的政治控制,韩国商业界在日贺田种货币改革引起的严重金融恐慌中奋力挣扎。汉城商人当时创建汉城商会就是为了想出一种自救办法能使自己免于金融灾难。他们的直接目标是找到一种办法来克服周转资金的严重不足;当他们向政府呈交的建议由于日本阻挠而被置诸高阁时,于是决定于1906年成立自己的商业银行,即他们所称作的韩一银行。除银行主要设施外,还兴建了一座商品陈列馆。他们还出版了一份《商工月报》为商业界同行提供各种国内外经济动向的信息。但在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汉城商会被解散了,韩国商人便被吸收进日本人控制的“京城商会”。

韩国企业家从1897年前后起也开始对近代工业产生了兴趣。他们意识到只有生产出质量不低于日本的产品才竞争得过日商。

出于这种认识他们兴建了近代制造工场,纺织工业是最引人瞩目的行业。那些年间建起了许多著名的纺织工场,如1897年安弼寿的“大韩织造工场”,1900年“钟路织造社”(由政府特许的钟路的一家老布店所建),1902年金德昌的“金德昌织造工场”(是在他原来工场的基础上接近代标准重建的)等。除纺织工业外,陶瓷、稻米加工、烟草、制粉等行业的工场数量也逐渐增加。

当外国列强为获得韩国铁路建造权互相争夺时,有一种意见认为,铁路也应当用韩国的民族资本来兴建。朴琪淙于1898年创立釜下铁路会社的目的就在于此。该会社计划将釜山与洛东江口地区联结起来。其它铁路会社也相继成立,特别是1899年为建造京义线、京元线、咸镜线等铁路干线而成立的“大韩铁道会社”。但是开工资金不足,政府于1900年设立铁路院,决定由政府主管这几条干线的铺设。稍后又设立西北铁路局负责京义线铺设,其总裁李容翊于1902年举行了开工典礼,但工程却拖延下去,一直到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日军接管了这条铁路干线的建造权。

至于海运业,在19世纪90年代的官民合办会社停业后,直到1897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民间海运业。1900年成立了“大韩协同邮船株式会社”、“仁川邮船会社”、“仁汉轮船株式会社”等几家货运公司,稍后又出现了全面服务的通运社。

不过,韩国民族资本的这些工商活动与日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910年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韩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机会进一步受到限制。总监府颁布了一道管制商社法,1911年进一步加强了这项法律,日本总督府对商社的组建和解散有绝对的处置权。因此,如果说在日本的控制下,连日本商社的自由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那么,韩国资本经营的商社所遭遇的困难显然就更严重了。下表中列出的按1917年工厂所有者的族别统计的工业产量清

楚显示了这种形势。韩国人的工厂数并不比日本人的工厂数少多少,但是韩国公司的资本仅为日本的 1/8,产量不到日本的 1/10。这当然反映韩国人的民族工业大多是小规模的几乎是很不起眼的工场作坊。

不同民族在不同行业中的企业一览表(1917年)

业 种	民族别	工业数	资本金(元)	生产额(元)
制棉染织业	韩国人	70	236,390	652,073
	日本人	36	6,894,989	6,360,339
制纸业	韩国人	51	15,886	58,022
	日本人	4	15,000	144,516
皮革业	韩国人	37	52,900	229,139
	日本人	8	1,991,036	3,531,663
陶瓷制品业	韩国人	115	137,720	169,350
	日本人	67	506,500	631,944
肥皂·化肥 制造业	日本人	20	474,200	763,627
金属工业	韩国人	106	202,250	378,695
	日本人	57	279,270	1,590,729
制材工业	韩国人	22	33,917	80,529
	日本人	43	544,010	1,344,905
制粉精米业	韩国人	154	546,420	5,855,153
	日本人	152	4,082,906	41,685,923
	其他国人	1	500	4,500
面条糖果业	日本人	36	170,250	350,974
烟草制造业	韩国人	5	211,880	539,627
	日本人	21	2,214,413	6,016,332

续表

酿造业	韩国人	6	101,000	97,216
	日本人	108	1,968,485	1,835,318
	其他国人	3	23,000	53,363
制冰·制盐 清凉饮料业	日本人	17	786,281	1,321,951
印刷业	韩国人	11	103,110	65,546
	日本人	59	617,965	1,400,014
制铁业	韩国人	2	15,000	10,330
	日本人	26	8,832,555	14,801,381
	其他国人	7	2,207,584	5,975,230
电力天然气业	韩国人	3	384,733	134,769
	日本人	17	4,402,548	2,176,297
	其他国人	1	850,000	14,442
其他工业	韩国人	27	751,320	290,073
	日本人	35	279,960	575,671
	其他国人	1	5,000	2,545
	韩国日本人	1	25,000	22,000
总计	韩国人	609	2,292,526	8,520,522
	日本人	736	33,660,358	84,401,585
	其他国人	13	3,086,082	6,050,080
	韩国日本人	1	409,733	156,769

韩国人的民族工业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民族资本的增长必然要受到日本银行

的控制。此外，货币改革造成的资金严重不足致使韩国企业家陷入为谋求仅够维生的资金而绝望挣扎的境地。金宗汉的朝鲜银行建于1896年，是第一家韩国人的金融机构，随后出现了其它一些银行，包括以上提到的韩一银行。创建这些银行的是汉城的一些富商，前政府的部分官僚也给予了帮助。1903年政府甚至颁布了设立中央银行的条例。但这些影响有限的努力无法与日本人的银行相抗衡，就连韩国政府创建其中央银行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第四节 爱国启蒙运动

政治社会团体的活动

独立协会解散后，成立了其它许多政治社会团体，大大有助于提高城市知识阶层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这些团体确信韩国面临的政治社会问题要到韩国国民当中去寻求解决，于是，积极推行韩国全民教育计划。

第一个这样的团体是保安会，它是宋秀万等人针对日本试图夺取韩国荒芜地开拓权而于1904年发起组织的，该团体通过公开演讲和宣传鼓动激起了国民的反对，最后迫使日本撤回了要求。保安会在李相高领导下继续壮大，发展成了具有广泛目标的组织，但不久，在日本压制下被迫解散。

这场政治社会运动不仅反抗日本的侵略，也为国内政治改革进行斗争。例如，独立协会的前会员于1904年组织的共进会就是以此为目标的。一年后，共进会发展成“宪政研究会”，主张君主与政府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人民应当自由享受法律所保障的各项权利。其它一些政治社会团体包括被称为“人民代议会”的团体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这类政治团体经常举行活动，既谴责日本也抨击

本国政府，结果政府下令禁止在汉城举行公众政治集会。由于已经不可能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于是社会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这场运动力图通过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和使韩国人民享有更广泛的受教育机会来建立恢复韩国主权的基础。大韩自强会是具有这类计划的重要团体，于1906年组建，是宪政研究会后继者。抗议日本在海牙密使事件后要求高宗退位的就是这个团体，结果被总督府强行解散。但不久它又以大韩协会的名称出现，继续其社会文化运动。

1907年成立了国债清偿协会以发起一场偿还政府从外国几乎全部从日本所借巨款的运动。日本包藏祸心地使韩国政府承受巨大的债务是确信外债的存在威胁着国家的独立。

大邱的徐相敦和金光济等人率先提出国债可以通过韩国人民的联合努力来清偿，这一想法很快传到汉城接着扩散到全国。《大韩每日申报》、《帝国邮报》、《皇城新闻》、《万岁报》等各家舆论机构都特别积极地募集“义金”。为了共同目的，男人们加入了“禁烟运动”，妇女和姑娘们则出售头饰、项圈表示响应。总督府把这一活动视为排日运动，采取了一切手段加以压制。《大韩每日申报》的编辑梁起铎被诬告贪污该报受托管理的公众捐赠而遭到拘捕。最后，指控撤消，本人被释放，但清偿国债运动已一蹶不振。

由于政治社会运动处于总督府的严密监视下，韩国人最后只能求助于秘密结社。新民会就是这类秘密团体中的一个，成立于1907年，成员有安昌浩、李东辉、李甲、梁起铎、李升薰等报界、军界和商界人士。新民会一边公开创办陶瓷工场促进韩国工业，开设学校发展韩国教育，经营书店提高韩国人的公众意识；一边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促进韩国独立。但该组织的所有领导人都牵涉进1911年的105人事件，并遭到拘捕，结果新民会的活动陷入

了停顿。

韩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由于韩国一般国民，特别是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大幅度提高，出版报纸这种近代大众舆论媒介已变得十分重要。韩国第一家报纸可以说是《汉城旬报》，这家报纸是经金玉均等开化派成员的努力由政府设立的博文局于1883年出版的。不错，这是一份优先报导政府新闻的官方出版物，但它在向其读者报道国内外时事和介绍西方新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一年后由于金玉均的甲申政变失败，该报被迫停刊。

徐载弼于1896年创办的《独立报》是首次出版的名副其实的一家近代报纸。《独立报》起初每周出版3次，但不久改为日报，并以韩文出版。它向一般公众提供客观的新闻报道，同时也为维护民族独立和扩大公民权利而奋斗。《独立报》也成为独立协会内部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知识阶层发表见解的工具。

另一份报纸为南宫樵于1898年创办的《皇城新闻》，也是独立协会的机关报，但它更多的是为儒教革新派讲话。总的说来，《皇城新闻》吸引的读者是谙熟汉文的中上层人士，该报以中韩混用文字出版。因此，该报不能像用本国文出版的《独立报》那样传递近代价值观念。但是，《皇城新闻》站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前列。该报主笔张志渊就1905年保护条约的缔结所作的反应盛传一时。他在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社论中报道了条约缔结的始末，同时在舆论界也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为了躲避日本的审查（这种新闻审查所根据的仍然是日俄战争时期实施的军事安全条例），他免费挨家挨户地发送报纸。张志渊在谴责日本背信弃义的侵略、慨叹韩国政

府的无能之后,以这样悲愤的语句结束了社论:

“呜呼,痛矣!我二千万为人奴隶之同胞,生乎?死乎?檀箕以来四千年,国民精神一夜之间猝然灭亡而止乎!痛哉,同胞!”

1898年即《皇城新闻》问世的同一年,李钟冕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出版《帝国邮报》。这是一份纯本国语报纸,以中下层和妇女读者为对象,因此其政治作用不大,主要关心的是社会问题。

当日本加紧新闻审查,报纸已丧失公开批评日本侵略政策的自由时,英国记者欧内斯特·T·贝瑟尔在1905年联合梁起铎创办了英韩两种文字的《大韩每日申报》。由于该报由一位英国人控制,日本和英国又是盟国,所以《大韩每日申报》得以免受日本审查。报社大门挂着一块“日本人不许入内”的牌子,并一直泰然地攻击日本的侵略行径。《大韩每日申报》起初中韩两文混用,但后来为了使读者更加广泛,采用韩文出版,英文版则供外国读者阅读。为了抵制该报的影响,日本当局授意日本人出版各种报刊,但没有一家比得上《大韩每日申报》。正是这份报纸因刊登高宗否认他同意《保护条约》并吁请西方列强保护的私人信件而触怒了日本人。日本从多方刁难贝瑟尔,还到英国领事法庭对他进行指控。不久,贝瑟尔被迫与该报中断了关系,但《大韩每日申报》继续像以前一样出版。

第二年,1906年孙秉熙、吴世昌和其它天道教(东学教的新名字)的领导人创办了《万岁报》,亲日的一进会特别是该报抨击的靶子。1909年,大韩协会开始出版《大韩民报》,它也毫不留情地反对一进会。

韩国报界在提高韩国国民政治意识方面是功不可没的。韩国报纸当时已勇敢地宣称进行反日武装斗争的是“义兵”,而不是日本人所诬指的“暴徒”。难怪日本首任总监伊藤博文说过,在动员韩

国人方面,韩国报纸的一个字比他的一百个字都有威力。也难怪日本总监府要于1907年颁布新闻出版管制法对韩国本国报界实行严厉的控制。1910年日韩合并后,韩国报界的处境更加困难,这时,《大韩每日申报》实际上是唯一保留下来为人民说话的报纸,而就是这份报纸也在改名《每日申报》后变成了总督府的喉舌。在保护时期,海外韩国人也出版了几份报纸,如美国的《新韩民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潮新闻》,这几份报纸也在韩国境内发行。不过1908年这几份报纸也受到查禁,这样韩国人变成了没有一份为自己说话的报纸的民族。

不断高涨的教育热

1886年韩国政府创办了一所特别学院(育英公院),利用西方的新知识进行教育,1894年的甲午更张后,制订了一套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这几种国立学校中出现了新的课程表。1895年,高宗颁发了一道教育立国的诏书,对教育的重要性作了这样的强调:

“环顾宇内形势,凡以富强独立而雄视天下之国,人民皆知识开明。知识之开明得之于教育之善美,以故,教育乃保全国家之根本所在。”

但总的说创办官立学校还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官僚,招收的也主要是两班达官显贵的子弟。因此,这些学校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这个时期兴办教育在广大民间也蔚然成风。无数私立学校创办起来以适应教育年轻一代的日益强烈的要求。“知识即力量”已成为整个知识界的一种信念。结果,许多过去在政治运动中十分活

跃的韩国爱国志士也怀着为独立韩国奠基铺路的愿望直接投身于教育事业。这种现象在1905年韩国沦为日本保护国之后变得更明显了,因为当时公开的政治活动已几乎不可能。

第一所近代私立学校是1883年创立于元山的元山学舍,它是开化派官僚德源府使郑显奭应元山商会和当地居民的要求设立的。新开放的口岸城市的居民靠自己的力量发起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学校,是对国家面临的外来挑战的回应,具有重要意义。3年后,美国宣教会于1886年成立了培材学堂和其它几个私立学校。1905年的乙巳条约后,韩国人自己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私立学校。同时,由于美国传教士于1886年创办了梨花女子学校,韩国出现了第一所女性教育机构,不久,另外几所女子学校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这些学校在将韩国妇女从传统两班社会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韩国完全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前的几年中,私立学校数目已达到3,000来个,尤以北半部居多。这几方面情况可以从下表列举的一部分重要的私立学校中窥见一斑。

韩末的私立学校

年 代	校 名	设 立 者	地 名
高宗 20 (1883)	元 山 学 舍	郑 显 奭	元 山
高宗 23 (1886)	培 材 学 堂	美北监理会	汉 城
	梨花女子学校	美北监理会	汉 城
	徽 新 学 校	美北长老会	汉 城
高宗 27 (1890)	贞信女子学校	美北长老会	汉 城
高宗 34 (1897)	崇 实 学 校	美北长老会	平 壤

续表

光武 2 (1898)	培花女子学校	美南监理会	汉城
光武 7 (1903)	崇义女子学校	美北长老会	平壤
光武 8 (1904)	好寿敦女塾 青年学院	美南监理会 全德基	开城 汉城
光武 9 (1905)	普成学校 养正义塾 徽文义塾	李容翊 严柱益 闵泳徽	汉城 汉城 汉城
光武 10 (1906)	信圣·保圣女子学校 进明女子学校 淑明女子学校 辅仁学校 养圃义塾 中东学校 瑞甸书塾	美北长老会 严贵妃 严贵妃 辅仁学会 秦学新 申圭植 李相高	宣川 汉城 汉城 汉城 汉城 汉城 间岛
光武 11 (1907)	新兴·纪全女子学校 大成学校 五山学校 五星学校 凤鸣学校	美南长老会 安昌浩 李升薰 西北学会 李凤来	全州 平壤 定州 汉城 汉城
隆熙 2 (1908)	畿湖学校 同德女子义塾 大东专修学校	畿湖兴学会 李载克 大东学会	汉城 汉城 汉城
隆熙 3 (1909)	大昭义学校	张志日英	汉城

最热心建立私立学校的人不是两班阶层人士而来自于广大群众。在新学校受教育的许多人也不出身于两班阶层。这些学校主要讲授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开设的课程不仅有历史、地理、政治、法律,还有代数、几何等。当时的私立学校既是传授新知识的课堂,也素以民族主义运动的温床而著称。这些学校经常主办辩论、演讲比赛以及各种运动会来煽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人进入新学校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们中有些人身为高级学校学生却常常兼作初级学校教师。韩国社会中的保守分子一直认为新教育是不正统的,但私立学校依然办得很兴旺,学校充满了浓厚的爱国气氛。

日本对这些私立学校的存在极为不满,在总监府时期颁布过一道法令,要求私立学校只有经官方同意后才能开办,而且只许使用当局批准的课本。合并以后,日本教育政策改变了,总督府把重点放在指导韩国人掌握简单手工技艺的职业教育上。其原因之一是日本害怕如果让韩国人接受高级教育,韩国人就要批评殖民政策,积极从事韩国独立运动。此外,日本认为韩国不需要产生未来的领导人,所以只关心培训韩国人如何为日本官僚和技术人员服役当差。因此,日本致力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日语是韩国人的普通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日本统治的基础,而职业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只教授枯燥乏味的手工技术。然而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下,幸存的独立学校仍然是韩国民族教育的主要工具,并往往成为韩国民族运动的策源地。

宗教运动

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对知识阶层从事的政治运动和教育运动具

有重大影响。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霍勒斯·N·艾伦来到韩国，第二年，该教派的霍勒斯·G·安德伍德和北监理会传教士亨利·G·阿彭泽勒也从美国来到韩国。继他们之后，新教其它各派的许多传教士也接踵而至，他们一道积极地进行各种传教活动。作为传道的一种手段，传教士从事的医疗工作对韩国社会帮助极大。他们通过传播西方自由思想，在唤醒韩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韩国新教徒徐载弼、李商在、尹致昊这些独立协会的核心人物都投身于政治运动。新教私立学校不论是韩国人经手的还是教会创办的都以传播民族思想的机构出现。如1903年成立的皇城基督教青年会这类基督教团体便实行了积极的社会纲领，在它的刺激下类似的韩国青年团体也相继成立。这些青年团体不仅热衷于政治和教育，而且还发起禁酒、戒烟、打破迷信、争取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简化民间礼仪的运动来唤起新的社会意识。

新教备受新知识阶层，工商界人士欢迎。在经济活动发达的地区如平安道尤其如此。1905发起的大型《圣经》研讨会证明新教在韩国越来越有活力。在会上与会者朗读《圣经》篇章，激励听众自我反省，从而加深了他们的信仰热忱。1909年发起“百万救灵运动”，力图使大批信徒皈依新教。新教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因为它的教义，也因为它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化、思想和活动。新教的吸引力部分还由于一种心理因素——韩国人敏锐地感到基督教信仰可以弥补他们社会的缺陷，正是这种缺陷导致韩国丧失了国家地位。

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宗教运动也向韩国人民灌输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东学有一派被亲日的一进会拉走，但第三代教主孙秉熙在新创的天道教名义下，引导东学的主流积极参与民族运动。天道教也实行广泛的文化纲领，其中包括出版民族主义报纸《万岁

报》。

总的说来，儒教采取一种保守立场固守自己的传统，因此儒学者对近代化趋势往往持反对态度。但他们也坚定主张必须将日本人赶出韩国，为此，他们上疏请愿，招募“义兵”，抗击日军。同时也努力改革儒教使之适应于时代的变迁。如上所述，儒教革新派与新知识阶层的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参与独立协会的活动。在佛教内部也兴起了改革，1913年韩龙云的《朝鲜佛教维新论》一书问世便是这方面的一项成果。

最后，罗喆和吴赫为了恢复对檀君的信仰成立了大倮教。虽然，大倮教也是一股保守势力，但它发起的宗教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启蒙学问

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这个时期，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繁荣的。然而，这个时期学者们为启蒙国民所付出的努力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他们出于爱国的目的，致力于培养国民的独立意识，在全社会广泛传播西方的新思想。

当时，当现了许多学术团体来推进这些目标。有些学会是由各地学者组建的，如李甲的西北学会，李光钟的畿湖兴学会，张志渊的岭南学会，李保的湖南学会，南宫橿的关东学会。有些学术团体基础则更广泛一些。如俞吉浚的兴土团，金允植的大东学会，秦学新的女子教育会。这些学术团体大多数出版学报以满足公众对知识的渴求，《西北学会月报》、《畿湖兴学会月报》、《湖南学报》是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刊物。还出版了一些启蒙性杂志，如《大朝鲜独立协会会报》、《大韩自强会月报》、《少年》。创办了广学书铺、汇东书馆

等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反映新知识的书籍。

俞吉浚的《朝鲜文典》是19世纪末第一部近代著作,为韩国语言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不久,周时经成立《国文同式会》、池锡永成立国文研究会,这两个团体都致力于韩语拼写难题的研究。1907年,学部采纳池锡永的建议设立国文研究所,开始认真进行韩语拼写、使用标准化工作。在参加这项工作的学者中周时经是成就最卓著的一位,他著有《国语文法》和《朝鲜音韵学》等著作。周时经的弟子众多,后来,这些学者组建了朝鲜语学会。

这个时期在韩国史研究方面张志渊、朴殷植和申采浩是最活跃的人物。他们通过研究写作,极力倡导培植民族气节与自尊感。他们出版的著作如《乙支文德传》、《姜邯赞传》、《崔道统传》、《李舜臣传》等都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作品记叙了反击外国入侵者的英雄的生平。当时,历史地理也是热门学问,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作品也强调人民要热爱他们祖先的土地,学者们还为发掘古典、重新认识其价值下了功夫。这方面的出色工作是崔南善成立了《朝鲜光文会》,在他的资助下出版了《朝鲜丛书》。

世界史也引起了很大兴趣。特别吸引韩国人的是可以引为借鉴的建国史和可以从中吸取有益教训的亡国史。这样便出现了《瑞士建国志》、《美国独立史》、《意大利独立史》、《波兰末年战史》、《越南亡国史》等作品。由于同样的原因,世界英雄人物传记也是韩国民众喜爱的读物,如《伊太利建国三杰传》、《华盛顿传》、《彼得大帝》、《圣女贞德传》。

新小说和歌曲

这个时期还诞生了“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起到了连结韩国

旧小说与新文学的桥梁作用。新小说全部用韩文写作，所以人人都可以阅读消遣，但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它不免会受到旧小说许多特点的影响。例如，新小说继续发展惩恶劝善的主题，人物也与老套子如出一辙。然而新小说中的人物是现代背景下的现代人，他们讲的话都是用本国语的熟语传达给读者的，这些都是新小说正在向即将出现的新文学演变的明显标志。而且，新小说的主人公通过言行为韩国独立大声疾呼，有力辩护新教育的必要性，呼吁男女平等的家庭伦理，主张根除迷信，创建科学文明的社会。

总之，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新小说反映了当时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它代表韩国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阶段。李人植是新小说家中的先驱者，他的代表作有《血之泪》、《雉岳山》、《鬼之声》。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李海朝的《自由钟》和《牡丹屏》，崔瓊植的《秋月色》和安国善的《禽兽会议录》。新小说已成为1919年“三·一运动”以前韩国小说创作的主流，新小说成就的高峰以李光洙于1917年出版的《无情》一书为标志。

和着西洋乐曲，演唱新歌词的所谓“唱歌”很快就在当时流行起来。唱歌受到欢迎是从新教圣歌传入开始的，但很快就风靡全国。唱歌是对爱国、独立、新文化、新教育充满激情的赞颂，在这方面它明显地反映了创作这些歌曲的那个时代。学生和独立战士欢快地演唱这些歌曲，士气倍增，许多歌曲都渗透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这个时期，外国文学也大量介绍到韩国。《圣经》当然是第一部译成韩文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另一部作品是《天路历程》。

许多文学翻译作品也对青年读者有吸引力，如《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

第五节 “三·一”运动

流亡和秘密结社

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已不能公开进行独立运动,许多韩国民族活动分子逃往海外避难。在境外发起的独立运动基本上反映了两条不同的途径。前一条途径是提倡在邻国的领土上建立运动基地,据此以开展活动,直到可以用武力恢复韩国独立。那些越过鸭绿江、豆满江逃到满洲西间岛和北间岛或俄国沿海州的独立战士主要从事这类活动。在李始荣、李东宁和李相龙的领导下在西间岛的三源浦建立了一个著名的武装独立运动基地。为了训练独立战士在该地开设了新兴武官学校。在俄国沿海州,李相高、李东辉于1914年成立了大韩光复军政府,组建了一支独立军,制订了武装反日计划。训练独立战士进行军事斗争是“义兵”的斗争传统。实际上,许多在义兵中战斗过的人加入了新的流亡武装。

后一条途径是鼓吹韩国应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来恢复独立。为此,活跃在上海的韩国流亡者与中国保持一种秘密联系。申圭植是其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912年组织了同济社,并与中国的革命党结成了联盟。另一方面,李承晚于1909年在夏威夷组建了国民会,以美国为基地进行其国际活动。同年,朴容万在美国为韩国青年创办了“韩人少年兵学校”以此表明他所坚持的外交途径要以准备诉诸武力作为后盾的主张。合并之后,韩国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国际集会上申述韩国情况。当国际社会党大会于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时,在中国流亡的韩国独立运动分子派出代表提出韩国独立的要求。同年,韩国代表又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弱小民族会议,呼吁世界舆论恢复韩国的国家地位。

韩国国内的民族活动分子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仍继续与国外爱国者保持联系，并通过秘密结社为独立而进行斗争。1907年由安昌浩创建的新民会就属于这一类团体，它以坚持独立协会传统的韩国基督教派为核心。安昌浩本人已在美国避难，但他争辩说韩国要恢复独立必需具备两个先决条件——通过发展教育提高韩国人的知识道德水准，通过发展实业增强经济实力。因此，他一边致力于建立海外独立运动的基地，同时侧重于国内广泛的启蒙活动。但是在1911年的“105人事件”中，由于那么多领导人被捕入狱，新民会很快便解散了。不过，它的思想继续存在，并通过以前的会员所从事的启蒙和其它力所能及的活动得以广泛传播。此外，张日焕于1917年创建的朝鲜国民会也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从事爱国启蒙运动工作。还有一些团体坚持义兵运动的传统，值得一提的主要有林炳瓚于1912年组建的独立义军府，徐相日于1915年建立的朝鲜国权恢复团，蔡祺中于1913年成立后来又经朴尚镇等人扩充的“光复会”。这些团体的最终目标是以武力恢复自己国家的自由。

无论是海外独立军的武装斗争，还是亡命国外的爱国者的外交活动，抑或是国内秘密结社和教育团体的生气勃勃的工作，都表明韩国国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日的精神。这时，全国各地人民暴动此起彼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断高涨，并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致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个时刻，适逢国际风云突变，为蓄势待发的韩国人民带来了机会。

“三·一”运动的爆发

迄今为止，韩国民族运动把希望不是放在亡命活动和秘密结

社上就是放在启蒙活动宗教运动上，正是民族自决主义有力推动了以往的这种民族运动使之转变成恢复韩国独立的全民族声势浩大的运动。民族自决主义是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决议的组成部分，以响应欧洲弱小民族方兴未艾的独立运动而提出的。贯穿《凡尔赛条约》的复仇精神使人们不能全面认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接受了，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民族从前奥匈帝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而以前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都成为独立的国家。

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蹂躏的韩国人民自然以最大热情欢迎民族自决原则。韩国人相信世界最终将结束“暴力时代”迎接“道义时代”，相信依据民族自决原则韩国也可以独立，这一希望将民族运动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

1919年1月在上海集会的韩国流亡志士组织了新韩青年党，并派金奎植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为韩国独立进行呼吁。该组织也派代表前往韩国、日本、满洲、西伯利亚和其它地区，探讨开展各地独立活动的办法。同时，崔八镛和在东京的其它学生组成了朝鲜青年独立团，制订行动路线。结果1919年2月8日，大约600名学生在东京神田基督教青年会馆集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发布了国家独立宣言书。这起事件极大鼓舞了韩国国内一直试图将独立运动公开化的人们，不出一个月，一场全国范围示威游行便爆发了。

在国内，独立运动的新阶段是通过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各宗教团体来协调的。作为韩国全体国民的代表在韩国独立宣言书上签字的核心人物有天道教的孙秉熙、基督教的李升薰、佛教的韩龙云等33人。他们决定利用定于3月3日为已故国王高宗举行葬礼、大批民众将从各地聚集汉城的机会提前两天行动。1919年3

月1日,33位民族代表聚会泰和馆正式公布了《独立宣言》,并宣布韩国从现在起成为独立国。同时,学生们聚集在汉城塔洞公园聆听宣言的朗读,而后他们穿过街道,一边和平示威游行,一边高呼“韩国独立万岁”!彪炳于史册的韩国最大的民族运动“三·一”运动便揭开了序幕。

“三·一”运动的展开

“三·一”运动是以发布由33位韩国民族代表所拟订的《独立宣言》为开端的。尽管有些人主张起草成独立请愿书,但最后拟订并宣布的还是正式的《独立宣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三·一”运动,使之发展成全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宣言的开头几行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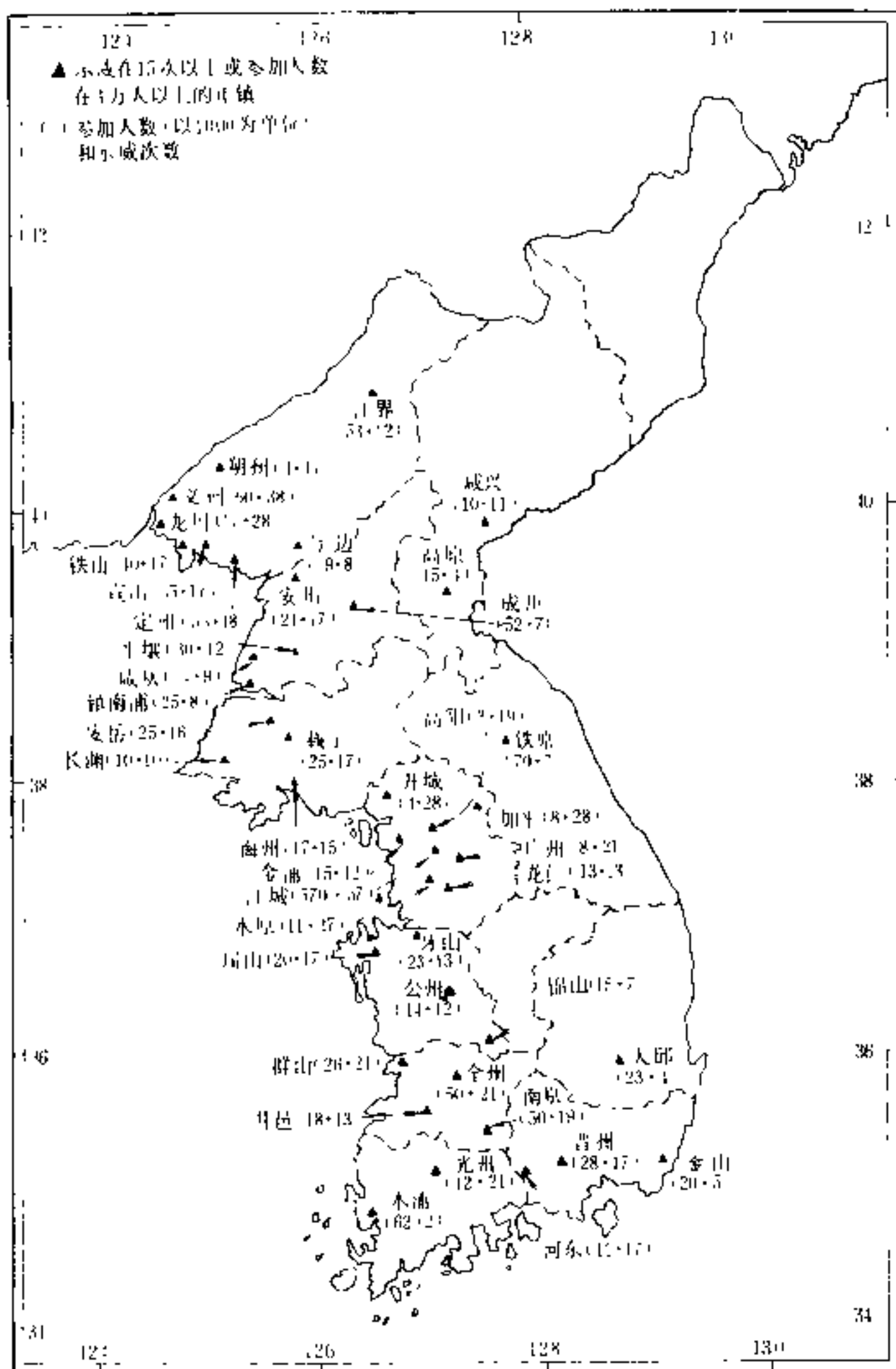
“吾等兹宣布我朝鲜为独立国,朝鲜人为自主民。以此告世界万邦,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子孙万代,永有民族自存之正权。依仗半万年历史之权威发此宣言,合二千万民众之诚忠布明此宣言,为民族恒久如一之自由发展而主张此宣言,为顺应并进基因于人类良心发露之世界改造之大机运而提起此宣言,此为是天之明命,时代之大势,全人类共存同生之正当发动,天下何物都不能沮止抑制之。”

韩国独立宣言宣布民族自存的正当权利和人类平等的至上原则,并没有煽动反对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复仇行动。因此,正如附在宣言后的三章公约所保证的坚决要求自决的韩国人民不采取任何排它的手段,人人始终恪遵共同协议,为了民族尊严与荣誉而秉持正大光明。换句话说,“三·一”运动的用意完全是和平的。

33位民族代表在泰和馆读完独立宣言后就向日本当局通报

了自己的行动,结果立即遭到拘捕。他们的计划是,他们发起的独立运动首先由学生开其端,然后扩大国民运动。于是学生有计划地聚集在塔洞公园,正式宣读独立宣言后便高举太极旗,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开始游行示威。学生的游行示威为“三·一”运动增加了活力。不仅学生、商人、农民、劳动者和一般市民参加进来,连在督政府就职的韩国人也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的同情。示威运动逐渐蔓延到农村,独立万岁的呼喊声响彻了全国的山林村镇。不分男女老幼,独立是一切活着的人的共同心声。确实,“三·一”运动的唯一武器就是“韩国独立万岁”这一呐喊。韩国人如此浩大的独立示威使日本当局大为震惊。日本惊惶不安地看到,这场大示威的直接参加者达2百万,集会达1,500次,218个郡除7个以外都发生了示威活动(见图,第359页)。示威游行很快蔓延到满洲、俄国沿海州以及海外其它地区。

和平示威运动被军队镇压下去,日本不仅派出了宪兵和警察,还出动了海军。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遭到了枪击。接着日本人又野蛮地焚烧学校、教堂和私人住宅。据日本官方发布的报告,有46,948名示威者被捕,7,509人被杀,15,961人受伤,715所房屋被毁或被烧,再加上47所教堂和2所学校。但实际数字都远远超过官方的报告。此外还发生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暴行,如水源附近的堤岩里有29人被赶进教堂里活活烧死。然而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它的国际地位是稳固的。由于这个缘故,尽管韩国人赤手空拳地反对日本非人道的镇压政策,“三·一”运动并没有赢得西方列强的支持,最终未能达到目的。



“三·三”运动图

韩国临时政府的建立

“三·一”运动是由宗教团体和教育机构进行的，但它们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紧密结合的组织。海外的独立运动也是由韩国的各种流亡人士独自进行的。另外，“三·一”运动后不久在国内外成立了几个不同的临时政府。因此，感到需要有一个对独立运动的进一步活动进行全面指挥的领导机构，于是为创建一个这样的统一的流亡临时政府便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它既包括久已在海外活动的韩国人，也包括“三·一”运动后流亡国外的人士。在结构上，临时政府由议政府和国务院组成。虽然这是一个流亡政府，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按照民主原则组成的政府。新创建的临时政府不是旧君主制的复辟，而是民主政府，这一事实反映了韩国人民在“三·一”运动中显示的威力，也进一步证明韩国人民的政治意识已达到一个新的觉悟阶段。

临时政府与韩国人民的联系通过一个专为此目的而设置的联络机构来维持。各道、郡、镇都有人负责联络，正是这种制度为全国各地的任何人参加独立运动提供了出路。再者，国外继续进行独立活动所需的资金通过这一机构向韩国民众征集，并转送出去。

临时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派金奎植为全权公使出席1919年5月的巴黎和会，声明韩国的独立事业，还派代表参加同年8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社会党大会，会上通过一项争取韩国独立的决议。同年，在满洲安东县设立了光复军总督，满洲和俄国沿海州的独立军重新聚集在一面旗帜下，从而为以武力开展独立斗争作好了准备。最后，临时政府出版《独立新闻》作为机关报，正是该报将国内外独立运动的进展告知民众，重新唤起和助长了国民的独立自由思想。

第十五章 民族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殖民政策的转变

宣扬“文化政治”

“三·一”运动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变它在韩国的殖民政策，尽管只是装装门面。日本宣传机构宣称韩国人已甘心屈从于日本殖民统治的谎言现在已大白于天下，因此世界舆论对日本在韩国的做法也严辞谴责。于是日本不得不宣布它放弃宪兵警察统治，而支持所谓的“文化政治”。这样就要求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改，斋藤实将军出任新总督后，便公布了在“文化政治”的名义下所作的一些重要政策调整。

首先，以往韩国总督是从现职陆海军大将中挑选的，现在改为也可以任命文官出任。其次，废止宪兵警察制，实行普通警察制。最后，扩大韩国人受教育面，并将其标准提高到与日本人同等的水平，同时放松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允许韩国人出版韩文报纸。

但这一切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达到与以往完全相同的目标罢了。因此，新政策大部分是欺骗性和蛊惑性的。首先，迄止1945年日本被用武力撵出韩国，没有一个文官被任命为总督。此外，虽然宣布对警察制度实行改革，但警察机构实际上却在扩充，警察人员也在增加，包括宪兵在内，1919年的“三·一”运动后不久，警察人数增加到15,000名左右，1938年达到21,782名。同时，监狱林

立，因“思想犯”而被捕的人数剧增。至于鼓噪一时的扩大韩国人受教育机会，正像后面要详细解释的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宣传，而以前的差别教育依然如故。再者，创办用韩文出版的韩国人的报纸如《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和《时代日报》倒是实情，但对日本来说这不过是用来控制韩国舆论喉舌的一种手段。相应地日本审查制度依旧很严格，删改、没收、罚款、停刊的事例层出不穷，平均每月有五、六起之多。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在日本的韩国人所承受的非人待遇，无疑让韩国人看清了日本假仁假义的真面目，当时许多无辜的韩国人被日本暴徒残害了。

总之，日本声称的“文化政治”不过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对其以往的暴力镇压政策所作的某种表面的和欺骗性的调整。日本的殖民政策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仅有的一点政策变化也是由于日本国内发展不利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导致日本对韩国的要求发生变化才引起的。

掠夺韩国的稻米

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发生的一些新情况迫使日本在韩国的殖民政策作出某些修改。首先是为了克服日本在高速工业化中因失调而带来的粮食供应的严重危机，决定将大量的韩国稻米运往日本。特别是1918年日本米价暴涨引发了全国性的米骚动。结果，日本对韩国大米需求量激增。

从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起，韩国稻米就不断流入日本，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后进一步加快了稻米的流出。现在，日本面临国内粮食供应的严重危机，对韩国稻米的需求更是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于是便采取了特殊措施以增加其殖民地的稻米生产。第一步

计划设想从 1920 年起在 15 年内用 1.68 亿元经费来灌溉 427,500 町步上地,并改进耕种方法,使稻米产量增加 920 万石以上。预计增加的一半以上即 500 万石定为每年对日本的输出量。不过即便如此,也意味韩国将能增加 420 万石稻米,所以韩国也能从这项计划中受益。

但事实上增加稻米产量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1926 年下调了指标,但产量仍距目标甚远。1912—1916 年间稻米产量平均为 1230 万石,1922—1926 年间增加到 1450 万石,甚至在以后 1932—1936 年的十年间,稻米收获量平均也只有 1700 万石。这样,总增加量不到原先计划的 1/3,但 1922—1926 年间稻米输出量(实际上全部输出日本)却从 1912—1916 年间年平均量仅 106 万石增加了 4 倍多。下一个十年再度上升,到 1932—1936 年间达 876 万石。此时,向日本输出的韩国稻米数竟超过了韩国全部稻米产量的一半。在下表所涉及的 25 年间,韩国稻米产量增加不到 40%,而同期稻米的输出却增长了 8 倍多。

稻米的产量和输出量

单位:百万石

时期	1912-1916	1917-1921	1922-1926	1927-1931	1932-1936
平均产量	12.3	14.1	14.5	15.8	17.0
生产指数	(100)	(115)	(118)	(128)	(138)
平均输出量	1.06	2.20	4.34	6.61	8.76
输出指数	(100)	(208)	(409)	(624)	(826)
国内消费量	11.24	11.90	10.16	9.19	8.24
人均消费量 (按石)	(0.72)	(0.69)	(0.59)	(0.50)	(0.40)

由于输出日本的稻米超过了指标定量,而产量的增长则大大低于日本计划者制订的目标,所以韩国消费者只得忍饥挨饿,因为尽管稻米收获量增加了(1919-1934年间增加了370万石),但韩国民众的所得量却大大减少。结果,与日本人均稻米年消费量为1石以上相比,韩国的人均稻米年消费量逐步下降到不到它的一半。那么,用什么东西让饥肠辘辘的韩国人果腹呢?于是从中国弄来了各种杂粮,有小米、高粱、黄豆等。从中国输入的小米,1912年只有1.5万石,到1930年猛增到172万石,比原来增长了100倍。被拿去供养日本人的韩国稻米就是用这些杂粮来替代的。

日本增加韩国稻米产量的进一步计划于1934年暂时中止了。这是因为日本也陷入了世界范围的萧条,害怕韩国稻米输入增加会使日本农民面临的价格形势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虽然计划已经暂停,但业已进行的提高亩产量的土地改良方案仍在实施。这主要指地方水利协会承担的水利工程。到1931年,韩国各地大约有138个这样的工程竣工,另有23个在进行之中,全部经费超过1亿元。但是,由于这些水利设施耗资巨大,水利协会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因而对灌溉区域土地征收的水费也大幅度增加。由于这个缘故本应上涨的新灌溉土地的价格在许多情况下反而开始下跌。结果,本应给农民带来好处的新水利设施实际上却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陷入贫困。一时各地掀起了反对水利协会的浪潮。

韩国成为日本的商品市场

日本不仅把韩国视为粮食供给地,还把它看作是日本的商品市场。1920年取消所有韩国出口税,1923年允许大多数日本进口品自由进入,因此日本对韩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到

1931年为止,韩国出口总额的95%输往日本,同年韩国进口总额的80%来自日本。韩国市场对日本工业的重要性根据日本出口总额中韩国所吸收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一数字1939年达到34%。

而且,在韩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中占优势的是制造品,如1919年占79.1%,并基本上保持这一水平。进口品主要有布料、纱线、酒类、糖、烟草、纸类、机械,换言之,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中很大比例是日用品。相反,韩国向日本的出口品主要是粮食,特别是稻米,而且至少到1930年,原料和半成品出口在重要性上还是第二位的。仅从这一点便可以清楚看出韩国确实是日本的殖民地。

韩国对日本贸易的构成

(按现值的百分比)

年份	出 口				进 口			
	1919	1929	1935	1939	1919	1929	1935	1939
原 料	(85.2)	(83.0)	(73.7)	(49.5)	(6.8)	(13.3)	(16.3)	(14.5)
食 品	72.0	68.9	57.2	27.9	1.6	9.8	6.0	5.7
工业原料	13.2	14.1	16.5	21.6	5.2	3.5	10.3	8.8
制 造 品	(10.4)	(13.3)	(22.9)	(45.8)	(79.1)	(79.5)	(79.6)	(80.9)
食 品	0.4	2.5	1.6	2.5	5.1	8.1	6.6	5.1
半制成品	9.7	8.8	17.2	32.4	9.3	10.4	14.2	14.4
制 成 品	0.3	2.0	4.1	10.9	64.7	61.0	58.8	61.4
其 他	(4.4)	(3.7)	(3.4)	(4.7)	(14.1)	(7.2)	(4.1)	(4.6)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然而,20世纪30年代韩国对日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然,日本作为韩国几乎唯一的贸易伙伴的地位进一步被加强了,向日本出口的工业原料的不断增长正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关系。同时,

韩国对日本出口中制造品所占比例也开始迅速增长。1929年只有10.4%，到1935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39年几乎占出口总额的一半。另一方面，出口日本的粮食主要是大米的比例，甚至连绝对数量也在下降。以百分比计算，粮食出口在1919—1935年间从72%降到57.2%，到1939年急剧降到仅27.9%。但是根据这些事实就推断韩国作为日本殖民附属国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是失之轻率的。这是因为出口日本的韩国制造品的增长恰恰是日本资本在韩国投资增长的反映。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在推行日本殖民政策方面又发生了某种变化。

日本对重工业的投资

1920年，总督府取消韩国商会管制法。结果，建立公司不再需要批准，只要登记即可，因此，那些希望创办新企业的人便从以前要等待许可的冗长程序中解脱出来。但如果认为日本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鼓励韩国人投资那就错了。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韩国发展对日本资本投资有利的市场，日本作为盟国的供给国享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景气现已使其资本过剩。日本的目的是要把韩国从销售日本成品的市场转变成资金市场。韩国劳工成本低廉不到日本劳工的一半，而且可以要求韩国劳工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这些有利的劳工条件，再加上廉价的水电力的充足供应这一潜力，吸引了日本投资者的注意。这样，于1926年成立了朝鲜水力电气会社，开发咸镜道赴战江的水力。第二年在兴南成立了可以利用当地电力的朝鲜氮肥会社。在当地兴建的化肥厂就规模而言不仅在韩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日本也未必有先例。

日本资本在韩国的大规模投资就这样开始了，1931年满洲事

件的爆发,日本傀儡的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日本对满洲的全面控制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日本现在变成了所谓的国防国家,因而感到更需要开发韩国资源以供应日本的军事工业。日本大财阀争先恐后地在韩国建造工厂,韩国工业结构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增长极快。

具体而言,1925年制造业在韩国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为17.7%,1931年增加到22.7%,1936年为31.3%,1939年为39%。相反,农业品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从1925年的72.7%,下降到1931年的63.1%,1936年的51.8%,1939年的42%。结果,如果把1939年的6%的矿产量加到该年39%的制造业中,那么该年矿业与制造业相加构成韩国总产量的最重要部分,甚至超过了农业。最后,韩国某些地区变成了新工业地带,其中以咸镜道最重要。咸镜道作为日本人进入满洲的新通路,其战略地位也很重要。

不过,韩国制造业特点应予充分注意。下表显示每个行业在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制造业各部门的产值(百分比)

种类	1930	1936	1939
纺织	12.8	12.7	13.0
金属	5.8	4.0	9.0
机械器具	1.3	1.0	4.0
陶瓷业	3.2	2.7	3.0
化学	9.4	22.9	34.0
木制	2.7	2.7	1.0
印刷品	3.1	1.8	1.0
食品	57.8	45.2	22.0
电力	2.4	5.6	2.0
其他	1.5	1.4	11.0
合计	100.0	100.0	100.0

从这些统计数字首先看到的是食品加工工业的优势,最初无疑是最重要的,后来逐渐明显下降,化学工业很快崛起取代了它的重要地位。1939年,化学工业占制造业总产量的34%,如果加上金属工业的9%,机械器具工业的4%,那么该年重工业部门已达到47%。当然这表明日本的发展计划侧重于在韩国建立军事工业。换言之,韩国正在变成日本侵华的供应基地。

对韩国矿业资源的掠夺

从下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矿产工业增长的速度不亚于制造业。1930年亦即在满洲事件前,韩国矿产值为2,465万元,而到1936年中日战争前夕,已增加了四倍半以上,达到11,043万元,到1942年再次猛增,达到44,542万元,略加比较就可以看出,短短的12年增长如此显著确实令人吃惊。

在发展韩国矿产业方面,日本主要强调的是黄金。1936年黄金产量为17,490公斤价值5,935万元,相当于矿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日本政府鼓励开采金矿的原因是,日本基本上要靠黄金来购买美国和海外其它地区的石油、屑铁、工作机械以及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其它资源。

但1941年日美战争爆发后,矿产业从重采金转向日本军事工业所需要的矿产上,如铁、钨、石墨、菱镁矿、钼。结果,1930到1944年间铁的产量增加了6倍多,煤为8倍,钨为700倍,石墨为5倍,菱镁矿为29倍,钼在1930年时尚未开采,但在1940到1944年间已翻了两番多。这再次证明韩国已成为日本的兵站基地。

重要矿产的产量

单位：公吨

年度	金	铁	煤	钨	石墨	铂	菱镁
1930	5.876	532,497	884,138	12	20,073	28	—
1940	22.060	1,185,426	5,740,941	4,218	94,581	195	73,540
1944	0.598	3,331,814	7,048,776	8,333	103,306	760	157,745

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1941年日本甚至鲁莽地攻击了美国。在进行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日本制定了一个所谓国家总动员政策，甚至在日本国内也实行各种非常措施。不用说，这项政策在其殖民地韩国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日本在“日韩一体”的口号下发起了一场根除韩国民族个性的清洗运动。

日本取缔一切它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文化活动作为推行同化政策的第一个步骤，《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韩文报纸，以及像《文章》这样的韩文杂志被下令禁止出版。朝鲜语学会的领导人被控煽动民族运动于1942年10月被捕，遭到日本警察的严刑拷打，李允宰和其它几位语言学家瘐死狱中。文学家被迫以日文写作，最后甚至规定日语是学校和家庭唯一通用的语言。不仅韩国语研究，而且连韩国史研究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韩国最主要的历史学会震檀学会也停止了活动。此外还要求韩国人参拜日本神社，有些基督教徒如朱基彻拒绝参拜竟丧了命。金教臣和他的许多同事因出版《圣书朝鲜》而饱尝牢狱之苦。最后，日本人推行了“创氏”政策，强迫韩国人过日本式的家庭生活，用日本人的姓氏。总之，日本的目

的是要从根本上抹煞韩国民族特性意识,从而使韩国民族从地球上消失。

日本还采取措施征用韩国粮食和某些金属制品,征发韩国劳动力。强迫韩国农民把收获的稻米直接交给政府,多种金属品被日本派作战争之用。当战争愈演愈烈,日本本土的人力资源吃紧时,又对韩国人力实行了总动员。大批韩国人被强征为劳工,被征募到煤矿、兵工厂、日本前方基地去做工。单为这些目的运到日本的韩国人就超过了70万。更有甚者,还将未婚的年轻妇女征去编入所谓的挺身队,强迫她们充当日本前线军的“慰安妇”。日本也征募韩国人服日本的兵役,起初实行自愿兵制,只要求韩国人承担兵役义务,但后来变成强迫大学生入伍,并从1943年起,对一般韩国人也实行强制征募。许多韩国人充当日军炮灰而死去,还有许多人拒不加入学生兵或拒不服役,被送到煤矿或其它地方做苦工。至于强征去为日军作战的那些人,一旦前线有机可趁就逃到盟军一边。

第二节 民族资本及韩国农民和工人的状况

民族资本的状况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保护下,日本在韩国工业界各部门的资本投资迅速增长。日本军部在三井、三菱、野口等大财阀的通力合作下建起了军需工业。因此,这些工业的发展并不表明韩国资本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如下表关于1938年对韩国制造业资本投资所显示的,日本资本占优势——87.7%对韩国资本的12.3%;而且,如果将日本在电力工业的垄断地位即21,306.5万元投资也算在内,那么韩国资本比例就更小了。如果按每家企业的资本投资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那么很明显与规模巨大的日本企业相比韩国

企业是小规模的。在这种形势下,韩国民族资本企业也往往受日本投资者的控制,因为它们必须向日本资本家借钱维生。

按民族统计的工业资本(1938年)

单位:千元

区 分	实际投入资本(括弧内为百分比)		每个会社实际投入资本	
	韩国人会社	日本人会社	韩国人会社	日本人会社
纺 织	6,075 (20.8)	23,103 (79.2)	164	593
金属机械	1,852 (7.3)	23,654 (92.7)	32	249
酿 造	12,054 (46.6)	13,772 (53.4)	38	107
制 药	1,676 (64.2)	934 (35.8)	51	37
陶 瓷 业	432 (2.7)	15,791 (97.3)	36	395
制粉精米	2,526 (20.4)	9,860 (79.6)	27	141
食 品	217 (2.2)	9,621 (97.8)	13	128
木 制 品	594 (5.3)	10,553 (94.7)	31	129
印 刷	625 (29.8)	1,461 (70.2)	14	35
化 学	2,954 (2.9)	100,736 (97.1)	80	1,340
其 他	1,193 (18.6)	5,220 (81.4)	18	39
计	30,198 (12.3)	214,705 (87.7)	41	267

采矿业也有同样情况,因为大部分矿山开采都在日本人手中。1945年,日本资本在煤矿总投资中占94.8%,在其它矿产业中日本在投资和设备中的份额更高,达96%。因此像制造业的情况那样,在采矿业中得到发展的不是韩国人的资本而是日本人的资本。

针对韩国制造业的这种发展,日本描绘了一幅“韩国跃进”的宣传画。但取得迅速发展的不是韩国人而是日本人。因此,它不是

为韩国人造福而是为日本人谋利益的经济的发展。事实上，韩国工业经济是在韩国人承受牺牲的基础上拼命为实现日本人的目标而建起来的。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的民族资本投资仍持续增长。金性洙的京城纺织就是一个范例。该企业建于1919年，是一家主要由湖南地主出资创办的韩国民族企业。它生产为韩国人喜爱的厚实耐用的棉布，市场主要在农村。它的产品深受西北一带人的喜爱，那里的民族情绪特别强烈。京城纺织的方针是只雇佣韩国人，这一民族企业的特点在其整个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同时，金性洙通过他创办的中央中学和普成专门学校（现在的高丽大学）为韩国人提供民族教育。他也是1920年发刊的《东亚日报》的创办人之一，他始终不渝支持这家民族喉舌表达韩国民族的舆论。除京城纺织外，安熙济的白山商会也是一家著名的贸易会社，由岭南地方地主出资在釜山创办的。白山商会为韩国独立运动捐助过巨额资金，同时还热心于韩国教育事业，促进韩国人的合作化运动。

平壤的针织品和橡胶制品厂也是民族资本投资的著名范例。1920年后开始繁荣的针织品工业主要生产西方式样的长短袜。这些工厂的经营者，如工信的李镇淳、三共的孙昌润，大多是自强不息的小商人。他们勤俭储蓄，积攒资金，最终建起了自己的工厂。橡胶厂主要生产深受人们欢迎的胶鞋。这个行业是在开发了一种仿韩国传统靴的式样后繁荣起来的。这项设计的创始人李丙斗成为崔奎凤经营的正昌橡胶制品工业社的厂监。这些平壤针织品和橡胶品厂的经营者颇有代表性，他们的商业经营以勤俭、信义为本，富有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在私生活中恪守基督教的准则。在平壤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工业逐渐成为日本企业无法企及的韩国民族企业活动的主要领域。

韩国农民的贫困化

日本声称 1910—1918 年的土地调查事业旨在使韩国土地所有关系近代化。但如上所述,这项调查实际上是为日本侵占大量的韩国土地铺平道路。结果,日本大地所有者人数增加了,同时以前韩国两班阶层中的一些人也变成了大地主,继续保持他们一贯享有的特权地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耕种土地的人不可避免地沦为朝不保夕的佃农。由于他们现在是按与地主的契约关系劳作,这样他们便丧失了过去使许多佃农可能最后得到其耕作土地的租用权,从而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此外,那些设法维持自耕农地位的人,大多数连一点地都搞不到了,因此只得当佃农到别人的土地上劳作。

地主阶级当然人数很少,但是由于上述发展,自耕农(这些人耕种自己的地,而没有多余的地出租)的比例也异常低。根据 1916 年的统计,在全部 264.1 万农户中,不在地主或其它地主(这些富裕地主有多余土地租给佃农)只占 2.5%,而自耕农刚刚超过 20%,而农户中 40.6%是自耕农兼佃农,36.8%是纯佃农,后两类共有 204.5 万户,占 77.4%。占总数几乎 60%的农户在不到 1 町步(2.45 英亩)土地上耕作。这些贫困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处境是悲惨的。据日本总督府统计,1924 年在总数为 2,728,921 户农户中至少有 44.6%,即 1,273,326 户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换言之,将近一半的韩国农户必须举债度日。但很明显,实际数字要大于官方的统计。陷入贫困的农民,一旦食物告罄,只得以草根树皮糊口。连总督府也承认挨饿的人数有时超过了农户总数的一半。

各阶级的农户数 (1916年)

阶级	户数	百分比
地主	66,391	2.5
自耕农	530,195	20.1
自耕农兼佃农	1,073,360	40.6
佃农	971,208	36.8
计	2,641,154	100.0

在日本殖民政策下,韩国农村的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只会越来越明显。自耕农和自耕农兼佃农这两种沦为纯佃农的人数急剧增加,而日本人的不在地主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以下统计数字显示:不在地主和其它地主的百分比 1919 年为农户总数的 3.4%,到 1930 年为 3.6%,这一增长归因于日本不在地主人数的增长。同一时期,自耕农比例从 19.7% 降到 17.6%,自耕农兼佃农从 39.3% 降到 31%。相反,纯佃农的百分比却从 1919 年 37.6% 上升到 1930 年 46.5%。

佃农向地主交付的比例平均为收成的一半。此外,佃农还要负担肥料费、灌溉费、运输费、地税;按要求还得向地主提供劳役。显而易见,韩国农民的生活是困苦不堪的,唯一的出路往往是从土地上逃走。“火田民”(这些人在无人居住的高山地区将草木砍掉或烧掉,开出一小块空地来耕作,直到以后再到处去开荒种地)的人数从 1916 年的 245,626 人到 1927 年的 697,088 人,几乎增加了 3 倍。据官方统计,1936 年韩国农民中的这一最低阶层的人数超过 1,500,000 人。同时,迁移到满洲和日本的人数也逐年增加。迁移到满洲的韩国人 1927 年为 560,000 人,1931 年为 800,000 人,到

1940年为1,450,000人。迁移到日本定居的韩国人1910年不到1,250人,1930年达119,000人,1941年猛增到1,469,000人。然而,无论是在满洲当农民还是在日本作劳工,韩国移民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善。而且,与当地人的摩擦导致了诸如满洲的万宝山事件这类不幸的种族暴力冲突(这是一起中国和韩国农民为使用水源而发生的冲突),日本人则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些事件为它的侵华行径辩护。

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形势下,韩国农民的抵抗运动越来越高涨,于是日本发起了所谓的“农村振兴运动”。1933年一项自力更生的计划出台,这项计划力图解决存在已久的“春荒”问题,了结农民的债务负担,进而复苏农村经济。为此目的,它鼓励农民过精打细算的日子,发展副业增加收入。但在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连耕作小块土地的佃农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这项计划注定是达不到预期结果的。这项政策归根结蒂不过是日本人试图消弭韩国农民日益高涨的抵抗运动而实施的一种权宜之计。

韩国工人的生活

随着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韩国雇用劳动力的人数与年俱增。1931年,满洲事件爆发的那一年只有106,781名工人,35,895名矿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已分别增加到207,000人和162,000人,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年又陡增到520,000人和224,000人。1944年当战争达到高潮时,工厂有600,000名工人,矿山有350,000名劳工。如果把建筑、交通运输和其它经济部门的劳工也加进来,那么1944年韩国雇佣劳工总数超过2,000,000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韩国雇佣劳动力在其总人口中便

占了很大比例。

这些劳工被要求长时间地工作：47%的工厂工人和34%的矿工每个工作日要干12小时以上。而且这样劳累的工作工资并不多。如下表所示，1929年在韩国的日本成年男工每天所得为2元32分，而韩国工人每天所得只有1元，还不到前者的一半；男童工日本人为71分，韩国人为44分；成年女工日本人为1元1分，韩国人仅59分；女童工日本人为61分，韩国人仅32分。以这种工资生活，一个家庭连最低标准都难维持，更谈不上有余钱花在文化娱乐活动或孩子的教育上了。

韩国工资劳动者的行业构成

行 业	工人数	百分比	时 间
制造业	591,494	27.9	1945.1
采矿业	346,424	16.3	1944.9
建筑业	437,752	20.6	1944
林 业	205,911	9.7	1944.10
海产业	211,520	10.0	1944
运输业	198,896	9.4	1944
农 业	130,377	6.1	1943
合计	2,122,374	100.0	

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健康自然得不到满意的保护。结果，许多工人成为工业事故或疾病的牺牲品。防范措施太少几乎无济于事。这些工人的生活只能说是一种悲惨的生活。然而还有很多人就连这种工作也找不到。1931年统计数字显示，据抽样调查韩国人失

业率为 15%，是同年日本人失业率的二倍多，后者为 6.7%。显然，劳工状况问题是当时韩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问题。

不同民族的工人工资（1929 年）

韩国人	男	成年工	1.00 元
		幼年工	0.44 元
	女	成年工	0.59 元
		幼年工	0.32 元
日本人	男	成年工	2.32 元
		幼年工	0.71 元
	女	成年工	1.01 元
		幼年工	0.61 元

第三节 韩国民族运动的新阶段

“购买国货运动”及佃农和工人的劳动争端

20 世纪 20 代，许多韩国商人和地主转变成了企业家，于是出现了不少韩国人的企业。不过，韩国民族资本的资金来源不足，在规模上无法与日本人竞争；因此，如果得不到韩国公众的支持便无法壮大。用意在于积极刺激韩国人对现代工业投资的“购买国货运动”便应运而生。1923 年，物产奖励会成立，在“靠自己产品生活”的口号下，发起了一场劝说韩国人抵制日货、支持国货的运动。汉城和平壤等大城市首先发动，而后蔓延到全国，得到青年会和妇女

会、少年团的热烈响应，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一场全民族运动。

同时，人数不断增多的佃农所面临的问题导致冲突加剧，而各种佃农组织的成立则进一步激化了冲突。如上所述，农村人口不仅贫困不堪，而且时时面临地主剥夺他们租佃权的威胁。他们对这种境况极度不满，于是群起而反对地主。1922年发生了124起事件涉及农民2,539人，1925年上升为204起参与农民4,002人，1930年上升到726起参与农民13,012人。在上述事件中，60%左右是由佃农抗拒将他们的租佃权转让给其它农民而引起的，其余18%是要求减少地主索取的租佃税。在这些争端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要求地主分担土地税、灌溉费等税负。我们已经指出，日本农业政策对韩国农民所造成的损害也是导致佃农骚乱的一个诱因。而且，许多争端就发生在日本的一些大农场如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不二农场。与日本地主最严重的争端就发生在咸南高原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在平北龙川的不二农场。不难理解，韩国佃农的骚乱不仅是一场争取公平待遇的经济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抗日运动的形式。

随着日本大企业利用韩国廉价劳动力，对韩国工业进行更大的投资，劳工纠纷也愈益频繁。从1912年的6起牵涉1,573名工人迅速增加到1921年的36起牵涉3,403名工人，1926年的81起牵涉5,984名工人，1931年205起牵涉21,180名工人。1920年成立的劳动共济会以及1922成立的朝鲜劳动联盟会更为这些劳工纠纷推波助澜。结果，发生了1921年釜山码头工人罢工和1923年汉城橡胶女工罢工一类罢工，最重要的是1929年元山工人总罢工。罢工起因于一家英国石油公司的日本监工殴打韩国工人，工人们要求解雇日本监工，于是开始了罢工。这时，元山劳动联合会介入了这起事件，罢工蔓延开来，几乎元山所有的工人都参加了罢

工。全国各地捐钱捐物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日本当局于是匆忙纠集了一个愿与政府合作的御用劳工组织来解决纠纷,但这一努力失败了。罢工最后虽然以妥协的形式解决了,但它清楚地表明劳工纠纷与民族运动的相互关系。大部分劳工争端是因要求增加工资而引起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是要求享有劳资谈判的权利和实行8小时工作日。韩国工人的斗争逐渐蔓延到全国,成为抗日运动的一翼。

总的说来,20世纪20年代购买国货运动及韩国佃农和工厂工人的劳动骚乱给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对此,日本一直采取高压政策,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的镇压行动更加严厉了。

“新干会”的活动

“三·一”运动后,韩国独立运动力图在各种社会学说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与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刚刚取得胜利,列宁主张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以援助。在这种形势下李东仁领导的“高丽共产党”于1920年在上海成立,布尔什维克为它提供大量资金援助。

同时,在东京的韩国留学生中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活动,其特点是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认任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采取极端恐怖主义行动。其具体做法是朴烈于1923年暗杀日本天皇的计划。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小组,他们论证只有推翻日本资本主义才能赢得韩国独立,为此目的,他们于1925年创建了朝鲜共产党,并在鼓动劳工骚乱的基础上发起了有组织的反日斗争。但是由于派别林立削弱了韩国左翼运动。

针对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挑战，韩国民族主义者力图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但他们无法克服的障碍是韩国国民对与日本殖民统治妥协的任何组织都抱有强烈的反感。“六·十岁运动”后，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于1927年结成了统一战线，成立了“新干会”这一民族单一组织。这时，日本当局仍在推行其宣布的“文化政治”，也急于想借此窥探韩国民族运动内部的动向。这些因素导致了新干会被承认为合法组织。

“新干会”的纲领是以下三项保证：

1. 促进政治和经济的觉醒。
2. 加强民族团结。
3. 抵制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

因此，尽管“新干会”是官方批准的组织，但从它的宣言可以看出其目标是积极参与韩国独立斗争。它提出的政策建议有解散日本人用来剥削韩国人的那些企业（如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终止日本鼓励韩国人移居满洲和日本的移民政策，建立适应韩国人需要的教育制度，将韩语列为学校的教育课程，有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的自由，废除限制和控制韩国人的特别取缔法规。总之，新干会在当时韩国人民面临的一切问题上持民族主义的立场。

虽然新干会的公开活动受到日本警察的压制，但它仍在汉城以外建立了一百多个分会，其成员达到30,000人左右。妇女团体“友友会”也与新干会一道致力于同样的目标，这进一步表明韩国人民对民族运动的热情支持。当光州学生于1929年举行示威游行时，新干会派出调查团并举行群众抗议大会以表示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这导致许多新干会的领导人被捕，使该组织几乎不能继续活动。1931年5月在会内社会主义派别的要求下新干会解散了，从此抗日斗争被迫转入地下。

“六·十岁运动”和光州学生运动

学生领头的独立示威运动的爆发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民族运动的显著特点。预示“三·一”运动的第一把火是东京的韩国留学生点燃的，演变成全国范围斗争的汉城街头示威也是由学生进行的。“六·十岁运动”和1929年的光州学生运动同样如此。

李朝末代君主纯宗死于1926年4月，民族的悲哀加上对日本的深仇大恨汇成了对故主的深切悲恸。站在前列的左派活动家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在6月10日国君安葬之日举行一次群众反日示威。但日本当局对以前韩国人利用高宗之死发起“三·一”运动记忆犹新，所以警察保持高度戒备，发现了葬礼前的地下活动。于是搜缴了印制的传单，并将各地韩国知名人士予以预防性拘捕。日本当局竟然禁止人们来汉城参加送葬，为了执行这一禁令还加强了安全措施。尽管戒备如此森严，学生独自发起的另两项计划却一直没有被觉察，终于在6月10日爆发了街头游行。送葬队列沿着通往基地的路线，每到一处学生们便高喊“韩国独立万岁”，并分发传单，传单上写着“二千万同胞！赶走敌人。用鲜血换取自由。韩国独立万岁！”结果200多学生被捕，这起事件一般称之为“六·十岁运动”。

学生民族运动不仅采取街头游行示威形式，还通过有组织的学生罢课来进行。在这些场合提出的要求有设立符合韩国人利益与需要的教育课程，结束日本殖民教育的歧视性特点，在学校完全用韩语教学，由韩国人来教授韩国史，韩国人和日本人分校。反对日本殖民政策的学生罢课遍及韩国，1929年光州学生运动达到了顶点。

光州学生运动起因于三名日本男学生辱骂放学回家等车的三名韩国女学生，由此引发了韩日学生的冲突，到1929年11月3日

光州冲突竟激化成了公开的街巷战。日本警察当然把责任都推到韩国学生身上,逮捕了近400名卷入的学生。这时全城学生奋起抗争,游行示威,呼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押同胞,废除和族歧视,解放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这些游行并不限于光州,第二年初扩展到全国,波及194所学校约54,000名学生。同时,引起广泛公众同情,正如以上已经提到的,新干会也来进行现场调查,举行群众集会。最后,582名学生被校方开除,2,330名受到无期限停学的处分,被捕者达1,642人。光州学生运动引起的动乱是1919年“三·一”运动以来韩国最大的一次民族运动。

海外的独立运动

在海外独立运动中,值得首先提到的是满洲独立战士的活动。由于地理上相邻,自从李朝末期“义兵”领袖洪范图在满洲活动以来,那里已成为武力恢复韩国独立的活动中心。在满洲的乡村中,至少住有100万韩国移民,这里是抵抗运动的天然基地,特别是三一运动后高涨的独立意识继续持续,为了进行顽强持久的抗日斗争还编制了独立军各部。独立军的武器远远不如日军,但通过彻底的民族教育,已经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这些韩国游击队在满洲和韩国境内对日本军队和警察发动了多次攻击。1920年在满洲东南韩国境内发生的凤梧洞和青山里战斗赢得了辉煌胜利。在凤梧洞战斗中,洪范图领导的韩国独立军联合崔东振的军务都督府的独立军迫使一支日军投降,使日军死伤300多人。在青山里战斗中,由金佐镇领导北路军政署的独立军粉碎了在人数和武器上都占优势的日军,击毙日军1,000人。日本袭击在满洲的韩国人的村庄进行报复,在著名的1920年“庚申惨案”

中,许多房屋被烧毁,许多韩国青年惨遭杀害。

“庚申惨案”后韩国抵抗武装疏散到人迹罕至地区,包括俄国的领土上。但不久他们开始了重建,尽管情况十分不利;同时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战斗,他们在统一领导下化整为零,结成了小股队伍。结果,在鸭绿江中部地区,以辑安县为中心建立了受韩国临时政府直接领导的参议府。同时,在吉林省和奉天省组成正义府,实际上是南满韩国人的行政机关。在北满洲,以1912年自由市事件后从俄国返回的独立军为核心(在这一事件中,俄国的韩国人和布尔什维克队伍向拒不解除武装的韩国民族战士发动了进攻),合并了数支独立军,而后成立了“新民府”。这样,满洲的韩国独立军分别由参议府、正义府和新民府组织起来。这三个机构既是住在满洲的韩国人实行自治的民主的民政机关,同时也是在武装抗日中训练和发展抵抗队伍的军政机关。虽然,三者始终没有联合,但它们从未放松过对共同敌人的反抗斗争。

满洲独立军在当时建立的牢固基础上坚持不懈的活动,日本不得不赶紧寻找对策。1925年日本派总督府警察局长三矢宫松与满洲军阀张作霖签订了一份联合扑灭韩国抵抗活动的协议。许多韩国独立战士还一直认为满洲的中国当局同情他们的事业,结果被逮捕移交日本人。这使韩国独立力量受到沉重打击,1931年满洲事件后,由于满洲实际上已逐渐处于日本人控制下,韩国独立军与反抗满洲新傀儡政权的中国力量联合起来,并继续他们的斗争。最后,他们被迫疏散到中国内地或俄国沿海地区。

满洲的独立活动主要采取武装抵抗形式,在中国的韩国流亡者则以恐怖手段打击日本。金元凤的义烈团和金九的爱国团是这类组织中最著名的。这些组织策划的爆炸和刺杀阴谋无以数计,最著名的恐怖事件有义烈团员罗锡畴(1892—1926年),投掷炸弹袭

击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事件(1926年),爱国团员李奉昌(1900—1932年)企图谋杀日本天皇的手榴弹投掷事件(1932年),爱国团员尹奉声(1908—1932年)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设置炸弹炸死炸伤日本高级文武官员多人事件(1932年)。

至于韩国临时政府,在李承晚任总统问题上发生分歧,李承晚主张韩国应成立国际联盟来接管领土,通过李东辉从列宁那里获得资金。在恢复统一方面,1923年在上海召开了韩国国内外的独立活动家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但是没有成功。长期缺乏基金加重了困难,临时政府除了勉强维持存在,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加快了统一战线的形成。1941年美国参加反日战争进一步推动各派成员团聚在韩国临时政府的旗帜下。此时,临时政府随同中国政府迁到战时首都重庆,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翌日,韩国临时政府宣布了反日战争宣言,并继续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以争取外国的支持。

在进行外交活动的同时,也开展了生机勃勃的军事活动。在新达成的政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了武装的独立军的团结,在韩国临时政府完全指挥下独立军联合组成光复军,与盟军一道对日抗战。特别是从1942年起,按照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光复军密切协同中国军队完成了各项活动。同时,派到缅——印战场的光复军还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除光复军外,直接加入中国军队的韩国人也是重要的兵力,至于在美国的侨胞,他们的自愿服务也为这场共同的战争作出了贡献。这样,韩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在克服了重重障碍后又以新的面貌向前迈进。

第四节 维护韩国文化

通过民族教育进行抵抗

“三·一”运动后日本在推行文化政治的同时也改变了在韩国的教育政策，日本宣布愿意为韩国人提供与日本人相同的教育水平。实际上，学校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在汉城也设立了大学。不过，日本对韩国人的教育所作的承诺跟以前一样空洞。下面表中所列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甚至在小学这一级别，韩国人的入学比例也不到日本人的入学比例的 $1/6$ 。这种差别在高等教育中就更加明显了。在专门学校比例为 $1:26$ ，在大学超过 $1:100$ 。总之，韩国教育机构的增多主要使日本殖民者受益而不是使韩国人受益。仅这一事实便表明日本人所吹嘘的“文化政治”是十分可笑的。

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在韩国教育方针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在“教育即生活”的名义下，把重点放到了教授日语和职业教育上。这是因为，随着韩国军需工业发展，日本需要大量懂日语并具有一定技术的劳工。这样在临近战争结束时，按照抹煞韩国文化特性政策，便停止了教授韩语，日语成为学校唯一用语。总之，日本在韩国的教育方针自始至终是其殖民政策的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只能再次指望从本国人的学校里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多数韩国专门学校的学生都在私立学校学习。还有一些韩国人则出国留学——到日本，那里的歧视不像韩国国内那么严重，或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1931年，在日本的韩国留学生为3,639人，而在美国留学生为439人。如果考虑到其中大多数是大学生，这一数字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当时，在韩国人当中现代

按民族统计的就学人数 (1925年)

学 校		就学者数	在万人 中占的比率	比率的 比 较
初等学校	韩国人	392,832	206.53	1
	日本人	59,859	1,240.43	6
男子中等学校	韩国人	5,443	2.86	1
	日本人	4,490	101.26	35
女子中等学校	韩国人	705	0.38	1
	日本人	5,690	128.32	337
实业学校	韩国人	4,831	2.54	1
	日本人	2,843	54.12	25
师范学校	韩国人	1,696	0.86	1
	日本人	625	14.95	16
专门学校	韩国人	439	0.23	1
	日本人	676	15.24	63
大学预科	韩国人	71	0.04	1
	日本人	233	5.25	131

思潮和学术的传播显然应归功于这些人在韩国私立学校和在外留学所受的教育。创办民主大学代替日本的京城帝国大学也可以说是韩国人要求高等教育的自觉反映,正是这种教育为韩国人民

成为自由的民族准备了条件。

然而,不用说大学和专门学校这一类教育机构不能满足韩国人民的需要,就是中小学一类学校数量也太少。由于这个缘故,要求设置辅助教育机构的呼声很高。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传统的书堂被改建成向农村儿童提供初级教育的重要场所。其中有些私立农村学校最后得到认可成为总督府教育体制中的普通学校。

另一类辅助教育机构是劳动夜校。最早的劳动夜校是玉麒焕于1907年在马山创建的,大规模的兴办还是在1919年“三·一”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指出农民和工人有组织的运动这时已蓬勃发展,劳动夜校的建立只是这一现象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全国城乡都开办这样的学校,尤以私立学校相对较少的南方诸道为多。总的说来,劳动夜校为贫苦佃农、劳动者及其子女提供了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只接收妇女和女孩参加的夜校也开始出现。夜校基本上只提供一年教育,主要讲授韩语和算术,但夜校对韩国面临的社会民族问题也很关心。由于没有教育费,学校的经费只得靠热心公众的捐赠来解决,因此,为了使学校能够开办下去常常要煞费苦心。随着日本在1931年满洲事变后加强了镇压,夜校数量也日渐减少。但这时,韩国学生发起了农村启蒙运动,学生利用暑假深入农村帮助农民扫盲,改善日常生活。《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等韩国报纸对这一运动都给予了重要支持。

关于韩国的学术研究

在韩国语研究领域,由周时经的弟子们成立的朝鲜语学会(从1931年起改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1年发起的朝鲜语研究会,现在名为韩国语学会,这一韩国语言学家联合会对于韩语表音

法和使用的标准化作出了莫大的贡献。通过《韩文月刊》学会致力于推广和普及韩国拼音字母的应用,在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仍喜欢用中文写作。同时,学会开始编纂韩语辞典,为了给这项工作打好基础,进行了以下准备,如设计了韩语拼写规则,对本国词的标准形式和变化形式加以区分,为外来语的韩译制订通则。韩国语学会所从事的这些重要工作切实反映了当时韩国人的需要。学会通过纪念“韩语日”(为纪念1446年创制韩拼音字母而定)也大大提高了广大国民对韩国文化的鉴赏力。

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史学沿袭李朝末年爱国启蒙史学的传统是这个时期国史研究所特有的现象。朴殷植在其著作《韩国痛史》和《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中,不仅痛斥日本的侵略政策,还同时主张必须维护韩国民族灵魂,极力为独立运动提供精神上的支持。申采浩是一位主要致力于早期韩国史研究的史学家,他着眼于唤起读者的爱国精神,特别强调富有特色的韩国郎家思想,其代表作有《朝鲜史探研》和《朝鲜上古史》。郑寅普在他的著作《朝鲜史研究》中也强调要保留韩国独特的“灵魂”,或文化个性,这一点也表现在所用的题目《五千年间朝鲜之魂》上。崔南善将檀君神话解释为韩国民族的文化特性的表现,他在《儿时朝鲜》一书中提出韩国史构成东北亚文化主流的观点。文一平也试图把韩国史看成是独特的韩国文化个性的表现;不过他的最著名的作品还是《韩美五十年史》。以上大多数研究都与争取韩国独立的斗争息息相关,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都很关心对浸润于韩国民族历史的精神实质的理解。这些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受到日本当局的压制,朴殷植、申采浩和其它志同道合的历史学者在亡命生活中继续艰难地从事著述。

从20世纪30年代起,韩国史研究的重点转到社会发展过程

上,兴起了一个试图从经济角度解释这些发展的相继阶段的学派。有这种偏爱的一部分学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加于韩国的历史发展。这期间还出现了另一个学派即实证史学派,这个学派认为透彻理解韩国历史只能通过对一个个历史问题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不是把韩国的历史经验放入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公式中。1934年创立震檀学会的学者们的研究活动就本着这个学术宗旨。该学会的刊物《震檀学报》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颉颃,发表了政治、民俗学、美术史和思想史等方面许多高水平的研究论著。

现代文学的发展

“三·一”运动后韩国文学史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韩国文学此时冲破了启蒙小说平铺直叙的文体所特有的说教局限。这种启蒙小说以李光洙的作品而达到顶峰,并被承认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走到了尽头。新一代的文学艺术家创办了许多文学同人刊物,如1919年的《创造》,1920年的《废墟》和1922年的《白潮》。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金东仁(1900—1951年)在这些杂志中找到了渲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在他的“土豆”这类作品中,他刻意要创造自然主义文学,以研究的直率来描写饥饿、贪欲和本能的性行为。同时,廉想涉(1879—1963年)的作品如《三代》则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表现范畴,他逼真地描绘了现实社会的世俗生活。充满感伤情调或浪漫主义的文学在20年代初也蔚然成为韩国文学的一个支流。

在20年代中期兴起了两种抵制病弱的感伤艺术的新文学倾向。其一是提倡民族意识的文学,代表人物是韩龙云(1879—1944年),他在《沉默的爱》一诗中表达了对民族深厚的爱。李秉歧(1892—1968年)等努力使时调现代化,也属于这一倾向。其二是提倡社

会意识的文学,其代表即是所谓新倾向派文学。这种文学受到当时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主要描写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新倾向派文学后来演进为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主张文学活动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文学。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加强,日益加深的危机意识笼罩着韩国人民。在这种背景下,韩国作家再次改变了创作方向,转向“纯”文学道路,有意回避当时危机逼人的现实。随着1939年《文章》杂志的出版,这种使文学摆脱政治干预的倾向——坚持认为文学从来似乎都是纯粹的——愈加明显。这种文学运动的实质是逃避主义,但它显示了韩国语言表达的自然之美,又不依赖于借自中国的空洞用语,因而对促进韩国民族文化也作出了贡献。

日本殖民统治末期所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也使纯文学派的写作备受压抑,因为用韩语写作的任何文学作品再也不允许出版。这是韩国文学面临的最黑暗的时刻和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韩国作家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以日文出版作品,甚至同意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为日本服务。这个时期青年诗人尹东柱(1917--1945年)的诗句尤其感人肺腑。这位诗人在韩国解放前夜死于日本监狱中,他在其遗作“天空、风、星辰和诗”的“序诗”中写道:

永恒的苍天是吸引我的磁石
直到我死的一日
因为最微小的羞愧的理由
都不会在我身上存留
风在树叶间发出诱人的沙沙声
但激励我更加矢志不移

在这些诗句中,尹东柱发出了一个孤寂的灵魂在其人类良知的感召下痛苦挣扎的声音。

第十六章 民主主义的开端

第一节 韩国解放

解放

由于意大利于 1943 年 6 月投降,盟军在第二次大战中胜利的前景更加确定无疑。这意味着韩国从日本人的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日子也已临近了。实际上,同年在开罗举行了美、英、中三国领袖的高峰会议,并于 1943 年 12 月 1 日通过开罗宣言,其中这样宣布:

“上述三大国没有忘记受奴役的韩国人民,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韩国应该获得自由和独立”。

这项宣言的内容,无疑应归功于韩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一年半后,即 1945 年 5 月,德国也宣布投降,当这三位盟国领袖于 1945 年 7 月在柏林郊外波士坦再次会晤时,他们又重申了早先在开罗议定的原则。一个月后,苏联也签署了波士坦宣言。这样由四大盟国签署的国际协定便确定了韩国人民将在日本最后失败的时刻获得独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终于无条件地向盟国投降,韩国从 36 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暴政下获得了解放。人民欢天喜地,韩国城乡街头再也看不到日本的太阳旗,迎风招展的是韩国的太极旗。韩国人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解放便意味着立即独立。

但从日本暴政下的解放来得出乎意料的突然,而且在日本仍

控制所有通讯手段的情况下,又很难获得国外准确消息,因此韩国领导人对于应当采取什么准备措施发生了分歧。宋镇禹及其追随者预计盟军会马上占据德国,返回韩国的临时政府应接管政权。而与吕运亨持相同观点的人则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认为在盟军到来前需要建立一个民族代表机构。这样前一派人按兵不动,等待临时政府官员返回,而后一派人则成立了建国准备委员会。虽然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参加了该委员会的活动,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不久像委员资格最老的安在鸿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纷纷退出。这时,委员会的左翼势力立即组成“朝鲜人民共和国”作为政权机构,从而实际上使自己与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立起来。而反对他们的人则举行“国民大会”的筹备会进行反击,目的在于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联合支持临时政府的广泛的国民舆论。

三八线的划分和军政府

正当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逐渐激化时,美、苏两国军队占领了韩国。苏联因与韩国有共同的边界,所以首先到达。苏联是在8月9日,日本投降几乎已成定局时才向日本宣战,而后越过边界进入韩国,在日本投降后,继续占领平壤、咸兴和北韩其它大城市。美军在一个月后在仁川登陆,于9月8日进入汉城,而后逐渐驻军南韩。在北纬38度划分美、苏占领区的分界线。这条人为的分界线成为韩国民族日后分裂和悲剧的主要外因。

美苏军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管理着各自在南北韩的占领区。在北韩,苏联当局利用了所谓的北韩临时人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组成,甚至包括曹晚植这样的民族主义

者,在苏军司令部的方针指导下享有实际的行政权。不久,苏联组建了以金日成为委员长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在把曹晚植和其它民族主义者逐出委员会后,实施了公有化政策。此后越过三八线进入南韩的人数骤增,到1947年末总计超过80万人。

在另一端,稍晚进驻南韩的美军建立了军政厅,并管理南韩的行政事务。美军政府既不承认朝鲜人民共和国也不承认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主权行使机构。但是被授与行政权的美军实际上预先并不了解韩国的情况,因而也不能满足他们所统治的人民的希望。更糟的是,与北韩的情况不同,南韩允许政治活动的自由,结果造成政党林立的混乱局面。总共出现了50多个政党,主要的政党有宋镇禹的韩国民主党,安在鸿的国民党,吕运亨的朝鲜人民党和朴宪永的朝鲜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指望政治联合,即使李承晚从美国以及金九和临时政府的其它要人从中国回到国内也不能使政治混乱的局面平静下来。

南韩人民现在不仅饱受政治动荡之苦,还要承受严重的经济混乱的恶果。由于一味强调军需工业,又严重依赖日本,韩国经济呈现畸形发展。因此,解放后一旦与日本切断了一切联系经济必然会受到沉重打击。而且,国家沿“三八线”一分为二便将南韩的轻工业和农业地带与北韩的重工业地带分隔开来(见下表)。而南韩仍在开工的工厂设施常常缺乏合格的本国技术人员。此外,36亿元货币(解放时总发行额为50亿元)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周便投入流通(大部分是日本当局在美军登陆前发行的),从而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在解放后三年内有二百多万韩国人从北韩进入南韩,或从中国、日本和以前日本在各地的占领区返回祖国,这些不利因素都对经济混乱的产生有影响。

南北韩的产业分布(百分比)

产业种类	南 韩	北 韩
食 粮	65	35
煤	20	80
钢 铁	5	95
水力电力	10	90
化学药品	15	85
机 械 类	65	35
一般消费品	80	20

第二节 大韩民国的建立

反托管运动和美苏联合委员会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交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托管计划作为解决韩国问题的办法。这项计划使韩国处于美英中苏四大国托管之下达5年之久,因而遭到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表达民众愤怒,临时政府领导人组成的“反对信托统治国民总动员委员会”发起了反托管运动。汉城的商店企业关门停业,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美国军政府的雇员也参加了罢工,示威活动遍及全国。起初共产党参与了反托管运动,但稍后突然转而支持托管,从而给以左右两派势力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事业设置了严重障碍。这时,临时政府领导宣布召开“非常国民会议”,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正式政权以抵制托管计划的实施。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46年1月举行了为实施莫斯科协议而

召集的美苏共同委员会预备会谈，3月召开了美苏共同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会上苏方提出应将反对托管的政治党派和社会团体排除在就成立托管计划设想的临时政府进行协商的那些韩国团体之外。这种主张旨在把民族主义者排斥在过渡政府之外，而由共产主义者单独组织政府。美国代表的反应是，主张政治表达自由原则，提出就是反对托管的人也应参加协商过程。共同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第一轮会谈很快于1946年5月破裂。

共同委员会的僵局给韩国政界带来进一步混乱，结果为打破政治僵局进行了许多尝试。当时由李承晚领导的国民党的反应是组织民族统一总本部并建立韩国自治政府。李承晚要求取消雅尔塔和莫斯科协议，废除三八线和托管制，立即建立一个独立的过渡政府。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李承晚亲自赴美国活动。另一方面，以金九和其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人士为首的韩国独立党组成了“国会议”（其前身为“非常国民大会”），其主要活动是反对托管，同时设法协调左右两派，以实现南北统一。还有金奎植领导的中间右派与吕运亨领导的温和左派也共同努力以促进左右两派的合作。这些温和势力受到美国军政府的支持，并成为美国于1947年建立的南韩过渡立法议院的成员。

同时，左翼政党组成了所谓“民主主义民族战线”并开展了一致赞成托管运动，以支持莫斯科协定和共同委员会的重新召开。左翼分子希望对共同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支持能提高它在托管制下政府当局的地位。同时，左翼分子运用各种方法破坏南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当警察发现朝鲜共产党使用大量伪币的证据时，美国当局下令逮捕其领导人，于是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但共产党转入地下后仍继续活动，最严重的例子是1946年10月初铁路罢工时发生的大邱起义。

同时，美国军政府设立了一个全由韩国人组成的立法机构南朝鲜过渡立法议院，委派了韩国人出任的大法官，韩国人出任的民政长官。这样，正式行政权便移交给朝鲜人的过渡政府。

大韩民国的建立

美苏共同委员会在初次会谈破裂的一年后于1947年5月重新召开。应委员会的要求，韩国政党和社会团体曾提交过有关未来临时政府的组成和政治方向的建议。但是，苏联重申以前的立场，即反对托管计划的团体应被排斥在协商过程之外，苏联的不妥协使委员会的协商陷入停顿。

这时，美国提议韩国问题应提交美、苏、英、中四国外长会议进一步讨论。苏联对这项建议也加以反对，于是美国将韩国独立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美国建议在韩国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全面选举，在选举产生政府之后美苏军队应撤离韩国，应设立一个联合国有关韩国问题的临时委员团来监督和推进这些条款的履行。尽管苏联反对，但联合国安理会以压倒多数同意通过了美国略加修改的决议。根据这项决议设立的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团于1948年1月开始工作，但苏联阻挠该委员团进入北韩的种种努力。联合国安理会的临时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1948年2月的报告，批准在委员团监督的地区举行选举，并依据选举结果设立独立政府。这样，韩国独立之路便明朗了，虽然联合国主持下的独立政府只在国家的南半部设立。

1948年5月10日进行了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大选。南北协商派联合抵制选举，分给北韩的100个席位空着，但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有198名。第一届国会于5月31日召开，其首要任务是立即

制订一部宪法。7月12日制宪国会通过了宪法,并于7月17日正式颁布。按照宪法条款,将在7月20日选举总统(当时韩国宪法规定,由国会间接选举总统),李承晚赢得了胜利。接着建立了行政机构,1948年8月15日向韩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大韩民国”的成立。同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承认大韩民国实际上是韩国唯一合法政府。不久,大韩民国便获得美国和50多个国家的承认。

第三节 朝鲜战争

北韩的共产主义势力

北朝鲜的临时人民委员会于1946年2月在平壤成立,被指定在苏联军事当局的控制下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该人民委员会通过各种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彻底的土地改革,为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着于1947年2月成立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不再冠以“临时”),这样就等于在北朝鲜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政权。

共产党当局不许联合国韩国委员团在北韩执行任务,而提议南北两方政治领导人直接谈判。其目的在于阻碍委员团的活动,促使美苏占领军同时撤退,然后伺机以武力扩大共产主义在整个朝鲜的统治。因此,北韩早就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948年正式成立单独政府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准备。在不久爆发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前,北韩的兵力为10个步兵师团,1个坦克师团(242辆坦克),一个飞行师团(211架飞机)。相比之下,尽管李承晚总统叫嚷要以武力统一韩国,但南韩兵力却不到8个步兵师团。南韩军队装备很差,连一辆坦克也没有,空军只有约20架训练机,一架战斗机也没有。

朝鲜战争

南韩的第二次大选于 1950 年 5 月举行,选举结果是国会中执政党得 56 席,民主国民党和其它反对党得 26 席,无党派得 128 席。这表明国民对政府和现有党派缺乏信心。大约同时,华盛顿发表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韩国不在美国的东亚环形防线之内。这样一直试图发动武装斗争颠覆大韩民国的北韩共产党人便认为全面打入南韩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韩军队开到了三八线附近,装备很差,力量单薄的大韩民国军队很快被迫撤退到半岛东南端的洛东江一线。这时,联合国决定给大韩民国以军事援助,大韩民国作为独立国家诞生时联合国曾起过产婆的作用。联合国指挥部建立起来,大约 10 个国家——包括美、英、法、加、澳、菲、土耳其——的军队抵达韩国,在联合国旗帜下与南韩军队并肩作战。

继仁川登陆成功之后,1950 年 9 月 28 日又收复了汉城。9 月 30 日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不久到达东北海岸清津、北中部惠山和楚山地区的鸭绿江、西北部的宣川。但中国军队的介入使战局急转直下。在新的战争中,联合国军队一度撤到汉江以南,但稍后中、朝联军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在后撤过程中损失严重。战争逐渐陷入僵局,最后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联合国和共产党方面达成了停战协定。激烈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朝鲜战争是韩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它所造成的痛苦的惨烈程度是难以形容的。据估计南韩仅在战斗中死亡的人数就达 150,000 人,失踪者 200,000 人,受伤者 250,000 人。同时,被劫持到北方的老百姓超过了 100,000 人。蒙受战争损失的入数达几百万。北韩方面伤亡人数是上述数字的几倍。

很难对朝鲜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作精确的描述,但财产损失

估计超过 30 亿美元(1953 年的美元)。南朝鲜大约 43% 的工业设施, 41% 的发电设施, 50% 的煤矿设施被毁坏和损坏。国家 1/3 的房屋被毁。大量的公共建筑、道路、桥梁、港口也被夷为废墟。

朝鲜战争头两年南韩的生产指数

品 名	1949 年	1950 年	1951 年
粮 食	100	96	73
海 产 品	100	73	92
无 烟 煤	100	53	10
钨 矿	100	60	86
棉 布	100	85	47
胶 鞋	100	16	57
普通砖瓦	100	74	58
水 泥	100	48	30

但衡量朝鲜战争造成的损失不能仅用物质尺度。这是因为战争使历来具有民族统一意识的韩国人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民族分裂、统一遥遥无期的悲惨现实。停战以后并不是没有进行过统一的尝试。依据停战协定的提议于 1954 年 4 月召开的日内瓦大会就属于这种努力。在日内瓦大会上, 大韩民国代表提出, 首先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应得到承认; 其次, 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 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民主韩国。但北韩共产党人拒绝这种方式, 使日内瓦会谈破裂。在以后几年里, 联合国大会每年都要重申统一的“日内瓦原则”。

第四节 1960年4月革命

独裁政府的壮大

在朝鲜战争引起国家危机期间,国内也出现了政治危机。这是因为国内政治日渐趋向于独裁统治。李承晚的独裁倾向一开始就很明显,他顽固地坚持宪法赋予总统职位不相称的权力。而且,为惩治与日本殖民统治相勾结的民族败类而颁布的特别法,也由于他的反对而被搁置一旁。

1952年当朝鲜战争激战正酣时,李承晚看到国会推选他为第二任总统的前景十分黯淡,于是厚颜无耻地实行独裁来保住自己的权力。他在由人民直选总统的修宪计划遭到国会拒绝后,公然采取步骤强迫国会按他的意旨办事。他首先宣布戒严令,然后于5月26日把大批反对派议员投入监狱,这桩事件被称为“5·26政治波动”。这场政治风波一直到国会通过包括直选总统条款的所谓选举宪法修正案才告平息。最后,李承晚强迫举手表决,许多议员不败公开对他表示反对。

以强制手段在1954年5月的大选中取胜的李承晚的自由党稍后建议修改宪法,取消现任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禁令,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使他的总统职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项修正案因投票人数不到法定的2/3多数而被否决。不料第二天,竟宣布予以通过。理由是投赞成票要求通过的人数为135.3人,可以合理地四舍五入为136人。

在野党派民主国民党和无党派议员当即组成护宪同志会,这个团体后来发展成为政治反对势力混合体的民主党。结果,在1956年选举中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获胜,1958年在国会选举

中,民主党阻止自由党获得修改宪法所需三分之二的多数。这次,自由党在城市遭到了惨败,只在易于使用各种高压手段的农村取得胜利。由于面临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几乎失败的形势,自由党于1958年试图通过修改国家保安法(以加强对政府控制)和地方自治法(使政府能任命地方重要行政机构的领导)来加强自己的实力。由于遭到在野党议员的强烈抵制,自由党于12月24日召集受过特别军事训练的警察逮捕了反对者。于是,在只有自由党参加的国会的大会上通过了引起争议的修改案,这一事件被称为“二四波动”。

新兴财阀的诞生

随着独裁政权的壮大,在经济界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即财阀的崛起。朝鲜战争的严重破坏使工业生产陷于停滞,韩国政府为支付战争费用和满足联合国部队对韩币的大量需求印制了大量的货币,从而引起了高通货膨胀。结果,在战争期间日用品的价格半年便翻了一番。物价的交替上涨严重威胁了国民的生活。但政府在进口原材料和日用品分配方面给予少数受优待的工业家、商社以特殊待遇,使他们得以牺牲公众利益而牟取暴利。同样,政府还使那些支持它的企业能够享有特别融资、按特兑换汇率配给的美元和与外援项目有关的引进资金。因此,虽然在敌对状况终止后的几年里,主要由于美国的援助,工业产量和朝鲜基础设施总的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但这增加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商人的利润而不是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且,由于银行的持股人以前是由政府来指定,所以这些新的巨头也控制了重要的金融机构,从而使他们得以加紧对韩国经济的进一步控制。其结果如下表所示,就是雇工

在 200 人以上的大企业在制成品总发货量中占有高得不相称的百分比。

1962 年主要行业的生产集中度(单位:百万元)

行 业	企业总数	大企业数*	总发货额	大企业发货额
制粉	58	2 (3.4%)	2,337	233 (10.0%)
糖	44	2 (4.5%)	3,480	3,173 (91.2%)
纺织	174	33 (19.0%)	11,089	9,834 (88.7%)
轮胎	10	2 (20.0%)	1,105	1,023 (92.6%)
肥皂	98	1 (1.0%)	518	255 (49.2%)
胶鞋	48	9 (18.8%)	1,845	1,437 (77.9%)

* 雇工在 200 人以上

这样,在短短几年间,与政府密切勾结的一批财阀兴起了,并在许多基本日用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取得垄断地位。结果,经济不公平变得更加严重。首先,中小企业由于不能获得足够资金而濒于破产境地。但城乡经济部门的不平等更突出。农民根据 1949 年实行的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但农户中口粮短缺的情况仍像以前那样普遍。由于政府任意规定的米价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贫农的境况更加恶化。这样,与独裁政权相勾结的少数新兴财阀在经济界的独占地位给韩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安。

四月革命

在李承晚独裁政治下酿成的社会骚乱到 1960 年 3 月总统选

举中达到了高潮。李承晚及其自由党出动政府雇员特别是警察公然采取操纵选举的行动。政府玩弄了各种伎俩，如投票人三人一组相互监视、事先投票、换票、破坏反对党的选举运动、使用恐怖手段等。同时，向财阀筹集巨额竞选经费，这些财阀都是靠与自由党政府的寄生关系发财致富的。

这些臭名昭著的非法行为早在选举前就引起了反抗，2月28日的大邱学生示威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这次示威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抗议对校园的政治干涉。但3月15日的马山学生示威，目标便公开对准了选举中的不正当行为。警察开火驱散了游行，造成了一百多名参与者伤亡。4月11日在马山港发现了一名高中男孩的尸体，于是警察对示威者的暴行大白于世，愤怒的马山学生和市民再次走上了街头。

马山示威是点燃汉城示威的火星。4月18日，高丽大学的学生在汉城市中心群众大会结束后的返校途中遭到政府雇佣的打手的袭击，许多人受伤。第二天，4月19日，汉城几乎所有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和许多高中学生涌到市区街道，高喊“我们要求新选举！”“为保卫民主而死！”“李承晚政府必须下台！”等口号。在国会议事堂前示威后，学生们前往总统住所景武台，在总统住所附近他们遭到了警察的枪击。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倒在血泊中死去，学生们愤怒至极，放火焚烧了许多政府建筑物，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暴力破坏活动。政府感到情况严重，宣布戒严，调集军队，暂时恢复了街头秩序。

4月25日，大学教授团在国会议事堂前向群情激愤的群众宣读了时局宣言书，从而把示威推向高潮；而后，学生和市民举行了一通宵的游行。次日示威人数更有增无减。戒严部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李承晚最后失去了保持权力的任何希望，他于4月26日

正式辞职,示威立即平息,大学生带领国民恢复了公共秩序。

四月革命是韩国历史上赤手空拳的人民第一次推翻暴虐政权的成功尝试。这次革命的领导角色是由学生扮演的。对既成政权及其政治秩序完全丧失了信心,这使学生们在1960年4月革命处于先锋地位。同时,革命没有国民全心全意支持也不可能成功。在反对独裁政治和与其相勾结的剥削人的经济利益集团中联合起来的人民力量,通过青年学生意气风发的示威活动显示出来。因此,四月革命为韩国民主发展昭示了光明的前景。

附录

历代王室世系 古 朝 鲜

檀君王俭(公元前 2333 年—?)……………否王——准王(? —公元前 194 年)

卫 满 朝 鲜

卫满王(公元前 194 年—?)——○——右渠王(? —公元前 108 年)

夫 餘(解)

……………始王——尉仇台(121 年)……………夫台王……………
……………尉九台王(? —200 年)—简位居王—麻余王—依虑王(? —285 年)……………
……………依罗王(286 年—?)……………玄王(? —346 年)

本加耶(金)

(42—532 年)

1. 首露王(42—199 年)—— 2. 居登王(199—259 年)—— 3. 麻品王(259—291 年)——
4. 居叱弥王(291—346)—— 5. 伊(尸)品王(346—407 年)—— 6. 坐知王(407—421)——
7. 吹希王(421—451 年)—— 8. 銓知王(451—492 年)—— 9. 钳知王(492—521 年)——
10. 仇衡王(521—532 年)

大加耶

1. 伊珍阿鼓王(42年—?) 9. 异脑王(522年)
- 月光太子 16. 道设智王(?—562)

高句丽(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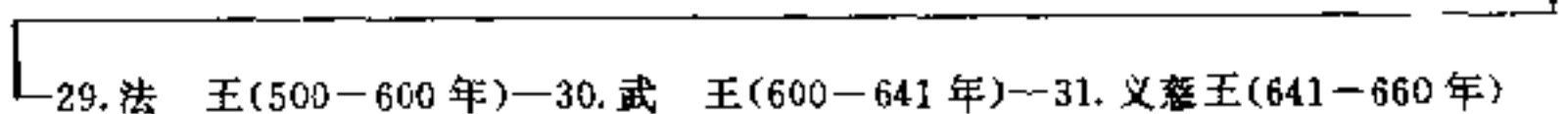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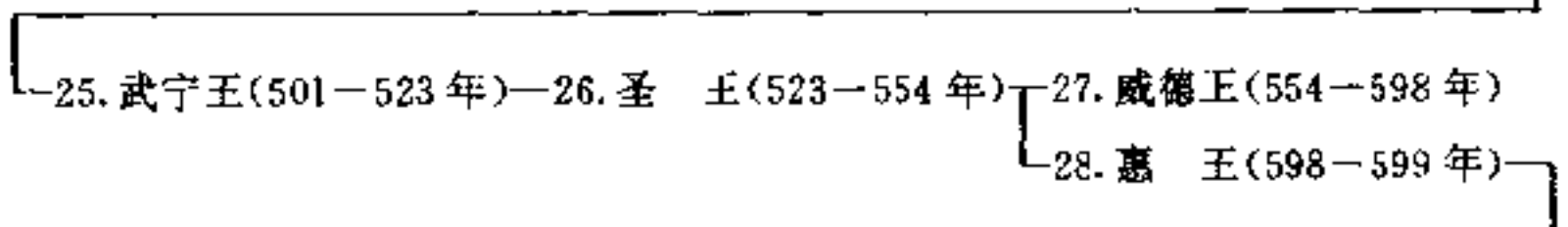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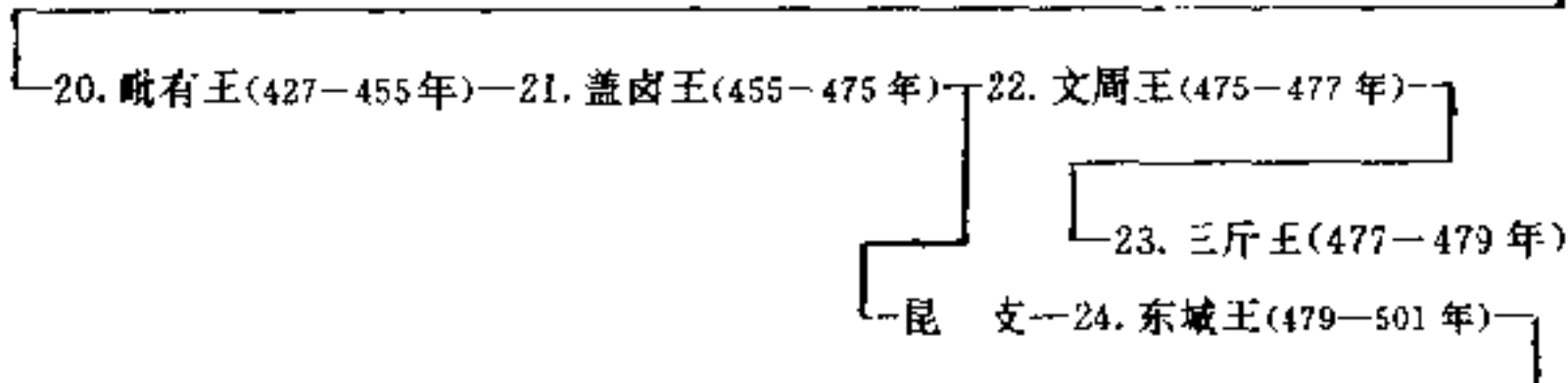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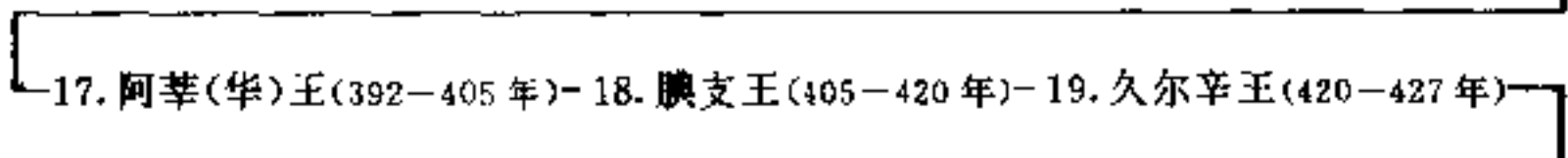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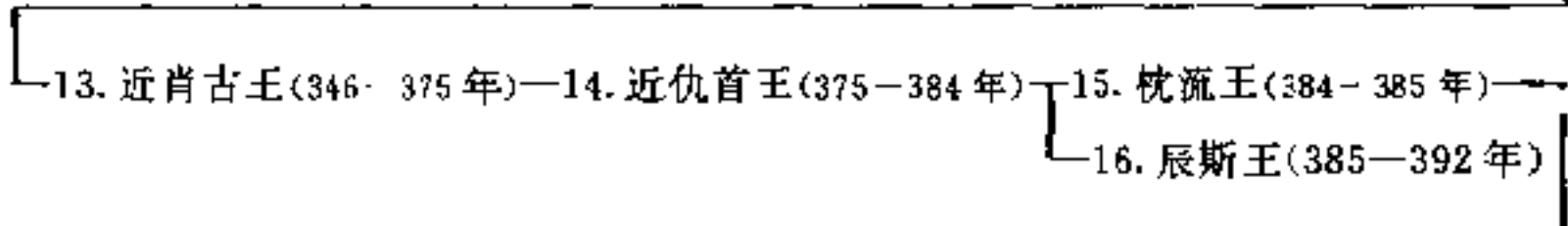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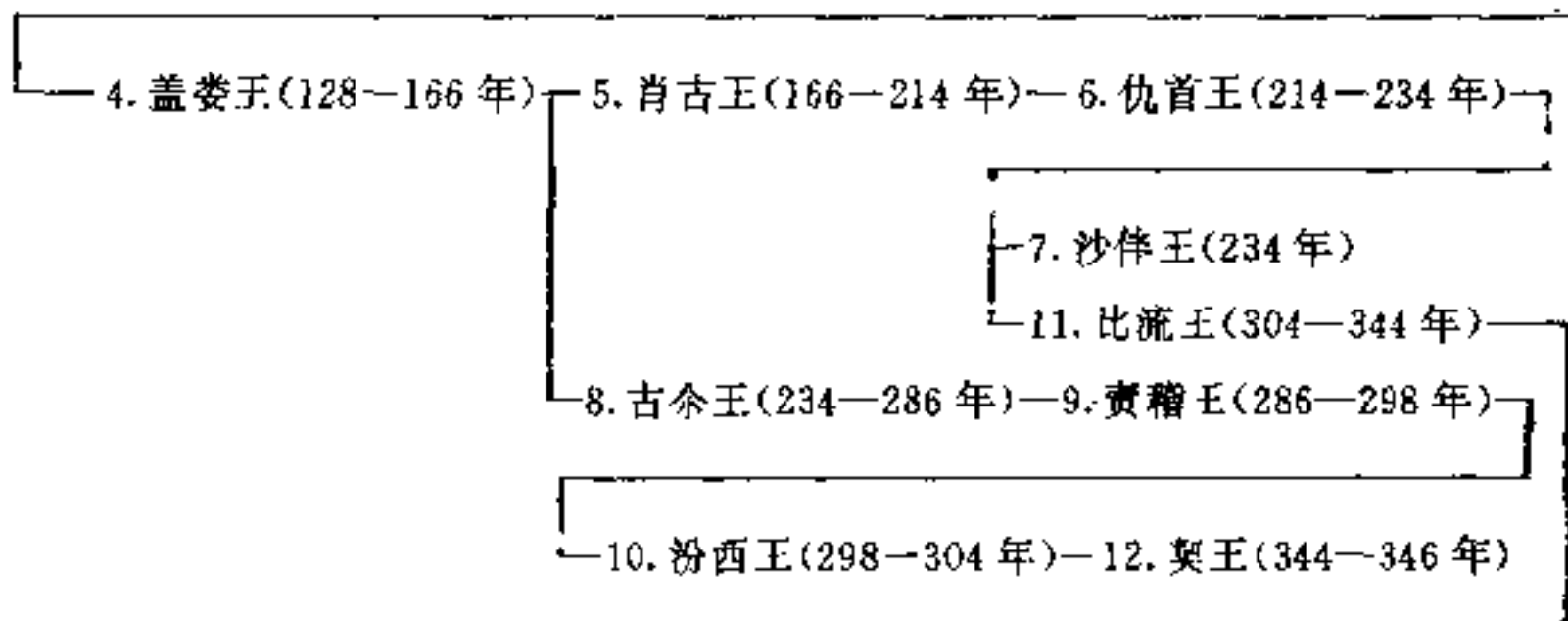
(公元前37—668年)

1. 东明王(公元前37—公元前19年) 2. 琉璃(明)王(公元前19—18年)
3. 大武神王(18—44年) 5. 慕本王(48—53年)
4. 闵中王(44—48年)
- 再 思 6. 太祖王(53—146年)
7. 次大王(146—165年)
8. 新大王(165—179年) 9. 故国原王(179—196年)
10. 山上王(196—227年)
11. 东川王(227—248年) 12. 中川王(248—270年) 13. 西川王(270—292年)
14. 烽上王(292—300年)
- 咄 固 15. 美川王(300—331年) 16. 故国原王(331—371年)
17. 小兽林王(371—384年)
18. 故国壤王(384—391年) 19. 广开土王(391—413年) 20. 长寿王(413—491年)
- 助 多 21. 文咨(明)王(491—519年) 22. 安藏王(519—531年)
23. 安原王(531—545年)
24. 阳原王(545—559年) 25. 平原王(559—590年) 26. 婴阳王(590—618年)
27. 荣留王(618—642年)
- 太 阳 28. 宝藏王(642—668年)

百 济 (扶 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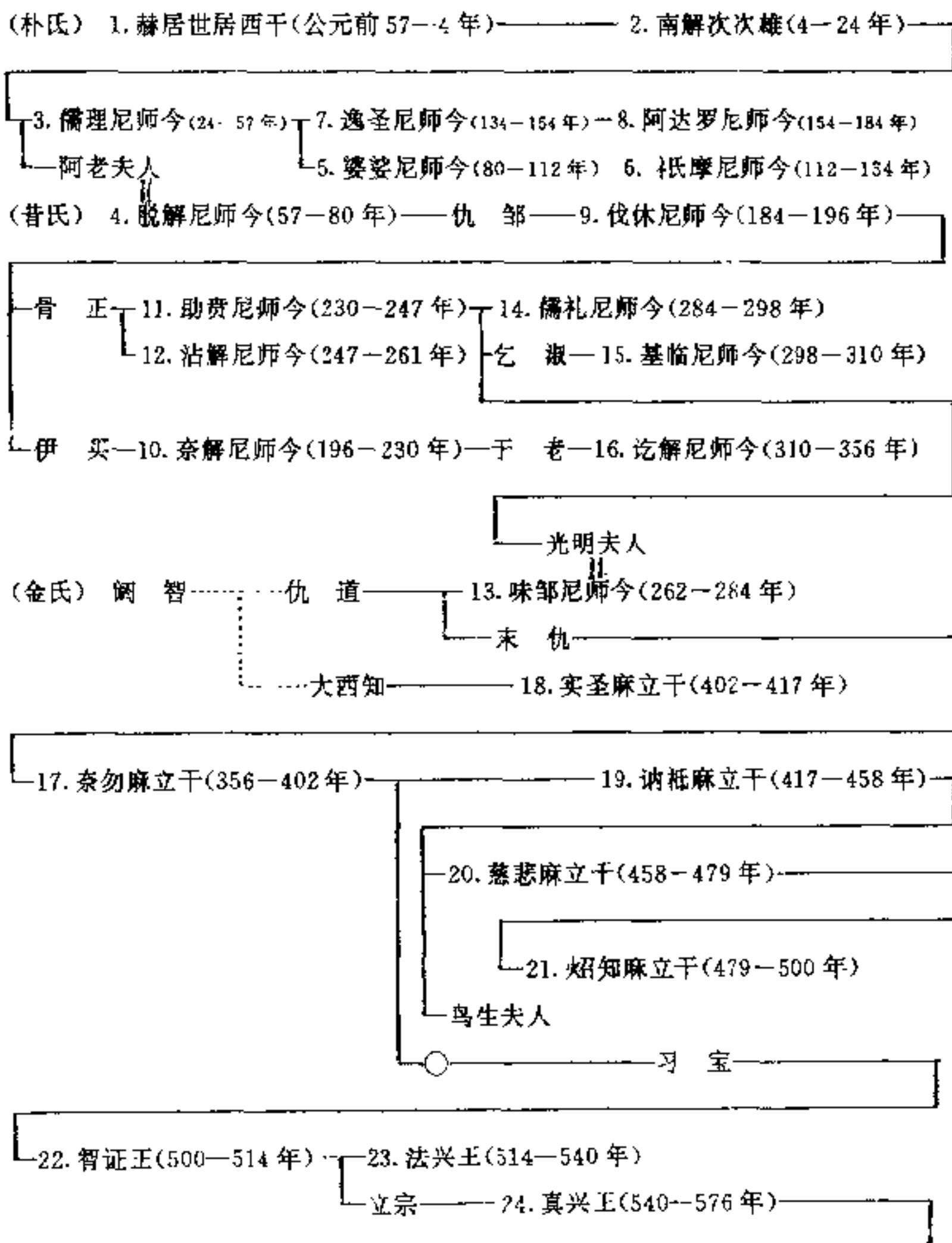
(公元前 18—6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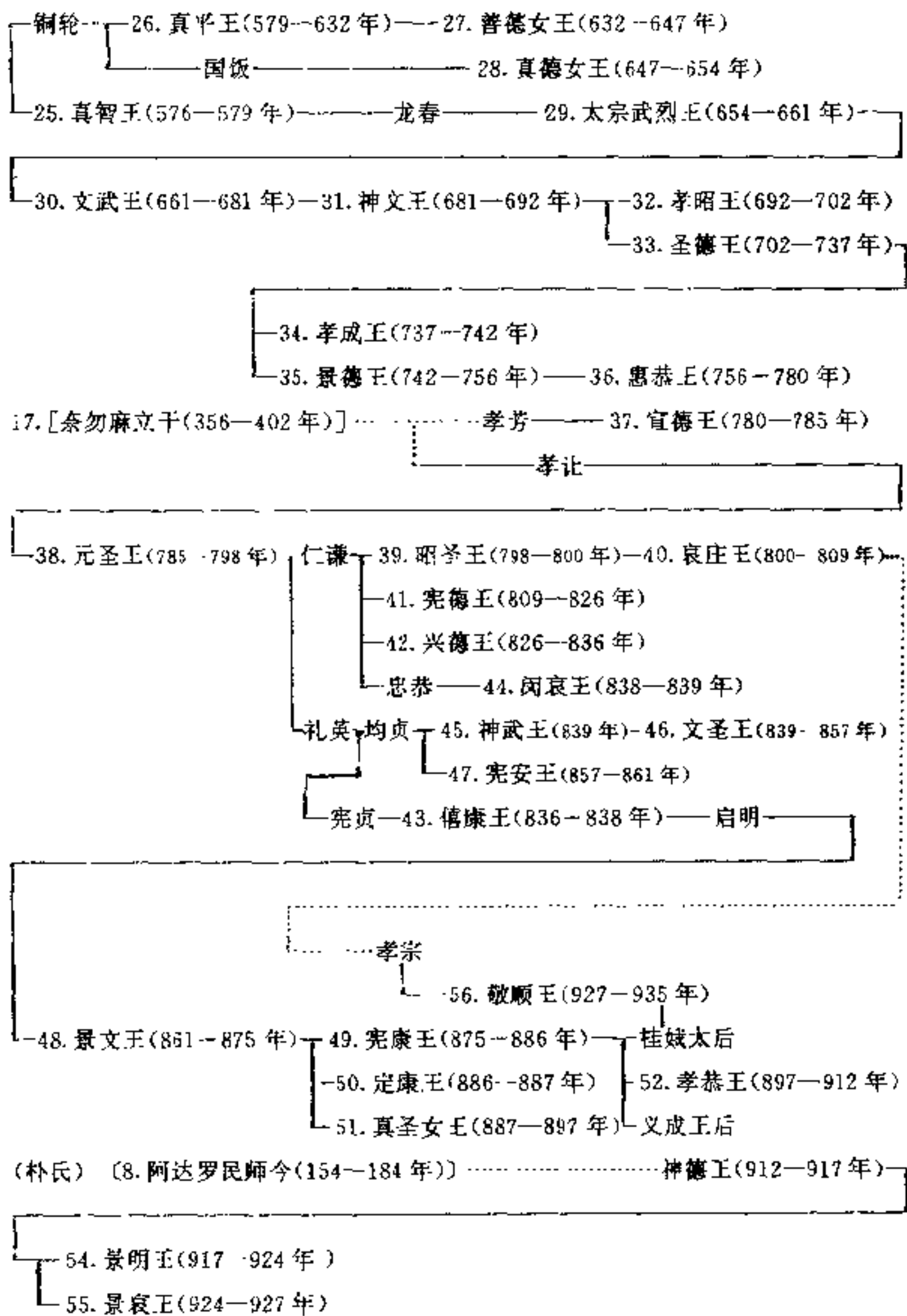
1. 温祚王(公元前 18—28 年)——2. 多婁王(28—77 年)——3. 己婁王(77—128 年)→



新 罗(朴、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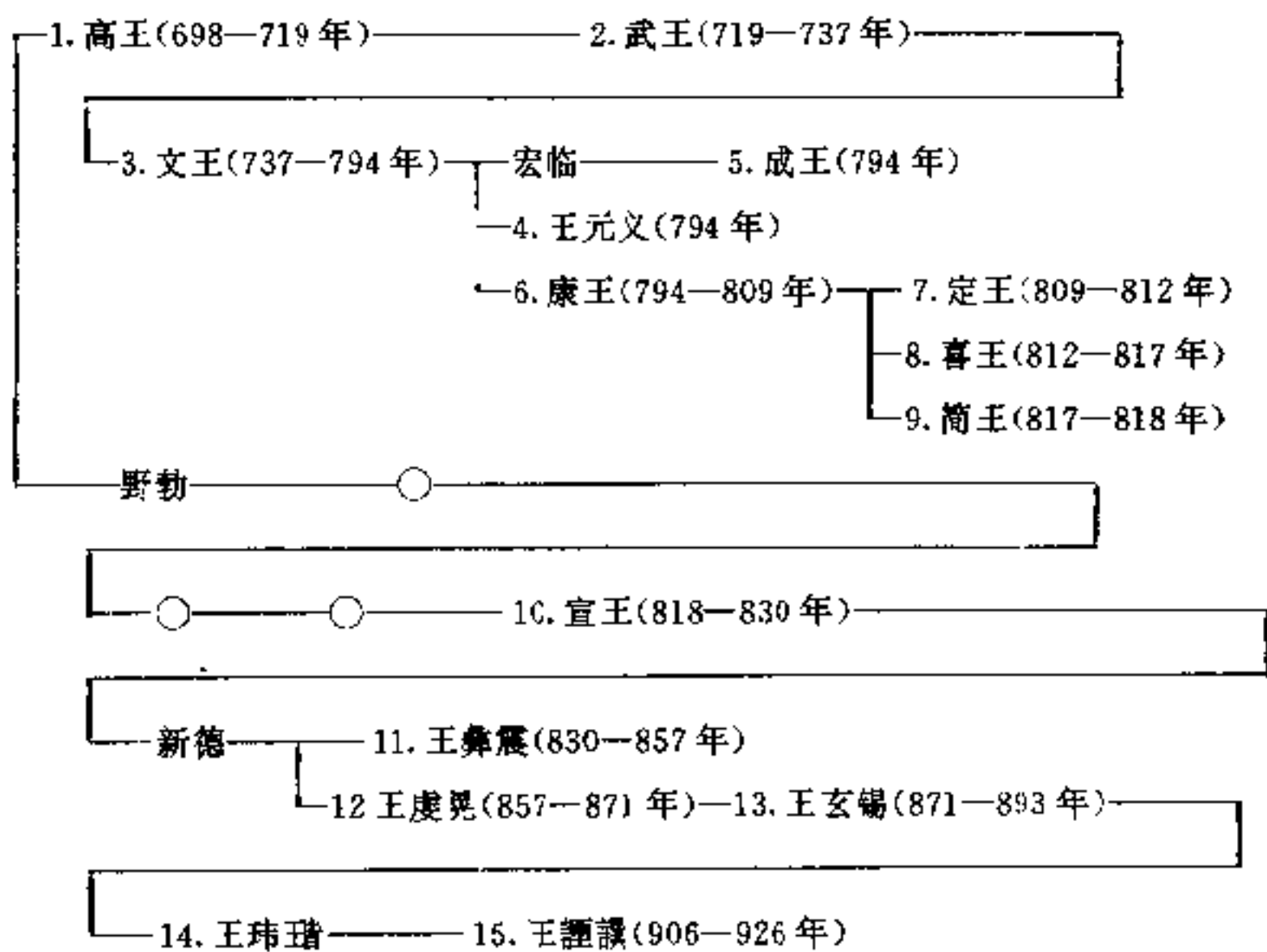
(公元前 57--93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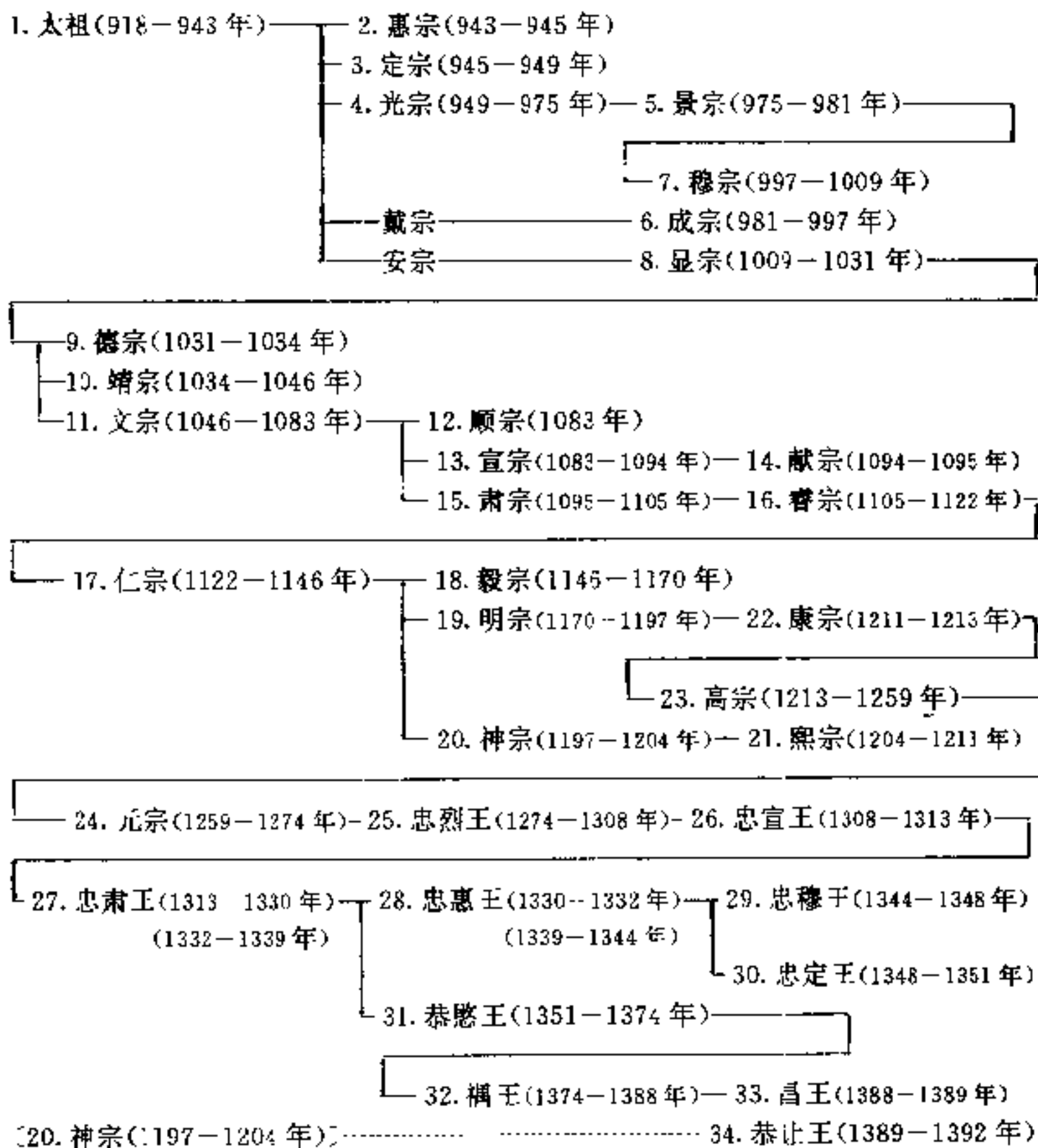
渤海(大)

(698—926年)



高丽(王)

(918—1392年)



朝 鲜(王)

(1392—1910年)

